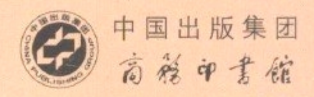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东南亚史

[澳] 米尔顿·奥斯本 著　郭继光 译

Southeast Asia: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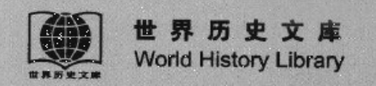


Southeast Asia: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ISBN 978-7-100-0945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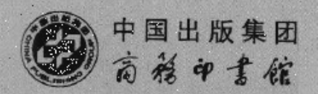
定价：38.00元



东南亚史

[澳] 米尔顿·奥斯本 著　郭继光 译

Southeast Asia: An Introductory History



图字：01－2010－3622
SOUTHEAST ASIA：An Introductory History
By Milton Osborn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南亚史/(澳)奥斯本著；郭继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100－09458－0

Ⅰ．①东… Ⅱ．①奥…②郭… Ⅲ．①东南亚-历史
Ⅳ．①K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3384号

东南亚史

责任编辑：王卫东
责任印制：孙志莞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商务印书馆
地　　址：北京市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电　　话：010－65258899
印　　刷：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1/16
印　　张：20.25
字　　数：282千
印　　次：201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38.00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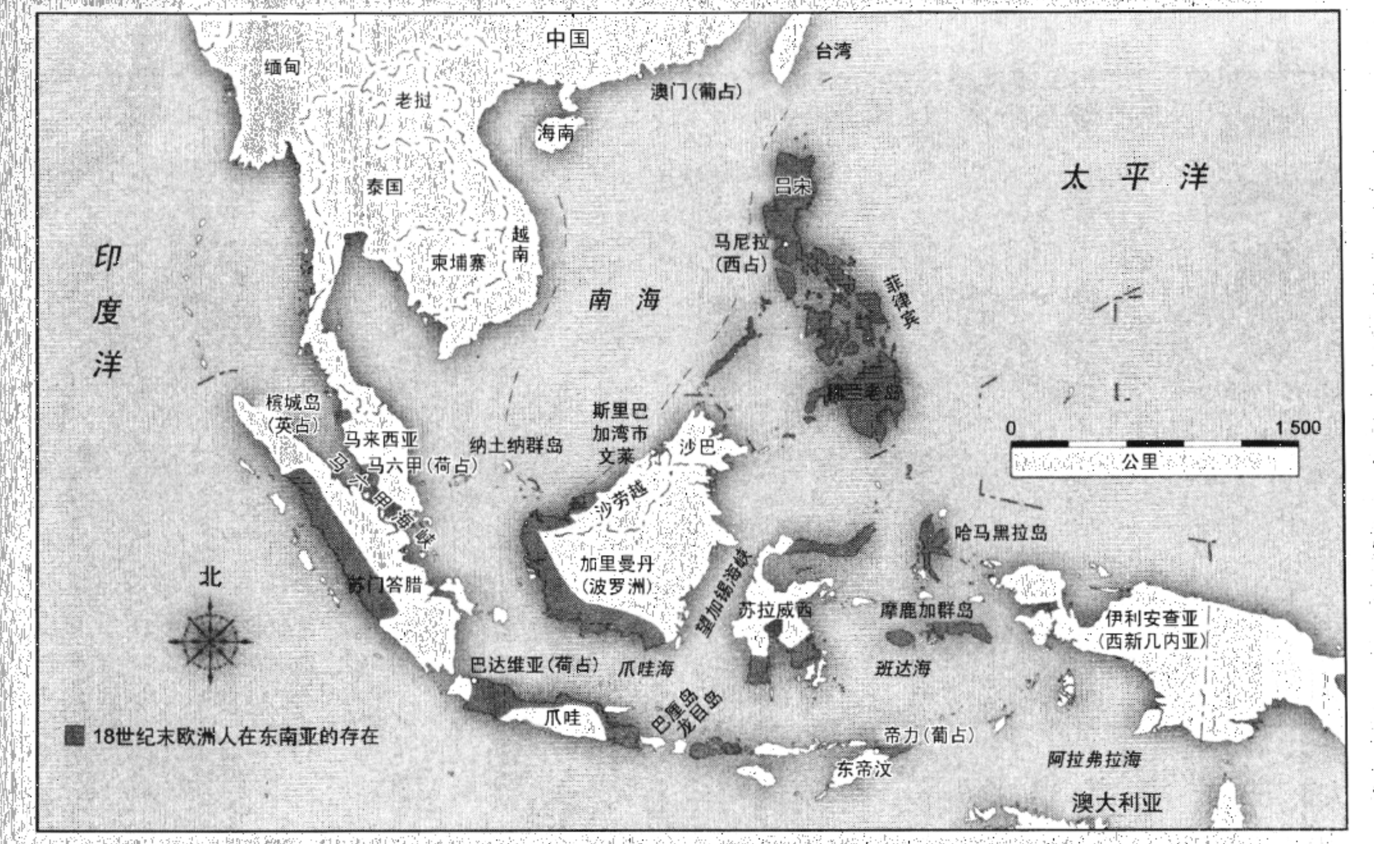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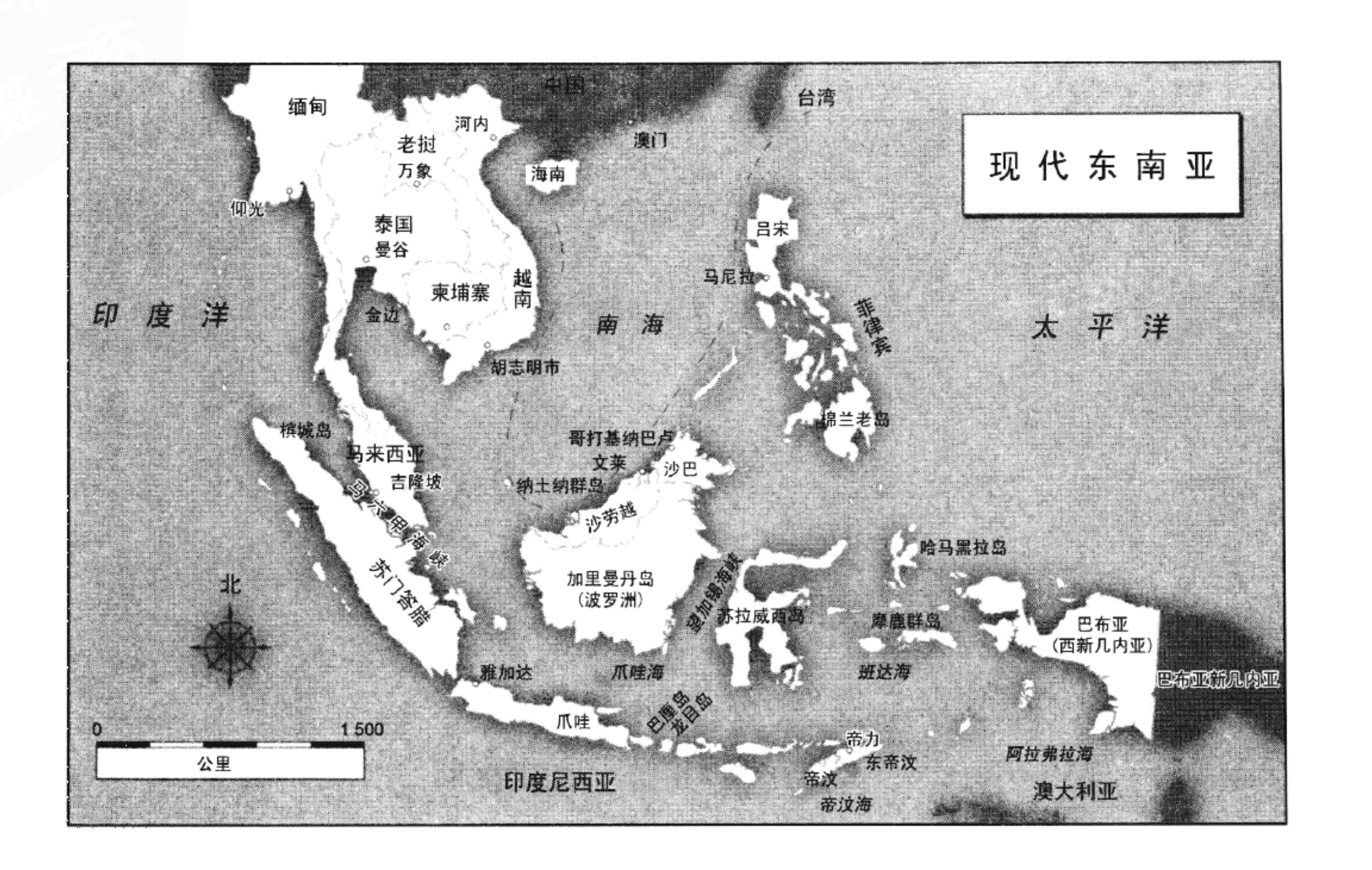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这幅地图以一种很常见的方式表明了18世纪末期欧洲人在东南亚的存在。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没有欧洲国家在东南亚大陆拥有殖民点(马来半岛被认为是东南亚海洋地区的一部分)；除了荷兰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和西班牙的马尼拉之外，欧洲在东南亚海上世界的定居点在数量和力量上都很小；图中阴影部分不应该被认为是区域的反映，相反，它是权力和商业政治活动的结合。图中的边界和地名多为20世纪的边界和名称。


现代东南亚
中国
台湾
澳门
海南
缅甸
河内
老挝
万象
仰光
泰国
曼谷
柬埔寨
越南
金边
胡志明市
印度洋
南海
太平洋
吕宋
马尼拉
菲律宾
棉兰老岛
槟城岛
马来西亚
吉隆坡
马六甲海峡
哥打基纳巴卢
文莱
沙巴
纳土纳群岛
沙劳越
加里曼丹岛
(波罗洲)
苏门答腊
望加锡海峡
苏拉威西岛
哈马黑拉岛
摩鹿群岛
巴布亚
(西新几内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雅加达
爪哇海
班达海
爪哇
巴厘岛
龙目岛
帝力
东帝汶
帝汶
帝汶海
阿拉弗拉海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北
0
1 500
公里

前　　言

xiii

在准备这本《东南亚史》第九版的时候，我修正了统计材料和“建议阅读”中的书目，删除了一些已过时的条目，增加了大量东南亚研究最新的重要文献。与以前的版本相比，这个新的版本更加关注经历了殖民统治的每一个国家的后殖民定居点在独立之后的变化。在1979年本书的第一版出版至今的这段时间内，与最初的后殖民定居点的割裂已日益突显其重要性。尽管如此，让我们再次引用大约400年前沃尔特·拉雷（Walter Raleigh）爵士的至理名言：“任何人在撰写现代历史的时候，如果与历史事件太接近，都有可能失败。”因此，尽管我列出了新近发生事件的概要，但却无意对之进行详细分析。

本书中儿处惯用语的用法需要说明。书中提到的日期是目前通用的公元纪年。凡是涉及泰国的部分，本书统一使用“泰国”，而非其旧名“暹罗”，即使“泰国”这个名称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确定的。同样，我使用“Burma”而不是“Myanmar”——这个充满了政治意味的术语。此外，在提到老挝时，我使用形容词的“Lao”，而不是旧的用法“Laotian”。

xiv

尽管已经是第九版了，但是以下诸位在早期各版中给我的建议仍使本书获益良多：戴维·钱德勒（David Chandler）、约翰·雷葛（John Legge）和梅尔雷·李克莱弗斯（Merle Ricklefs）在总体文本上的建议；

帕梅拉·古特曼(Pamela Gutman)和比尔·奥马利(Bill O'Malley)对有关东南亚艺术和地区写作方面的建议。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再一次偿还我对已经过世的霍尔(D. G. E. Hall)教授和沃尔特斯(O. W. Wolters)教授所欠的人情债。当我跟随他们学习东南亚历史的时候,他们给我带来了灵感。我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已经过世的迈克尔·利弗(Michael Leifer)教授多年来给我的友谊和帮助。作为关注当代东南亚的学者,他理解过去的重要性。

米尔顿·奥斯本(Milton Osborne)
悉尼,2004年

目录 *Contents*

插图

版图

地图

图表

示意图

第一章　什么是东南亚？

1

没有什么比从大小和比例开始讨论更好的了。对于一个研究东南亚历史的新手来说，东南亚的过去比纷乱的现在更加让人困惑不解。不过，即使只考虑当前的状况，一个局外人仍将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如何用地理术语形象地描述东南亚的面积以及如何认识其人口规模。印度尼西亚的人口超过2亿也许众所周知，但是，有多少人认识到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这个事实的意义？只有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人口超过印度尼西亚。而且，有多少业余观察家意识到目前统一的越南拥有7 900万民众，比西班牙(3 900万)、埃及(7 100万)、波兰(3 900万)和加拿大(3 000万)的人口还多？况且，越南还只是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四个人口超过3 000万的东南亚国家之一。虽然人口总数只是约数，但可以确定的是，21世纪初期东南亚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总数比例不低于8%。当用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来进行对比时，这个数字的意义就清楚了。中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20%—25%。因此，仅仅以这个作为标准，东南亚地区的人口数量也堪称巨大。

2

规模本身并不意味着力量，这在今天的东南亚和过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确实是如此。不管一个单个的东南亚国家能够在其领土内外行使多大的权力，该地区还没有一个国家发展出如一些欧洲强国曾经拥

有的全球性力量,比如鼎盛时期的英国,或者 20 世纪最后 25 年里的超级大国。由此就引出了一个重大问题需要东南亚历史学家来回答:既然其规模如此巨大,那么为什么在过去的 2000 年里东南亚地区在全球力量的转移中发挥的作用这么小呢?

要更准确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许多因素,而且并不是所有东南亚专业研究者都认同这些因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仰仗于使用那些可能会让文化背景严重欧化的人感到吃惊的术语来考查东南亚。这就是大小和比例值得关注的地方。

很多人认为,无名的或鲜为人知的城市、国家或者族群的规模和重要性,比那些更加出名的地区和族群要小得多。还有一种同样武断的做法是,用我们自身所处社会的文化传统所认为的重要性去衡量和评估陌生文明的成就。与 100 年前相比,今天的生活也许同质化程度较高,但当时的欧洲探险家及其继任者、管理者、传教士、殖民者,以及贸易商人却丝毫没有怀疑他们自己的优势。然而,这个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因为对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来说,东南亚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区域。

由于我们知道伦敦和巴黎是当代大都市,而且我们知道它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的定居点,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一直以来都是巨大的和重要的。伦迪尼姆(Londinium,伦敦的拉丁文拼写)在罗马时代的重要性,可能远远超过鲁特西亚(Lutetia,巴黎的古代名称),后者在 4 世纪把名字改为巴黎。但是由于我们熟悉“伦敦”这个名字,因而很难想象从罗马时代直到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军事征服,这个地区是多么渺小。当诺曼底的威廉于 1066 年圣诞节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的时候,伦敦还没有享受到英格兰皇家城市的待遇。仅有不到 3.5 万人居住在这个中世纪城市乱糟糟的街道上——这就是当时的伦敦给人留下的印象。与此同时,在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柬埔寨,超过 100 万的人口与一座城市彼此依存。这座城市在其建筑成就、水利工程的先进性以及每年定期收获三次水稻作物的能力上,与当时的任何欧洲城市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吴哥城。直到发现了它的

3

遗址以及其中的大量碑刻,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具有卓越成就和复杂技术的文明。但是几百年来,欧洲、罗马、威尼斯、巴黎和伦敦,以及其他十几个大城市的奇迹将学者们的注意力和观察者的兴趣牢牢锁定。伟大的柬埔寨吴哥城,作为一个几乎持续了六个世纪的强有力帝国的中心,直至 19 世纪才为西方所知,而且对其认识的深入也进行得相当缓慢。

我们也许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观点。雅典、底比斯、斯巴达虽是小国,却仍然活在研究欧洲历史的那些人心中,这是因为它们对(广义的)欧洲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相比之下,除了专家和部分旅游爱好者,很少有人知晓蒲甘帝国的知识。蒲甘是 11—13 世纪缅甸的权力中心,也建有一个可以与吴哥建筑相媲美的寺庙建筑群。那些秉承西方传统的人不能立即接受蒲甘和吴哥社会的宗教和文化基础。当把关注点转向另一个早期东南亚帝国的时候,这些人也同样明显缺乏理解和认同。一个西方人很容易想象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航行到美洲的画面(不论准确与否),但是他却很难想象马来水手英雄般的航海壮举。事实上,他们航行到中国,并为早期东南亚历史留下了一个强有力的大国:根植于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

不过也不能片面夸大我们对欧洲的了解与对东南亚的不了解之间的反差。有很多好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理解欧洲历史的片段相对容易,以及为什么在了解东南亚历史进程时难以获得类似的背景意识。 4
为了获得更深入的早期东南亚历史知识,需要付出时间和专注,还要愿意学习大量艰涩的语言。要研究这些普通大众缺乏兴趣的课题,上述条件也许是必需的。几代学者在一些个案上辛苦研究,仅仅掘开了该地区历史总体结构的一些片段。幸运的是,对一般的学生来说,在"全然无知"与"学术般地专注于细节"(尽管令人羡慕,但只有专家才能做到)之间存在一些中间状态。

到目前为止,我在这个以概述为主的章节中,用一种广义的、非特指的方式来使用"东南亚"这个术语。如果在 19 世纪 30 年代这样做将让人相当吃惊,因为当时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思考和谈论"东南亚"。一

些作者使用“近印度”(Further India)这个术语来表述东南亚区域,就好像孟加拉湾之外的所有已知区域只是另一个规模较小的印度次邦一样。只有当人们考察中国对越南文化生活的影响,或者涉及菲律宾由于西班牙的长期影响而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的一些特性时,他们才意识到“近印度”这个术词是多么不合适。另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经常被使用的一般描述是“季风亚洲”,这个术语来自对几乎所有东南亚国家都非常重要的季风气候。尽管地理学家经常使用这个词,但是它不仅仅涉及现代学者所指的东南亚;锡兰、印度部分地区以及南中国地区同样被描述为季风区。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东南亚工作的外国人(无论是以学者身份还是以其他身份),还是东南亚国家的当地居民,都不以上述这些常见的词语来指代该地区。这些称呼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而出现的。当时出于军事方面的需要,一个东南亚地区的概念开始成形。从战略军事观点来看,当时这个区域不是印度,不是中国,也不是太平洋的一部分。相反,一种意识开始萌芽:文莱、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现代国名而不是其他名称来称呼这些国家,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初期已经非常流行)形成了某种地理单位。我特意没有把菲律宾包括进去,因为菲律宾是否属于东南亚,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晚期仍然是一个学术上不确定的问题。至于东帝汶,直到 1975 年其领土被印度尼西亚侵犯之前,人们很少在考察东南亚历史时提及。

当然,东南亚被当作一个地理和文化单位不能仅仅是军事战略的考虑。在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开始探究现在所称“东南亚”范围内的这个地区和另一个地区之间的相似点。整个东南亚大陆各个王室的宫廷礼仪存在相似之处,这被认为是显示了一种共同的遗传特征或传统。家庭结构的基本相似点也存在于广泛的区域内。历史学家已经开始将之汇总在东南亚漫长历史中关于外来思想和外来者重要性的所有已知证据,以揭示东南亚自其最初历史阶段以来的内部国际关系的区域模式。换句话说,东南亚不是一个仅仅受到其

强大邻居——中国和印度影响的区域。地区内的帝国盛衰起落,而且大陆和印度尼西亚岛屿还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了政治和贸易关系。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学者对该地区的重视,把东南亚当作一个整体的趋势越来越流行。现在,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语言学家(此处仅提及一些著名的学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调在该区域的广大范围内所找到的基本相似点。为了理解这些学者对此激动不已的原因,以及强调东南亚何以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有必要对该区域的一些现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其实是在战后才获得普遍认可的特点,进行简要评论。

6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认识到,东南亚国家既不是"小印度",也不是"小中国"。这两个大国对该地区的影响不能被忽视,即便它们影响的程度和效果存在争议。不过,将东南亚国家视为是文化独立的单元也已成为一种共识。换句话说,如果过去的趋势是将东南亚视为一个由外部(尤其是那些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文化价值构成的地区,那么现在的学者对当地文化传统的力量和重要性则报以同样的关注。在那些印度人或者中国人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如东南亚艺术、宗教、政治理论等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这些外来思想被缅甸人、柬埔寨人、印度尼西亚人以及其他人所采纳,以适应他们自己的需要和价值观的程度。例如,印度宗教概念的重要性一定得到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认可,但是印度教最根本的特征之一——严格的种姓制度,却从来没有被印度之外的国家接纳。印度的建筑和艺术概念在东南亚艺术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过,蒲甘、吴哥的荣耀和爪哇的庙宇建筑,其根源都是它们自己的个性,比如泰国制造的精美佛像就不同于在印度发现的佛像。即使对外依赖较严重的越南,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比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更为显著,但其本土的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尤其是在平民阶层),显示了它并不是一个仅仅接收外界影响而没有自身传统价值的国家。

东南亚和外国的学者都逐渐认识到,印度和中国的影响在过去被过分强调了,而存在于该地区各种社会之中的基本相似点却没有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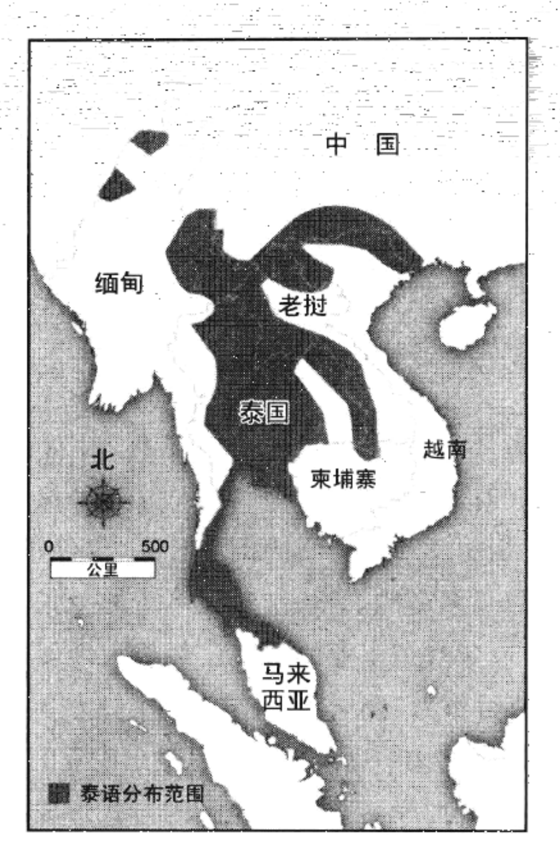
足够的重视。尽管东南亚的各个社会不太可能存在普遍的统一性，但是遍布广大地区的某些广泛的相似点还是相当惊人的。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核心家庭或个体家庭的重要性是一种广泛的相似点，这与印度强调大家庭的传统正好相反。同样，在传统的东南亚农业社会中通常将妇女置于家族中的显要位置，这不仅反映了当地普遍的价值观，也与印度和中国社会形成了对照。

7

之所以将东南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量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意识到很多地区的语言同一性被殖民强国所设置的边境强行割裂。现在仍有人尚未摆脱以前殖民强国造成的幻觉，总是试图强调不一致性，而不是去认可广泛的相似点。比如，越南这个国家，仍旧有一些人认为越南的北部和南部讲不同的语言。然而事实是，与其他任何国家一样，越南各地区拥有各自的方言。但是，如果语言上的同一性标志着更广泛的社会统一性的话，那么，无论越南的政治史如何错综复杂，它都一直是个统一的国家。因为北部与南部的越南语之间的差异肯定不比“受过教育的南部英格兰人”与粗鄙的苏格兰人所用的语言之间的差异大，而且还比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方言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

当我们观察比单个国家(如越南)更大的地区时，广泛的语言同一性的现象更加突出。这种同一性的有些方面只有那些最权威熟练的学者才能发现。比如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的越南人和高棉人(或者柬埔寨人)拥有共同的、遥远的、说同一种语言的祖先。业余人士对此很难理解，部分是因为，在这些语言中，越南语有音调，而高棉语没有音调。但是一个业余人士却不会忽视下面这个明显的事实：傣泰语系的许多方言变种，在泰国、中国南部部分地区、越南、缅甸掸邦、老挝、柬埔寨西部和东北，以及马来半岛最北部(尽管这种情况在今天已越来越少)，都被广泛使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重要现象。傣泰语系拥有如此广泛的分布，这提醒我们注意地图上那些通常是人为设置的边界线，因为如果将共同的语言视为建立一个国家的基础，那么把老挝低地地区从泰国划分出来似乎很难说得通。同时，鉴于使用傣泰语系的人群在东南亚的广泛分布，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境内少数民族的存在，现在东南亚的许多

8



语言属傣泰语系的各民族在东南亚大陆的分布

傣语不仅是泰国人口的主要语言，而且它也被缅甸的掸族人、老挝的低地人口和越南、柬埔寨和马来西亚北部的人们广泛使用。在中国的最南部也能发现傣泰语系的使用者。

国家正受到相当程度的民族不和的困扰。大多数人，或者主导的统治集团对少数族群的诉求，包括语言兴趣方面的诉求在内，颇不以为然。举一个例子，无论在当代还是在过去，缅甸许多使用傣泰语系的掸族人都痛恨缅甸人的控制，因为后者是他们长期的对手，并且讲不同的语言。 9

另一个最重要的语言同一性的例子是印度尼西亚或者马来语(学术界称之为“南岛语系”)的广泛分布。同样，虽然不同地区的方言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但是这个基本语言的各个变种确实在当代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南部沿海地区广泛使用，其中越南的南部沿海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有使用印度尼西亚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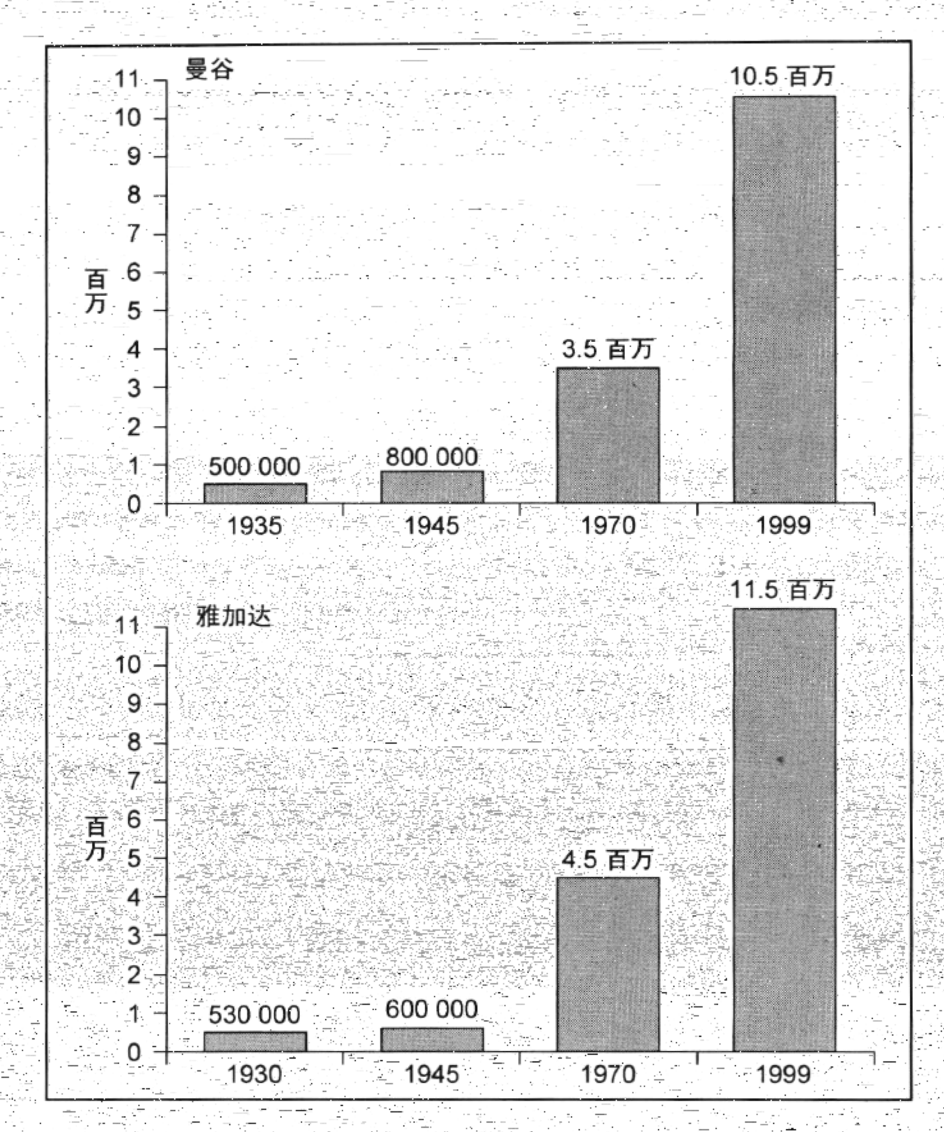
者马来语的定居点。不过就如印度尼西亚的国家格言“多样性中的统一”一样，刚才描述的相似点和同一性并不能抹杀存在于各地区和各族群之间的巨大差异。当然，研究东南亚历史时，确实会在这方面遇到一些难以进行判断、辨别的问题。对一个地区或者一段时期来说，应该强调其同一性还是差异性？鉴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传统势力依旧强大而受现代世界影响有限的地区，那么在东南亚历史标志性的特征——连贯性、与割裂过去、引发变革的非连贯性之间，我们应如何分配自己的关注点？

所有这些问题不可能有明确一致的答案，因为它涉及了如何判断——既对个体又对群体下判断，而判断总是有争议的。判断总是取决于潮流时尚，而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潮流时尚(仅仅举出这两个学科)如服饰潮流一样总是多变的。不过，对于下述的主张也许存在某种程度的共识。过去 50 年对东南亚的研究已经极大地促成了人们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是值得作为一个整体和作为一个独立于南亚和中国文化的实体来关注的地区。按照这种框架来思考东南亚的做法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与此前学者研究该地区的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目前，同一性和相似性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不过，给予差异性足够的关注也同样重要。差异性把不同的地理区域和不同的族群彼此区分开来。对旅游者来说，这些差异性经常使得他们在东南亚的不同地区之间穿梭成为一种既轻松又很长见识的经历。

10

东南亚的区域范围超过 35 个纬度和约 50 个经度，可想而知，它拥有着怎样丰富多彩的地理特征。传统上，人们大多群居于低地定居点、海岸以及河流湖泊沿岸，但这只是定居地理模式中的一种。例如，越南北部对高密度定居点的需求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红河流域农业种植方法，之后湄公河流域人数较少的越南人也开始使用这种方法。不过，即使只观察湄公河流域，一个当代旅行者仍然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存在于柬埔寨和越南南部物理景观之间的差异，这是由于那些地区虽然彼此相邻，却有着不同的人口压力，而且他们对于农业人口所追求的价值认识也不相同。驱车从金边到西贡(胡志明市)，一路上看到的是

完全不同的景观。柬埔寨那一边是休耕的土地，正在耕种的土地则是一年一收割。零星分布的优椰使眼前的一切仿佛一幅巨大的田园风景



迅速发展的东南亚城市

《双城记：曼谷和雅加达》

迅速发展的城市已经成为东南亚现代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曼谷和雅加达的发展展示了这种状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这两个城市的人口都不到 100 万。54 年后，曼谷的人口已经是 1945 年时的 13 倍多，而更大的雅加达的人口则是 1945 年的 19 倍。

东南亚大城市人口的持续增长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它们必须提供服务以及增加工作岗位。

画，并告诉人们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被稻米夺去了立足之地。不过，一旦越过边境，景观立即发生了变化。即使非专业的观察家也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农业模式，这种模式似乎没有留下任何土地来休耕，而且一年种植两季稻米，土地上的优榔已经被清除干净，这样的景观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没有被任何垂直物体所阻挡。

湄公河流域的柬埔寨和越南在外观上的差异本质上是由不同的农业实践造成的，而这又是源于不同的地质基础，山脉和山谷之间的差异，以及气候与降雨条件的地区差异。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地区都处于热带，不过这不意味着此地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热带的丰饶。那些居住在泰国、缅甸和老挝高地地区的山地民族受制于他们的物理环境，其生活模式就很难让人联想到热带的丰饶，而这种丰饶在某些气候更有利的地区可能是其标志性的特征。

是否可以将东南亚视为一个滋润、蓬勃、肥沃的整体，仍需要斟酌。它可能拥有所有这些特质，但前提是人口数量适中，且所辖土地肥力足够、适宜耕种。没有比爪哇岛上即将成熟的作物连成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更具有欺骗性的了，在那里，越来越多的人口（在 21 世纪初已经超过 1 亿）挤在一个与英格兰差不多大的地方。而英格兰不仅人口只有它的一半而且还是一个经济多样化的发达国家。同样具有欺骗性的是被马来半岛的热带雨林覆盖的绵延起伏的小山。从空中俯视，马来西亚西部的森林延伸到地平线，没有被公路或者定居点阻挡。这里有森林资源，但是无法为增长的人口进行农业扩张。

从缅甸的干旱区到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Papua，以前的伊里安查亚）被冰雪覆盖的山脉，从越南西北部绵延起伏的牧区草原到菲律宾群岛陡峭的梯田稻米地，东南亚是一个由多种地质条件和农业耕作方式彼此配合而成的混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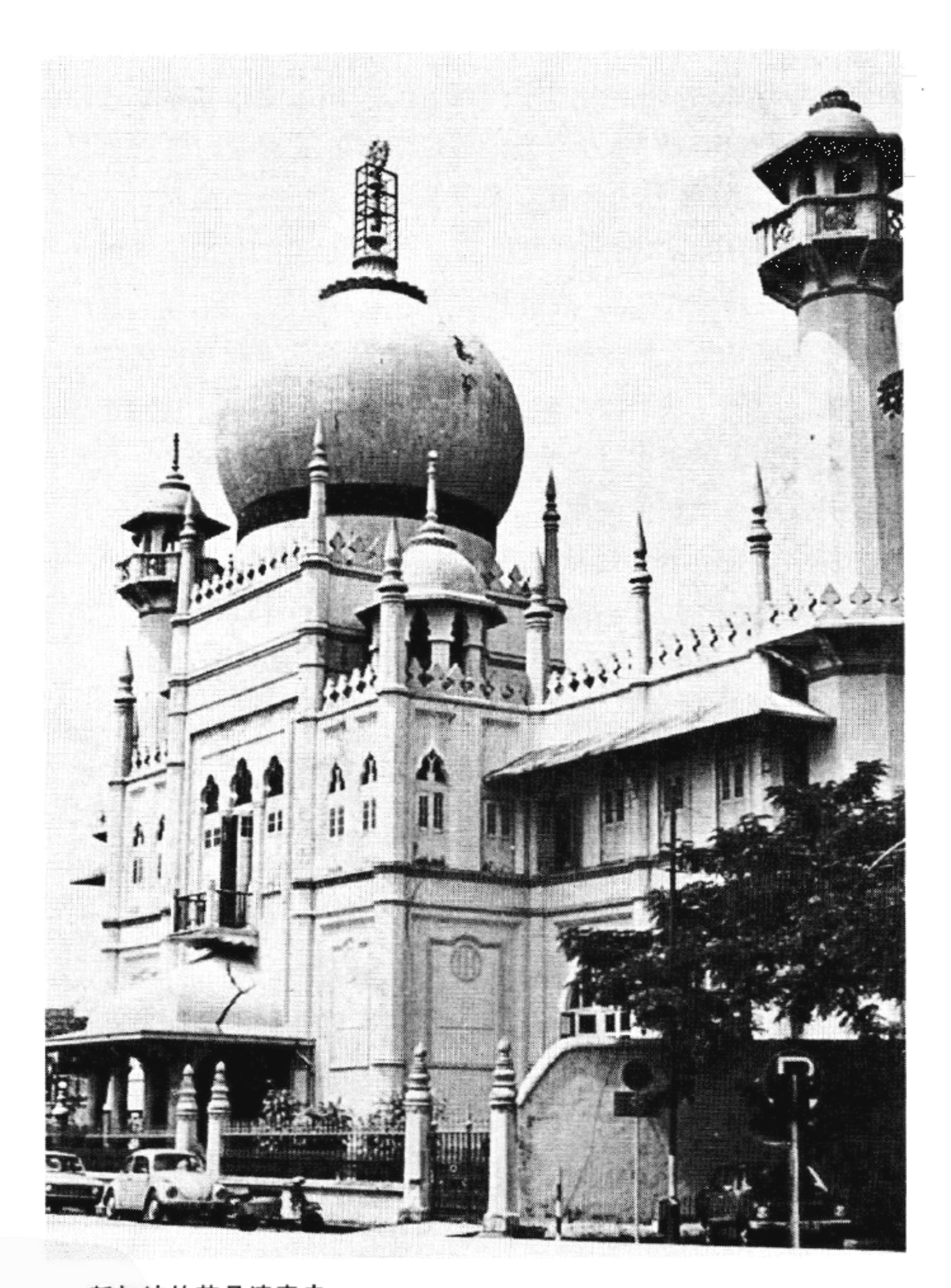
东南亚是一个充满反差的地区。对于在该地区旅行的人来说，最明显的反差是城市与乡村。东南亚城市的发展已经成为 20 世纪最显著的发展特征之一，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以下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一戏剧性的变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曼谷拥有超过

1 000 万的人口。仅仅一个世纪以前,泰国的总人口只有 600 万。甚至在 1960 年,曼谷的人口可能少于 150 万。在城市人口的增长方面,曼谷的例子与雅加达、20 世纪 90 年代的金边、胡志明市和许多省级城市中心区等,都有相似的地方。这些迅速发展的亚洲城市吸引着农村人离开乡村,他们在乡村通常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和繁荣的前景。对他们来说,不管城市中心区的条件是多么凄惨,至少它们看起来能够为个人发展提供一些希望。失业、拥挤和城市服务系统的不足,这些残酷的现实经常将那些希望无情地扼杀。不过没有什么比乡村居民持续地迁移到城市地区更能反映当代东南亚城市与乡村的反差了。这种迁移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逃避乡村生活狭窄的视野、长期的繁琐苦工,以及在许多年轻男女看来受到传统束缚的种种限制。在东南亚的乡镇,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购置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以应对通讯革命,而为了更方便地去往全国各地,还需要拥有相应的交通工具。远离城市的不便由此可见一斑。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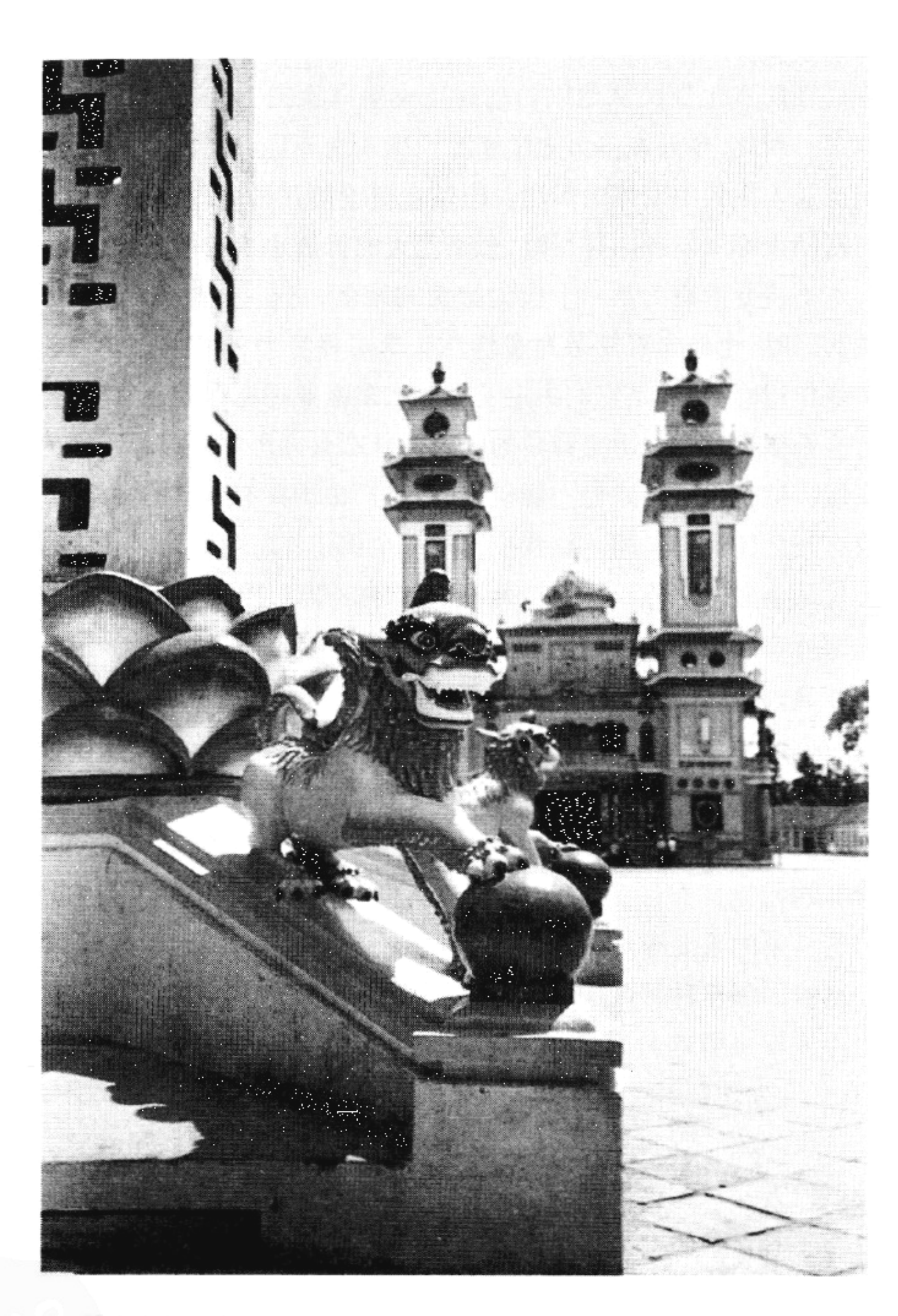
富有和贫穷,发达和落后——这一类的反差在东南亚比在那些从 19 世纪伟大的工业革命中受益的地区要明显得多。如果将东南亚视为政治不稳定的地区,那就很好理解,为什么该地区的各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寻求独立的过程中,其政权更替会面临这么多问题——几乎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泰国是一个例外,它从来没有处于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之下。不过,就泰国曾经面对和目前面对的问题而言,它的历史经历与以前的殖民地有许多类似之处。让我们暂时回到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相似点,这里有另一个重要的理由促使我们把该地区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几个零散的国家。除了刚刚提及的例外的泰国,其他所有东南亚国家都经历过不同阶段的殖民统治。我们在这个共同经历里能找到什么样的相似点和差异点呢?外来的殖民强国是英国、法国、荷兰,还是葡萄牙、美国,这重要吗?为什么有些殖民政权和平地离开了,而有些却不惜动用战争以试图留下来?

提及东南亚的殖民时期将会产生另外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问题:应该对东南亚历史中的殖民因素投以多大程度的关注?不同的人和不



新加坡的苏丹清真寺

伊斯兰教是东南亚的主要宗教之一，在文莱、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占主导地位。东南亚清真寺的建筑形式表明它借鉴了中东地区的风格，如这幅图片中的新加坡苏丹清真寺。



越南南部的高台教“大庙宇”

高台教产生于20世纪初期，是一个混合宗教，这一事实可以通过它的建筑反映出来。

16 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答案。在过去,撰写东南亚历史的非东南亚人常常将当地的本土居民从他们自己的历史中排除出去,认识到这一点大有裨益。因此,今天许多历史学家意识到东南亚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东南亚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即使在讨论前往该地区寻求权力和财富的欧洲人等所发挥的作用时,东南亚人的价值也不应被忽视。

本书将要考察的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地区,它在拥有一些显著的同一性的同时,也包含着复杂的多样性。本书将努力去发掘那些曾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因素,是它们决定了为什么东南亚拥有目前这些特点,以及这些看似拥有类似历史背景的国家为什么会经历如此显著不同的政治发展。这个地区是我们一切研究的背景,由于具有丰富的多样性,所以它有时会使我们畏缩。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东南亚地区在宗教特征上也是最多样化的。伊斯兰教在海域地区势力强大,小乘佛教是泰国和柬埔寨的国教。该地区的一些地方是虔诚的基督教区,最出名的是菲律宾;而在其他地方,泛灵论则是最大众的宗教信仰。上述这些宗教并没有涵盖全部。这里还有印度教的追随者,不仅是印度移民的后裔,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和龙目岛的当地居民。共产主义是越南的国家制度,但是在越南社会里面仍明显存在着一些儒家价值观。高台教在越南南部有许多信徒,并将圣女贞德和维克多·雨果列为其个人行为精神的重要导师。

尽管面临着种种多样性,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组成该区域的国家历史中发现重要的共同主题。尤其是当接近东南亚历史的当代部分 17 时,我们会发现:那些寻求独立的人所面对的问题,以及那些试图领导独立国家的政府所面对的问题,通常都具有巨大的相似性,虽然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都大相径庭。

由于其复杂的过去和时而动荡不安的现在,不论是对非专业的观察家还是那些花毕生时间对其进行研究的人来说,东南亚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对象。了解东南亚的历史并不能提供任何对该地区将来发展的指导,因为这永远不是历史学的任务。但是考察该区域的历史将会厘清现在,搞清楚为什么各个国家的政治会如此不同,以及该地区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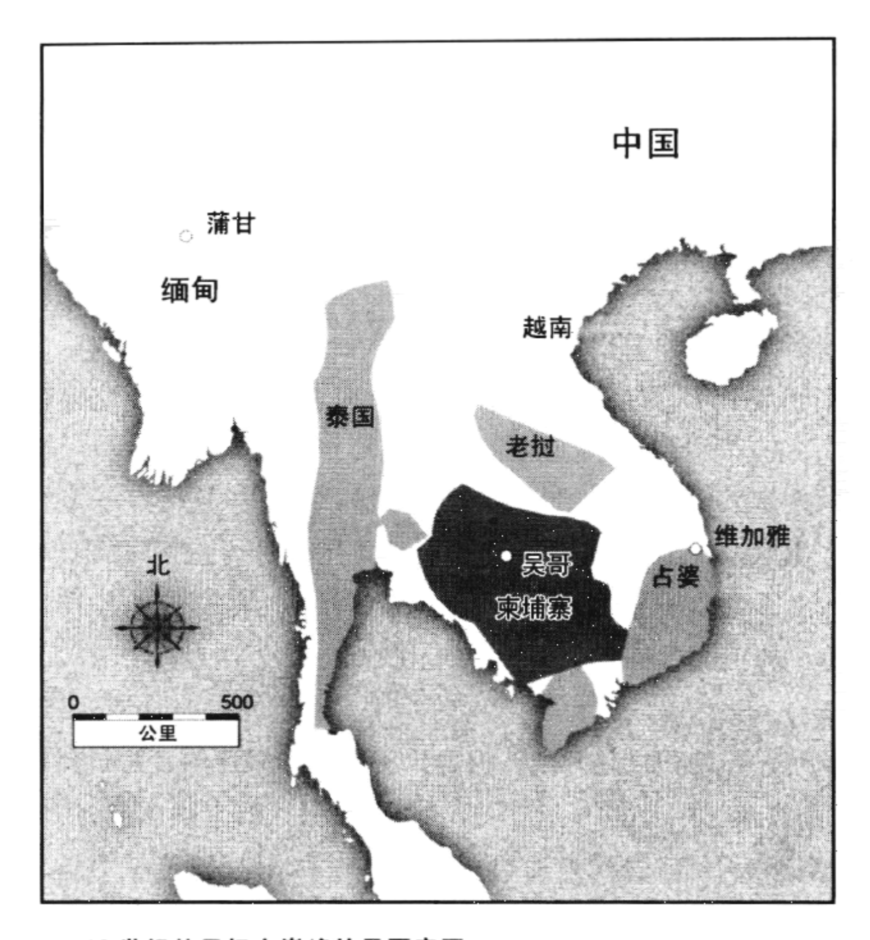
一个整体为什么在很多方面和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到外部的强烈影响。总之，了解东南亚的历史，将能够深入了解世界人口中一大部分人迷人的生活和信仰，而且由于他们的文化成就与当代的政治兴趣相去甚远，因此值得我们对之投以比过去更多的关注。最近，由于对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发展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缺乏了解，已经初见悲剧的端倪。这个事实更促使我们去大致了解那些成就今日东南亚的历史发展脉络。

18

第二章　现代东南亚历史的“古典”背景

东南亚历史学家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词汇。历史学家应该如何用西方背景发展出来的词或者短语来描述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经历？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学者们仍在进行争论：如何使用合适的方式来描述东南亚历史的特定时期，以及这些时期具体是怎样的，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因此，尽管“古典”或者“中世纪”这样的术语可以为那些关注欧洲历史的人所接受，但是东南亚历史学家对此却不以为然。

解决方法之一是使用那些没有特定文化或者历史价值观的词：写作和讨论“早期”东南亚历史，或者“传统”的东南亚世界。不过，即使这样也有问题，因为不同的历史学家会将这些模棱两可的词用来指代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这些困难的存在，把“古典”这个词运用到东南亚历史中也算是差强人意了。因为和希腊、罗马一样，东南亚在15世纪末时，有过一段艺术、建筑发展的繁荣期，同时其国家发展也处于巅峰状态，其后便陷入了一场全面衰落。接着，出现了新的强大王国。但是，如果我们要使用“古典”这个词，就必须对它有个清醒的认识：这只是一个很有用的比喻，必须对之进行严格的限定。



12 世纪处于权力巅峰的吴哥帝国

12 世纪，苏耶跋摩二世(1113—1150)和阇耶跋摩七世统治期间，吴哥帝国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这一时期，柬埔寨的疆土包括了现代柬埔寨、越南南部和老挝南部的很多地方，并在泰国中部和南部克拉地峡有几个附属王国。

中央权力对这些广阔的疆土的控制不是一样的，位置越偏远，吴哥统治者的卷入就越没那么直接。

作为一个曾被用来指称伟大的希腊和罗马的词，“古典”一词对于我们认识那时的东南亚确实是很有帮助，因为它提醒新手注意东南亚文化传统的分量，虽然这种文化传统在近现代已不总是那么明显了。在 19 世纪，这种传统的消逝已相当成问题。19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第一批到访柬埔寨王宫的西方人(实际上是法国人)认为这里很小且缺乏艺术的特色。他们对当时的柬埔寨统治者诺罗敦国王也持类

20

似的看法。他们无法相信,国王和他统治的臣民的祖先曾经居住在威武的吴哥庙宇旁。他们不能相信(尽管事实的确如此),也无法理解诺罗敦国王把自己看作国家传统的捍卫者,虽然那些吴哥国王的名字也许已经被遗忘,但他作为其后裔继承了王位,从而将他们的荣耀归柬埔寨所有。

下面这个例子很好地突显了古典时期的重要性。东南亚人和东南亚的政府都非常珍惜他们国家过去的荣耀,尽管这些荣耀被铭记的方式也许非常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缅甸人铭记11—12世纪建造的蒲甘庙宇的荣耀,而印度尼西亚人则不断挖掘早期历史阶段爪哇统治者的重要意义。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尖锐的观点,争论保存下来的记忆在多大程度上是准确的。不同的人、不同社会团体和不同国家对所谓的古典时期的本质和重要性的认识,当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差异。完全忽视这一点的重要性是很要不得的。

还有更进一步的理由要求我们关注东南亚的古典时期,因为王国的兴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代历史。如果我们目前研究东南亚大陆,那么就有必要去问:作为古典时期最强大的大陆国家,吴哥柬埔寨在控制和利用水资源方面曾拥有先进技术,其建筑成就更是一时翘楚,为什么最终会成为历史的失败者呢?再问一个消极的问题:在享受了几个世纪的巨大商业成功之后,海洋帝国室利佛逝在13—14世纪是否失去了其对印度和中国之间伟大的东—西贸易的主导地位?再来问个较正面的问题:为什么爪哇总是成为历代强国的必争之地,且它们不仅渴望统治该岛,还渴望获得(尽管很少得到)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其他岛屿的宗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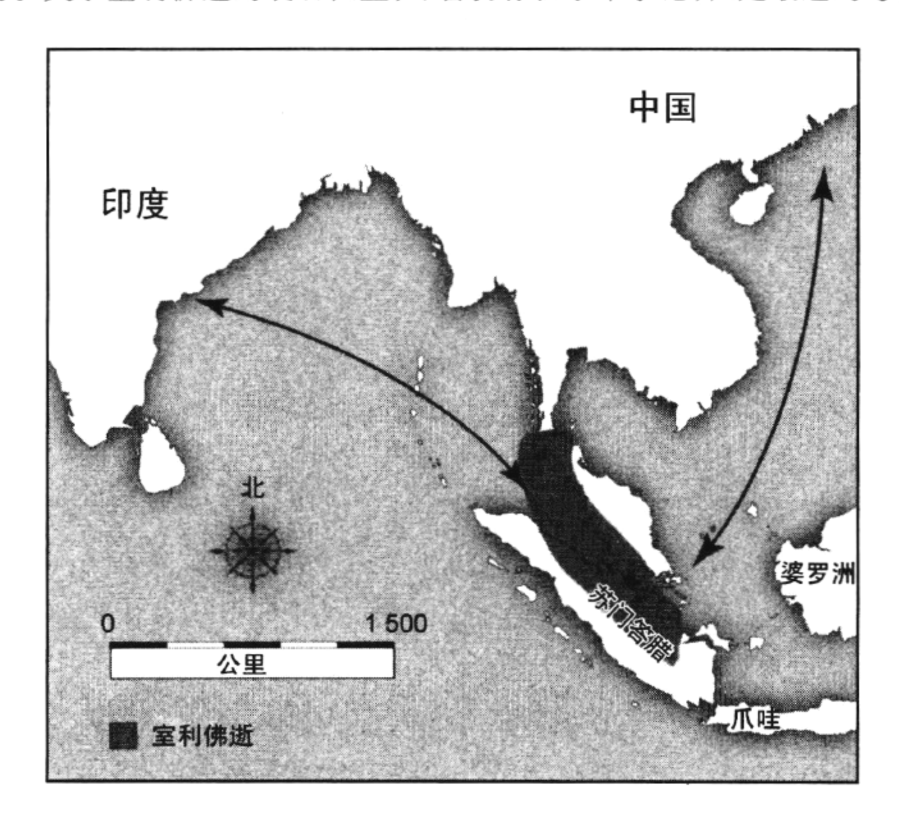
21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也许不可能给出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且本章只是为以后的章节提供背景资料。不过,粗略地描绘古典东南亚的一些重要特点,讨论一些促成国家和帝国兴衰的因素,以及它们在建筑、航海等领域的成就,还是可能的。为此,我们有必要试着勾勒一幅9世纪前东南亚已存在的国家格局的简单图画。那时的东南亚相当复杂,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按照国家的位置或者距离王权中心的远近

来描述当时的情况。我们对当时菲律宾的很多方面还不了解，对东南亚海域地区的其他部分也相当陌生。但是一旦我们将目光转移到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西部，格局就比较清晰了。明确的王国或者国家在9世纪之前就已经在爪哇出现，而且这些国家已经在兴建庙宇、神社和装饰模式上展现出了一定的艺术能力。

西北方就是苏门答腊岛，那里的一个贸易帝国——室利佛逝，在6—7世纪盛极一时，而且尽管一直以来挫折不断，但它几百年来持续主导西方（印度）—东方（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更多的群岛内部的地方贸易。关于室利佛逝的确切位置，尽管仍存在学术争论，但是最近的考古

22



室利佛逝贸易帝国

学者们对室利佛逝的确切位置有争议，7—13世纪，这个伟大的贸易帝国主导了通过东南亚的以及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洋贸易。室利佛逝也许有几个首都，最重要的一个在苏门答腊南部，今巨港附近。如这个地图上所标示的那样，室利佛逝通过控制马六甲海峡的港口和水道保持了其权力。阴影部分代表室利佛逝实际控制的地区。

研究毫无疑问地指出这个伟大的海洋帝国的首都在苏门答腊岛的南部,8—9世纪时就位于如今的巨港附近。如果我们斗胆对9世纪东南亚海域地区的状况做一个概括,那就是:尽管在其他地方存在着一些小国,但当时真正的权力中心在苏门答腊海岸和爪哇内陆。这些权力中心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仍相当显要,直到古典时期结束。

大陆的状况虽然充满了各种颇具争议的问题,但相对还是比较清楚的。在9世纪,越南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华帝国占据了红河三角洲地区,并且把它作为自己最遥远的省份之一进行管理。沿着现代越南海岸延伸的是占婆王国,那里居住着占人,他们的语言与印度尼西亚居民有关联。往西是正在崛起的柬埔寨王国,它此时刚刚崛起,并向主导东南亚大陆大步迈进。尽管我们今天知道柬埔寨距离"伟大"仅一步之遥,但是9世纪时的情况尚不明朗。第一批统治吴哥地区的柬埔寨(高棉)国王已经开始发展能够掌握环境的技术,这最终为军事扩张和伟大的庙宇建设项目提供了经济基础。不过在9世纪,他们仅仅是比那些散布在现代泰国低地地区和现代缅甸大河谷沿岸的小首领稍强势一些的统治者而已,掌管的土地也非常有限。

23

9世纪时,在这片还无法确定东南亚区域内的所有已知王国,其统治者和王室都是外来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的信徒。这些印度的宗教是几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种发展始于基督元年,被命名为"印度化",不过学者们对这个词的真正含义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不过,广泛的共识还是存在的,比如关于印度化过程的某些特征,即我们现在描述的这些特征。

从2—3世纪开始,印度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往缓慢地扩张。这种扩张并不均衡,一些地区比其他地区较晚受到印度的影响,而且其影响的程度在每一个世纪里都不同。对越南人来说,他们在早期阶段生活在中国人的统治之下,从来没有发生印度化的过程。由于不同的原因(遥远的地理位置),菲律宾也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印度化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口大量迁移到东南亚。相反,只是数量有限的商人和僧人学者把各种形式的印度文化带到了东南亚。这种文化的很多(但不是所

有)内容被当地人吸收并加入他们自己的文化模式中。这个观点被广泛认同,但是现在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印度的种种观念也许是由游历到印度的东南亚人带回的。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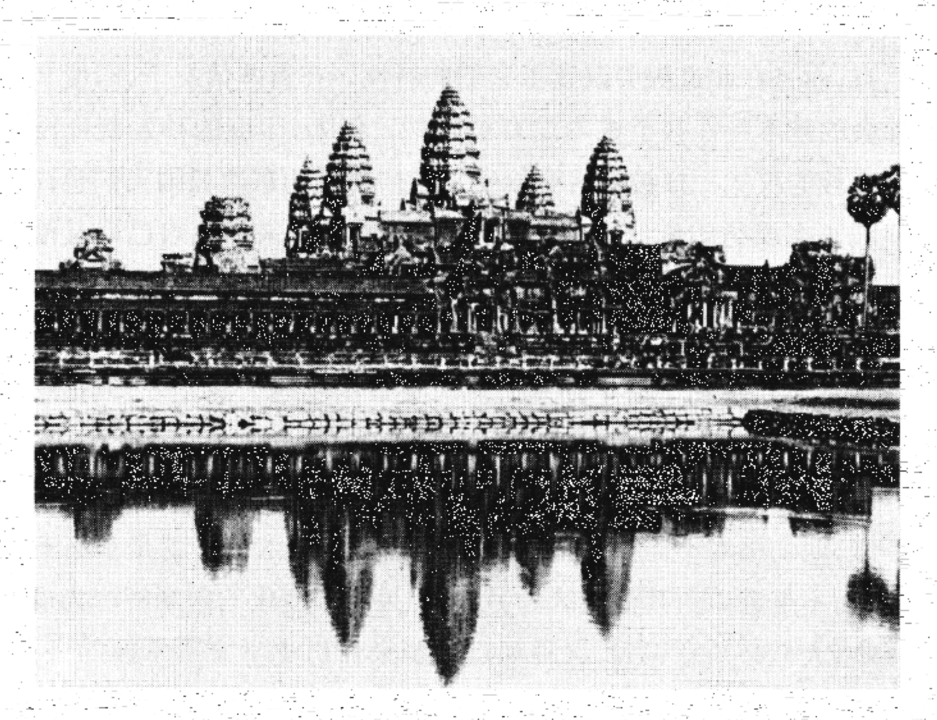
在此,有些情况提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虽然印度文化“来到”东南亚,但不能就此认为东南亚人缺少他们自己的文化。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认同这样的观点：印度文化对东南亚产生这样的影响是因为它很容易与当地民众已存的文化模式和宗教信仰相适应,而这些文化模式和宗教信仰也已经沿着文明的道路行进了很长一段距离。因此,印度化过程不应该仅仅被视作东南亚人接受印度文化价值的过程。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吸收了印度文化,其中尤以印度宗教、艺术形式和政治理论最为重要。不过这些来自印度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礼物已经被东南亚人收归己有,而且在此过程中改变了它们的特性。在有些情况下,印度文化和社会的基本特性甚至根本没有被采纳。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没有像印度教的仪式一样被东南亚接受,不过,早期的东南亚国王们也许认为他们正在模仿印度统治者,并且使用种姓术语来描述自己以及他们的王朝。东南亚艺术仿效了印度的艺术模型,但随后发展出了自己的形式。印度的语言在官方和宗教事务中使用。不过,尽管以梵文撰写的碑铭仍然是我们了解早期东南亚历史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但是随着东南亚人用印度字母改造他们自己的语言,对梵文的使用最终消失了。

总而言之,东南亚人借鉴并吸收了印度文化。但是某些非常重要的领域,他们根本不需要去借鉴。水稻的培育技术似乎就是东南亚本地的,而不是进口自其他地区。另外,如果将印度化的内涵解释为借鉴和吸收,人们必须意识到,这种观点主要来自历史学家所掌握的证据。我们对国王、朝廷和僧人的世界了解得非常多,但是对农民的世界却知之甚少。稻田里的无名工人也许没有受到印度化的任何影响。印度教 25 和大乘佛教(最早对东南亚产生影响的佛教派别)的复杂之处在于,它们既关注法师,又保留了对周围生物和非生物神灵的敬畏。

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印度的思想对统治者和宗教人士的吸引力？一个略显片面的答案似乎是：对于准备获取更多宗教和世俗权力的东南

亚人来说，印度的文化提供了一种条理清晰、发展完善的理论和知识模式。关于婆罗门僧侣如何从印度来到东南亚的传说被实用地进行了改编。传说中，婆罗门教徒给东南亚的统治者带来了关于治国和管理宗教事务的智慧和建议。婆罗门教徒既是学者又是僧人，他们指导统治者如何正确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他们还是天文学家、占星家和建筑师。作为建筑师，他们不仅能够按照建筑技术的要求，还能按照宗教象征和天文观测来建造他们的庙宇。这些人是非常宝贵的咨询师，仅从下面这个事例就可以看出人们对其价值的认识：在关于柬埔寨诞生的传说中，人们将一个婆罗门教徒与当地公主的传奇婚姻视为柬埔寨进入辉煌的吴哥时期的开始。

26



吴哥窟

从东南亚古典时期保存下来的所有建筑中，柬埔寨北部的吴哥建筑群是最壮观的。这些庙宇建造于10—14世纪，散布在大约200平方英里的区域内。最著名的也许是最大的宗教纪念物是吴哥窟，这里展示的是其西面。它由国王苏耶跋摩二世建造，在约35年的短期内建成。吴哥窟的底座长726英尺，宽669英尺（分别是220.2米和202.9米），中心塔高220英尺（66.7米）。照片由奥利弗·豪斯(Oliver Howes)拍摄。

9世纪时，印度化了的东南亚存在着两个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引起历史关注的国家，一个是位于柬埔寨境内以吴哥为核心的内陆国家，另一个是室利佛逝海洋国家，它的首都之一在苏门答腊岛南部。这两个国家被认为代表了早期或者古典时期已知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国家类型。相比当时其他许多国家，他们的存在维持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因此，对他们历史的考察能够揭示一些导致东南亚早期历史中王国和帝国成功发展，以及最终引发溃败的一些原因。

吴哥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兼之对宗教信仰方面的优势，从而在东南亚大陆的许多地方占据主导地位。为了在柬埔寨发展一种能够自给自足的文明，从古自今都必须掌握对水患和旱灾的处理方式。尽管柬埔寨在雨季时暴雨连连，但是一旦雨季结束，土地就会迅速干涸，随之而来的是差不多6个月的旱季。人们可以在河岸边定居，随之而来的是人们距离这些水源地越来越远，问题也变得越发尖锐。早期碑铭显示，前吴哥时期的柬埔寨人以地方为单位应付这种状况；也就是说，与9世纪初期吴哥地区在城市建筑群出现以后建造的灌溉工程相比，当时似乎还没有任何像样的此类工程。

公元9世纪吴哥建立之后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很大学术争议的问题。过去曾有人认为，建造在庙宇周围的大规模水库以及城市鼎盛时期存在的护城河和运河的复杂系统，都对农业灌溉有实际意义，并且象征着印度教宇宙中的“海”。进一步的研究（包括分析航拍照片）表明，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新的研究已经得出结论：主要的水库也许是被用于家庭生产，比如提供饮用水，同时也具有一些象征意义，但是它们不是用来进行大规模灌溉的。现在有人主张，当时吴哥的民众每年能够种植三季水稻，是由于使用了自然灌溉的模式，即利用周围湖水的涨落这一泛滥—退却周期来进行灌溉。尽管这一问题尚未定论，但是人们对这种新的解释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吴哥的农业基础使得它能够养活众多的人口，因此有足够的人力建造古代高棉标志性的伟大庙宇。吴哥柬埔寨的财富就是其民众和农业能力。没有这两种资源的结合，就不可能有吴哥窟——世界上最著



女王宫中的阿布萨罗

女王宫是吴哥最美丽的庙宇之一，也是最小的庙宇之一，建造于967年。它是由一个僧侣而非国王建造的，而且以其雕塑和雕刻的美丽出名。这里展示的阿布萨罗（即天女）是一位提高了印度神世界的天使，受到吴哥时代柬埔寨人的崇拜。照片由奥利弗·豪斯拍摄。

名的伟大庙宇，以及最大的单一宗教建筑。捕获的战利品和被当作奴隶使用的战俘成为了城市的财富。但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吴哥柬埔寨不是以贸易立国的。吴哥统治者（有时候是显赫的官员）建造的庙宇铭记了国家的宗教理想。建造和维护这些庙宇，以及向其僧侣提供衣食所需要的财富，均来自这些庙宇附近肥沃的稻田。

对于有幸访问吴哥地区的任何人来说，柬埔寨在公元 9—15 世纪之间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大大小小的庙宇散布在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学者们仍在不断发现新的重要线索，揭示了这个社会何以建造如此美轮美奂的建筑。让历史学家兴奋不已的最新发现之一是：吴哥窟可能是在天文观察的帮助下建造完成的。导向这一结论的诸多调查研究表明，建造此庙宇的建筑师和工匠已经有能力实现别具一格的建筑壮举。工程的精确性极高，在高度以及长距离的墙壁方向方面，理论上的误差都少于 0.1%。

这种技术能力证明了，吴哥时代存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它在美学方面的成就可与其技术能力相媲美。雕像、浅浮雕和高浮雕，以及吴哥帝国存在的几个世纪里不断完善的建筑形式，都证实了东南亚历史古典时期的柬埔寨拥有丰富的文化。对此还有其他佐证：中国使者周达观在 1296 年访问了吴哥，尽管此时，吴哥的高棉人正逐步丧失对这个他们花了 4 个世纪的时间建立、发展的帝国的掌握，但周达观仍深信该城市在东南亚是最富有的。尽管他作为中国人，对非中国的社会文化和习俗持一定的保留态度，但他显然对吴哥统治者的财富和这个他盘桓几近一年的城市的方方面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虽然吴哥能够给一个持怀疑眼光的中国官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它的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脆弱。柬埔寨已经以吴哥为核心向外扩展，把今天泰国、老挝和越南的很大一部分合并进其帝国范围内。这不是一个贸易帝国，尽管存在一些货物的交换。但吴哥帝国真正重要的特征绝非商业。很多较弱的统治者和管理者接受吴哥国王作为他们的最高君主，用欧洲史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的领主”。当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再满足于现状，选择为独立而战时，便打破了这种政治关系，而

且还威胁并最终破坏了吴哥赖以生存的农业体系。15 世纪的某个时刻，柬埔寨国王和宫廷决定离开吴哥，这对东南亚大陆来说具有深刻的重要性，尽管欧洲对此闻所未闻。一个伟大的帝国走到了尽头，随着它的终结，其他国家开始崛起。泰人是打倒吴哥的民族，从那个时刻开始，他们的历史轨迹就成为一个缓慢但是扎实地向控制包括现在泰国在内的疆土迈进的过程。

公元 939 年从中国获得独立的越南国与吴哥的覆灭没有直接关系。不过，从长期的历史观点来看，柬埔寨的崩溃对越南随后扩张到现代越南南部的区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里曾经是吴哥帝国的一部分。在东南亚大陆的西部，柬埔寨发生的事对早期的缅甸王国来说是无关紧要的。11—13 世纪，一个伟大的缅甸城市在蒲甘建成，直到 1287 年被当时统治中国的蒙古人入侵，并被抢掠一空。尽管这些事件以及缅甸后任统治者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王国的努力，与柬埔寨的衰落没有直接的关系，蒲甘的灭亡再次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一个更广泛的地区范式的出现。在这个范式里，我们可以发现 15 世纪之前在东南亚大陆出现的新的王国和权力模式。

我们更应该将这些更替理解为“变化”，而不是衰亡。吴哥的败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新兴的泰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其经济结构不能够继续维持。但是吴哥的文化并没有消失。获胜的泰人从他们曾经的统治者那里吸收了很多东西。泰人的建筑及其书面语形式借鉴了很多高棉人的灵感。而且，吴哥和蒲甘衰落以后，新的王国崛起，其他国家也增强了实力，这样一来，将关注焦点放在早期或者古典时期最强盛的王国的衰落上是一种历史的片面。

到目前为止，本章关注的大部分内容都与大陆，尤其是与吴哥帝国有关。海上帝国室利佛逝本身的风格同样重要，但却是以不同模式塑造而成的。正如吴哥代表了古典时期一个以陆地为基础、非贸易的东南亚王国的成就，室利佛逝则代表了东南亚地区早期历史阶段海上贸易强国最伟大的成就。

31

室利佛逝的崛起依靠的是贸易和中国的保护。简而言之，东南亚

早期历史阶段最重要的国际贸易模式就是中国与包括印度(向西进一步延伸到波斯以及更远的地方)在内的东南亚地区之间的东西方贸易。珍贵的西方货物包括被认为有药用价值的林产品在中国交换成丝绸、瓷器、漆器和其他制造品。到了公元7世纪,马来人控制了大部分此类贸易,尤其是通过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那部分。马来人主要的权力中心位于南苏门答腊岛的东海岸。

这是如何产生的目前尚不清楚,而且对于水手们驾驶着满载贸易货物的船只在没有中间停靠点的情况下如何克服漫长航海的困难抵达中国,眼下仍未可知。不过,这些历史性发展的某些方面还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它们帮助我们认识了一个在性质上与东南亚海陆全境范围内以陆地为根本的王国非常不同的王国是如何兴起的。室利佛逝的崛起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简要考察这种关系,就必须谈到中国在东南亚的作用,因此要在这方面先作一些概述。

不论强大还是弱小,历任中国统治者都把他们的国家看作是“中央之国”,因而广为使用“中国”这个名称。这并不是意味着其帝王们认为在中国的陆地边界之外存在一个中华帝国——按其字面意思来理解。对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认识则更为微妙和复杂,其中尤以对室利佛逝这样一个海上贸易王国最为甚。

32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今天的东南亚地区称为南洋地区,也就是“南部海洋”的意思。只有越南曾经直接处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而且只持续一个朝代,即外来的蒙古人在1280—1368年统治的元朝。当时的中国皇帝还寻求以武力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国家。在中国人眼里,南洋的国家缺乏纪律和秩序,而且可悲的是,他们没有使用中国政权和文化在内忧外患的政治动荡下能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的工具。

按照中国人的观点,只有东南亚的各个国家与中国保持适当的朝贡关系,这个地区才能以一种让人满意的方式来运作。不过,我们使用的词汇并不能非常贴切地代表这种关系。向中国朝贡并不意味着这个东南亚王国受中国统治从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中华帝国的一部分。相

反,朝贡关系涉及相当程度上的相互迁就。成为朝贡国以后,肯定不会再违背中国的利益,而中国也会保护其朝贡国的利益,反击那些可能会欺侮他们的国家。对室利佛逝这样一个海洋贸易王国来说,能在成为朝贡国以后获得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一旦中国把这种地位赐予了室利佛逝,作为其对手的其他海洋贸易王国将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

随着中国把这种认可给予室利佛逝,后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跃居东南亚海洋权力的前列。很多有关室利佛逝的著作只是一些推论,但这些关于海洋王国发展过程的推论都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由于其位于马六甲海峡这一战略要地,室利佛逝逐渐控制了印度群岛西部以及群岛地区与南中国之间的所有海上重大贸易。尽管室利佛逝似乎曾拥有一个首都,但它至少先后位于两个不同的地点,在室利佛逝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可能存在更多的首都旧址。而且,首都也许只是比组成这个贸易帝国的其他港口和贸易点稍显重要一些而已。以共同目的而团结在一起的帝国的各个部落,会对任何想挑战室利佛逝垄断地位的王国或者贸易点即刻施以惩罚。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猜想,不论室利佛逝中心存在什么样的政权,由于其在基本的贸易安排不受侵犯的条件下,允许帝国的各组成部分拥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自由度,因而其权力的行使并不强硬。

33

室利佛逝如同吴哥一样适应了环境。对室利佛逝的印度尼西亚—马来王国来说,海洋的开放边界弥补了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和今天马来半岛西部沼泽的海岸缺乏适宜耕种的腹地的缺憾。这两个国家在古典时期的鲜明对比使它们成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的典型例子。直到 19 世纪时,东南亚国家还追随着这两种发展模式。对以陆地为基础并且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直到 19 世纪才出现重大的变化。室利佛逝在公元 7—14 世纪作为以一个海上大国所发挥的作用,依次被其他国家所继承(如马六甲),并最终在 19 世纪传递给了新加坡(尽管这种观点存在争议)。但是,不论以后的哪个国家承担了地区转口贸易港的作用并且成为东南亚西部海区的贸易焦点,

室利佛逝都是第一个认识到控制海洋的重要性的王国。尽管葡萄牙、荷兰或者英国的商人和战略家都奋力争夺在东南亚海区的优势地位，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早期海上帝国的继任者，而且他们谁都不了解室利佛逝王国。不过，确切地说，他们只不过是追随某个古老模式的最新成员而已。

不过，如果室利佛逝适应了其全盛时期的环境，那么与吴哥一样，一旦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也就无法生存了。对室利佛逝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变化是 13 世纪中国与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驾驶他们自己的贸易帆船在该地区买卖货物。这种发展打破了室利佛逝费尽心力、排除万难才得以长期维持的平衡。中国航运活动的扩张正处于印度尼西亚王国努力超越当前的权力中心并扩展地方宗主权的时候，这个事实使室利佛逝的利益更加岌岌可危。对室利佛逝最危险的是，以陆地为基础的爪哇王国已经开始怀有帝国野心，并且打算趁室利佛逝的地位被削弱而发动致命一击。在 14 世纪晚期的某个时刻，爪哇占据统治地位的王国成功削除了室利佛逝的残余势力，从而结束了后者长期海上统治的历史。

34

在这些对吴哥和室利佛逝的有限描述中，我们只是对历史进行了表面上的勾勒。因此，这种历史对普通百姓关注得太少。而只关注朝廷和国王，关注与大战役以及与地区性甚至全球性有关联的贸易发展。然而，我们目前很难做到平衡。即使在我们关注东南亚古典历史时期的国王时，我们也很少能够真正洞见其真实个性。不过也有部分例外：公元 7 世纪的高棉国王让他的朝廷抄写员在一个碑铭中鼓吹，敌方的妇女们为了得到他的微笑，认为即使被其强奸也是值得的——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坚信男性主导地位的一个例证。即使这样，我们还是不清楚，这铭文究竟是一个例行的恭维，还是确实与伊奢那跋摩国王本人(碑铭是为了他而记录的)有关。我们也能够从后来的柬埔寨国王阇耶跋摩七世(12 世纪晚期和 13 世纪初期)有关其赋予国家职责的碑铭，及其哀悼一个亡妻死亡的碑铭中了解他所信奉的某些个人价值观。

我们无法全面地描述这些统治者的个性，对古典时期爪哇王国的

各个国王也是如此。爱尔棱加国王(10世纪晚期)、格尔达纳卡拉国王(13世纪晚期)等统治者,加札马达等高官的名字之所以载入史册,都得益于一些与他们有关的事件,而不是他们的个性。而且,如果我们连深入了解这些人都存在困难,又如何能够讨论农民、工匠和没有掌握权力但仍然对国家的生存至关重要的其他团体呢?

35 20世纪的很多东南亚历史研究者仍然只关注统治者、宫廷仪式和大战役的历史。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普通男人"或者"普通女人"的生活。关于古典时期,我们在吴哥巴戎寺的雕刻上发现了普通人生活的一些片段,从中一窥12世纪柬埔寨的日常生活场景。尽管斗鸡、犁田、分娩的妇女和赌徒等也许都是典型场景,但是雕刻没有告诉我们乡村的生活细节。以爪哇为例,该国14世纪的伟大史诗《爪哇史颂》(*Nagarakrtagama*),提供了爪哇的新柯沙里朝廷与乡村互动的很多有趣的信息。不过,我们从中很难了解村民的自身感受。受所掌握的资料的限制,我们只能去关注更宏观的问题,比如印度化、大国的兴衰,以及本章到目前为止尚未提及的一个话题:一个"中国化"的而非"印度化"的东南亚王国——越南王国的文化和政治发展。

在我们研究东南亚历史的过程中,越南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在该地区显得非常与众不同。由于越南在文化和政治方面从中国借鉴了许多东西,有时候我们很难一眼看出越南的历史和社会中的东南亚元素。不过,那些元素曾经存在而且目前仍然还在。在越南历史中,有关是否在生活中保留中国元素的问题,曾经引起很大争议,这主要取决于帝王、宫廷和官员。尽管越南在多方面向中国借鉴,越南农民的迁移欲望也很强烈,但是诸如越南非官方社会中的妇女地位,以及不同于中文的越南语言等该国家的历史特征似乎与东南亚的联系更紧密。

不过,中国思想在官方层次上的影响力是不容否认的。中国是越南官方生活的一个榜样,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应对问题和挑战。这些事

36 实可以用来解释,为何中国对越南的影响比印度对柬埔寨的影响更大。

在其他许多涉及程度深浅的争论(尤其是有关东南亚历史的)中,学者们通常持有不同的观点。不过,在中国和中国思想对越南国家发展深刻的重要性上,他们却能达成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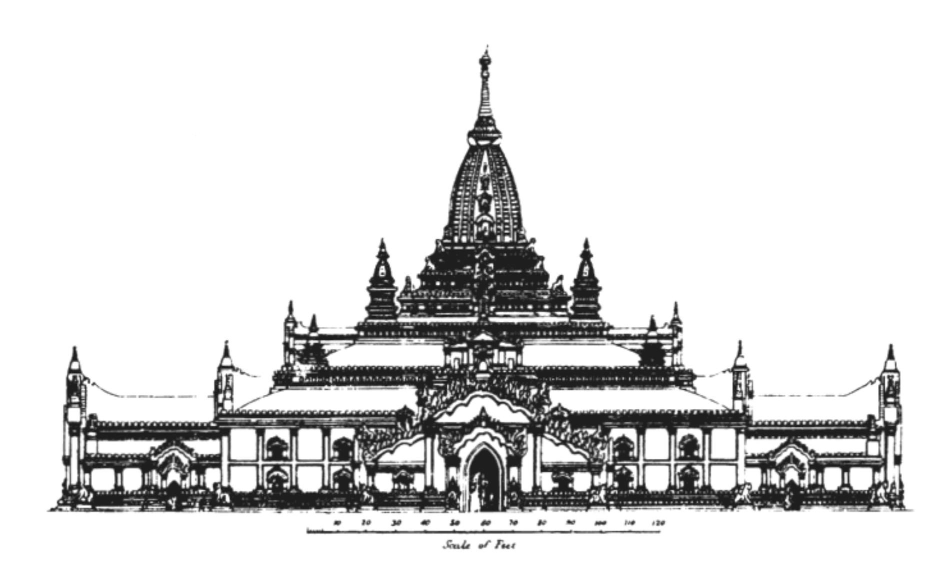
而且,当就下面的命题进行学术讨论的时候,学者们同样达成共识:越南在公元 939 年获得独立,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保持了这种独立状态,尽管有时为此需要与中国交战。由于越南明显是中国的朝贡国之一,所以一些观察家很难理解其与中国的关系。尽管两国有密切的文化联系,但这种朝贡地位并不意味着越南乐意接受中国对其内部事务的政治干涉。不过,朝贡地位确实使得越南不可能以一种可能得罪其北方邻国和宗主国的方式在其边界之外轻率行事。

与经历了印度文化输入的那些地区相比,越南作为一个非常特别的东南亚国家,其在 15 世纪古典时期末崛起并跃居大陆强国行列的事实进一步强调了这个区域内当时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因为越南的崛起是以牺牲其南部邻国——占婆为代价的。后者这个印度化的王国曾经一度能够不时地挑战强势的吴哥帝国。直到 12 世纪末期,占婆人仍驾驶其伟大的军事独木舟沿着湄公河和洞里萨河航行,并在一场针对城市的水上攻击中成功抢掠了暂时衰落的吴哥王国。然而,到了 14 世纪初,占婆的力量已经大大减弱了,而越南则加入了吞并过程,还挑起了长期摩擦。这最终造成了占人王国的消失。

由于 13—15 世纪发生了这么多重要的变化,历史学家怀疑可能存在一件或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能够为古典时期大国的垮台以及将在该地区此后的历史中发挥更突出作用的王国的出现提供解释。在这些可能的重要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元朝蒙古人发挥的作用。有迹象显示,蒙古人通过搞垮缅甸蒲甘,以及干涉印度尼西亚群岛、越南、占婆和柬埔寨内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于推动变革的动荡局面。也有人给出了其他值得关注的地方,例如稍后小乘佛教来到东南亚大陆,以及伊斯兰教到达海洋地区以后引发的变化。

37

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对所有这些观点都给予一定的关注,因为是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一起塑造了 13 世纪后期以来的东南亚政治版



蒲甘的阿难陀寺

蒲甘的庙宇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它坐落于缅甸的中部，可以与柬埔寨的吴哥窟媲美。蒲甘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庙宇是由江喜佗国王(1084—1113)建造的。阿难陀庙宇代表着1094—1287年缅甸艺术的顶峰。当时蒲甘帝国在东南亚大陆西部占据主导地位。据1866年前去阿瓦朝廷的一个使团讲述，由亨利·于勒(Henry Yule) 1856年汇编。

38

图。蒙古人对以蒲甘为核心的王国的破坏，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是蒙古人在吴哥的兴衰中所发挥的作用就不那么明确了。伊斯兰教作为一个整合因素，在印度尼西亚岛屿中具有很重大的意义。伊斯兰教对爪哇北部和苏门答腊岛北部等群岛地区旧式的国家关系模式的瓦解，起到了政治方面的推动作用，但是其程度很难确定。

简而言之，一系列重大变化曾经发生，同时伴有政治变革，而且文化和宗教领域也都有所发展，这些都是比较显见的；但是若要坚持这些巨大的政治变革都是由一个或几个主要因素引起的，证据就稍显薄弱了。柬埔寨的例子在这方面很有启发性。20世纪初期以来，很多人尝试用一个单一的重大的因素来解释这个王国何以由盛转衰。最早期的解释注重强调小乘佛教的重要性，认为它是一个比印度教和大乘佛教更“民主”的宗教。后来的观点主张吴哥衰落的一个可能的原因也许是疟疾的流行：泰人对吴哥地区的入侵破坏了城内和城市周围的水库与

运河系统，为蚊子提供了适于繁殖的死水池塘。我们今天对这样单一化的解释持保留意见。柬埔寨的统治者接受小乘佛教也许是想借其支撑国家权力，而不是努力使宗教更“民主”。泰人的入侵毫无疑问非常重要，但是人们日渐发现，“突发性的疟疾击倒了高棉王国”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

由于古老王国难以适应新环境，而新的王国却证明自己更能适应变化的世界，东南亚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若想寻找个人和王国的生存能力以外的其他原因，注定将是徒劳的。而且，过于强调古老王国的衰落和某种文化特性的消失（比如梵文的使用），将会使人低估旧的价值在新王国中的地位，因为这些新王国其实是古典时期那些强有力王国和帝国的继承者。

39

总之，古典时期结束之后出现的东南亚世界在很多方面得益于早期时代的成就。现代东南亚的研究者也许并不非常了解其中纷繁复杂的细节，但是他们不能忽视它的重要性，也不能对下述种种继续视而不见：因人们将目光局限在近期出现的问题上而无视发展的总体轮廓，影响历史发展的基本文化因素，以及这个基本的重要事实：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一样，东南亚拥有一个有趣并且值得关注的过去。



40

第三章 朝廷、国王和农民：欧洲影响之前的东南亚

当人们回首漫长的历史时，常会忍不住去寻找“分水岭”——它将过去的两个阶段截然分离，因而可以被描述为一个时代的开始或者结束。这种方法比较合情合理。不过，这种方法很可能造成曲解。即使曾经声名显赫的东南亚的帝国或被推翻或遭瓦解，我们也不应该认为那些曾经在缅甸的蒲甘、柬埔寨的吴哥和中爪哇伟大的纪念碑如婆罗浮屠附近生活过的人的子孙后代会将这些帝国完全遗忘。我们也不应该假定，那些“古典”时期结束后几个世纪里出现的东南亚王国的国王们会认为，他们没有其前任那么重要，那么忠诚，那么强有力。简单来说，18 世纪时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不仅本质上仍然是传统的，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在统治时，坚信应该保持传统世界的稳定性，或者至少是持久性。的确，现在有些学者会认为，18 世纪对许多东南亚王国来说是一个不断增强自信的时期。可以确定的是，18 世纪东南亚的大多数国王和官员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地位正受到欧洲人的威胁。

41

最后这一点解释了为什么所有对东南亚历史的全面考察要把这么多的注意力放在 18 世纪。由于欧洲人在东南亚政治中不断增加的作用，东南亚在 19 世纪开始发生变化，但它们比一些评论

所认为的要慢得多，也隐蔽得多。因此，想要找出与18世纪相关的“分水岭”似乎确有一定道理。这个世纪见证了一个有意义的历史转型：大多数东南亚王国从传统的、本质上没有受到欧洲影响的状态转向了一个至少在政治层次的发展上受到欧洲人越来越多的影响的新局面。因此，18世纪是东南亚传统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最后一个世纪。

不过，当人们将18世纪和刚刚提及的那些19世纪的变化作对比时，会发现“分水岭”这个词似乎并不非常妥帖。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当殖民国家在东南亚地区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系列的“分水岭”：一个“18世纪分水岭”；一个“19世纪的政治分水岭”；以及一个“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经济分水岭”。很明显，用词不当会破坏这个词的力量和含义。“分水岭”这个词最好是用在一系列相关联的发展中，其中也许横跨两个世纪，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在此期间实现了转型。从这个观点来看，18世纪是这个分水岭的一部分，后者涵盖了19—20世纪早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政治和经济的综合变化。

如果制图员在一张18世纪的东南亚政治图上用不同的颜色标注不同国家，这张地图将会五彩斑斓，甚至连地图上有多少种颜色都难以数清。20世纪时，东南亚有10个国家，如果包括东帝汶的话就是11个，一名绘制18世纪政区图的制图员则需要为至少40个国家——王国、侯国和苏丹国——画出轮廓。这些国家中的很多不是那么重要。不论是在东南亚大陆还是海上世界，人们都能找到某些方式来区分真正重要的国家与那些只是为了讨宗主或者霸主欢心而存在的国家。但是不论如何计算，18世纪东南亚的政治版图都明显比该地区当代的政治版图复杂得多。而且，与下一个世纪的地图相比，18世纪东南亚的政治地图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殖民地的区域事实上是非常小的。除了北部菲律宾岛屿和爪哇的大部分地区，18世纪欧洲人在东南亚的存在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几个贸易站零星地点缀在各个地区的海岸线上。

42

43





婆罗浮屠

中爪哇的婆罗浮屠纪念物是在8世纪末期和9世纪开始的时候建造的。建筑的形式是一个巨大的佛舍利塔、一个圆锥形或半球形建筑，它用丰富的浅浮雕来进行装饰，浮雕内容来自佛经。(上图)。它的顶端是一系列护佑着佛像的舍利塔，而且朝圣者从那里可以看到遥远的神圣的火山，比如默拉皮火山。(下图)照片由M. C. 里克莱夫斯(M. C. Ricklefs)拍摄。

哪些国家在这个本质上仍然传统的东南亚世界里存在过呢？最著名的是越南王国。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面，越南在政治上是分裂的，一个郑氏(Trinh)家族占据了越南北部，另一个阮氏家族占据了南部。尽管存在分裂，而且在该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当一个次大规模起义击败了那些家族统治者从而带来短暂的统一时，该国正处于飞速发展之中，一个政治统一的越南王国的理想存活了下来。这个理想的王国被认为是由儒家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且其行政系统仿照中国流行的模式。不过，忠诚于儒家价值以及一个把中国作为榜样的官僚系统并不意味着越南只是中国大城市的一个变种。当国家政治上分裂的时候，越南的统治者或者部分统治者从中国复制了很多，但并不是全部。最明显的是，他们没有接受任何关于中国有权干涉越南内部事务的观点，即使中国声称有权要求作为朝贡国的越南效忠自己。

由于中国与越南宫廷和官员在设置和功能上部分重叠，越南在其政府结构上的缜密与礼节要求与其东南亚邻居是不同的。在理论上，以及某些现实中，越南的官僚系统对所有能够通过选拔考试的人都是开放的。相反，在东南亚的佛教王国(缅甸、泰国、柬埔寨和现代老挝的低地侯国)中官位似乎都是世袭的。出身官宦之家是日后进入统治者阶层的重要条件。在越南，考试成绩被作为指导原则，虽然官员的儿子更容易学有所成，因而享有更多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

44

越南的官员可以向被称作“天子”的统治者提出建议，而且统治者被认为通过正确地遵守国家和宗教仪式来调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系。就如行使这些形式需要遵循一套详细的程序一样，越南官员生活的其他部分也被认为要遵循规定的模式。官僚是一个金字塔，统治者在塔顶，明确限定的联系在塔顶和组成行政管理基础的省内最低级官员之间建立了。越南拥有成文法典，结构严密，解释条款众多。严格的规则限定了每一个等级的官员所拥有的权力大小以及每一个等级的资格。而且与他们邻国不同，越南人相信有必要明确地划定边界。

许多方面越南都不同于东南亚其他主要的大陆国家，据前一章所述，它们所受的外部文化影响来自印度而不是中国。不过，尽管印度文

化具有普遍的重要性,但它在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王国的影响并没有那么明确和显著。除了一些朝廷僧人,越南官员的穿着打扮与中国官吏相同。这种直接的借鉴并不是东南亚大陆佛教宫廷的特点之一。越南官方的建筑也是直接从中国借鉴的;而在佛教国家,印度的影响是一件更微妙的事情,而且到了18世纪,只有很少的例子被直接识别为文化借鉴。

45 佛教国家的政府编制与越南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前者的官员关系模式在许多方面更复杂,部分是因为它缺少明确限定的权威界限,而越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明确的界限。越南寻求对国家的严格控制,权力一直延伸到乡村层级;而佛教王国的中央权力则是遵循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王国边远地区的控制权被轻易地下放给省长,省长能够行使几乎完全不受限制的权力,因为他们总是被假定不会挑战国王作为王国内事务最终仲裁者的地位。如果用金字塔来描绘越南内部的权力特征,那么一系列的同心圆则可以代表佛教王国的权力本质。国家可以被看做是被最大的同心圆包围的区域,但是只有在中心,即最小的同心圆所在的位置,国王拥有的才是真正的绝对权力。在中心圆之外——或者皇宫的限制之外——国王的权力经常会随着远离首都而逐渐削减。至于边界,再一次与越南形成对比的是,东南亚大陆的佛教统治者认为边界是不确定的,是可以渗透的。事实上,由于佛教王国的中心与外部区域缺少密切的联系,以及存在许多基本独立的小的权力中心,一些学者已经主张,在传统的东南亚世界里谈论“国家”是不合适的。当然传统的东南亚国家(为了方便我们继续使用这个词语)与20世纪被描述为“国家”的政治单位是完全不同的。

不论在王宫内的国家权力中心,还是在外部区域,拥有权力的官员都不是因为学识获得任命的。出生官宦之家、有能力以及引起统治者注意的机会,这些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升迁。佛教王国的统治者对于优秀官员的标准并非没有想法,因为有记录非常清楚显示他们确实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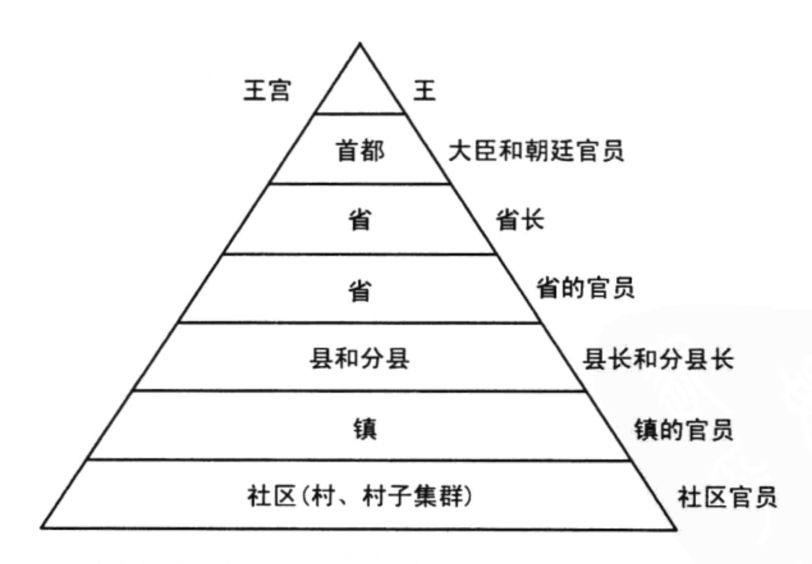
46 确的想法,但是其标准比越南的更灵活,更个性化。同样,国内的商业运营也很少以正式的模式进行,而是更多地取决于最高层次的国王或

者远离首都的省内大小官员的好恶。

使用这些泛称主要为了讨论一种理想状态，或者至少是一般状态，而不是用来详谈单个的偏离常规的特例。东南亚佛教王国强有力的统治者努力把他们的控制强加给整个王国，就如越南历史中有一段时期，结构清晰的国家系统难以运作，中央权力也不能控制远离首都的区域内那些野心勃勃的省长。但是，泛称必须在广泛的历史考察中，因此在强调存在于泰国政府（举一个佛教王国的例子）与越南政府之间的巨大差异的时候就没必要犹豫不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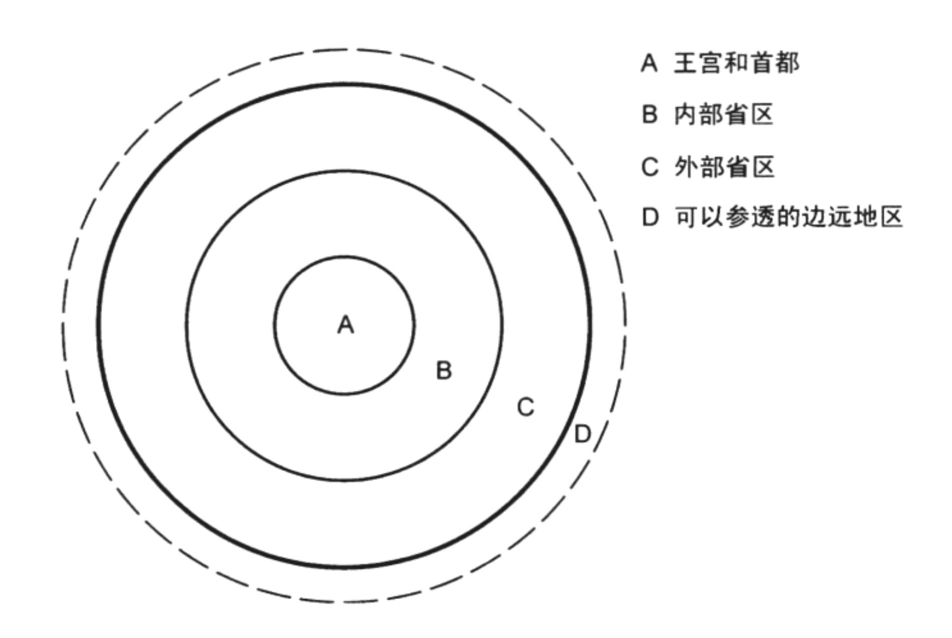
就如越南的皇帝一样，泰国的国王期望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进行调和。但是这种调和的本质和赋予参与行动的君主的作用都是非常不同的。在泰国以及其他的大陆佛教国家，国王的半神地位反映了君主和他占据的王位是王国的中心。君主是把佛教王国维系在一起的关键。尽管越南皇帝的头衔是“天子”，但他却没有同样的地位。越南的皇帝对国家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们不等同于国家。越南能够接受下面这种状况：在17—18世纪的100多年里，他们的皇帝只是个有名无实的首脑，一个随时听从大家族使唤的傀儡。不论国王的权力由于远离他王宫所在的首都是多么有限，也不论高级官员如何努

47



越南传统社会的权力分配示意图

在县长和分县长级别以下的职位不算是官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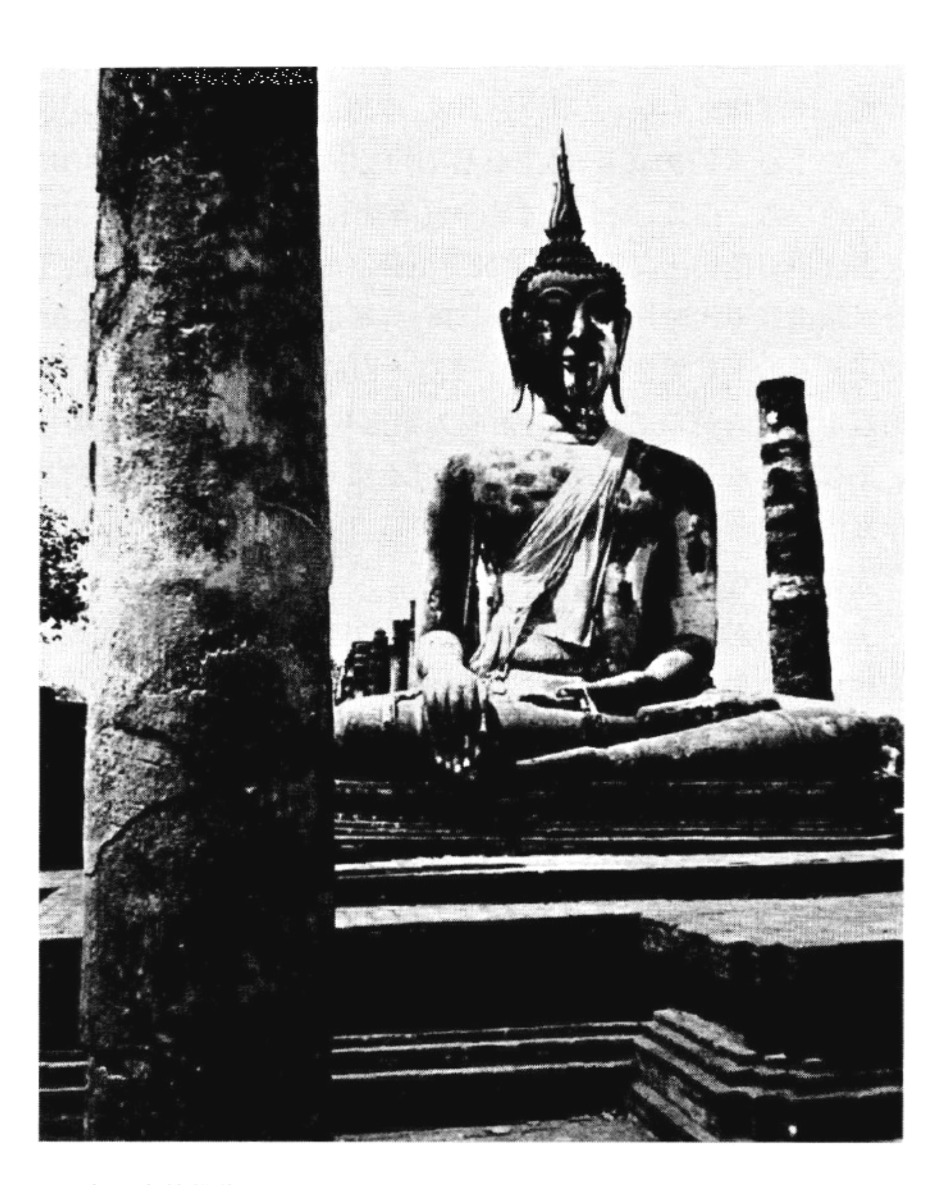


东南亚大陆传统佛教王国内的权力分配示意图

在距离王国首都越远的地区，统治者就越不可能实施有意义的权力。外部省区之外，由于没有确定的边界，是可以渗透的边远地区。

力去利用继位的儿童，佛教王国体系并不认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是对其官员而不是统治者的意向映射。

所有东南亚大陆佛教王国统治者的共同点是信仰——被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臣民共同拥有——他们半神或者接近神的特性。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国王拥有神性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而且越深入考察，问题就变得越复杂。对一个寻求以泛称来理解东南亚的人来说，下述广泛的观点值得关注。信奉佛教的传统统治者在东南亚大陆所发挥的近乎神圣的作用，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与欧洲基督教统治者有关的"神圣权利"的概念。欧洲的统治者拥有一个基督教认可的权力神授的地，但是无论这些国王和王后的地位被提升到多高，他们自己都不是半神或者准上帝。与此不同，东南亚大陆的佛教徒国王被看做是神圣的，或者部分如此。他们作为国王的位置不仅仅被佛教信仰所许可，他们本身也被从人类中选出并赋予只有神或者近神才能拥有的权力。



素可泰的佛像

佛教在泰人国家占据主导的位置，这些泰人国家在13世纪挑战了东南亚大陆吴哥的权力，并且在15世纪击败了吴哥的柬埔寨人。最早的泰人王国之一是素可泰，它的首都位于今曼谷以北约290英里的地方(460公里)。素可泰的遗迹零星地点缀着巨大的佛像，正如照片中所示，它们仍然是崇拜的对象。

这又是理想的图景。不过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在没有任何质疑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家族纠纷、武力政变,或者国王被推翻以及野心家阴谋(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成功)篡位等动荡事件。尽管现实比理想更复杂,但不管怎么说,理想被保持了。成功地把统治者从王位上赶走的挑战者,马上会极力声称拥有被击败的对手的所有半神圣的权力。而且,那些通过斗争或者阴谋推翻一个统治国王的人也大多会声称他们比真正的君主拥有更合法的王权。这种传统的历史背景对东南亚现代时期的重要性也许已经很明显了。考虑到传统的佛教徒统治者的至尊地位,人们不应该对下面的事实感到奇怪:一个如泰国君主那样的统治者已经继续成为泰国现代历史中非常重要的角色。王权的传统观念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多年来能够从他曾经是柬埔寨国王(1955 年放弃王位)这个事实中获得巨大的政治优势。

50 王室成员对东南亚海上地区的近期历史也是重要的。如果他们的重要性相比大陆国家没有那么显著,那是因为传统原因以及这样的事实:泰国的君主统治了一个从来没被殖民的国家,而西哈努克和他的祖先则是在一个允许至少保持柬埔寨国王的一些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的殖民体系里实行统治。与大陆的佛教君主制不同(再次排除越南这一特例),海上王国的大多数统治者是穆斯林,是按照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名义来行事的苏丹。根据严格的理论,作为穆斯林的苏丹们只能是人,并且拥有这个地位(人)所应有的局限。不过,严格的理论限制仍有松动的余地,尤其是在东南亚的海上地区,比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部分地区,他们保持了来自印度观念的大量影响。

没有其他地方比爪哇的情况更真实的了,在那里,16 世纪末期崛起的中爪哇马打蓝王国的统治者是穆斯林,但是,同样重要甚至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是一种丰富的神秘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这种传统借鉴了印度教—佛教的观念以及当地爪哇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模式。在他们的臣民眼里,马打蓝的统治者不仅仅是人,而东南亚海洋地区那些海岸和河边王国的许多统治者却并不如此。后面的这些统治者们是拥有

特殊权利和几乎无限特权的人，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人。马打蓝的统治者安坐在他的王宫里，正式承认伊斯兰教，但是与岛屿上许多其他传统王朝发现的模式相比，他的王权更容易找到与大陆佛教君主制的相似之处。

不论他们行使权力的宗教或者哲学基础是什么，18 世纪东南亚传统世界的统治者和服务他们的官员是一个与其他民众分离的集团。在越南，绩优能够使一个农民的儿子进入官方统治集团。一旦这种情况发生，这个年轻人或者平民出生的人将脱胎换骨，与以前完全不同。比这更明显的是，在该地区其他地方存在着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之间的分隔。除了罕见的特例，精英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隔几乎是一道鸿沟，这种深刻的差距只能在非常时期或者借助一个特殊的人才能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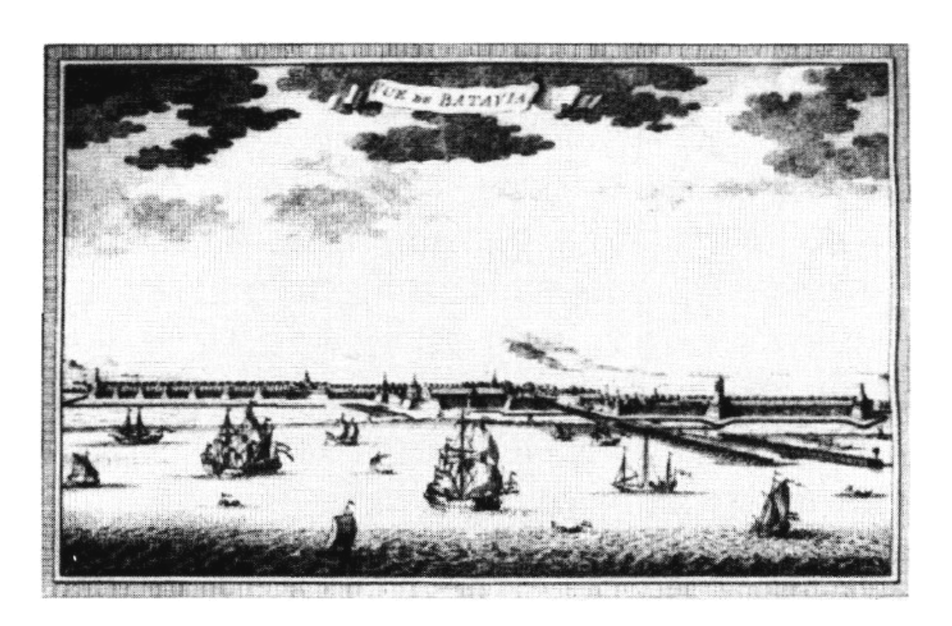
51

不过，当使用“分隔”或者“差距”这类词的时候，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弄清楚所谈论的是什么样的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的分离。例如，这里涉及的“分隔”不是宗教意义上把国王或者苏丹从农民那里分离出来。相反，农民很清楚地感受到他们自己、他们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宗教联系。这个事实包含在这样的谚语里面：“是一个缅甸人就是一个佛教徒。”谈到传统的缅甸，人们还可以加上一句：“要知道，在缅甸佛教的主要庇护人是国王。”分隔的根本特点是权力的分隔。在传统的东南亚，权力集中在极少数精英手里，不存在中间集团或者阶级来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明显的分隔。权力能否被明智地实施，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

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在东南亚被统治者之间没有区分，因为这不是实情。最重要的是，在东南亚所有国家（包括越南）里面，“村长”或者乡村领导等农民社会成员与无权决定乡村社区内部政策的那些人存在明显的差异。由于“农民社会”这个词是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因而会导致一个简单化的倾向，认为所有的农民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都是贫穷的佃农，在生活中除了照看他们的田地和听从上级之外不发挥任何作用。这样的概括是不能让人满意的。无论人们使用何种标准，在传统的东南亚世界里，没有农民是真正富裕的，但是一些人比另外一些人

富裕很多。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在乡村社区里获得了权力和影响，而且一旦获得就很少会让它失去。他们是以“村长”的头衔来行事的社区领导，而且也是联结乡村与更高的省级权威的中间人。尽管他们的物质条件也许通常会比同村人要好得多，但作为连接王朝与乡村定居点之间链条的最后环节，他们的责任并不值得羡慕，因为他们要监管税收、安排劳工工作以及确保男子参与代表他们遥远统治者的利益的战争。

52



18世纪的巴达维亚

爪哇北部海岸的荷兰殖民城市巴达维亚18世纪早期的景色。巴达维亚，即今雅加达，恰好控制了通往印度尼西亚东部香料岛屿的海洋交通，而且也是香料贸易最初把荷兰带到了印度尼西亚。由于建在地势低洼的地面上，对它的许多欧洲居住者来说，巴达维亚是一个死亡陷阱。欧洲居住者受到疟疾或者卫生设施不足的严重影响。照片来自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这些乡村领导对权力的使用在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甚至在每一个区里面也不同。由于已经强调越南非常独有的特征，因此，获悉那个国家的乡村社会是由一个非常特别的领导体系的成员来主导和领导，并不让人感到惊讶。而在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权力和实施责任是齐头并进的——一个村长拥有权力并且实施它，而在越南乡村的复杂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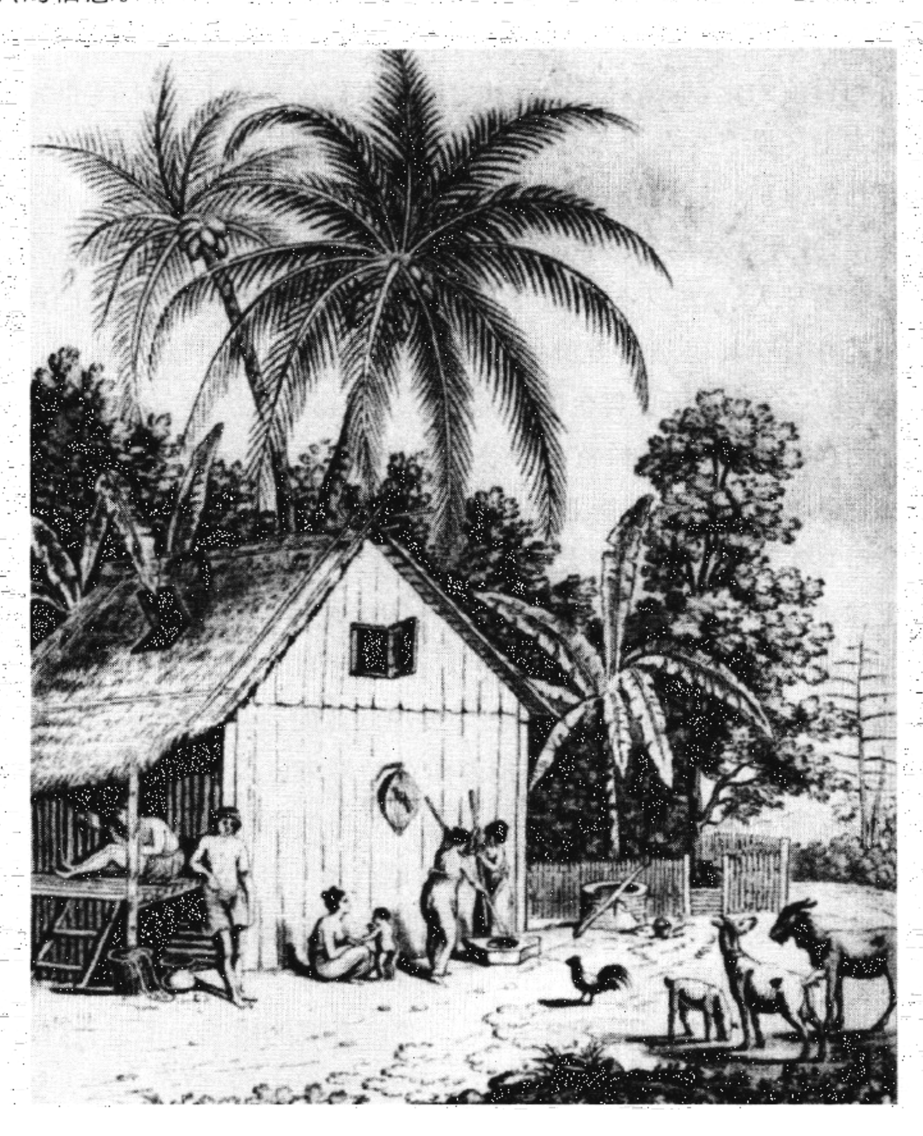
里，情况则不同。那里比较富裕的农民与其他地方一样，是一个自我延续的团体；差异在于，越南的乡村领导通过一组乡村官员来开展工作。53 这些乡村官员对乡村政府负责，同时还对其他较强势的村民负责。

到目前为止，本章对东南亚社会的考察已经关注了直到 18 世纪结束基本上还没有受到欧洲力量或者观念影响的传统世界。不过，在 18 世纪开始之前，以及在整个 18 世纪，欧洲人正开始慢慢卷入该地区的事务中，并开始对整个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菲律宾。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是最早一批来自欧洲的人，他们来到东南亚并且在其仍然需要继续争论和再评估的历史中发挥作用。16 世纪，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葡萄牙似乎将在该地区建立其主导的地位，并且将在丰富的香料贸易中获得主要的份额——当初是香料这种商品把欧洲人吸引到东南亚的。但是在葡萄牙的早期成功（包括 1511 年获得马来半岛西海岸伟大的贸易城市马六甲）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相对迅速地衰落，因为荷兰成了在马来—印度尼西亚世界从事贸易最重要的欧洲国家。但是如何重要呢？对在荷兰港口的商人来说，居住（而且通常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死掉）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确实重要，因为他们发展出了一套一段时期内能够给荷兰带来巨大利润的商业体系。但是除了他们的爪哇基地以及分散在各岛屿的哨所之外，荷兰的影响一直到 18 世纪中期甚至末期都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对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区来说，荷兰的影响直到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期才到来。在社会和行为模式方面，有一个有趣的案例表明，巴达维（雅加达）的荷兰人受到了同样甚至更多的印度尼西亚价值观的影响。不过，这些趣味性的讨论不能掩盖重要的事实：直到 18 世纪中期，荷兰人对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来说仍然是不重要的。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情况也是如此。

与东南亚其他地方相比，菲律宾很晚才成为历史的焦点。我们知 54 道，西班牙于 16 世纪后期在群岛北部的岛屿定居下来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帆船已经访问了菲律宾。令人沮丧的是，这些航行的记录没有告诉我们菲律宾社会的本质，因此我们对于西班牙

到来之前菲律宾生活的知识基本上依靠殖民之后才写作的那些人所提供的信息。

55



苏门答腊的村屋

这是一幅关于苏门答腊村屋的版画，版画是根据1792年的图样制作的。在18世纪要结束的年份里，尽管欧洲人与东南亚的联系在缓慢地增加，但是从这幅画中看到的那些农民继续过着一种基本上受到他们乡村和其附近地区面积限制的生活。此图采自出版于1811年威廉·马斯登(William Marsden)的《苏门答腊历史》(*The History of Sumatra*)，该书藏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

一般说来，西班牙人所接触的东南亚，主要是以小社区为单位进行统治，而没有中央统辖的区域。菲律宾的南部岛屿有个别例外：在那里，传统领导人对伊斯兰教的采纳已经帮助他们组织起了小的王国，通过使用宗教的统一力量，把许多分散的社区合并到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内。到了16世纪中期，伊斯兰教已经在更北部的岛屿缓慢地扎根，并且抵达了马尼拉。但是这是只出现在海岸区域的现象，内陆地区仍然没有受到新宗教的影响。因此西班牙人面临的是一个以大的村庄作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与东南亚的其他地区一样，权威在村长手里。由于出身、遗传或者能力使然，村长比其同村村民更富裕，更强大。

菲律宾北部岛屿缺少中央权力，除了几个中心港口，南部岛屿从来没有经历切实的西班牙统治，这使得西班牙殖民权力以一种该地区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方式来移植自己。而且，与东南亚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同，西班牙殖民推进的主要代理人不是士兵和商人，而是传教士。即使传教士在其他地方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状况在东南亚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不过在菲律宾，教会与国家的联系的程度与法国统治越南期间教会与国家的联系程度不同。就如世界上其他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地区一样，在菲律宾，教会与国家是不可分的。这种独特的特点使一些学者提出，为了理解17世纪以来菲律宾的历史和社会，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经历。 56

无论人们是否将菲律宾与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经历进行对比，西班牙的价值观，尤其是西班牙天主教价值观对菲律宾农民社会的影响都是深远的。菲律宾成为了东南亚地区天主教信徒占多数的国家。当然，天主教传教士的存在并没有立即带来乡村社会模式的变化。不过，随着教会和国家的共同力量促进权威的发展，西班牙的殖民逐渐冲击影响了农民的生活，给传统的地方领导带来了新的、更大的权力，尽管他们坚持乡村或者地区之上的权力必须由西班牙人掌控。这种局面最终的讽刺性后果已为菲律宾人所周知，但是其他人却并不清楚。到了20世纪早期，西班牙200年的统治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群不断增多的本地菲律宾人，他们接受的教育使他们非常适合在教会和国家中发挥作

用,但却因为他们不是西班牙人而无法如愿。这种状况造成的怨恨为19世纪后期菲律宾革命运动播下了种子。不过,还有另外的讽刺性后果。菲律宾受到西班牙的冲击比东南亚其他地区都要早得多,影响也深远得多。因此,如果西班牙的冲击产生了一个怨恨西班牙政治控制的阶级的话,它也为一种乡村经济状况奠定了基础。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几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发展、加强并且合法化了高度的社会分层,直到今天这仍然是菲律宾生活的一个特点。

对菲律宾的扩大讨论表明,该国的经历在很多方面与东南亚的其他地方非常不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比那些总是提醒我们注意越南独特个性的特征更是不同。不过,对菲律宾和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来说,农民的生活有一个普遍的模式,这允许我们再一次冒险进行简单和扼要的概括。在整个东南亚,农民生活的基本模式是:通过耕种,男人和女人们确保了对田地的权利。西方的土地所有权概念对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来说并不适用,但是越南再一次与其大多数邻居不同,它存在明确界定的私人土地所有权。一个家庭可以几代人在一块土地上工作,但是田地仍然是统治者的"财产"。这种情况细想一下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只要各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仍然很少,那么就没有什么土地压力。如果由于战争、饥荒或者霸主的过分要求等许多条件一起作用,造成一个农业地区生活困难的话,那么一个家庭或村庄可以迁移到能够找到工作的替代区域。他们甚至能够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在19世纪末,柬埔寨的法国官员惊讶地发现,农民可以通过柬埔寨和泰国的边界分别向两国迁移——无论什么时候强调农民人口的国家身份意识,都有必要记住这个事实。

农民的生活很不轻松,有时候甚至令人吃惊的困难。在那些依靠季风来为灌溉水稻供水的国家,饥荒的风险总是存在的。不过在所有(除了最贫穷的)地区,总会拥有几次乡村节日以及伴随着它们的快乐,但是对于一种深受疾病困扰以及涉及严苛的体力劳动的生活方式来说,这些快乐不可能是常态。

尽管乡下的农夫与种植者是精英等级之外最重要的东南亚群体,

但是其他群体也值得关注。在大一点的乡村和小的贸易中心，或者远离伟大首都的行政管理中心，还有工匠和商人。沿着大陆和东南亚岛屿周围的海岸以及河湖地区还有渔民，他们的职业把他们与种植者分离开来，不过他们享有相同的价值观，并遭受着类似的苦难。

不论是种植者、渔民，还是工匠和小商人，农民的世界本质上是封闭的。除了与更大世界的微弱联系，不存在真正自主的乡村。较富有的村民也许知道其稻米地之外的一点世界，就如渔民必须了解一些自己卸下渔获并把船拖出水面的海滩之外的世界。但是乡村之外的世界无法被完美地体验，而且在村子里面出生的任何人，除非战争或者迁移，离开的可能性事实上是非常渺茫的。这个事实解释了东南亚地区许多国家民间故事的一个共同主题：一个乡村青年借助智力、好运气或者魔法(有时候是三者一起)漂亮地转型为一个伟大的官员，甚至是一个国王。

58

这样的主题突出地强调了农民生活的基本现实和不变的生存本质。生活不一定是静止的。在面对饥荒或者逃避战争的时候，村民将迁移。流动的商人和他们的大篷车一起穿越东南亚大陆，从下缅甸进入到现代越南的高地地区。来自苏门答腊、爪哇北部港口和苏拉威西岛的印度尼西亚商人在他们的贸易航行中蜿蜒穿过群岛的各个海域。但是在国外冒险之后，他们回到一个多年来没有改变本质的世界。

不过，随着 18 世纪走向结束，大量的变化对作为整体的东南亚来说不再遥远。许多变化是西方对该地区影响的结果。19 世纪，只有泰国逃脱了殖民统治的经历，而且即便是泰国，西方对它的冲击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得多。而其他的变化与殖民国家的到来没有任何关系。在 18 世纪的最后 30 年里，越南政治动荡，开始挑战现存的社会和经济模式——西山造反(1771—1802)在社会意义上是否具有真正革命性是另一个没有解决的历史争议。在泰国，一个新王朝——也就是从 1782 年开始的却克里王朝的到来，把一系列著名国王推上了权力的舞台，他们用个人能力改变了国家。他们通过重振政府形式以及有选择性地借鉴西方，达到了改变国家的目的。

不断增长的西方影响所带来的变化和东南亚各个国家统治集团内部杰出个人激发的变化，后来在整体上影响了所有民众。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变化的事实和前景对精英的影响最大。我们在这里再一次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隔。泰国的统治阶级最早意识到了激发第一任却克里统治者拉玛一世的天赋，体现在为整顿宫廷生活而编纂的内容丰富的法令以及他亲自吟诵的罗摩衍那(Ramayana)史诗之中。中爪哇的精英欢迎18世纪中期突然蓬勃发展的文学。越南的精英也是最早对伟大的史诗《金云翘》作出回应的人。作者阮攸在19世纪初期写作了该诗歌，作为考察人类生存的道德困惑的最好的越南文学，该诗歌的地位从来没有被取代过。

对农民来说，世界还和以前一样，主要有作物种植和收获周期性循环、一年的各个季节、出生和死亡等大事件。很难想象他们在18世纪的现实生活，因为21世纪东南亚最遥远的乡村已经接触到现代世界并且被它改变。进入18世纪农民的精神世界则更困难。我们也许能够感觉这个精神世界的某些复杂性，万物有灵论的信仰混合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宗教或者哲学——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印度教和儒家学说——这些都被东南亚国家所信奉。不过，即使最感性的研究者也不能在另一个时代的宗教世界完全深入另一种文化。

不过，尽管本章强调了传统的东南亚世界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离，但是我们必须坚持一点，即这两个团体生活在一个整体性的世界里。因为这也是传统世界的一个特征，尽管随着新力量和新观念渗透到该地区，它在不久之后将面对挑战。朝廷和国王是与他们统治的种植者、渔民和小商人分隔开的。但是所有这些群体都居住在一个单一的、统一的世界里。正如中世纪欧洲的农奴和封建领主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感觉到自己是基督教的一部分一样，种植者或者渔民们也会感觉到自己和他们的统治者处于同一个世界，不论统治者是一个伊斯兰苏丹还是一个佛教国王，是一个越南的儒家皇帝还是一个信天主教的西班牙总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19世纪开始的历史将是一系列变化的历史，这个曾经也许安宁、自足的世界开始改变了。

第四章　少数族群和奴隶：传统东南亚的局外人

61

前一章描述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单一世界”，是属于主流群体的世界，无论他们的地位是卑微还是显赫。不过，居住在传统东南亚的人，并不都是这个国家内占据主导地位的种族集团的成员。在传统东南亚的各个国家内，有一部分人数很少的局外人，他们是移民或者来自遥远地区移民的后裔——印度人、波斯人、华人和阿拉伯人。这些少数族群一直到 19 世纪后期都不怎么重要。对于东南亚大陆以及某些海上地区来说，传统世界真正的局外人是居住在山上和山区的民众。

与单一种族的大陆国家或地区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分隔相比，传统东南亚社会的“山上与山谷”的分隔有所不同。低地的种植者是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哪怕只是可有可无的一部分。居住在高地地区的民众不受低地国家行政机构的约束，而且他们并不与低地社会共享价值观。

不过，当进行一般描述的时候仍需要小心，因为山上—山谷的分隔不是绝对的。根据政府的日常运作，东南亚的大陆山地民族是局外人，但是他们在整个地区发挥了多种多样的重要作用。他们是奴隶的一个（甚至可能是唯一）来源，交易森林产品，或者提供特殊的技能，如训练大象。通过这些方式，高地的少数族群在没有成为主流社会的一部分

62

的情况下，与主流社会联系在一起。

上述情况直到最近才开始有所改变。这种现象在一个现代世界里面似乎相当奇怪。现代世界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上的统一——如热点词汇“地球村”。不过，上述情况对200年或者100年前的欧洲人来说似乎没有那么奇怪。因为在欧洲，山区的民众长期以来被看作（而且他们自己也这么看）是一个分隔的群体。而且不仅仅在欧洲如此，美国东部隔绝的山区的社区记录显示更是如此。东南亚高地地区少数族群的种类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相当多的。与那些低地社会相比，他们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同样大。在传统东南亚，许多山地民族是游牧农民，他们赖以生存的方法是刀耕火种技术——“吃森林”——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通过烧毁树木来将森林铲除，并在由此产生的灰烬里面找到一个暂时较为肥沃的地点来种植农作物。其他人本质上则是固定社会的成员，在高海拔的山谷里面种植水稻，但是抵制任何与平原生活同化的行为。

山上民族和山谷民族之间的种族与语言的联系通常是很紧密的，即使这个事实经常得不到认可。在一个重要的案例中，这种联系得到了山上民族自己的认可。那些属傣泰语系的山谷居民虽然不愿加入他们在低地同样属傣泰语系的种族群体，但他们已经意识到存在于他们之间共同的基本语言，因此他们也称呼自己为傣泰人。但是这样的意识似乎没有成为其他群体的一个特征。贯穿于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南部山脉上的山地民族色登族和巴纳族都讲同一种语言，大致可以看做是现代柬埔寨语或者高棉语的前身。不过，这个事实没有促使这些山地民族与低地大多数人之间形成任何意义上的共同的种族身份。

63

高地少数族群与低地多数族群之间长期存在的绝对分隔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群体之间绝对的社会分隔造成的。不论政府利益与贸易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肯定存在一种近乎绝对的社会分隔，主流阶层会挑选一些用来描述山地民族的词语来总结这种分工。这些词无一例外都是贬义的，充满了歧视并且强调分隔这两个群体的社会和文化差距。高地人被越南人称为“moi”，被柬埔寨人称为“phnong”，被老挝

人称为“Kha”。这些词都能翻译成“野蛮人”或者“蛮人”，体现了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所说的“无法无天的次等种族”的概念。今天，这些贬义词通常已经被从官方用语中剔除，但是仍然保留在某些个人的词汇中。

社会分隔，这个词语在这里的含义非常广泛，甚至几乎有些绝对，但是，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它没有阻止主流和非主流群体的联系。高地的民族对低地社会，提供了很多功能。如果一支低地的军队想穿越山脉攻击敌人，谁能为他们提供知识？谁能带领奴隶突击小队各方从低地冲到最偏远的地区，并且帮助捕获那些与平原世界隔绝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这些任务没有规律可循，从山上征召兵役加入低地统治者领导的军队从而参加战斗也是如此。这种军人的重要性可以从柬埔寨文学作品中看出来。柬埔寨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个来自山上的男人，他是一场成功战胜侵略者战役的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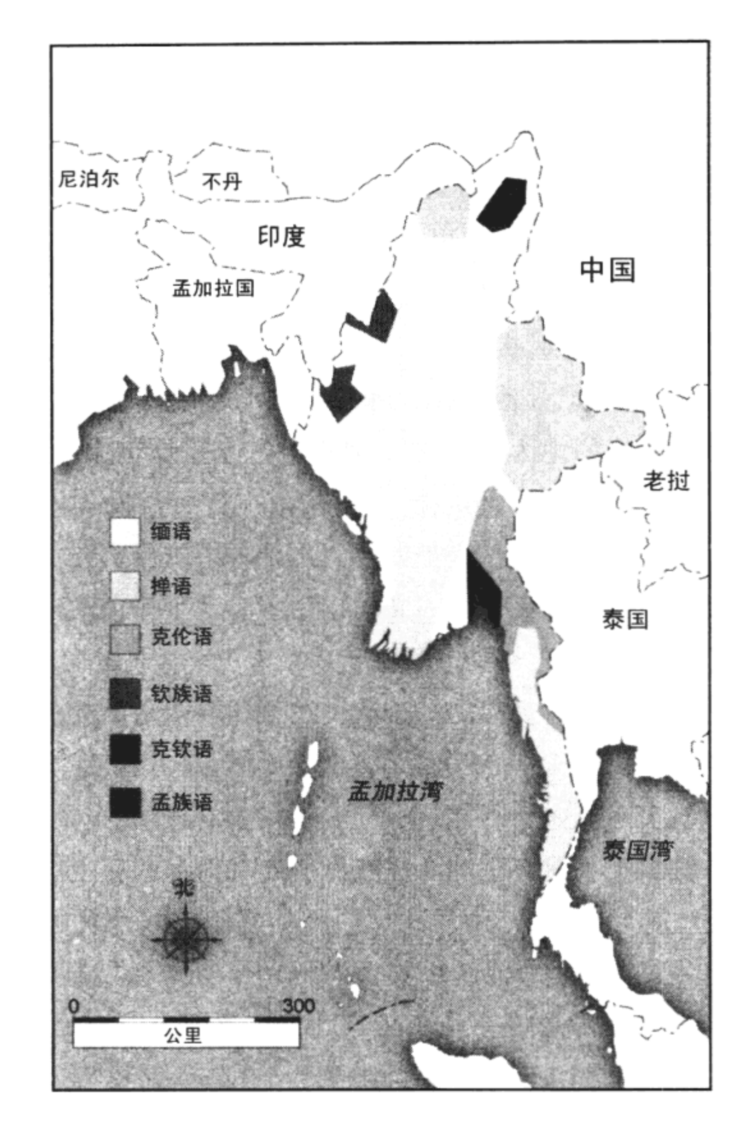
其他任务则比较有规律。一个居住在柬埔寨西南山脉山麓的少数族群拥有为柬埔寨朝廷供应豆蔻种子的世袭任务，一直到法国人出面阻止，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奴隶制度。对这种朝贡的报酬就是，山地民族被允许基本上不受打扰地居住在他们疟疾为患的环境里面。

除了这些实际的任务，山地和平原民族之间的联系可能是不可思议的。18世纪，东南亚的传统世界仍然保留了其本质特征，越南和柬埔寨的统治者嘉许了居住在两个国家之间一系列山脉中的两个加莱(Jarai)巫师的神奇魔法。这些巫师被称为“火与水之王”，连柬埔寨君主都要送给他们礼物，这一举动似乎就如他同时向泰国和越南朝贡一样奇怪。这似乎是出于对这些巫师伟大魔力的一种信奉以及他们与柬埔寨皇家饰物“神剑”(preah khan)最神圣部分的遥远联系。这是一把有名的宝剑，它被描述为“因陀罗的闪电”——印度诸神之王。更确切地说，两个“王”被授予的地位以及其他皇室家族与特定的山地民族群体之间保持的脆弱联系，可以被看作是现在相互隔绝状态的群体曾经拥有共同起源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对高地和低地民族的大多数看法与东南亚大陆的一

64

65



缅甸种族语言分布略图

在东南亚大陆的国家中，缅甸很独特，少数族群占有很大比例，超过了其人口的30%。

些国家有关，在这些国家里面，存在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比如越南的越族人，柬埔寨的柬人(高棉人)，泰国的泰人，以及较小程度上的老挝的老人。其他地区却非常不同。在大陆，缅甸的情况与其邻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有着漫长的历史，但缅甸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缅人占据了主要的河谷，但是缅甸边界内高地地

区的人口很少欣然接受缅族试图强加给他们的政府。的确，从缅甸有历史记录开始直到今天，不同种族群体的紧张局势一再发生。这是因为存在相当规模的土著少数族群：掸族、克钦族、克伦族和钦族，这还仅仅是非缅族群体中最重要的几个，他们构成了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仅仅掸族和克伦族就占了缅甸全部人口的大约16%。

这种规模的少数族群促进了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的种族团结。在这些国家里，土著少数族群少于总人口的15%。这个数字在过去并不总是能阻止主流与非主流群体的冲突，但是由于已经明确确立了有利于主要种族群体的优势地位，所以从来没有权力归属不明的现实问题。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的土著少数族群确实可以被描述为局外人。但是这个词对缅甸来说却是不同的意思。在那里，掸族和克伦族也是局外人，但是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表明他们能够抵制缅族人把其意志强加给他们的任何企图。为了明确这种区分，必须补充一个必要的限定条件。例如，如果在泰国没有实际权力归属于谁的问题，那么也会存在另一个方面的高地—低地关系。在整个历史时期，甚至直到最近，低地政府通常都认为没有必要卷入高地地区的日常管理。只要这些地区的民众没有危害到国家的利益，最好由他们自我管理。如果高地民族不被看作是一个威胁，这种政策是可能的。但在缅族人眼里，高地民族对缅族统一的梦想构成了一个昭然若揭的威胁，因而这种政策是不可能的。

66

我们无法在海上地区找到传统时代东南亚大陆存在的种族关系模式。尽管海上世界的居民，从马来半岛到菲律宾群岛，使用的都是一系列具有共同根源的语言，但是他们所处环境的地理特征有助于分裂而不是统一。爪哇的大岛屿为大面积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场所，如14和15世纪的满者伯夷。不过满者伯夷和早期以苏门答腊为基地的室利佛逝一样，在他们的中心之外都没有种族—语言上的统一。如东南亚的研究者反复强调的那样，东南亚的海上地区有一个非常不同于大陆的种族模式。那里没有一个“主流多数族群”与“非主流少数族群”的一般模式，海上世界的人口是由一系列拥有错综复杂关系的种族群体构成的。唯一可以比较的是，很少存在一个明确定义的种族群体支配另

一个少数族群的情况。相反，各族群清楚地了解自己身份，并与其他种族分别居住在各自的领土范围内。不论是苏拉威西岛的武吉士海员、西爪哇的巽他人，还是婆罗洲内部的迪雅克，都是如此。在地理上分裂且环境险恶的东南亚海上世界建立一个领土广大的国家在现代之前多半是不可能的。众多小国家与许多部落地区共存则是正常现象。

67

过去和现在都有个别的例子证实，原始山地民族的发展水平把他们与海上世界的更大的种族群体分隔开来。我们能够从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和菲律宾群岛上分散的群体中发现这些种族，他们是该地区一些最早居民的后裔。他们的数量总是很少，而且总是被人类学家描述为小黑人。他们从来没有对生活在低地的其他族群构成威胁。

海上世界真正的隔阂不是山上居民与山谷居民之间的分隔，而是以永久居住地为基础的生活模式（无论是种植、捕鱼还是贸易）与那些仍然追寻一种综合了狩猎和刀耕火种农业的游牧生活之间的分隔。在大陆世界，不定居的种植者必然是高地人，但在东南亚海上区域并不如此。而且，对于传统海上世界的不定居的群体来说，被纳入以定居民族为主要构成的国家体制内，对他们或者其他人都没有什么意义。

在传统的东南亚社会，一个局外人的经历通常是由种族和地理因素决定的。但是，任何对该地区的考察都需要考虑其他局外人。欧洲访问者不假思索地将这些男人、女人和儿童描述为“奴隶”。确实存在这些人，他们在传统东南亚社会的地位符合“奴隶”这个词所代表的所有悲惨的特征。这些人是以一种非常明确和特殊形式存在的局外人，他们不能分享现存社会的好处。他们是其主人的财产，主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对待和处置他们，因此他们及其后代没有解脱的希望，他们的后代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自动成为奴隶。战俘和被奴隶远征所俘获的人是经常用来填补这个角色的群体。

68

成为这样的奴隶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没有被救助的前景，此外还有其他群体也被西方的观察家称为“奴隶”，但是更准确地说，他们与前者并不相同。例如，来到东南亚传统世界的西方游客很少理解“真正”的奴隶（注定要过一种奴役的生活）和为了应付债务或其他未履行的义务

而自愿、暂时放弃自身自由的那些人之间的差别。这些债务奴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局外人，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他们从其主人那里受到的对待是非常不同的。

在传统东南亚的复杂本质中，我们更应该理解的也许是，还存在其他群体——统治者或高官的仆人。这些人不是生活在社会之外，而是在这些社会中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社会没有将选择权对他们开放；他们的生活地位和他们的工作在出生的时候就注定了。这些人是世袭的宫廷仆人，不论是在东南亚大陆佛教王国，还是中爪哇的苏丹王国。

即使在对传统东南亚那些局外人进行最简洁的评论时，也要强调这个地区的复杂性，该地区从 18 世纪末期开始受到来自西方的重大影响。不过，认识到这种复杂性不应该使一个观察家看不到总结概述的可能性，以及该地区历史中曾经存在一些共同主题的事实。在对大陆和东南亚海上、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和信奉佛教或者另外一种宗教的地区进行对比时，还是应该考虑其中存在的与差异性同样重要的同一特征。

在 18 世纪开始的时候，东南亚的所有地区仍然被一种几个世纪都未曾改变的生活模式主导。西方意义的工业还不存在，而且工匠只占全部人口很少的一部分。在统治者、官员和为精英服务的那些人的等级之外，那些种植者、渔民、小商人和统治者之间没有任何的缓冲。

69

这是一个这样的世界：高度重视秩序，遵守适当的程序，并保持对传统做法应有的尊重。因此，它经受不住那些非东南亚人努力改变它的尝试。因为西方人经常无法遵循东南亚的规则，即使他们有时认为他们正在这么做——这确实很少见，而且由此产生的变化往往是巨大的，比如为了引进新的思想和技术而作有意的尝试。

生活在 18 世纪东南亚传统世界的那些人也许认为，他们已经对自己的问题有了答案，无论是和平与战争，人与宇宙，以及控制宇宙的诸神的关系，还是有必要去找到面对社会内外不同群体的合适的行为模式。但是，随着西方开始越来越多地侵入东南亚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回

答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从 19 世纪开始的东南亚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有时是论战。这场辩论或论战的核心是关于东南亚人如何解答他们面对的新挑战所带来的问题。有些答案是有意识寻找解决方案带来的结果,有些问题从来没有被全面回答。总之,挑战成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基调——对传统权力处置的挑战,对接受传统价值观的挑战,以及对经济生活传统模式的挑战。随着这些挑战的发展,传统的东南亚世界也缓慢地遭到了无情的破坏。



第五章 欧洲人的到来及挑战

70

欧洲人的作用在东南亚历史中曾经是如何重要的问题已经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研究该地区的学者的关注点之一。如同在学术的争论中曾经存在许多真正的问题被争斗的尘埃所遮盖一样，某些特定观点的拥护者也不乐意看到他们的观点不是唯一值得考虑的观点。争议的核心是什么样的因素在形成东南亚历史道路中是真正重要的。随着争论的进行，大多数学者逐渐认同东南亚人自身的因素是最重要的，而且还认识到，过去写作该地区历史的时候，非东南亚人由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通常是西方的)，经常无法全面重视那些因素。

现在尘埃落定，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共识：欧洲殖民活动时期不能被视为是东南亚广泛的历史中的一个不重要的事件。考察该地区历史的几种传统方法——就是强调欧洲的作用并且称之为"欧洲中心论"——的重要的限制是：欧洲人影响的本质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影响的力量也是不均衡的。认可了这些事实，加上意识到无论考察的哪个时期，东南亚国家丰富和重要的历史以及它们的人口才组成了东南亚真正的历史，就会催生一个更加平衡的发展图景。而且这个更平衡的图景肯定会考虑到欧洲人的作用，但却是以一种非常不同于 50 年甚至 40 年前的方式。

71

下面这个例子更明确地证实了这一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前，历史书中非常常见的是，把荷兰对印度尼西亚岛屿的统治看作是好像已经稳稳地建立了几百年的样子。荷兰人是在 17 世纪初期到达印度尼西亚的，正因为如此，通史经常指出，这些岛屿成为荷兰的殖民地已经 300 年了。这种陈述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一错误的简化已经广泛散布。荷兰殖民统治已经建立 300 年的看法没有考虑这样的事实：现代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到 19 世纪晚期，甚至更晚至 20 世纪初，才处于荷兰的殖民统治之下。而且，专注于荷兰作用的历史很少(如果有的话)关注印度尼西亚人在他们自己岛屿历史中的作用。印度尼西亚人构成了荷兰人行动的背景，而不是被看作两种文化冲突的重要参与者，这种冲突是更广泛的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一部分。

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写作印度尼西亚的历史不需要关注荷兰的作用。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就如葡萄牙人和美国人在菲律宾，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地区，以及英国人在缅甸和马来亚，甚至少量的葡萄牙人在东帝汶，他们是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在历史的某些方面，在意义深远的具有决定性的发展上，欧洲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东南亚地区建立国际边界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欧洲人发挥的作用就不像以前认为的那么重要。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人写的有关越南的历史中，经常将驻越南的法国官员描述为主导了法国文化植入越南的生力军。当越南的革命者在 20 世纪 40—50 年代抗击法国的时候，他们通过促进越南语的识字率增强挑战他们对手的能力，这清楚地说明了该观点的错误。与所有法国人的观点相反，法国的语言和文化从来没有取代土生土长的价值观和语言。

72

与其他很多事情一样，我们在这里正面对关注点的问题。东南亚国家更古老一点的历史书通常有一个狭窄的关注点。它们考察欧洲总督和官员所发挥的作用，而不是整个历史舞台。当关注点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转到更广泛的观点时，欧洲人没有消失，他们在整个的东南亚世界中占据了不同的位置。欧洲人成了努力提升自己地位的众多群体中的一个，而且还是对他们所处的社会很不了解的一个群体。

另外一个例子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观点。随着 18 世纪的结束，荷兰

在巴达维(雅加达)建立殖民地已近 200 年。爪哇的很多地方通过贸易协定或者荷兰任命的负责外埠政权的高级省级官员,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发生联系。不过,无论从政治还是从文化的角度,都不能将爪哇视为一个荷兰人的地区。不仅由于爪哇的文化生活几个世纪以来继续维持不变,而且荷兰殖民统治者对这个他们声称不确定统治的地区的了解也相当少。直到 19 世纪初,爪哇的一个欧洲统治者才知道在中爪哇日惹的旁边存在婆罗浮屠巨型佛塔——世界上最大的佛教纪念碑之一,而且不是荷兰人而是英国人发现了它,当时处于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人在爪哇实行了短暂的殖民统治。

那么,当欧洲人宣称他们在东南亚拥有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什么? 在最根本的层次上,欧洲国家成为该地区至高无上的统治力量。这种政治发展也带来了欧洲侵蚀东南亚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殖民国家创立的边界(只有少数例外)已经变成了东南亚当代国家的边界。同时,西方人的到来质疑了有关管理的旧价值观和方式,因为欧洲国家的成功统治证明了旧体制的不足之处。为了了解这些政治发展以及其中涉及的权力和思想的转移,是时候对前面描述的彻底终结传统世界的殖民统治进行国别考察了。

73

大陆东南亚

缅甸

直到 18 世纪结束,缅甸还没有成为欧洲扩张的目标。由于几个世纪以来长期受到种族分裂的困扰,18 世纪后半期的缅甸在一个新的贡榜王朝强有力的领导下,似乎已经找到新的生活。在这个王朝的建立者雍籍牙(1752—1760 年在位)和继任者,尤其是波道国王(1782—1819 年在位)的领导下,缅甸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内部统一,即使不能完全消除邻国带来的威胁,至少也能减轻不少。不过,这些领域的相对成功只是解决了缅甸所面对的一组问题。其他问题是由英国权力缓慢地扩张到印度的东北部地区所带来的。缅甸人以前曾认为印度东北部地区处于他们的影响范围之内。

这里有一个关于外来价值观和东南亚价值观冲突的典型事例。18世纪缅甸的统治者认为，位于现代缅甸西部或者西边的阿萨姆、曼尼普尔和若开是他们的利益应该占上风的边界区。他们通常不寻求对这些地区的严格控制，而是期望缅甸在那里享有最高利益，而且绝不允许那些可能挑战这些利益的人进入该领域。这个观点正好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所持的观点相反，后者的权力正在向印度以外的地区扩展。反对在边界区划定明确的边界这一观点对英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在西方人看来同样令人费解的是，一方面，这个政治体系允许缅甸统治者声称对处于印度和缅甸之间的这些地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同时接受只要不涉及缅甸的利益，这个地区居民就不受管辖。英国人认为，如果来自阿萨姆、曼尼普尔和若开的攻击方进入到东印度公司控制的领土，那么缅甸朝廷就要负责，并且应该采取行动阻止其"臣民"这么做。

74

他们没有进行思想交流。而且，边界区的问题不是缅甸和英国之间存在争议的唯一问题。其他刺激性的问题涉及对英国商人的权利——或者更明确地说，是缅甸人认为缺少的那些权利——以及对外交流的合适层级的不同看法，这些问题缓慢但切实地破坏了双边关系，最后导致了缅甸统治者孟既(1819—1837 年在位)灾难性的决定：通过侵犯孟加拉与英国对抗。

缅甸遭遇的悲惨结果是，英国进入下缅甸，攻克了仰光，然后在1826 年强迫缅甸签订《扬达波条约》，条约规定东印度公司控制若开和德林达伊。

20 多年来，英国侵蚀的范围被局限于此，而且相比虽然恼人但还可以忍受的英国人在若开和德林达伊的存在，缅甸首都阿瓦复杂的国内政治更为重要。不过，对于管理政府和商业事务的不同观点又一次造成了缅甸和英国的敌对。

19 世纪 50 年代初，仰光的发展与 1839—1842 年广州的发展(当时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间的对比引人注目。仰光的缅甸官员允许英国商人进行贸易，但是他们在追求个人财富上毫不犹豫，比如他们会迫害那些被视为外来干涉者的人。他们相信这么做增强了缅甸

的声誉，因为这为他们毋庸置疑的权力提供了证据。当印度的英国人逐渐把缅甸的事件看做对他们在整个东方的作用的力量和意义的测试时，他们的判断被证明是致命的错误。英国军队起初没有得到授权，但是后来得到了伦敦的批准，他们发动了第二次英缅战争，占领了下缅甸——一个拥有相当大的农业和木材潜力的地区。 75

英国的殖民推进再一次停了下来。1853 年，英国已经在下缅甸安顿下来，他们满足于等待。缅甸朝廷发现自己不可能调集足够的军事力量把英国驱逐出去。尽管面临着外交危险，由于长期以来国内争斗的持续存在，它不可能展示一个团结的外交阵线。到了 19 世纪 80 年代，缅甸变得对英国非常重要，不仅是作为一个有潜力的财富来源，而且是作为英国与法国争夺在亚洲势力范围的重要一环。但是我们现在不清楚，缅甸朝廷、其统治者和官员们对这些内容了解多少。对一些官员来说，英国的商人为他们获取个人财富和羞辱外国人提供了机会。对其他在曼德勒的朝廷官员来说，礼节问题似乎经常比权力问题更加重要——尽管很清楚，英国人和缅甸人都对外国人是否应该在国王在场的时候穿鞋高度重视。但曼德勒的缅甸朝廷误判了英国人的力量，后者决心成为缅甸的主导力量，并确保其在商业利益上超过法国。于是在 1885 年，事情到了危急关头。由于拒绝了英国的最后通牒，锡袍王——缅甸的国王决定了其国家的命运，英国军队于 1885 年 11 月发动了第三次英缅战争。

1886 年初，英国攻陷了曼德勒，并声称控制了那些以前没有占领的缅甸地区。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发生了许多艰苦的战斗，且通常伴随着英国军队对那些被俘获者的严酷惩罚，但是“英属缅甸”最终还是形成了，而且缅甸和印度之间的西部边界也被划定。如果缅甸的领导人更好地理解了他们面对的挑战的实质，那么历史又会变成怎样？这个问题永远不可能有答案。严格的准确判断一定是：缅甸的领导人受制于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不可能认识到他们这么高度重视的价值观对英国人毫无意义。

越南 76

如同缅甸一样，越南是被一步步地归入殖民统治之下的。但是与

77



越南的高级官吏

越南是东南亚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中国的影响，文化上显得与众不同。在传统的越南，中国的影响在视觉上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在皇宫和庙宇建筑以及官员的服饰方面，这位高级官吏的服装即是一例。图片采自《旅游世界》（*Tour Du Monde*），1878年。



越南的士兵

与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的传统统治者相比，越南皇帝的不同之处在于维持着一支常备军。这样一支军队的存在以及信奉儒家意识形态的力量，误导了越南的统治者及其官员，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抵抗住法国殖民者的攻击。在战斗中，那些士兵根本不是装备精良的法国士兵的对手，法国殖民者在 1858—1886 年逐渐征服了整个越南。照片采自《旅游世界》，1878 年。

英国在缅甸的统治不同,法国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越南花了 25 年的时间,而不是将近 60 年。而且与缅甸类似,越南的统治者和朝廷也经常未能真正理解法国给他们带来的挑战的实质。

不过,我们不应该太多地去寻找类似点,因为在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法国军队第一次侵犯越南时,后者是一个非常不同于缅甸的国家。除了两个国家巨大的文化差异,此时的越南似乎正走在一条通向成功的持续上升的道路上。尽管存在内部困难,但是国家是统一的并且正在扩张。不论两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差异是什么,缅甸和越南的政府有一个共同的致命错误:两者都没有对欧洲入侵者的力量和决心产生清醒的认识。在越南,顺化的朝廷了解西方的技术进步,但却认为它们不会对自己的独立构成威胁。

法国把越南看作是与中国贸易的一个跳板,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越南的地理位置临近中国并不意味着重大贸易一定会在两国之间传递。当法国的军队侵犯越南的时候,他们希望的是贸易,承诺保护基督教传教士,并且还嫉妒英国在其他地方的殖民推进。越南朝廷几乎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儒家秩序还没有使得统治者和他的官员准备好来应对这类发展,尽管他们知道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占。因此,当越南人发现他们没有物质力量也没有外交能力把法国从本国驱逐出去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没有任何希望也没有任何理由的政策。随着法国在 1859 和 1867 年占领了越南南部一大片肥沃地区,首都顺化的越南人希望入侵者不再进一步推进。

79 他们的希望落了空。法国人打算留下来,并且在 19 世纪 80 年代继续扩展他们的殖民领地,直到包括所有的越南地区。为了这么做,他们不仅在东方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帝国,还在加速越南知识分子危机意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19 世纪 50 年代晚期法国刚刚侵入的时候,越南国家是一个活力和停滞结合的矛盾体。越南的边界持续推进到西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这是一个国家保持持久活力最明确的证明。但是这种活力与下列现象并存:越南嗣德皇帝和大部分的官员阶级不愿意承认西方构成的威胁是多么大。不过当时还是出现了极少数的声

音，认为存在这种威胁，并且需要改变，他们中间有基督教学者、官员等。但是直到法国殖民统治在整个越南的建立，西方挑战的全面进入之时，保守势力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越南的地理形状使法国不能以其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一样的方式来进行殖民统治。部分是因为越南的统治者和官员长期注意划定他们国家的边界。不像在海上地区，法国可以创立一个以前没有存在的国家。法国在越南必须构成一个军事威胁，随后强加一个外来的殖民政府，因此在毁坏越南旧秩序上法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们随后不乐意与越南人共享权力，以及不乐意考虑殖民地独立的可能性，法国人为东南亚历史上最强有力的革命之一做了铺垫。

柬埔寨

与缅甸和越南比较，柬埔寨在东南亚大陆是一个小国，力量有限，以前的辉煌都不复存在，甚至在 19 世纪中期之前其伟大的庙宇遗迹也从柬埔寨手中转移到泰国国王的领土之内。但柬埔寨毕竟生存了下来，这反映了泰国和越南的统治者都不乐意推动他们的对手达成最终的结果。在经过了一系列跨越柬埔寨领土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冲突之后，泰国人和越南人达成共识：允许柬埔寨继续存在，作为两国之间的缓冲区，与两个邻近的朝廷保持附庸的关系，从而使他们得到最大的利益。

80

如果 19 世纪法国没有进入越南和柬埔寨，我们只能推测也许会发生什么。不过，尽管只能推测，影响柬埔寨历史的可能线索也并不难以查找。如果没有法国的到来，似乎很难想象柬埔寨会被长期保留以发挥缓冲区的作用。它作为一个国家也许会湮没无闻——尽管不可能以任何确定的方式来讨论——一个痛苦的弱国最可能的命运。

19 世纪 60 年代初，越南的法国人决定加强对柬埔寨的控制，这就确保了该国的生存，而且不仅是国家的生存，因为通过保持柬埔寨的统治者诺罗敦国王国家象征性领导的地位，法国在提高王室以及朝廷官员的声望上也发挥了作用。在这方面，他们的行动与本章已经考察过的另外两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缅甸，英国结束了

君主制。在越南,法国破坏了皇室的权威,以至于没有一个越南皇帝可能再一次获得前殖民时代所要求和获得的忠诚。但是在柬埔寨,由于有目的的计划欠缺,法国帮助维持了传统的王室领导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老挝

当英国和法国在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地区追求其目标的时候,有两个地区脱离了通常的发展模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泰国,它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成功避免了殖民统治的国家。另一个就是现在被称为老挝的大陆地区。

81

今天被称为老挝的地区在19世纪是由令人困惑的小国模式构成的,没有一个小国能够以任何真正独立的形式来行事,因而不存在政治实体。按照东南亚的传统方式,这些小国是更强有力霸主的附庸国,有时候一个国家可能有不止一个宗主国。

以一种非常实际的观点来看,老挝国家的形成是殖民行动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殖民争斗的结果。19世纪结束时,法国和英国在东南亚大陆的争斗加剧了。随着英国在缅甸建立殖民地以及法国控制越南和柬埔寨,影响范围位于哪里的问题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有时甚至有些感情用事的大辩论。在这种状况下,泰国有得有失。好处是,只要泰国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于英国控制的缅甸和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之间,其作为两个帝国之间缓冲国的优势将有助于维持自己的存在。但是泰国得到的好处必须与其损失进行权衡比较,后者包括为得到殖民国家的善意或者容忍而作出的必要让步。因此,尽管泰国没有经历殖民统治,它还是以多少牺牲了该国的一些独立为代价的。例如,外国势力在泰国能够获得许多极为有利的贸易条款,而且还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在他们的国民卷入到民事和刑事案件中时,享有领事裁判权。

泰国可能得到的东西,在老挝却被剥夺了。老挝没有统一的国家,而是成为许多霸主的附庸国,随着中国难民和土匪逃离到云南—广西边界地区,老挝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混乱。此时的老挝似乎非常适合进

行殖民拓展。法国抓住了机会，在1885—1899年，通过个人的厚颜无耻、大国操纵以及依靠越南过去对老挝部分宗主权的可疑声明，在老挝建立了殖民据点。比东南亚大陆其他地方更清楚的是，欧洲人的到来促成了一个新国家的产生。这个国家尽管经历了巨大的政治转型，但是生存到了今天。

82

泰国

泰国避免了殖民统治，这一经历的特性已经被强调了很多次。不过，这样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泰国没有受到伴随着殖民推进到东南亚其他地区而来的巨大变化的影响。越南和泰国是两个比较成功的东南亚国家。不过与越南不同，泰国能够在不经历殖民统治的情况下成功地生存下来。很多因素共同作用使之成为可能。在讨论老挝发展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及其中的一个因素——泰国被彼此存在竞争的欧洲国家看作是他们冲突利益之间的缓冲地区。但是，还有更积极的因素可以解释泰国的成就。最重要的是，泰国在出色国王和官员的领导下获得了优势。缅甸和泰国在这方面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面对着一个新的来自英国的外来威胁，缅甸的佛教徒国王和官员们几乎不可能理解挑战的本质，更不用说去制定一个抵制它的方法了。相反，在泰国，来自国王以下的敢于追根问底的大脑正在寻求理解它和欧洲力量的本质，以及属于那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和技术知识。

孟固王(1851—1868年在位)是所有泰国统治者中最出色的一个，而且是泰国避免外国统治计划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设计师。他是一个具有改革意识的佛教徒，作为一个僧侣度过了早期的成年时光，他的战略包括积极努力去获得西方的承认和外交让步，这样避免了泰国可能被一个或者几个欧洲国家寻找借口实施殖民统治。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具有改革雄心的国王朱拉隆功(1868—1910年在位)遵循了他的方法。两位君主都是出色的人，并且都幸运地拥有才能出众的高级助手，其中有的是王室成员，有的是泰国朝廷的官员。

不过，尽管泰国领导人才能卓越，欧洲国家带来的挑战也不可能全都避免。法国巩固他们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殖民据点的决心导致泰国失

83

去了对下列地区的宗主权：老挝地区沿湄公河的领土，以及一个世纪以来被认为是泰国一部分的柬埔寨西部省份。这些损失发生在大约世纪之交的时候。稍后，在 1909 年，泰国把四个马来邦的控制权割让给了英国。这四个邦——玻璃市、吉打、吉兰丹和丁加奴——由此加入了马来半岛英国殖民帝国，并且构成了马来西亚现代国家的一部分。

总之，即使泰国没有经历其东南亚邻居那样的殖民统治，它也受到了欧洲入侵的深刻影响。它失去了对领土的控制，并且不得不向外国利益大量让步。尽管如此，泰国在 19 世纪后期向东南亚其他地方展示了一个奇特的对比。泰国的领导人实行的政策展示了一种能够从欧洲国家新的入侵元素中获得最大好处的非凡能力。只有在泰国，一个东南亚国家通过雇佣的欧洲顾问等外籍人士来寻求现代科技的好处。

海上国家

印度尼西亚

讨论东南亚大陆地区和欧洲帝国主义带来的挑战的时候，所涉建立殖民国家的时间跨度最多大约 60 年。对印度尼西亚来说，荷兰建立一个帝国的时间超过 300 年。毫不奇怪，这种缓慢推进的类型持续作用了这么多年，其带来的挑战的特征和引发的回应是非常不同的。既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那么最好记住，就如本章后面要强调的一样，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推进的重大时期发生在 19 世纪末期，持续了大约 16 年的时间。

荷兰人作为商人来到印度尼西亚群岛。为了追求初步目标，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去控制北爪哇主要港口和其他岛屿从事香料贸易的主要商业中心。不过，与英国在印度发展类似，荷兰东印度公司逐渐成为一个管辖力量和贸易公司。当 18 世纪爪哇人的争斗导致马打蓝王国崩溃的时候，荷兰人已经完全参与到操纵爪哇内部事务的活动中，因而极有兴趣在监督马打蓝继任国家的设立中发挥作用。这个继任国家以中爪哇日惹和苏腊卡尔塔(Surakarta，即梭罗[Solo])为核心。

84

到了18世纪中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已能够对爪哇的大部分地区行使政治控制，但是这种控制的性质是脆弱的，而且没有相关的荷兰文化或者技术的影响。不过，经济影响是存在的，因为随着荷兰通过爪哇精英和华人的税收代理，开发了越来越多为公司利益筹集资金的方式，并抽取最大量的农业产品。这种经济的重担落在了农民身上。但是对农民和精英来说，经济变化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传统世界、价值观和社会等级会发生突然的转型。

对远离爪哇的几个有限的地区，情况基本上也是如此：他们在19世纪之前保留了荷兰的影响。随着荷兰缓慢地间歇性地扩展他们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控制，对既定关系和价值体系的挑战是19世纪和20世纪历史的一部分。这种扩展部分是回应欧洲不断增长的对热带产品的需求，部分是回应其他外国势力在东南亚地区不断增加的活动。

从荷兰的观点来看，经济需求和外国竞争的压力意味着，他们必须保持对分散岛屿的松散控制，之前在几个有限的基地运作以及与当地统治保持联系的手段都不再够用。相反，在印尼的荷兰政府——18世纪末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被取消——现在寻求建立更严密的控制以及更一致的管理。这些目标有时候造成了与当地力量尖锐的血腥冲突，尤其是在苏门答腊地区。而且，荷兰在19世纪后期获得亚齐的北苏门答腊地区的主导权之前，不得不去战斗几十年。在巴厘也是如此：荷兰只有在攻克了顽强的抵抗之后才获得了控制。

85

到了19世纪初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基本结构已经建立。通过征服和签订条约，荷兰声称控制了从西边的苏门答腊延伸到东边新几内亚西部的所有群岛。只有位于东帝汶东部小的葡萄牙殖民地逃脱了荷兰的网络。荷兰的旗帜现在飘扬在一系列极端多样化的岛屿上，这些岛屿的文化发展水平囊括了独特而精致的爪哇世界和仍然能在新几内亚发现的现代石器时代。在这样一个多样化的地区，外来的欧洲力量的影响同样也是多样的，从爪哇中部和东部越来越贫困的农民，到苏门答腊的多巴高地和外部安汶印度尼西亚岛屿等迥然相异的地区所植入的基督教。

除了伴随荷兰统治而产生的所有其他发展变化，外国对现代印度尼西亚所有岛屿的控制还带来了其他的东西。这就是荷兰东印度的各种族群对他们共同利益的思考，以及将来共同的国家认同的可能性。在更遥远的历史时代，曾经有统治者考虑建立一个“努沙登加拉”(Nusantara)，即岛屿帝国。由于外国的统治，这样的帝国轮廓已经建立，而且比以前似乎更清楚更严格。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最终成立是印度尼西亚人的成就。但是这项成就是在一个框架内完成的，这个框架的相当一部分是在荷兰殖民统治期间确定的。

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

与印度尼西亚一样，马来西亚现代国家在殖民时期也找到了其地理起源。在传统时代，今天的马来西亚国家是更大的印度尼西亚——马来世界的一部分。马来苏丹统治着马来亚半岛沿岸、婆罗洲岛屿的北部地区以及东苏门答腊岛(这个岛处于荷兰的控制之下)的各种大小国家。非马来种族居住在半岛和婆罗洲的内陆。在传统时代，现在马来西亚占据的地区组成了一个权力动荡的地区。马来半岛北部的国家借助附庸国的身份与泰国的统治者联系在一起，而半岛南部的国家与现在已成印度尼西亚组成部分的那些地区的苏丹有联系。

86

欧洲人在这个地区的扩张是一件缓慢和偶然的事情。葡萄牙人在16世纪初期夺得马六甲后并没有任何进一步重大的推进到现代马来西亚地区的行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晚期。到了那个时候，荷兰人已经取代了葡萄牙人成为马六甲的统治者，英国人在现代马来西亚领土上的第一个殖民地已经于1786年在槟城岛上建立。新加坡殖民地随后在1819年建立。到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人已经在马来半岛的边缘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三个殖民地——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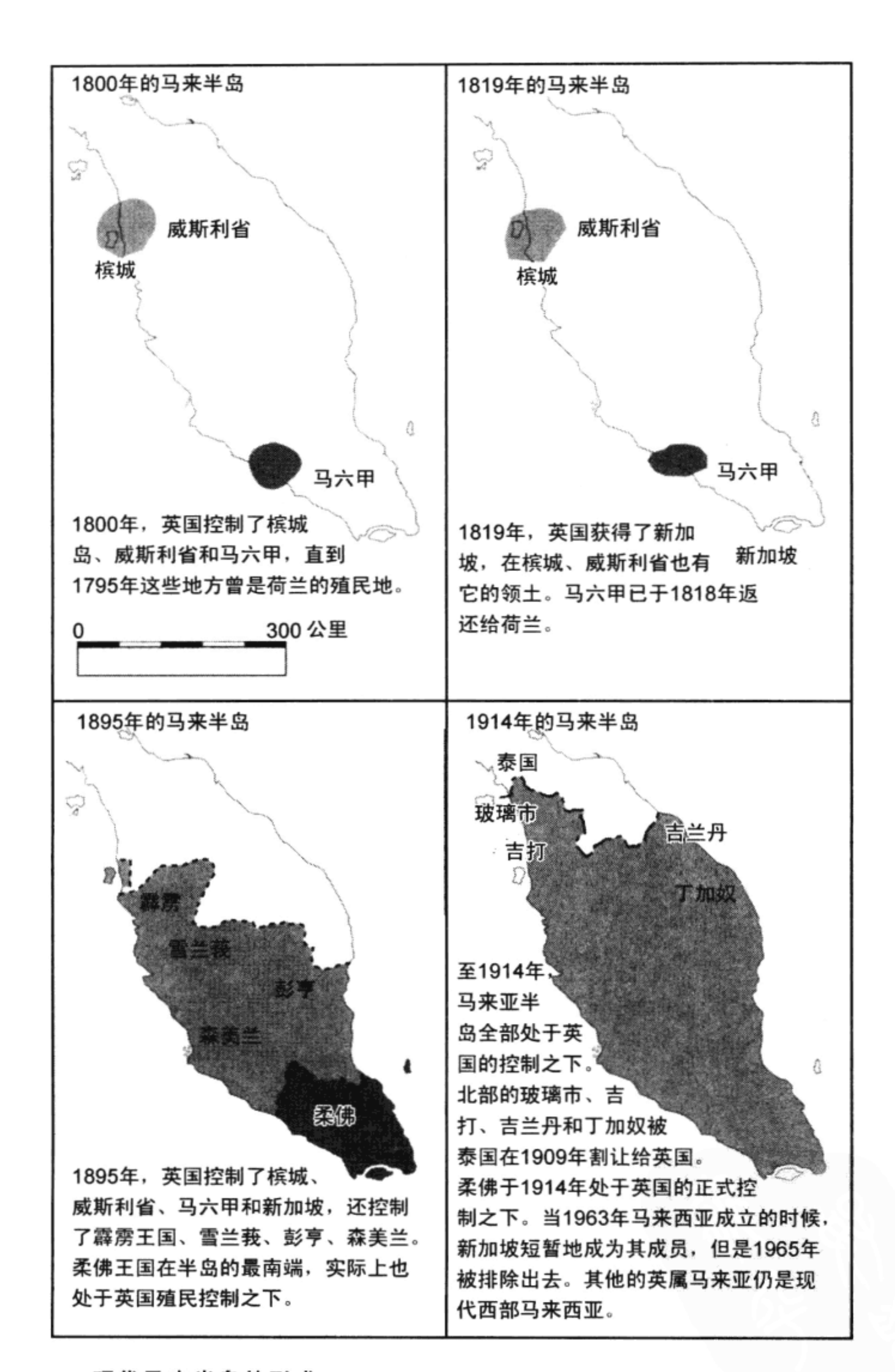
这些殖民地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缘地区，而且由于与半岛马来国家的关系，他们还有一个边缘的性格。这三个英国殖民地现在被称为海峡殖民地，它们被包围在马来世界内，但是并不属于马来世界。其人口增长并不都是因为马来移民，而主要是由于华人的涌入，以及后来

较少数量的印度人。不过，随着19世纪的结束，英国殖民地和半岛的马来苏丹国的联系增加了。南部的马来柔佛国家在经济上已经成为新加坡的密切伙伴，即使不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的话。这三个海峡殖民地都作为基地发挥了作用，商人和贸易商、锡矿工和劳工逐渐开始改变半岛的经济结构。常见的殖民地范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扭转过来，跟随贸易进入马来亚的旗帜也改变了。这样，随着贸易和商业的发展，英国人首先在该地区获得了政治上的至高权力，而且随后在这个至高权力的基础上确保对所有事务的直接政治控制。

导致英属马来亚最终在20世纪前20年间出现的过程不需要在这里详细分析。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控制尽管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还是扩展到了除海峡殖民地的整个马来半岛。两个政治集团形成了一个经济整体，同时还是一个或多或少统一的政治实体。但是，无论在这些方面获得了什么，殖民统治现代马来半岛的推进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并不统一。华人移民在海峡殖民地占据主导地位。在马来半岛的苏丹国，马来人作为“国家的人民”保留了特别的权利，但是与此同时，在经济方面却是欧洲人和华人更胜一筹。这是欧洲人进入东南亚带来的一个特别的后果。英国人在马来半岛的殖民统治划出了新的地理边界，这将成为一个新国家的基础。但是在那些边界之内，英国实施的政策所导致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在寻求解决的办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政策没有经过思考。

87

在马来半岛，欧洲国家创立新边界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没有比婆罗洲的发展更能够反映这一点的了。这个地区现在已经成了东马来西亚(现代沙劳越和沙巴)以及文莱。作为19世纪殖民推进的一部分，欧洲人考虑了在北部婆罗洲获得经济和战略优势的可能性。这是以进一步削减已经在下降的文莱苏丹国的权力为代价的，这个苏丹国曾经在婆罗洲沿岸和苏禄(Sulu)群岛的部分地区拥有广泛的权力。最终，现在已经合并到现代马来西亚的那些地区被东南亚的两个最不寻常的殖民国家纳入了一定程度的欧洲人的政治控制之下，而文莱苏丹国作为一个小飞地被保留下来，在1888年成为英国的一个保护国。


1800年的马来半岛
威斯利省
槟城
马六甲
1800年，英国控制了槟城岛、威斯利省和马六甲，直到1795年这些地方曾是荷兰的殖民地。
0
300 公里
1819年的马来半岛
威斯利省
槟城
马六甲
1819年，英国获得了新加坡，在槟城、威斯利省也有它的领土。马六甲已于1818年返还给荷兰。
新加坡
1895年的马来半岛
霹雳
雪兰莪
彭亨
森美兰
柔佛
1895年，英国控制了槟城、威斯利省、马六甲和新加坡，还控制了霹雳王国、雪兰莪、彭亨、森美兰。柔佛王国在半岛的最南端，实际上也处于英国殖民控制之下。
1914年的马来半岛
泰国
玻璃市
吉打
吉兰丹
丁加奴
至1914年，马来亚半岛全部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北部的玻璃市、吉打、吉兰丹和丁加奴被泰国在1909年割让给英国。柔佛于1914年处于英国的正式控制之下。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的时候，新加坡短暂地成为其成员，但是1965年被排除出去。其他的英属马来亚仍是现代西部马来西亚。

现代马来半岛的形成

在沙劳越,殖民推进的代理人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个人,詹姆斯·布鲁克,第一个"白人拉惹"(white rajah)。关于他的事情,人们已经写了很多。相比之下,沙巴的殖民权力属于一个商业公司——北婆罗洲特许公司。殖民"力量"的特点导致这两个领土内非常不同的发展轨迹。然而尽管如此,把这么多关于海上世界发展的评论联系在一起的基本线索还是有的。在沙劳越和沙巴就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后来的后殖民国家的存在是欧洲人到来的部分后果。以前从来没有对应的国家存在,也没有划定边界线的地方,在19世纪建立了新的政治实体,上述两个地区也不例外。

89

东帝汶

在5年的时间内获得港口城市马六甲之后,葡萄牙与东帝汶发生联系,后者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以檀香的一个来源地而出名。不过,直到16世纪60年代,葡萄牙才在东帝汶附近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永久殖民点,而且不到17世纪中期,数百名葡萄牙人就已定居在东帝汶。许多定居者是宗教社团的成员。通过欧库西(Oecusse)地区一个名叫的利福的基地运作了一段时间之后,葡萄牙人在1769年把他们的管理总部迁移到了帝力。

由于远离葡萄牙,且只有有限的资源,东帝汶的殖民地成为葡萄牙海外帝国被忽视的一部分。位于更强大的荷兰东印度殖民地旁边,东帝汶似乎经常处于被吸纳进荷兰帝国的风险之中。不过,1859年和1893年东帝汶与荷兰签订的条约保证了其存在。这些条约提供的确定性没有为东帝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带来任何好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东帝汶才被遥远的里斯本政府用来流放国家政敌。

菲律宾

本章所写的很多有关欧洲在建立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领土边界时候施加重要影响的内容,对菲律宾同样适用。西班牙对这些岛屿的漫长统治对划定一个国家的边界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国家以前既不存在任何边界,也不存在任何相当于现代菲律宾的实体。不过,为了建立对整个现代印度尼西亚的控制,荷兰的行动比通常要缓慢得多,同样,

90

西班牙获得对菲律宾的控制也是一件缓慢的事情。不仅缓慢，而且也不完全。尽管到了18世纪中期，西班牙的力量能够在菲律宾北部大部分低地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高地地区仍然在其掌控范围之外。而且，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地区从来没有处于西班牙的真正控制之下。西班牙多次尝试控制强烈要求独立的南部地区的苏丹国，但是都失败了。西班牙获得了对南部一些主要港口的控制，比如三宝颜，但是苏禄的苏丹和其他没有那么强大的苏丹从来没有处于西班牙的控制之下。南部菲律宾当代穆斯林分离主义的种子在很久以前就播下了。

不过，尽管菲律宾经历的欧洲挑战与刚刚指出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经历有相似点，但是西班牙施行的殖民统治为那些岛屿提供了其他地区不曾拥有的一个额外元素。这个极其重要的元素就是天主教。改信正在入侵的欧洲殖民国家的宗教在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尤其是在越南。但是殖民主义者的宗教变成了（就广泛的普遍意义而言）被殖民者的宗教，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发生过，包括1975年之前葡萄牙控制下的东帝汶（需要再一次强调，正在讨论的是北部菲律宾）。

在一个更广泛的层次上，人们也许认为天主教的植入反映了更一般的事实：西班牙在菲律宾的统治给北部岛屿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框架。以殖民时期之前的乡村结构为基础，西班牙创立了一个新的非土著的体系。这个体系并没有剔除来自菲律宾社会的所有土生土长的元素。不过，西班牙设立的行政、经济和宗教结构确实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标志着菲律宾对西班牙统治反应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已经记录在早先的篇章。当菲律宾人清楚地意识到，殖民国家不会允许印地奥人（Indios）——岛屿上的非西班牙居民——享受与西班牙人同样的民事和宗教权利的时候，他们开始不满意西班牙人的统治。不过要求这些权利的印地奥人都来自西班牙学校、学院和大学。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统治已经造成了东南亚其他地区根本不存在的一种状况。19世纪，被殖民者开始反抗西班牙的统治，这是因为他们实

91

际上无法成为真正的西班牙人。在他们痛恨放置在自己成为西班牙人道路上的障碍的过程中，菲律宾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身份，尽管如此，这种身份仍然与西班牙统治经历和天主教的重要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7 世纪的马尼拉

1571 年，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立了菲律宾殖民地总部。到 17 世纪中期，如从这幅版画中看到的那样，马尼拉成了一个大城镇。贸易是马尼拉的命脉。来自美洲的金银与从东亚带到马尼拉的货物进行交换，商业由常驻马尼拉的大量华人来处理。不过，权力被西班牙人牢牢控制着，国家与天主教会携手努力进一步加强政治控制，并促使人口改信其宗教。

本章对建立国家的边界这样的管理性事务的关注，仅仅是复杂整体的一个方面。人们也许认为，殖民国家已经建立了之前不存在的边界，而且他们的行动，不论好或坏，利己或者利他，都对形成一个将在东南亚出现的新国家发挥了作用。这样的发展不局限于世界上的一个地区，记住这一点是有用的。设立新边界和建立新的国家都与殖民统治的时间有关系，这在非洲和东南亚都是如此。 92

不过，除了这些管理性事务，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其他方面仅仅做了简要提及，但是随着东南亚历史被追溯到更现代的时期，它们将会受

到更多的关注。殖民国家划定了国家的区域并且在形成他们人口的特性中发挥了作用。尽管如此,在最后的分析中,当地居民——东南亚人自己,决定他们将如何生活以及按照什么样的标准生活。当考察欧洲人在东南亚的推进和挑战时,这一点必须记住。

第六章　经 济 转 型

93

在以前的章节中，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在东南亚建立殖民地的欧洲殖民国家的影响。殖民国家早在16世纪就开始到来了，但是更重要的进展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而且，如前面的章节所强调的，欧洲影响的本质是复杂和多样的。不仅如此，它还是自相矛盾的。东南亚人发现他们被不熟悉该地区文化和价值观的外来新手所控制，而且他们(或早或晚)开始痛恨这种控制，以至于去反抗它。不过，引发痛恨的同一种控制在建立今天的东南亚政治版图上发挥了作用。关于欧洲扩张真正的重要性或者成本的争论空间几乎是无限的。用来记录"好"和"坏"的资产负债表会随着人、时间以及民族的不同而不同。毫无疑问的是，过去存在欧洲人对东南亚社会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重大的后果。到目前为止仅仅简要提及的许多后果之一，是该地区的经济转型。

尽管17世纪以来东南亚的经济转型涉及本地人口的大量参与，但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结论是：巨大的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几乎统治了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殖民政府所采取的决定。在涉及当地人口的利益方面，发生的许多变化都是消极的，而且殖民国家把当地人口的利益放在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上的情况实际上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不管这些结果的动机和本质是什么，东南亚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变化，尤其是在19

94

世纪和 20 世纪。本章的主要目的是为那些变化提供一个纲要。

如果在一个晴天从现代东南亚的上空飞过，人们将会震惊于那些已经成为农业或矿业生产的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巨大反差。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海岛，人类行为改造的景观都非常醒目。辽阔的稻田散布在河流三角洲上。露天采矿在地面留下了褪色的疤痕。重复模式的橡胶和油棕榈种植园很明显地与仍然残存的丛林世界区分开来。如果知道这些景观中有多少在近百年间出现，你将大吃一惊。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橡胶种植园实际上是 20 世纪发展的产物。有很少量的种植园在 19 世纪后期就开始出现了，但是橡胶种植的大规模扩张是 20 世纪开始的。它之所以发生或许是由于欧洲的投资，或许是东南亚的小农橡胶种植业为了回应欧洲或者美国资本主义世界的需求而加入这一产业。

东南亚水稻种植的扩张是 19 世纪以来发生巨大变化的另一个例子。而且很多方面的(尽管不是所有)巨大变化可以归因于欧洲殖民控制。在充满沼泽和无向水道的迷宫中改变越南南部湄公河三角洲的巨大努力，在 1860 年初期法国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19 世纪最后 20 年和 20 世纪前几十年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多数情况下，越南人在贡献了劳工的同时，也收获了转型获得的经济利益，尽管数量有限。但是，发生这样巨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欧洲的控制，欧洲的控制使得排水和种植变为可能并且有利可图。这种欧洲(尤其是这个例子中的法国)控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发展，而这些社会发展引发了对当时经济体制的深刻不满，因为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变化只是给极少数人带来富裕。

95

这个事实再一次表明了东南亚经济转型的另外一面，这是欧洲人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经常忽视的问题。对许多人来说，当使用"转型"这个词时，带有"进步"的意思。变化在过去经常被认为是好的，尤其是当它与种植区域的扩展、新的农作物和种植物的引进，以及前所未有的新基础设施的建立联系在一起时。不过，这些转型中的每一个都不仅仅只有一种后果，而是有很多。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在理解东南亚的经济何以在从 19 世纪以来变化得这么迅速的同时，问一句：

"谁从这个转型中受益了?"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并理解19世纪和20世纪的重要性,有必要认识到,欧洲在对东南亚进行扩张时所采取的经济活动,非常不同于传统时代的经济活动。当然,传统东南亚存在丰富的经济活动。辉煌的室利佛逝帝国是后来海上国家的先行者,那些国家寻求通过垄断海洋路线和市场来获得财富。即使在吴哥这样的国家,尽管参与外部商业是国家生活很小的一部分,但为了应付维持君主制度配备人员的成本,复杂的内部经济模式得以蓬勃发展,这形成了柬埔寨生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点。而且,作为吴哥荣耀时期的唯一记录者,周达观描绘了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小额贸易。在16世纪初期落入葡萄牙人手里之前,马六甲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国际转口贸易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帆船为了交易进入"南海"。商人的大篷车穿越大陆地区的心脏,而且海上世界岛屿之间的贸易是前殖民时期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欧洲的影响确立之后,它同样继续是生活的一部分。

96

卷入到现存的贸易模式中并获得财富,毕竟是把欧洲人带到东南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他们希望从现存的保证会有巨大财富的香料贸易中获得部分(事实上是最大部分)利益。伊比利亚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希望获得更多,这是事实。他们希望改信天主教,这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希望从来没有排除通过贸易获得财富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在菲律宾感到伤心失望,因为开展有利可图的出口贸易机会渺茫,至少在西班牙人统治的早期阶段是如此。

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一段时间,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成功地达到了他们的目标。他们获得了对东南亚——更确切的是现代印度尼西亚的岛屿香料贸易的垄断地位,因此控制了这些商品对欧洲市场的供应。不过,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他们使印度尼西亚世界开始了一个农民贫困化的过程,其痕迹甚至留到了今天。荷兰的目标是完全控制香料贸易,并且通过破坏其所选区域之外的香料树来到达其目标。荷兰人开始以外来人的身份在现存的体制内运作,并通过他们的技术和组织优势,开始显著地改变那个体制。曾经组成传统贸易模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

整个岛屿突然被排除在外，即使仍然被允许从事生产，但是为了满足荷兰维持高价格的短期努力，树木被摧毁。东南亚的经济活动已经以一种以前从来没有的方式与欧洲的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

荷兰成功地控制了印度尼西亚东部的丁香和肉豆蔻等香料贸易以及大部分西部地区的胡椒贸易，他们在18世纪继续对爪哇农作物的种植和销售施加越来越多的控制，尤其是咖啡成了荷兰管理的目标。借助当地的统治者和华人代理人，荷兰人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荷兰人确定了“强制交付”制度，要求将固定数量的作物提供给东印度公司，如果货物没有到位，将威胁对村庄进行严厉的整体处罚。同时，荷兰期望将提供了欧洲市场迫切需要的货物的印度尼西亚本身组成一个制成品市场，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荷兰的船只运到东南亚的纺织品。

97

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19世纪之前，爪哇、香料岛和已经成为荷兰殖民经济体系一部分的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已经不可逆转地陷入经济灾难之中。尽管如此，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确立，这种模式把处于剥削地位的殖民国家及其代理人的利益放在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之上，而且大量人口在这个模式中的作用是明显不利且难以改变的。随着19世纪印度尼西亚和整个东南亚的经济变得更多样化以及更密切地配合广泛的欧洲利益，这种模式将得到加强。

19世纪是欧洲工业化的时代。技术革命在加快寻找海外殖民地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很多人都同意这一观点。殖民地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被视为一种经济模式的基本元素。这种经济模式要求，供应原材料到欧洲的工业国家，且这些原材料经过加工即可销售到世界市场，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包括这些物质最初的原产地。由于有利于欧洲，整个体系很明显是不平衡的。例如，缅甸、越南和菲律宾的东南亚人被期望在一个仅仅有利于其殖民主子却没有给自己或自己的同胞提供回报的活动中，无怨无悔地发挥作用。这种不平衡存在并没有让关注殖民地的大部分欧洲人感到不适。这些事实也许很难让人相信，但是肯定是真的。扩张的帝国时代及其经济发展的本质特点之一是一种信仰：

他们正在做的是正确的、合适的。对大多数欧洲殖民者来说,公平的问题根本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并且以宏观的角度来思考。19世纪中期著名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和探险家弗兰西斯·加尼耶,是一个聪明的、在很多方面有教养的人,但他认为"没有殖民地的国家已经死亡"的说法是实事求是、合情合理的。 98



橡胶种植园

马来西亚的一个橡胶种植园。在东南亚很多地方,种植橡胶是有利可图的,这个发现是该地区现代经济转型的一个重大因素。照片采自《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他的观点忽视了许多问题,但是不要忘记根本的问题:那些被殖民者是否希望拥有这样的经历。作为一个某种程度上煽动性质的声 99

明，它敦促人们去发展橡胶产业，开采锡矿，并且种植椰干棕榈，因此法国人的观点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东南亚能够像非洲一样供应许多物质。对19世纪现代欧洲和美国的需求来说，这些物质已经变得必不可少。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锡有助于满足工业国家对便宜的马口铁和轴承的需求，而这些对快速运行的工厂机器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来自整个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橡胶，能够帮助满足社会不断改进从汽车轮胎到手术设备等一系列物品的多重需要。欧洲和美国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准使得个人清洁成为规范而不是例外，所以椰干能够在肥皂工业的大规模扩张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由于19世纪的东南亚开始满足来自欧洲的新需求，所以在这个世纪，东南亚和工业世界发展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关系，这是容易理解的。随着新模式的发展，以荷兰垄断香料贸易为特点的旧体系逐渐变得不再重要。我们不按照国别来考察这种模式，而是使用一种更有用的方法：按照一些相关的主要工业品或者商品来研究发生的经济变化。

橡胶

19世纪的科技进步允许发展一种基本上不受温度变化影响的稳定物质，这很快被认为具有广泛的用途。在这之前的几个世纪，人们已经知道存在天然的橡胶。问题是为这个产品找到一个可靠的来源，因为最初只有很高的价格才能得到它，而且来自南美洲的数量也不稳定。

大部分是由于英国的努力，人们发现了在东南亚种植橡胶的可能性。由于人们一直到19世纪的最后20年才发现这一情况，所以必须指出的是，橡胶本身不是欧洲国家在19世纪后半期大规模进入到东南亚的最初原因之一。在橡胶开始发挥其作用之前，其他的经济因素已经在起作用，但是建立了橡胶种植园以后，它就会成为殖民努力的一个重要理由。因为按照供需关系法则，发现种植橡胶有利可图正好与20世纪初期需求的突然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

100

高潮)同时发生。

马来亚岛、爪哇、苏门答腊,以及越南和柬埔寨的广大地区都被用来种植橡胶。这确实是转型,因为被用来种植橡胶的许多地区以前从来没有种植过这种作物。简要地查阅统计数字可以提供某些相关的发展规模。西部马来西亚(马来半岛)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没有橡胶种植园,甚至没有以任何形式对野生橡胶进行开发。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有种植的土地中,橡胶种植园占有大约65%的份额。而且三分之一的农业劳动力在种植园工作。这是所有例子中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它反映的模式在其他地方也发生了,即使规模较小。一旦哪个地方有未开垦的土地,或者被丛林覆盖,新的种植园就将在那里建立。

如此巨大的企业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而且这个事实证明了,大型橡胶集团或是由外国人掌控或是被握在当地社区很小的群体手里——这个群体能够提供建立一个种植园所必须的资本投入,而且至少要等五年才能投入生产。因此,起初大投资者控制了橡胶工业,而东南亚人自己得到的好处是有限的。即使在劳工领域,马来亚的就业机会也给了非当地的工人,因为种植园从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输入了契约劳工。在越南,大部分的劳动力确实是越南人,但是这也没有保证个人或者社会的利益,因为劳工招募和随后的工作充斥着投诉和丑闻。

101

不过,尽管建立了许多橡胶种植工业,但是对东南亚人并没有好处,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这种不平衡。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小农种植者开始在橡胶的生产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尽管不可能挑战大种植园,但小农种植者能够种植橡胶来作为他们更广泛的农业活动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再一次搬出统计数据:有人估计,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生产的橡胶超过40%来自小农种植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西部马来西亚(以前的英属马来亚)的小农种植者已经将他们的份额提高到超过50%。这样的改进是在违背大种植园利益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英属马来亚和荷兰东印度——小农种植者的作用在法属印度支那没有那么重要——立法歧视小种植者而支持大种植园。可以很清楚地看

到，殖民政府明显认为自己应该服务于经济利益，而不是当地居民的利益。

锡

随着欧洲和美国需求的增长，锡在19世纪表现出新的重要性。不过在这之前，锡矿成为东南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已经有一千年的时间了。尽管在该地区其他地方也发现了锡的储藏，但该产业在马来亚（西部马来西亚）发展到了最高程度。在那里，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对马来国家政治控制的建立使得已经存在的华人锡矿企业迅速扩张。20世纪，华人的主导地位受到欧洲资本以及西方大公司使用的更高效的提取技术的挑战，这些西方大公司目前寻求获得该工业的一个主要份额。尽管华人的份额下降了，但由于这个工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从来没有被资本密集的西方公司压倒。西方公司依靠锡拖网来提取金属。

102 与橡胶种植工业存在的情况相比，刚刚描述的竞争发生在两个不同的非当地群体之间——欧洲人和华人移民。华人采矿集团通过许可和给予地方当局部分好处来开发锡矿，已经在马来亚进行了几个世纪了。不过，直到英国在马来亚建立殖民地之后，局面才有利于华人采矿活动的大规模扩张。最后导致的局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来亚的锡矿工业仍然在华人或者欧洲人的集团手里，他们被马来人认为是局外人，而且马来人认为自己才是以这个英属马来亚命名的国家的唯一真正所有者。

大米

橡胶种植主要依靠输入的劳工。锡业掌握在非当地人手里。但是，在东南亚所有出口作物中最为重要的作物——水稻，当地农民在其发展中的作用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并不意味着在衡量农民利益时，其结果会与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其他方面有什么大的不同。不过，与种植园和采矿企业不同，水稻种植对东南亚农民来说是

必不可少的。

在19世纪中期全面的殖民推进开始之前,东南亚已经开始出口稻米。但是出口量很小,而且一个国家的内部运输(从一个稻米剩余的地区到一个稻米缺乏地区)肯定比任何正在进行的出口贸易要重要得多。而且,稻米的生产通常不是用来出口的。19世纪之前生产的大量大米是用来维持生计,为了养活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只有条件特别好而且收成高过预期时,才有盈余可供种植区以外的地方消费。

在19世纪后半期,一个不断增长的世界市场刺激了那些稻米生产能够有盈余的东南亚水稻种植区(越南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泰国中部的湄南河三角洲,以及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迅速扩张。在越南和缅甸,水稻种植业的扩张发生在殖民背景下。在泰国则相反,它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同样迅速的扩张也发生了。殖民和非殖民经历的差异值得关注。

103

就如大规模的橡胶种植园的发展代表了乡村巨大的自然转型以及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一样,主要的大米种植地区的扩张也改变了景观。在伊洛瓦底江、湄南河和湄公河三角洲,大约100或者140年前,大米种植是稀疏、分散的。实际上,这些都是蛮荒边远的土地。在今天看来,这些三角洲具有生产丰富的农产品的巨大潜力,并给数以百万计的不知姓名的农民带来了工作:他们抽干了沼泽,建造了运河,并在肥沃的土壤带种植作物。在这些农业发达的证据面前,这些三角洲(尤其是缅甸和越南)却变成了经济和社会最不平等的地区。这个现象需要解释。

简单但准确地说,开发边界的承诺难倒了缅甸和越南的农民,因为他们还无法供应劳动力之外的东西。种植水稻是一个传统的农民活动,而且他们以不懈的辛劳来从事这项活动。但是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劳动力。首先,种植区的扩展也许对农民种植者是一个黄金机会。以前任何时候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而目前似乎可能存在一个机会去打破使农民一直是农民的恶性循环——仅能维持生存的农民生活在贫困的阴影中。但是扩展水稻种植业的资金要求超出农民能负担的范

围。种子、设备和雇佣劳工来确保及时收割,这些都需要资本。非常幸运的是,缅甸或者越南的农民有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不过,通常情况下,时代洪流与小农的利益是相背离的。

104 几乎是从越南南部水稻种植区戏剧性的扩展开始,农民发现他们在开发大块土地方面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最好是做佃户,最坏则是做一个单纯的劳工。有趣的是,法国人希望能够获得和控制越南南部广大的水稻种植区,这与农民寻求改变他们命运的希望一样是站不住脚的。越南水稻种植能力的发展以及参与扩张出口贸易的真正受益人,是相对较少的富有的越南地主以及西贡的姊妹城市堤岸地区富有的华商。越南地主的利益与法国殖民者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且能够控制使以前的非生产地区投入生产所必须的资本和劳动力。华商和托运人同样控制了堤岸重要的碾米厂,并且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商业网络,没有人可以成功地挑战它,即使是欧洲人或者越南人。

缅甸的情况有点复杂,因而农民从辛苦劳作之外的作用中慢慢退出花费了较长的时间。但是一般模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缅甸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因素,就是该国与英属印度在行政管理上的联系。随着英国对缅甸殖民控制的建立,新的领土处于印度的总体管理之下,尽管基本的文化差异把两个国家分离开来。作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缅甸对来自印度的移民是完全开放的,而且许多印度移民也在下缅甸水稻种植业的发展中发挥了主要的社会作用,尽管许多人认为这种作用是消极的。农村信贷的提供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印度放债人,但是长期的趋势是,印度人逐渐把缅甸人从水稻产业的许多基本部分中驱赶了出去,包括劳工的基本作用。缅甸地主在总体的事务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元素,但是如同从湄公河三角洲稻米地获益的越南地主一样,他们与其工人在几乎每一个方面上都是迥然不同的。

对越南和缅甸来说,伴随着殖民时期稻米业经济转型的弱点和危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中明显而悲惨地暴露出来。一旦世界出105 口市场崩溃,稻米业的弱点便暴露无遗。尽管大地主能够依靠储蓄或者利用储备的资本来渡过难关,但是劳工却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发现

突然自己没有资金也没有工作了。这种状况导致了骚乱和抗议。长期的政治后果则是更可怕。

与越南和缅甸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泰国稻米业的历史。认为没有农民在泰国湄南河三角洲地区的水稻种植扩张中受损的看法,是忽视了现实。重大的经济变化几乎都需要一定的人力成本。不过,即使在这种大规模的发展中有失败者,数量也肯定比其他地方要少,社会成本也小得多。如同越南和缅甸一样,19 世纪中期的泰国拥有大量的适合稻米种植的地区,这些地区以前从来没有被开发过。不过,与另外两个国家不同的是,开发这些以前休耕的地区是农民的基本特权。为什么这样并不总是很清楚,但是主要的原因不难找到。泰国不是一个外部国家殖民地的事实——不论外部国家可能成功地对泰国人的行动自由强加了多少限制——是非常重要的。泰国政府不用对一个遥远的期望殖民地交纳物质的议会、部门或者选区负责。相反,对农业发展的控制掌握在泰国君主和他亲密顾问手里。是他们而不是外国商业利益决定了发展的一般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农民保留了土地所有权,与缅甸和越南相比,对土地控制的规模也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在泰国,资本的获得也是重要的。华人碾米厂主和商人在扩展中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不过,不像另外两个面向出口市场的扩展地区,在泰国,农民与商人的关系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一种伙伴关系而不是剥削关系。

106

其他出口商品

橡胶、锡和大米是东南亚出口的最重要商品。但是还有许多其他商品也对该地区的经济作出了贡献,尤其是该地区的经济越来越依靠资本投资和雇佣劳动。例如,椰干种植园的发展遵循了橡胶工业设定的模式,尽管规模小得多。一系列其他作物被证明适合种植园发展,包括烟草和咖啡,最重要的是甘蔗。甘在爪哇和菲律宾作为一种主要出口产品而得以发展。利用当地人口供应劳动力,甘蔗种植业在把农民劳动力剩余从自给农业转移到有偿雇佣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甘蔗种植业是帮助 19—20 世纪巨大经济转变的另一个因素。

东南亚石油工业的劳动密集程度有限,但是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初,缅甸已经生产石油。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石油产品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北婆罗洲的沙劳越和沙巴领土的一个重要的出口商品。

到目前为止,本章重点关注的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发生的一般经济转型的众多方面。同时发生的还有许多其他非常重要的改变和发展,包括该地区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桥梁、水坝和港口的变化。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正在发生的变化有多么普遍?我们是否应该设想这种状况: 从 19 世纪后半叶的某个时期开始,东南亚被经济变化所"抓住",以至于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被上述这种发展所影响?

很明显,这不是实情。在东南亚世界更边远的地区,居民基本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不了解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甚至在没有那么遥远的地区,尤其是在乡下村里,伴随着东南亚出口经济扩展而来的经济发展,只在极有限的方面影响了那里的生活。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乡村文化生活展示了一种对外来压力超乎寻常的弹性,即使这些压力在地理上并不遥远。不过,渐渐地,最近的研究已经强调经济转型的深入程度和对东南亚人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程度,以及这是不是殖民政府的意图。

107

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不仅提出了替代生计农业的可能性,也向准备从事雇佣劳动的那些人引进了现金经济的概念。对大多数东南亚乡村人口来说,这是取代传统的易货贸易的一个全新元素。与现金经济发展同时进行的是缓慢但增长稳定的对需要花费工资的消费品的需求。而且这种模式将鼓励零售商业的扩大,而这些通常由东南亚两个主要的移民群体来经营: 华人或者印度人。

这种发展与建立种植园工业的地区有着最直接的关联,而且结果显而易见。其他的结果没那么容易看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们的存在只被某些学者认识到。借助于积累的知识和时间推移提供的观点,这些学者能够回顾过去。这并不意味着东南亚农民当时不能以非

学术的方式认识到问题所在。目前很清楚的是，爪哇经济转型的同时，乡村人口大规模增加，居住在那个岛屿上的印度尼西亚农民通过一个被称作“农业内卷化”的过程进行应对。不同于寻求通过移民——其他地方采纳的方法之一——来逃避乡村生活不断增加的困难，那里的农民有条不紊地着手在人均比例越来越少的空间上种植越来越多的作物。这种努力展示的决心也许让人钦佩，但在其索取的社会成本上，其本质是非常消极的。已经很严酷的正常生存条件变得更糟糕了。土地价值增加后，受益的不是普通农民，而是中等富裕的乡村居民。而且螺旋式下降的农村贫困随后得以加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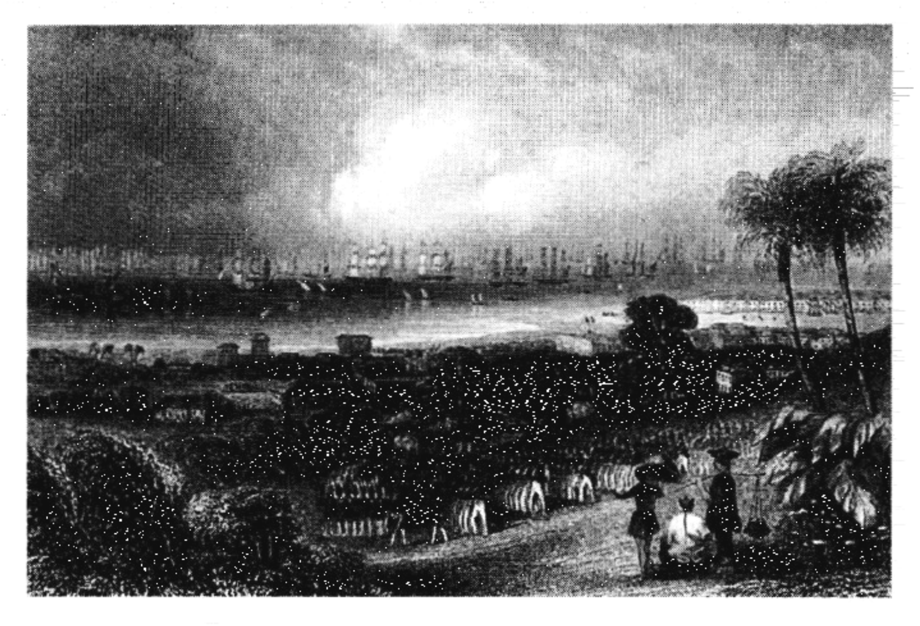
108

爪哇的发展也许是在经济转型背景下正在发生的那些重要变化中最出名的，但是它在当时经常被误解或者忽视。一个不那么出名但也反映了一些一般发展情况的例子可以从柬埔寨历史中找到。与爪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国家在其整个现代历史期间没有受到人口压力的困扰。不过，在这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发展大型种植园业的国家，殖民统治的存在造成了对乡村人口生活生产深刻影响的经济变化。设立新税种，在以前从来不存在权威的乡村结构中建立新权威，以及以国家的名义要求男人从事无偿劳动，这些都打乱了传统的乡村风貌。只有明白了法国在柬埔寨乡村的政策所造成的全面影响，人们才有可能理解为什么 1915 年和 1916 年的乡村不满能够强大到令多达 10 万农民发起抗议行动的程度。

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确实是普遍的，但也是不平衡的。一些早期经济分析家的观点认为东南亚有两种单独的经济——一种与世界市场联系，而另一种是封闭的“本土”经济，这是不正确的。当然，在东南亚各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有广泛的分隔。不过，这些广泛的分隔是相互关联的，所以生计农民和种植园的工资劳动者的生活都受到了正在发生的经济变化的影响。

城市的发展反映了总体经济变化的广泛影响。在 19 世纪早期，东南亚任何规模的城市数量都是很小的。王家首都，比如泰国的曼谷、中爪哇的日惹，人口也是以万来计，而不是以十万计。即使是更古老的殖

109 民首都如巴达维亚(雅加达)和马尼拉,在外国人存在了几个世纪之后,他们的人口依然少于 20 万。1820 年的西贡拥有大约 18 万人口,但是毫无疑问,它是越南最大的城市,而 19 世纪 60 年代时法国认为越南是一个几乎完全没有城市的国家。



1840 年新加坡港口的景色

1819 年成为英国的一个殖民地之后,新加坡在规模和重要性上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作为东南亚的主要转口贸易港,它的港口经常停满了船只。这一点从这个早期的版画上得到体现。

总之,就作为都市中心与更广泛的世界进行重要联系这个特点而论,东南亚大城市中的大多数是从 19 世纪开始履行城市职能的。这里有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例子:新加坡在 1819 年刚刚建立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马来渔村,长期居民不超过两百人。它在 19 世纪的迅速发展主要是由于来自中国的移民响应了飞速扩展的经济。作为整个东南亚的转口贸易港,新加坡的发展生动地反映了正在发生的更广泛的经济变化。它是被运送到世界上其他港口的货物转运点。1869 年苏伊士

110 运河开通之后,新加坡联系亚洲和欧洲的作用得到加强,因为来往欧洲所需要的时间大大缩短了。

就如城市的发展是 19 世纪的一个特征一样,基础设施、公路、运河

和其他形式的交通对现代经济生活也是必不可少的。19 世纪和 20 世纪引进的新公路和铁路系统的影响在每个国家都是非常不同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长期的和无计划的影响跟建造一个特定交通动脉的即时意图一样是重要的。马来半岛修建的公路就是这种发展的一个很好例子。

在 19 世纪中叶，马来西亚几乎所有的交通都是通过水运。交通工具不是利用贯穿南北交通尤其是半岛西海岸的公路和铁路系统，而是在海上和以更受限制的方式沿着从中央山脉流到海岸的河流缓慢地移动。随着经济转型在该地区发挥作用，为了运送产量不断增加的锡和橡胶，人们开始建设公路和铁路网络。起初，这个新交通体系对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它是为服务特定的以及大部分外来商业利益而专门设计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展的交通系统对马来农民开始变得同样重要，而且最终也服务了那些农民的利益。19 世纪和 20 世纪发展的基础设施，使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和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居住模式也发生了改变，更加容易的移动成为大量人口的一个期望。在该地区乘坐公共汽车或者三等火车旅行时，舒适也许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优势，但是在现代东南亚使用这样的交通工具之后，没有人还会怀疑旅行的重要性和轻松性使之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东南亚经济的全貌研究，提供的不仅仅是最简要地提及 19 世纪开始的重要转型的一些其他特征。更大范围的对经济变化的考察需要详谈银行体系的发展，需要讨论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对比，以及本章已经强调的广泛的相似点，还需要注意关于经济和政治力量互动的复杂问题——这一点将在后面有关民族主义崛起的章节中加以考察。 111

19 世纪中期以来发展的粗线条是清楚的，这些发展的重要性也是如此。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东南亚从一个出口薄弱、生计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变成了一个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整体，因为它的出口满足了工业革命之后的变化所推动的欧洲和美国的需求。随着东南亚出口经济的发展，更宏观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层次，只留下最遥远的地区和人口没有受到影响。大都市中

心城区的发展,出口的增加,现金经济的发展,新交通体系的设立——所有这些都是150年前开始的经济变化的产物。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东南亚的经济经历了比该地区整个历史中的任何时期都大的变化。

第七章　东南亚的亚洲移民

112

几乎所有第一次访问东南亚的人都会对在该地区任何大城市遇到的种族群体种类印象深刻。“搭配”在每个城市都不相同。但是几乎所有城市中心都会使游客轻易地认出组成该城市人口的范围广泛的不同群体。有时候关于不同种族群体存在的线索是外貌。来自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锡兰)的黑皮肤的泰米尔(Tamil)移民后裔在外貌上与来自中国或者印度北部的移民后裔明显不同。其他时候,通过一组移民穿的衣服与移民目前居住国的原住民后裔所穿衣服的对比,也可以明显看出种族多样性的事实。种族差异的其他迹象比比皆是。一个群体朝拜的地方与另一个群体朝拜的地方通常在建筑类型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例如在新加坡,一个游客很容易就可以看出马来清真寺、华人或者印度人庙宇,以及基督教教堂的欧洲建筑类型——另一移民社区的宗教象征——之间的差异。

当然,从技术上而言,“移民”这个词仅仅适用于描述离开本国来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的第一代定居者。本章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扩展了它的意思。在讨论移民社区的时候,本章将关注现代东南亚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现象:那些虽然建立了新社区,但是几代以来仍然被认为不是其所在国真正一部分的定居者群体。换言之,在21世纪初期,我们也许很难相信20世纪30年代居住在马来亚(半岛马来西亚)

113

的大多数华人不被认为是永久居民。在那个时期，大多数华人不是出生于马来亚，而且他们的政治利益在中国而不是在马来亚。我们可以对处于同一殖民状况下的印度移民社区作出一系列类似的评论：大多数印度移民出生于印度而不是马来亚，而且印度移民社区的政治利益几乎完全指向印度。

目前这些简短的信息都是提醒读者，注意东南亚亚洲移民的一些最重要的特征。主要的移民群体来自中国和印度，尽管通过本章稍后部分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两个庞大的种族群体内部还有相当大的变异。从印度和中国向东南亚大规模地移民是一个相对现代的发展现象，大多数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后半期。而且最终，组成东南亚移民社区的许多人在城市定居，或者参与到与该地区商业中心有关的职业中。

各种形式的移民与东南亚的历史一样古老，甚至更古老。在史前时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经过东南亚大陆向南迁移，以至于在高棉或者柬埔寨种族群体在 5—6 世纪建立政治主导地位之前，当代的柬埔寨地区也许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一些学者认为所涉及的只是新文化的流动，而不是民众，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东南亚的海上地区在史前和有历史记载时期也有大范围的人口移动。专家仍然在争论这些移动的本质和方向。在这类争议中，学术界直到最近才在下列问题上达成共识：太平洋上的群岛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上居住着史前时期从东南亚迁移出去的民众。我们也许从下面的事实才能部分领会这些早期移民的意义和规模：印度尼西亚文化的前哨也许可以在位于非洲东海岸之外的马达加斯加岛这样遥远的地点找到。

114

随着史前历史揭开面纱，我们也开始了解另一种形式的移民——一种比人们现在熟知的大规模移民更有限、更具有选择性的人口移动。例如，几千年前，在澳大利亚各民族之后，印度尼西亚各民族穿过东南亚大陆进行迁移。我们正在谈论的移民涉及有限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来自印度的教士和商人迁移到东南亚的早期国家。这些男人(因为几乎没有女人牵涉进来)不是任何大规模人口移动浪潮的一部分。相反，由

于他们掌握专业知识，他们前来新兴的东南亚国家，填补重要的空白，把印度文化移植到东南亚的历史发展中。本书之前已经讨论了这一点(在以前的讨论中就已指出，一些学者现在强调，很多外来观念是东南亚人自己从印度带回到东南亚的)。

总体而言，东南亚的古典世界似乎没有经历大规模的自愿移民。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有一批数量有限但非常重要的印度人定居在该地区，而且他们都出了名。从早期开始，也有中国人来到东南亚，一些人成了定居者。中国外交官周达观描写了13世纪末期柬埔寨的情况，其中十之八九都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他还记录了自己在柬埔寨首都吴哥看到他的同胞的情况。他们大多数是已经定居在柬埔寨的船员，并且已经成了商人，娶了当地的女人，他们的后代用一代或者两代的时间(我们必须假定)完全融进了当地人口中。

泰人(就是讲傣泰语系的民族)进入到现代老挝和泰国的领土内，是另一个发生在古典时代后半部分的重要移民例子。这一移民潮涉及了一个与很多东南亚历史相关的老套的争议话题。泰人进入东南亚肥沃的低地地区是否涉及大规模的人口移动？这个通过精英对泰语和文化的传播成功地把新泰族身份强加到其他人身上的过程，是否很微妙？ 115

目前而言，答案并不那么重要，把泰国与东南亚其他地方进行对比更重要。除了大量的人口作为战争俘虏被强制迁移到另一个地区，古典时代末期的东南亚不再是一个发生大量移民的地区。越南的发展再一次成为例外。公元939年从中国获得独立之后，越南的人口缓慢而稳步地向南迁移，来到曾经被占婆和柬埔寨控制的领土内。当法国殖民者在19世纪到来的时候，这种南向或者南进仍然在继续。其余已经缓慢发展的，则是周达观在吴哥看到的移民类型：个体和家庭为了各种机遇而在外国土地上定居。这些移民中的一些人很快被吸收进当地人口中。其他人，最出名的是与大港口城市如马六甲联系在一起的商人社区，则保留了他们非常明确的种族身份。在15世纪马六甲的权力和声望达到顶峰的时候，那里有华人、阿拉伯人、不同地区的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和波斯人组成的主要社区。这还只是该城市中一些四海为

家的居民。几乎肯定的是，这些远离祖国的游子大多不会把马六甲当作他们的家。他们在马六甲生老病死、开枝散叶，但是他们的家仍然在海洋那边的遥远地区。







新加坡的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

一个移民城市的三种面孔——新加坡的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

新加坡是东南亚移民社会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当 1819 年莱佛士拥有新加坡的时候，人烟稀少，仅有不到 200 马来人居住，今天它是一个超过 300 万人的蓬勃发展的国家。华人占 77%，马来人 15%，印度人 6%，剩余的 2%为其他种族。这些照片反映了 1970 年后期情景，马来人正从他们星期五的祈祷日回来，华人在观看传统戏剧，在实龙岗路印度人的主要居住区，印度人站在自己的门口。

直到最近,这仍是绝大多数生活在东南亚的非本地社区的态度。个体移民在一个特定的国家也许会变得重要,这样他们的后代就能完全融进对他们祖先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文化。泰王国提供了这样的例子:一个波斯家族——波纳家族在17世纪定居在大城,并且在19世纪成为该国最重要的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在泰国官方至今仍地位显赫)。

117

还有其他不符合一般模式的情况。马六甲的峇峇华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些移民的后代生活在一个特别的世界,其中一半是华人一半是马来人,从来没有一个族群完全占据过优势。他们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马来亚的永久居民。与此类似的是,菲律宾的华人密斯蒂佐社区在马尼拉非常出名,他们深深扎根于这片外国人的土地。到了18世纪,这个密斯蒂佐社区变得很重要,而且华人和菲律宾联姻的后裔至今仍在菲律宾的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相对于一般模式存在一些例外(包括来自中国清朝统治时期的难民,他们在17世纪逃到越南并且定居在那里),但是整个东南亚的情况有一个广泛的统一的特点。在港口城市以及并不非常内陆的城市中心有少量移民社区,他们从事大多数东南亚人不愿意从事的商业活动。在这些移民社区中,华人是最重要的。华人的商业和金融利益的范围是巨大的,但是他们的数量与大规模移民的后期阶段相比,则是有限的。例如,18世纪末,巴达维亚(雅加达)城内及其周边的华人大约有2.2万人。这个数字使之成为整个东南亚两个主要的殖民城市,另一个是马尼拉。其余城市的数字则较小。

在19世纪,变化到来了,原因有很多。关于亚洲移民的影响,没有地方比后来被称为海峡殖民地(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和马来亚的英国殖民地表现得更明显的了。其中,新加坡在关于19世纪东南亚的亚洲移民如何改变以前存在的政治和人口平衡方面,提供了即使不是典型的也是最有戏剧性的例子。

118

当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在1819年代表英国皇室接管新加坡的时候,他的行动"清除"了一小撮来自马来人世界的渔民和海盗。根

据他与柔佛苏丹国(新加坡岛在其领土之内)存在继承争议各方中的一方签订的协议,他宣布了他行动的法律基础。把这些理由放在一边,莱佛士使新加坡成为东南亚国际贸易中心的目标有非常直接的后果。把新加坡变成一个转口贸易港需要人力,岛上100个或者200个马来渔民一方面不乐意,另一方面数量也不够。华人,以及更少量的印度人,乐意这么做。新加坡的人口统计数字证明了这些。在港口建成5年内,新加坡的人口上升到超过1万人。马来人的数量增加到4 500人以上——对比1819年的情况,这是一个显著的增加,而且这个数字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40%。但是将来的趋势已经很清楚了,因为当时新加坡华人差不多有3 500人(超过30%),而这里以前根本没有华人定居者。

在新加坡建立后的25年内,英国殖民地的华人已经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了。在19世纪40年代,5.2万名居民中,不少于3.2万(或者61%)是华人。19世纪中期描述新加坡的作品非常明确地指出,不断发展的定居点是如何依靠华人移民的劳动和服务的。来自中国的新来者似乎填满了每一个行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移民成为有产一族,与那些也在新加坡找到良好前景的欧洲商人一样富有,甚至比后者更富有。

由于曾经是一个几乎无人居住的岛屿,新加坡在整个东南亚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在该地区,没有其他地方经历同样的组合:商业成功以及华人移民最终形成了一个新国家的基础。在这个新国家里,华人的后裔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不过,即使新加坡的经历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也不应该贬低19世纪华人移民对东南亚其他地方的重要意义。例如,在新加坡的邻居——马来半岛,从19世纪后半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期间,大规模移民到该国的华人引发了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政治问题。

119

在19世纪中期,马来西亚—新加坡世界的政治版图与今天非常不同。英国管理着其中的三个领地: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但是后来成为英属马来亚的半岛地区则在英国控制之外。到了19世纪中期,新加坡的发展促使英国卷入此前不愿涉及的半岛上各个马来苏丹国之间

复杂的事务中。柔佛的苏丹国,通过不到一里的浅水与新加坡隔开,它是半岛上与新加坡产生重要联系的第一批马来国之一。从经济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看,19世纪中期的柔佛也许可以被视为新加坡的腹地。尽管柔佛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变成新加坡新鲜淡水和产品的主要供应者,但是通过与新加坡有密切联系的华人定居者,它的农业得到了稳步扩展。尤其是在19世纪中期,柔佛成为生产黑儿茶(用来生产黑色染料的一种植物)和种植胡椒的一个基地。

尽管柔佛的华人农业定居点很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仍不及19世纪中期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马来亚产业。19世纪50年代以来,锡矿业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因此,华人劳工和华人资本变得非常重要。锡已经在马来亚开采了几个世纪,但是其规模仍非常有限。不过,随着西方世界越来越快地进入到工业时代,不断增长的对锡的需求改变了马来亚大量金属矿藏有限开采的旧模式。但问题是:谁来开采锡?

到了19世纪50年代,马来苏丹、贵族和首领已经意识到华人劳工的价值,并且或者直接从中国或者通过在新加坡的代理人征召了华人工人。到了19世纪60年代,随着对锡的需求持续增加,马来亚需要的华人锡矿工的数量也在增加,与他们一起增加的还有华人商人和企业家。马来农民发现锡矿开采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活动;因此如果马来统治者和贵族想扩展锡矿业的话,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扩充华人劳动力。

120

这种政策带来了问题。马来人不认为华人矿工是永久定居者,后者也不认为自己是。因此矿工同样也不认为马来国家的统治者对他们有什么权威。他们认同的权威是宗族协会、自助组织以及最重要的秘密社团。这种情况对马来亚有深远的意义,因为到了19世纪70年代,华人矿工的数量已经到了几万人,他们已经成了半岛的不安定因素之一。由于各个苏丹国的马来派系围绕着继承权争斗不休,华人秘密结社在一个地区或者另一个地区的独家开采权上也互相冲突。而且毫不奇怪的是,马来贵族的争议开始把正在争斗的华人群体牵涉进来。在当时这种危险和不稳定的情况下,再加上沿着半岛海岸海盗活动也日益猖獗,人们开始理解争论的焦点:在新加坡可以听到越来越多的呼

吁英国在马来亚半岛的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声音。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马来半岛成了以新加坡为基地的商业公司的一个重要市场,新加坡反过来也深深地卷入锡矿开采业中。

当19世纪70年代英国开始卷入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中国工人和商人的持续涌入。新殖民国家成功地建立了法律和秩序,为各种商业活动创立了一个更稳定的环境。随着位于马来亚的各个乡镇的发展,半岛西海岸的人口也相应地由华人占绝对多数。怡保、吉隆坡、芙蓉,以及许多更小的定居点都是大大小小的华人商业中心。不过,也许百年后的人们很难相信,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来到马来亚的华人不把自己看作是永久离开家乡的移民,而是不论停留多久,都只是暂时生活在外国的土地上。

121

只有理解了这些,人们才有可能去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马来亚华人社区的本质,以及英国殖民者对该社区的政策(或者根本没有政策)。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马来亚半岛的大多数华人或者出生于中国,或者其父母出生于中国。大多数情况下,华人社区的政治利益本质上是在马来亚之外的中国。他们并不是去从事与马来亚有关系的政治活动,造成该社区分裂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境内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冲突。尽管生活在马来亚,大量的华人仍旧认为中国是他们的家,是他们将来叶落归根的地方,是一个他们能够借鉴其文化价值观从而形成自身政治观念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结束了这种情况。战争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胜利,中国此时的重大变化意味着海外华人社区与中国国家的旧关系必须发生改变。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东南亚殖民地平静的时候,马来亚的华人居民已经增加到该国总人口的几乎40%,巨大的人口比例逐渐地被越来越具有政治意识的马来人看作是一种威胁。

为什么华人移民在马来西亚这么重要?更小规模的华人移民在东南亚其他许多地方是否也如此重要?历史学家或学者应该如何解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在广泛的商业领域和其他领域的反复成功?

对于努力尝试找到这类问题答案的那些人,存在一个在过去并非

总是可以避免的诱惑：将成功华商的“商业技能”或者“天赋才能”神秘化。这种做法的吸引力是明显的：不用进行复杂的分析，仅对宏观问题提供泛泛的答案即可。我们可以提供一系列更有助益也更准确的答案，但是如果深入考察的话，这些更准确的答案是复杂的，很难去理解的。对中国的研究总是一群由于掌握了中文而把自己与他们的同行分开的学者对一个分离开来的世界的研究。同样的评论也可以用在那些研究南洋华人——有许多方言的“南洋的华人”——的学者。本书的作者没有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122

一个重要的但是经常被忘记的事实，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东南亚华人的商业成功。大量的东南亚华人移民作为苦力到来、工作和死亡。苦力劳工从事艰苦、体能要求高的工作，但是工资低。华人企业家移民的成功不应该掩盖那些工资很低而且经常受到虐待的劳工。其他华人移民的职业远离商业世界的上层，比如作为市场园丁或者厨房帮手、木匠和店员。总之，商业成功和获得巨大财富不是东南亚华人生活的一个普遍特征。

对那些成功的人来说，找出一些一般的和明了的解释是可能的。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填补了其他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填补的社会空白。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越南的情况很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当法国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入侵南越，并且在1861年夺取西贡的时候，他们鼓励华人定居，因为他们知道华人商人能够发挥殖民地其他人(法国人或者越南人)还不能发挥的商业作用。华人移民乐意并且能够从事东南亚人本身躲避或者由于缺少训练和专业而难以胜任的工作。一个乡村小商铺店主的作用证明了华人移民占据的通常不是东南亚人乐意从事的工作。除了一些很明显的例外，东南亚人不认为从事商业活动是一种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而且，即使在乡村地区开一家小店铺需要资本以及对现金经济的理解。华人移民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优势。即使一个人的能力无法提供足够的资本，他也可以通过家庭或者家族联系获得资金。而且一旦他拥有了资金，他对现金经济运作的知识能够使他不仅仅是一个货物的供应商，而且还可以从事一系列广泛的商业，向农民 123

销售信用来换取他们的农产品以及贷款。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为什么华人移民不时会成为怨恨的对象,尤其是在一个将兴趣扩展到稻米业并且成功的商店主有时可能实施压榨的情况下。

由于华人移民与殖民政府的联系,对他们的怨恨有时候也能感觉到。随着殖民政府的存在越来越成为东南亚各民族怨恨的事情,怨恨的对象也开始包括那些华人移民,因为他们的生计与外来的欧洲政府密切相关。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人们怨恨那些充当税收员和殖民政府鸦片垄断代理人的华人。而且由于他们愿意使用殖民政府的法律来解决争议而不是依靠印度尼西亚人的习惯法或者阿达特法,这更加剧了对这些政府华人代理人的憎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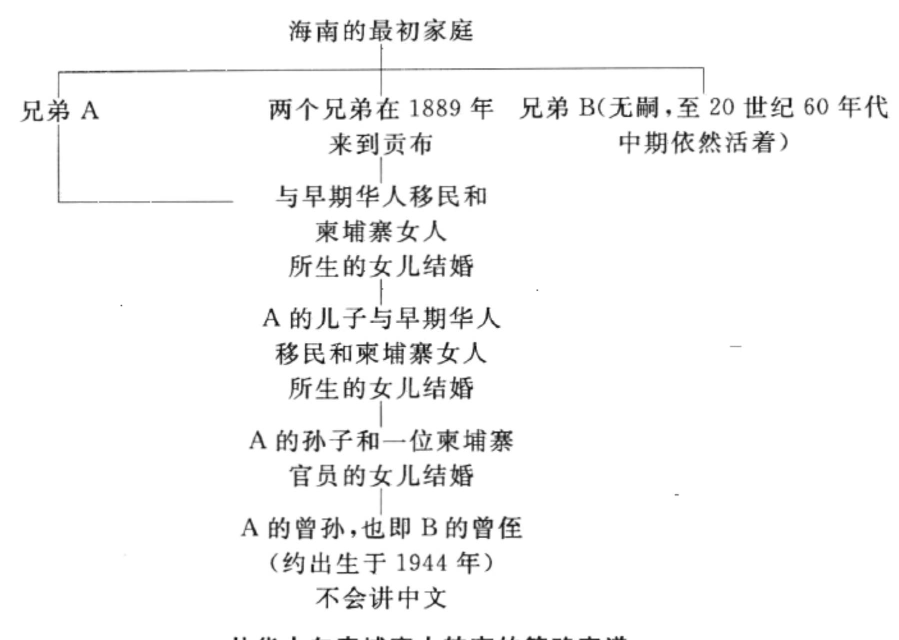
对东南亚华人移民社区的怨恨在一些地区更尖锐,因为那些地区的一系列社会和宗教因素使得很难将任何移民同化进现存社区。只有在柬埔寨、泰国和菲律宾,华人被大量吸收进现有的社会。在其他地方,越南虽是部分例外,但其同化的程度是有限的,甚至很少见。对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来说,华人移民不愿意信奉伊斯兰教成为同化的一个主要障碍。相反,在柬埔寨和泰国,作为国家宗教的佛教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框架,移民华人发现同化是可能的,于是,随后几代人完成了这个过程。菲律宾的天主教会也许不能被认为与泰国或者菲律宾的佛教庙宇一样灵活,但是没有了伊斯兰教的饮食限制,而且(实际上并不总是严格的理论)对不同的宗教仪式相当宽容,因此菲律宾的天主教在同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24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仍然有可能在柬埔寨看到同化过程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在发挥作用。每一个家庭的经历都有其独特的特点,但是下面将描述的真实案例也许可以被公正地认为是在其他地方重复了几千次的一个过程的代表。

在柬埔寨的海港镇贡布,几个家族控制了重要的胡椒贸易。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中一个家族的某位创始成员还活着。他那时候已经90多岁了,和他的兄弟在1880年后期一起来到柬埔寨。他们当时20岁出头,离开他们在中国海南岛的家,定居在18世纪末海南人已经

125



从华人向柬埔寨人转变的简略家谱

开始开发种植胡椒的一个地区。这位老人不会讲柬埔寨语,他是这个家族最年轻成员的曾祖父,从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他们家族已经繁衍到第三代了。这个 20 岁出头的年轻人实际上一点不会讲中文,他是法律意义上的柬埔寨人,柬埔寨语是他的第一语言,而且对一个外部观察者来说,他与其他成百上千有着华人血缘的柬埔寨人没有什么两样。

把这个家族最年长和最年轻的成员放在一起,就有力地证明了同化的现实。同样惊人的现象可以在居住着三代人的巨大的店面房里面发现。对于不同世代,那里有关于"华人特性"和"柬埔寨人特性"的平衡的微妙线索。柬埔寨风格的佛像放置在用金粉写着中国字的红纸条幅旁边,这些提供了对健康、财富、长寿和生育的传统祝福。店面房里面的所有居民,也许只有一半的人能读这些中国字。这个简单化的家谱突显了刚才描述的这个家庭从华人到柬埔寨人的微妙但稳定的变化。

不论是受到欢迎还是受到憎恶,已经同化还是作为一个严格分开的社区,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在该地区的历史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的经济作用是最明显的,但是有时候经济作用有重要的政治含义。最重要的是,一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对大多数人的回乡之路无论从个人还是政治上都已阻断了，那么社区中大量未被同化的华人，无论以前他们的作用是什么，现在都面临重大的政治问题。

我们已经提及这个事实：华人远远不是在东南亚唯一的移民族群。其他一些移民社区在该地区广泛的历史中也发挥了较小的作用，不过某些特定种族群体的单个成员还是相当重要的。来自中东部部分地区分散的移民社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他移民社区在一些特定的地区是重要的，在其他地区则没有那么重要。例如在柬埔寨和老挝，法国鼓励越南人移民，因为越南人乐意从事法国殖民管理需要的文书工作以及从事很少吸引柬埔寨人和老挝人兴趣的小商业。不过，在所有的移民社区中，只有一个种族群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接近华人的作用，这就是海外印度人社区。而且只要对其中的重大变数给以足够的重视，我们就可以概括地讨论这个社区的情况。

126

尽管我们知道东南亚的印度移民可以追溯到有书面记录的早期时代，但是直到 19 世纪才开始有大量的印度人移民到该地区。与华人移民一样，印度人来到东南亚是为了填补东南亚人自己不能或者不想从事的职位空缺。而且就像移民到东南亚的华人一样，大量来到该地区的印度人这么做是因为这里的雇佣机会比他们的故土看起来要多得多。

尽管印度人遍布整个东南亚，但是他们的数量在缅甸和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最多。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产生这种状况的理由。印度被一个英国殖民政府管理，来自印度的移民大部分都去了其他的英国殖民地。大量的印度移民是劳工，尤其是种植园劳工。但是印度劳工在其他领域也变得重要起来——在公路建设和铁路工作中。直到今天，任何一个到马来西亚的游客都可以轻易地看到印度劳工在刚才提及领域内的重要性。

不过，如同华人一样，东南亚的印度人移民从事很多种职业。一些人从印度被征召来从事他们的种姓和宗教群体传统上在印度从事的军队和警察职业。其他还有放贷者，他们自愿从事这种经常会导致怨恨

127

的职业,尤其是当地的东南亚农民发现他们深深地陷入到外来者的债务之时。在缅甸,印度放贷者的活动招来了巨大的怨恨,在缅甸独立之后,这种怨恨造成该国大量驱逐印度人。

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经济扩张的环境下到东南亚的其他移民一样,有些人大富大贵起来。印度移民和他们的第一代后裔变成了成功的企业家、律师和医生。不过,尽管很难提供让人满意的数字,但很清楚的是,只有很小一部分东南亚的印度移民达到一些华人所获得的商业成功的巅峰。对这种差异的解释似乎已相当清晰,但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在通常情况下,印度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成功似乎是在家庭层面上。由于不乐意从事涉及股份制运作的商业经营的价值体系,印度人的商业成功从来没有华人那么深远。

东南亚的亚洲移民是19世纪中期发生的重大的经济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当东南亚稳固(但并不平衡)地摆脱过去传统的时候,移民为大部分的发展提供了体力、能量以及后来的金融资本。新加坡这个最终独立的国家被华人控制。在马来西亚,半岛马来亚所拥有的人口中,华人超过了三分之一,华人的到来和定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非常重要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印度移民在数量上相对少一些,因此相应地没有那么重要。尽管如此,他们仍是极其重要的,就如缅甸的印度移民是非常重要的一样。

不过,就如已经清楚地指出的那样,移民到东南亚不是没有引发问题和怨恨。我们已经多次指出,移民填补了东南亚人逃避或者缺少技能的工作岗位。这是事实,但是,时代已经变化,一旦东南亚人获得以前他们缺少的技能或者得到训练,他们便开始怨恨自己很难获得移民或者他们后裔掌握的工作。同时,作为导致独立的长期动荡过程的一部分,东南亚人经常把他们国家的亚洲移民视为统治他们的殖民政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在缅甸,当这种感觉与对印度移民主导经济的尖锐怨恨加在一起的时候,获得独立后就为反动和报复揭开了序幕。 128

没有提及悲剧就结束对东南亚亚洲移民的讨论似乎是错误的。对许多已经兴旺的并且继续兴旺的人来说,除了新加坡非常特别的经历,

东南亚的亚洲移民总是有与其相关联的悲剧的风险。对19世纪的早期移民来说,死在异乡是个巨大的悲剧。对后来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来说,特定的个人悲剧就是发现他们既不"属于"他们祖先的土地也不"属于"(在许多东南亚人的眼里)他们出生和建立根基的新土地。有时候这种与亚洲移民相关联的悲剧感会变得非常明显。例如,用武力把印度人从缅甸驱逐出去,或者20世纪60年代印度尼西亚大规模屠杀华人,当时华人被视为共产主义者。

将东南亚的亚洲移民的经历与那些从欧洲迁移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移民经历进行对比,是具有启发性的。对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美国和澳大利亚提供了许多挑战,但是从来不是现有国家的挑战,不管那些国家多么弱小或者执著于传统生活方式。相反,亚洲移民陷入一个导致国家转型的过程。与欧洲移民不同,亚洲移民经常发现他们不能够成为国家的正式成员。亚洲移民对东南亚的经济转型是重要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新加坡是明显的例外),他们不是政治的主人。

第八章　幻觉的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南亚(1918—1941)

129

对那些稍稍思考过东南亚的人来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些年份直到最近才显现出一个突出的悖论。一方面，这些年份为殖民统治期间关于东南亚本质的一些最广泛接受的观点提供了基础——许多观察家认为“英属马来亚”、“荷属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在这些年份里已经达到成功的顶峰。在曾经在殖民地生活和工作的外来者描述的关于殖民后期的作品中，这是常见的一个判断。当然，在某些程度上，这种估计反映了那些相信殖民作用的人所持有的怀旧感。另外，不是因为冷嘲热讽才这么指出：有时候这种怀旧感也反映了许多人已经发现殖民地的生活比他们退休后在祖国的生活要舒服得多这样的事实。

不过，对更往后的一代人来说，至少我们对东南亚的一些感觉反映了一种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意识。这是一种通过小说和旅游书以及在一些家族联系的事例而获得的意识。它是萨默赛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这样的流行作家在其作品中所关注的一个时代。而且引人注目的是，现代东南亚的酒店是多么频繁地选择殖民地后期的照片来作为它们的装饰。因此，欧洲种植园主或者官员的形象(根据各人性格不同，其白色热带西装或一尘不染或染色并且破旧)已经不仅仅是短篇

130

小说的一个形象，而是对一个时代具有历史意义和代表性的一种反思。同样，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众记忆中没有完全成形的形象)的东南亚人(即“本地人”)是刻板定型的：谦虚和勤劳的农民，忠实的仆人，文雅但无能的王子偶尔会英勇反叛现代殖民统治及其价值观。

另一方面则形成一种悖论。更深层次(这个层次渗透到简单概括的大众文学和旅行者故事之下)的对两次战争期间的认知表明了截然不同于仍然广泛流行的一种观点。尽管我们也许认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殖民主义的全盛时期，当时除了泰国，东南亚的所有国家都处于欧洲或者美国的统治之下，但是在这些年份里，东南亚的殖民统治基础处于相当的压力之下。有时候，这个事实得到了实施殖民统治的那些人的认可。其他人则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对殖民地位的威胁。不过，不论存在意识的程度如何，两次战争期间的标志是两个非常矛盾的特点：外部力量在该地区广泛存在的同时，新的主要的内部力量正在开始运作，这将有助于确保结束所有的殖民政权。

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末，东南亚拥有了直到今天仍没有改变的边界模式。该世纪早期的各种各样的领土调整结束了一些长期的争议，而且殖民扩张实际上到了其上限。在大陆地区，缅甸有一个英国殖民政府；法国统治着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所有这些殖民地都被称作法属印度支那；只有泰国保持了脆弱的独立地位。东南亚大陆存在的现代国家已经继承了(只有有限的改变)殖民时期划定的边界。海上地区也是如此，尽管讨论他们的例子时，需要加上更多的限定。荷属印度的领土将变成印度尼西亚。同样，西班牙和后来美国殖民控制的菲律宾的边界变成了独立的菲律宾国家的边界。葡属帝汶最终将变成东帝汶独立国家。但是，在现代马来西亚，并没有一个领土统一的前任国家存在。确实，英国统治了半岛马来亚和新加坡，但是婆罗洲有两个可以找到更不寻常的欧洲控制的例子。在已经成为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布鲁克家族的统治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在现代的沙巴，一个特许贸易公司充当了政府组织，遵循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模式，只不过规模较小。不过，即使沙捞越和沙巴是行政例外，他们与英国的联系

131

也是明显的，而且在1956年和1963年之间，一个独立的马来西亚的最终建立提供了另外一个范例：一个现代国家采纳了殖民时期划定并且已经稳定了的边界。

随着边界的稳定和历史上最可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控制了东南亚殖民地的欧洲国家期望在一段时期内保持政府平稳和经济扩张。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经历似乎符合并且甚至超过了他们的第二个期望。19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的东南亚的经济扩张已经改变了该地区，而且该地区已经准备好去满足战争之后和平时期繁荣的需要。东南亚作为橡胶、大米和锡的主要来源地，那些控制了植物园、矿山和水田的群体的出口收入迅速增长。东南亚的橡胶为已经逐渐依靠汽车运输的西方国家制造轮胎。东南亚的锡在制造业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包括马口铁等终端产品，也包括工业设备的专门部件。东南亚国家种植的稻米养活了从印度到欧洲的人口。而且在这个经济广泛扩展的时代，东南亚其他的出口产品也享有类似的发展。

132

殖民官员希望在这个经济活动增长的时期，他们统治的人口可以不对这些外来统治表现出公开的怨恨反应，这些希望最初似乎也有道理。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平静似乎是当时的常态，尽管不是绝对如此。这种平静是不是经济活动扩张造成的，目前仍有争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下面这个命题：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现代政治运动开始在东南亚发展，这些运动的基本目标是从外国控制中获得独立，并最终建立一个按照新的、甚至革命性的政治理论来治理的新国家。

这种发展使得20世纪20年代显得如此重要，尽管其重要性在当时经常被低估。殖民政府在以前也遇到过抵制。当荷兰在19世纪扩展他们对印度尼西亚岛屿的控制时，曾经引发了激烈的殖民战争。在缅甸，英国多年施行的所谓“绥靖”政策已经变成了大量人口不乐意屈从于外国统治的一个证明；而在越南，抵制法国的记录几乎持续不断，根据情况的不同而起落，但是在重要时期从来没有缺少过。不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东南亚抵制外国统治的所有运动本质上具有传统的性质。不仅是传统的，而且许多例子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宗教和

千禧年运动相关联。当然,这个事实使持怀疑态度的殖民国家更容易认为这些抵制运动缺少真正的意义。

从传统抵制到现代反殖民挑战的转变通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发展。尽管这种观点从某些角度上来看是准确的,但是它作为一个解释是不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引出了太多的问题。民族主义描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东南亚民族主义者的崛起与欧洲或者拉丁美洲崛起的过程是相类似,还是完全不同?

除了详细地列出这个问题产生的争议,一个更积极的方法是去观察那些研究东南亚的学者之间已经达成的普遍共识——公认这个复杂的以及有时候情感被控的主题没有绝对统一的观点。大多数学者目前同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挑战现有殖民秩序的政治运动在主要方式上与19世纪的那些运动不同。明白了存在差异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寻求从殖民者的统治中获得独立的那些人漠视过去对殖民统治传统的反对。相反,反对殖民统治的现代东南亚人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建立在他们同胞已经建立的传统基础上的,但是他们同时还在某种程度上也考虑了变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

133

现代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特别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在一个以结束殖民统治并创立新印度尼西亚国家为目标的新政治项目中,仍然考虑了过去的传统因素。20世纪20年代因倡导印度尼西亚独立而出名的那些人非常清楚地了解在下列运动中抗击荷兰控制扩张的那些人的努力:爪哇战争(1825—1830)、苏门答腊的帕特里战争(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及苏门答腊的亚齐战争(1872—1908)。但是对于苏加诺这样将成为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的人来说,反对荷兰的运动有了早期反殖民领导者从来没有梦想过的新元素。首先,苏加诺及其同时代那些在20世纪20年代出名的其他领导人,指出了从外国统治中独立和建立一个以前从来不存在的新印度尼西亚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这个新国家纳入了荷兰统治的所有民族和领土,被认为是一个多样性的实体——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格言是"多样性中的统一",但是它不仅仅是通过拒绝殖民主义而统一起来。统一将通过接

受新价值观来构建，这些新价值观中的一部分来自印度尼西亚自己的传统，一部分来自欧洲——19世纪后，在那里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理论以及处置实际政治权力的重大现实变化。

从一个松散但准确的意义上看，在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其他地方出现的新的民族主义综合了西方和东南亚本身价值观的旧的和新的东西。民族主义声称被作为殖民地统治的人口和领土拥有他们自己独立的生存权利，追求维护一组特定民族在一个特定区域内生活的国家目标。按照当时的价值观，殖民国家理所当然地反对这些对政治控制进行根本改变的要求。而且，实现民族主义者目标的障碍似乎经常是艰巨的，而且经常导致殖民管理者不考虑新运动的力量。对民族主义者本身来说，对理想的信仰使他们相信，自己能够获得政治权力，以及能够克服明显不利，甚至不可能实现的状况。 134

但是问题仍旧存在：为什么这种新国家精神的发展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而不是以前？一些历史学家会拒绝这个问题的本质，而是喜欢去强调反殖民抵制的旧形式转化成新民族主义尝试的途径。不过，对大多数观察家来说，在传统和更现代的反殖民运动之间似乎不仅存在重要的差异，而且还有一些很容易识别的关于改变何以发生得适得其时的解释。大多数解释的核心是意识感的出现。到了20世纪20年代及其后，越来越多的东南亚人有一种新的意识感：主导他们生活的殖民关系不是毫无疑问的，而是相反，是可以挑战的。

在一个如越南这样的国家，国家认同感有很长的历史，这种意识感尤以信奉新的政治理论为标志，这些新政治理论被视为终结他们国家殖民地位的一个纲领。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感是随着殖民经历发展而来的，它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意识的觉醒，而不仅仅是采纳另一个政治理论，这才是最重要的。在整个东南亚，包括从来没有经历正式的殖民关系的泰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见证了关于政府本质和意图的觉醒。 135

在强调这种意识感发展的时候，由于该地区不同国家的新民族主义领导人遵循了不同的道路，所以关注点应该集中在东南亚作为外部

理论和概念的接收者和采纳者方面的作用上。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相关的政治思想以及一系列其他的理论和概念不是在东南亚发展的，不过，这些理论的很多内容被使用和采纳。在这里，意识的全球性觉醒使得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要性更容易理解了。

欧洲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获得了其现代政治结构——国家边界的划定以及巩固了国家单位。伴随着这个过程，涌现了大量的政治理论作品。从 20 世纪初至今，支持用革命方法解决政治问题与寻求其他方法的人一直争论不休。毫不奇怪，怨恨或者不满他们殖民地位的东南亚人期望大量的西方政治思想，想知道其中是否包含解决他们政治困境的答案。

这是一个毫不奇怪的决定，因为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发生在欧洲的重大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一种观点的发展——不是非常宏大但总是有意义的——这种观点坚持教育的机会应该扩展到殖民地国家的人口。至少对一些人来说，有了教育，就有机会阅读到发生在欧洲的重大政治变化，以及带来这些变化的政治力量。一旦相当数量的东南亚人接触到了西方教育，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发展就会得到最强有力的推动。这种观点没有什么夸大的成分。而且，到了 20 世纪初期，教育以及行政管理模式和社会模式的改变导致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新阶层——知识分子的发展。尽管也许有观点指出这个阶层已经在越南长期存在，但是不论在越南还是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地方，目前新出现的这个阶级在政治和知识信念上有别于以前。相当数量的受过教育的东南亚人第一次根据政治理论质疑他们的统治者——殖民国家的地位，而且他们能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广泛的知识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关注于辩论、讨论和行动，希望能够获得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

136

接触到西方教育以及通过西方接触到新政治概念可以有许多形式。对一些人来说，接触能够以正式的方式进行，例如通过教育和研究，有时候甚至可以在欧洲生活很多年。对其他人来说，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可以通过不那么正式但是同样重要的与西方的联系来获得。印度尼西亚的穆罕默德·哈达和越南胡志明的职业生涯提供了东南亚人了

解西方政治理论以及在其中发现一种终结他们国家殖民统治方式的不同途径的例子。哈达被荷兰看作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模范学生，在早年成人生活期间，他花费了差不多10年时间在荷兰学习经济学。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也是一个逐渐发现不可能调和荷兰流行的政治思想(个人拥有投票改变政府的机会是重要的)与印度尼西亚现有政治思想的人。当他1932年回到印度尼西亚的时候，对其同胞要求独立的支持导致他被荷兰殖民当局监禁，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被日本人释放。

胡志明对西方的熟悉则通过不同的方式。与哈达不同，法国从来没有把他看作模范学生。相反，他是一个职位很低但有学问的越南官员让人头疼的儿子，这个官员已经拒绝与殖民政府合作。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以一个船员的身份离开了越南，并且自己想办法到了欧洲，在伦敦和巴黎换了一系列低薪的工作，还在纽约和波士顿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在巴黎，他慢慢地开始熟悉那些已经采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作为其政治哲学和行动指导的人的革命著作。由于深信共产主义为世界上的问题，尤其是殖民地的民族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胡志明成了法国共产党创始成员之一。这攸关大局的一步导致他迈向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个人苦难、监禁以及最终取得其反抗法国在越南统治的部分斗争的胜利。 137

对于在东南亚殖民地开始了解西方政府本质的那些人来说，通过个人经历或者他们同胞的书籍和报道，产生的最明显的感觉是，适用于欧洲和美国的生活与行为模式与那些适用于殖民地的是多么矛盾。在这方面，一个关于英国在印度的著名谚语同样适用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东南亚生活的欧洲人和美国人。谚语说，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所有英国人都是“大人”(Sahib)。换句话说，白人的身份可以把在自己国家地位卑微的个人转变成了“老爷”或者“主子”。大量的证据表明，欧洲人在东南亚殖民地的悠闲很容易陷入一种模式，即假定他们在道德上高于“本地”的大众以及确保他们的生存条件是适合这种被提升的地位的。让我们举两个例子。比如，与他们在印度的同行一样，荷兰人和英 138



胡志明

胡志明是东南亚挑战殖民统治的最著名革命家之一。经历了30年的流亡生活，他信奉能够为把法国驱逐出去其国家提供革命哲学的共产主义。照片采自《远东经济评论》。

国人很自然地把他们自己当作“主子”(tuan，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就是单词“老爷”或者“主子”的意思)。这是一种越来越造成怨恨的状况。而且，人们逐渐意识到，殖民地的经济收益大量地汇集到遥远的宗主国、殖民社区外来成员以及已经成为前者利益共同体的那些人中。这种意识进一步加剧了怨恨。对大部分积极开展民族主义运动的人来说，殖民主义的不平等意识逐渐集中于两个特征之上：外来殖民者对当地人口的社会和政治主导，以及殖民者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当发现殖民地中各种各样的殖民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之间的明显联系之后，思想丰富的东南亚民族主义者质疑西方的政治和经济理论能否给他们面对的问题提供一个答案。对一些人来说，对如何获得独

立这个问题的一个明显答案可以在共产主义里面找到。这应该没有什么奇怪的。在 1917 年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发生几乎 90 年之后，人们仍然很难体会伴随着该事件的深刻的国际关注和兴奋。西方保守政治家的看法是：如果太多的权力落入工人手中，这就是可能会发生什么的可怕例子。当然，全世界的贫困和弱势群体的看法则非常不同。对于亚洲的一些人来说——不仅仅是东南亚，俄国革命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腐败、威权的君主制被以俄国工人名义行动的政治群体所推翻的事例，它还被视为一个标志着更多东西的事件：即将到来的全世界革命，尤其是他们自己所处的殖民地世界。 139

许多年以后再回顾，这种看法是多么不准确。不过，对一些东南亚人来说，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共产主义革命来获得独立的前景似乎是很真实的。共产主义革命哲学在越南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吸引力，在印度尼西亚有很重要的追随者，而且在菲律宾也发挥了虽然不大却很重要的作用。在英属马来亚，共产主义组织者在华人社区是积极的，但是其在该殖民地的发展截然不同于东南亚的其他地方。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属马来亚的华人社区仍然认为其利益与中国故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如此，支持共产主义的那些人不是通过挑战英国当局，而是通过筹集资金为他们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同胞提供支持。

为什么共产党当时只在越南成为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领导？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东南亚发展的很多东西。在东南亚所有国家中，只有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为了从他们的殖民统治者手中获得独立，不得不去从事持久战。这些战争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这也许反映了法国和荷兰保持他们殖民帝国的决心，而当时其他的欧洲殖民国家已经接受了殖民时代正在过去或者已经过去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进行的独立战争也可以被认为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存在于这些国家的状况的逻辑延伸。因为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殖民政府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独立是根本不予考虑的，尽管对独立的要求日益增多且日渐坚决。

与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相比，越南的经历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共 140



苏加诺总统

苏加诺是独立印度尼西亚的第一个领导人。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苏加诺既具有了不起才能也有个人弱点。1946—1965年，苏加诺主导了印度尼西亚的国内政治，并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照片由《远东经济评论》的德里克·戴维斯(Derek Davies)提供。

产党成了民族主义者抵制法国的领导，而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是反荷兰民族主义运动各种各样群体中的一个？从领导的能力和个性中，我们可以得到部分答案。规模小但决心大的越南共产党有几个领导人——除了胡志明，还有范文同和武元甲，他们都具有了不起的才能。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有具备能力和奉献精神的人，如司马温和陈马六甲，但是非共产党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才能至少跟他们共产党同盟的才能差不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情况的另外一个差别在于

141

他们各自殖民政权的本质。法国和荷兰这两个殖民政权都是压制型的，但是有人认为对越南的压制比对印度尼西亚的压制更严酷。尽管荷兰毫不犹豫地驱逐了苏加诺、哈达和苏丹·沙里尔，并囚禁了几百名不太出名的民族主义者，但是印度尼西亚的压制从来没有法国统治下的越南那么全面，至少没那么残忍，这应该是肯定的。

由于越南严酷的政治压制，共产党通过其秘密性和组织能力才得以生存并最终成功，这种观点远远不能提供一个满意的解释。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对越南的压制确实消除了或者使得其他的政治团体无能为力。而越南共产党的秘密特性有助于其生存——法国安全机构曾痛苦地抱怨他们无法渗透到共产党领导的内部等级中。但是共产党缓慢地获得权力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对共产党的领导人和追随者来说，共产主义似乎为行动提供了一个政治理论和一个纲领，这尤其适合越南现有的条件。殖民经济制度似乎非常适合马克思，尤其是列宁著作中描述的剥削模式。胡志明抓住了这个事实。尽管如此，同样需要记住的是，尽管共产党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已经使自己成为最重要的民族主义团体，他们还远远没有能力来获得权力。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印度尼西亚反对荷兰的民族主义者也离权力很远。即使他们与越南在这方面拥有共同经历，在其他方面还有很多非常不同的地方。越南共产党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在这样一个国家：该国具有悠久的国家认同的传统，儒家社会古老的绝对主义价值观首先受到威胁，然后又无法面对殖民主义的挑战和现代世界变化的现实。与之相反，印度尼西亚认同感的发展本质上是以各种形式的多元倾向为标志的一个社会中的现代现象。而且，如果我们概括一下 20 世纪的共产主义政治理论和实践对越南传统的儒家价值观瓦解所留下的空间的填补作用，可以看到在印度尼西亚找不到同样的情形。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在制定其将来的计划时所处的环境是：传统的文化价值以及传统和现代宗教价值还没有被证明是失败的。一个越南人可以哀悼儒家价值观占有一席之地的那种社会的消失，但是他必须去寻找替代它的东西，而且惋惜旧秩序消失的那些人通常也承认

142

其缺憾。另一个方面,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不把他们各种各样丰富的文化遗产或他们的伊斯兰宗教看作是荷兰殖民的原因,或者他们同胞无法驱逐荷兰的原因。相反,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者甚至不排斥共产主义,他们从过去的遗产中吸取力量,而且认为其与西方政治理论拥有同样的重要性。

让我们分析一下苏加诺。他身上体现了其同胞的许多特点,尤其是他的爪哇同胞,所以人们开始理解,为什么一个被无情的外部观察家视为讽刺漫画主角的人,在他的印度尼西亚同胞眼里,却是一个令人放心的人物,各种个人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特质和谐地结合在他身上。当1930年荷兰对他进行审判的时候,苏加诺捍卫了自己民族主义者的立场,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证明:不仅证明了他阅读大量政治著作的精力,还证明了他乐意去寻找一条合并了国家及其特征的最广泛思想的印度尼西亚独立道路。在印度尼西亚,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对荷兰的那些人认为不需要那种与共产主义相关联的绝对政治原则。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容纳了许多政治信念而不是像越南一样,变成了本质上跟共产主义是同义词的一种运动。

143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之间鲜明的对照可以作为对东南亚其他地方共产主义缓慢进展的一个及时的提醒。例如,泰国的情况可以归因于两个非同寻常国王——孟固王和朱拉隆功——的活力。传统泰国的渐进转型在1932年的"革命"时期达到了高潮。这次"革命"事实上代表了泰国治理体制的一次重大变化,因为从那以后,泰国的国王将成为宪政君主,而不是(至少理论上)一个绝对的统治者。坚持这种新状态的"革命者"大多数是政府机构和军队中比较年轻的人,很多人有国外经历,他们的目标是远离共产主义。由于有许多欧洲榜样作为指南,他们找到了一种方式来结束这种状况:泰国政治体系的本质过分依靠个人,即国王。1932年"革命"之后的泰国几乎不能被认为是实施了民主。不过,它是权力的一种重要转移。这种转移满足了一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曾担心统治者——国王帕恰迪波不会考虑紧密的王室集团之外的那些人的政治期望。不过,泰国发生的政治变化

是在一个对王位有普遍意义上统一认识的社会，而且佛教也为这个社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这非常不同于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地方。

不过，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有限成功不能仅仅根据一些民族主义者实现和平变革的能力来考察，因为另一些人是通过暴力方式来寻求变革的。就如泰国君主制和佛教是一个统一的因素一样，其他模式也为民族主义者的困惑提供了替代答案。在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以前很久，东南亚人就已经被日本人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挑战并击败沙俄的成功所震惊。与之类似，1911年的中国革命展示了革命者在一个亚洲国家成功地实现巨大政治变革的例子。对一些人来说，日本和中国革命者的成功是学习的榜样。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些成功则有更普遍的重要性。日本击败俄国表明亚洲人能够战胜欧洲人，就如中国革命所表明的，那些寻求设立革命目标的人甚至能够在最传统的环境下获得重大的政治变化。

144

除了特定事件提供的这些一般例子之外，还有在激发民族主义政策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更长期的影响，而且这也为替代共产主义提供了号召力。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或者佛教在缅甸的作用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而是意味着有些东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意识地发展起来。伊斯兰教和佛教徒运动在这些国家的存在，意味着在民族主义者考虑通过采纳共产主义作为理论和行动的向导来找到解决殖民问题的可能性之前，已经存在可以让民族主义者使用的重要号召力。

书写有关东南亚宗教运动的历史有着更多的困难。宗教经历是个人的事情，因此历史学家经常发现，除了强调最基本的发展轮廓之外，很难去做更多的事情。尽管这种困难是存在的，但一个局外人还是有可能了解伊斯兰教运动的力量和影响(在20世纪前40年的时间里，伊斯兰教运动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非常重要)，并且领会它们对民族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性。伊斯兰教，尤其是强调古兰经基本教义的改革伊斯兰教促进了印度尼西亚某些群体感受到了日益增长的社区意识。从他们的宗教中找到精神安慰和支持之后，这些伊斯兰教的印度

尼西亚信奉者也通过共同的信念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印度145尼西亚第一个真正重要的国家组织是伊斯兰联盟，成立于1912年。它起初是印度尼西亚蜡染印花布商人协会，面对来自华人经销商的竞争，他们在1908年走到一起（名称略微有异）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还在共同的宗教信仰上找到了团结的基础。早期加入伊斯兰联盟的那些印度尼西亚人主要是基于经济考虑，但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把自己与当时出现的各种伊斯兰组织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些印度尼西亚人一样，他们的宗教已不仅仅是个人信仰和信念的声明。作为一个伊斯兰教信奉者的事实也变成了一个政治声明。作为伊斯兰教的信奉者，必须认同印度尼西亚人社区的其他成员。这个印度尼西亚人社区的利益不同于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荷兰人以及控制了岛屿很多商业的华人商人，甚至与后两者相背离。

从20世纪初期开始，马来亚的伊斯兰教在强调这种信仰对整个半岛的共同利益上发挥了类似（也许比印度尼西亚稍逊）的作用。尽管已经经历了改革伊斯兰教影响的那些人经常在中东学习，赞成伊斯兰教在尝试实现改造马来亚社会上的重要性，但是宗教组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缓慢发展的马来人（不是马来亚人）的政治道路上没有同样大的影响力。随着英属马来亚发展成一个大量华人和印度移民社区并存的多种族社会，信奉伊斯兰教是构成急剧增长的马来认同感的因素之一。这些因素把政治上已经觉悟的马来人与华人和印度人分隔开来。经济生活的现实和成为伊斯兰信仰的成员都激发人们分享经济进步的好处，以与马来人的认同感相匹配。尽管如此，如果伊斯兰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马来亚没有与在印度尼西亚同样的影响，也许它们产生的是一个当时没有意识到的长远影响。在当代马来西亚，随着马来人政治主导地位的牢固确立，伊斯兰教作为一个限定马来人社区政治和社会利益的因素发挥了重大作用，尽管应该指出的是，有两个处于竞争状态的政党都宣称自己代表马来伊斯兰社区。

146 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缅甸而言，对认为民族主义非常重要的那些人来说，佛教提供了一个中心的号召力。如果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缅甸从殖民统治独立出来的骚乱水平，与在越南与印度尼西亚发现的一样正常，那将是一种误导，但是那儿的确存在积极的民族主义运动，而且其中的佛教因素不容忽视。佛教可以把缅人跟外来的非佛教徒(包括非佛教徒的亚洲人，以及英国殖民统治建立后大量涌入缅甸的印度人)分离开来，还为民族主义者传播思想提供了一个行政管理的架构。支持独立的宣传能够在僧侣之间流传，而且反殖民战略也可以在佛教徒理事会进行讨论。就如印度尼西亚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奉者一样，缅甸的佛教徒积极分子在他们的宗教中找到了对国家的认同，以及获得精神安慰的一个基础。

到目前为止，本章主要关注了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的出现，只将非常有限的注意力放在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发展上。采取这种明显片面的方法的原因是很简单的。在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民族主义运动或者在本质上非常不同于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或者根本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存在过。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柬埔寨和老挝几乎没有受到民族主义活动的影响。这两个国家与越南(印度支那另外的法国殖民地)形成鲜明的对比，它们在一个法国行政管理的控制之下，传统社会和传统的统治阶层得以保存。法国的统治给柬埔寨和老挝带来了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不是那种在其他地方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变化。

如果将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进行对比可以看到，在柬埔寨，法国殖民主义的真正影响直到 20 世纪初期才被感觉到。柬埔寨国王继续实施统治，并且对他的绝大多数臣民来说，他仍然是他们世界的神圣中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思想和西方教育只是勉强渗透到柬埔寨，而由法国控制的殖民经济的冲击对大部分人口几乎没有明显的影响。在印度尼西亚，情况却非常不同。尽管印度尼西亚社会中很多传统的东西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得以存活，荷兰殖民政权的冲击——尤其是在爪哇——比法国在柬埔寨的冲击要深远得多。在战争期间，王室在印度尼西亚同样重要，这肯定是实情，但是无论他们如何重要，一个现代外向型城市的替代焦点在巴达维亚(现代雅加达)出现了。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西方教育在印度尼西亚已经有了影响，并且成

147

为一种时尚，因此不可能简单地与柬埔寨的情况进行比较。到了1939年，十来个柬埔寨人完成了相当于法国中学水平的教育。

柬埔寨、老挝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马来亚，展现了传统统治阶级成员与殖民国家之间的利益联盟采取行动阻止民族主义活动发展的不同程度。相关的联盟不仅仅涉及个人的关注焦点，如一定程度的权力和财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治和社会气氛下，柬埔寨和老挝的国王、王子以及马来亚的苏丹有可能感觉到他们的同胞正在从殖民体系的运作中获得好处。一个柬埔寨或者老挝王子也许认为，除了法国，还有什么人能够确保越南人不会来侵犯柬埔寨？按照马来亚王室的观点，与充满活力和足智多谋的华人进行经济竞争，除了英国，还有什么人能够支撑马来亚的利益？

菲律宾展示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个案。如同印度尼西亚的部分地区，菲律宾，尤其是该国的北部岛屿，经历了长期的殖民影响。在东南亚的所有国家中，菲律宾发展出了最早的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因为20世纪初期反对西班牙的革命在其目标上拥有了明显的现代特点。尽管如此，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菲律宾仍然与美国保持着一种殖民关系，并且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对这种地位的民族主义式的怨恨。我们可以在下面两大类事实中找到对这种状况的解释。一方面，尽管其公民也许可能像其他国家的殖民者一样行事，但是美国在开始统治菲律宾的时候就清楚地表明了其给予该国独立的坚定意图。尽管总体看来，美国在有些时期有过犹豫，而且不同的个人在实行政策时也有不同的热情，但是给予独立的基本承诺总是在那里。另一方面，菲律宾的精英——最有可能成为民族主义运动核心，也是最应该对美国的最终意图有所怀疑的群体——不仅相信独立必将到来，而且他们发现同样重要的一件事：他们个人的经济利益被美国控制之下发展出来的体制照顾得非常好。1936年，菲律宾联邦的创立反映了美国人和菲律宾政治家的共同利益。美国保留了对外交关系和国防事务的控制，而将几乎所有的国内事务都留给了菲律宾国会。最重要的是，独立将在1946年发生。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尽管与柬埔寨和老挝的情况非常不同，但是

148

在被殖民者和殖民者之间仍旧存在利益同盟。

在接近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时候，整个东南亚地区被殖民国家距离其独立前景是接近了，还是远离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而且同样明显的是，从东南亚人的观点来看问题还是从殖民者的观点来看问题，答案也是不同的。一些观点认为，尝试再现殖民者而不是东南亚人的评估也许更容易些，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强调不同殖民地和不同个人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变化这个事实。

使许多欧洲人相信殖民统治时代仍然可以坚持很多年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展的反抗殖民政府的本质。除了1930—1931年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对法国统治的持续抵制，所有对殖民政府的挑战本质上都是短期的，并且相对容易战胜。不仅如此，出现的各种挑战，包括在荷属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反对荷兰统治的起义，都有浓厚的传统色彩，有时候还包括依靠魔法以及遵守千禧年的期望，所以殖民国家认为他们没有一点现代政治意义，更不用说民族主义意义了。1930—1931年间缅甸的萨耶山起义似乎部分是由经济因素引发的。他们把其归因于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并对殖民国家强加的税收报以深深的怨恨。但是，尽管英国控制的当局成了萨耶山追随者的目标，但是他们努力通过传统的方法来获得一个传统的目标。作为以前的佛教僧侣，萨耶山被农民立为缅甸的一个新“国王”，这些农民已经准备好去用古老的武器以及一种对保护他们免受子弹攻击的神奇护身符的信仰来面对警察的枪支。

149

反抗荷兰统治的抗议者在1926年和1927年曾经跟随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共产党第二梯队积极分子的领导，并且暂时成功地使殖民当局相信他们确实可能对荷兰统治产生严重威胁。这些抗议者更切合现代世界的现实。可以令人信服地说，殖民统治已经在缅甸产生了造成部分印度尼西亚人感到的痛苦和迷惘的一般条件。但是，由于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起义的成功，追随者(也可能包括部分领导人)所持有的希望与那些深思熟虑的民族主义者的期望大相径庭，后者认识到，最终的独立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需付出相应的代价。哈达、苏加诺和沙里尔

(Sjahrir)等人思考的是独立建立的新国家里面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印度尼西亚 1926—1927 年起义的参与者思考的是取消所有的税收，在城市地区免费乘坐出租车。而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土耳其的改革独裁者——则走下飞机，突然出现在印度尼西亚，领导独立运动。

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这些发展，以及马来亚的马来人反抗英国当局和 20 世纪 30 年代在菲律宾萨克达尔(Sakdalist，他加禄语，意为“控诉者”或者“攻击者”)农民运动等罕见的例子，都没有令外来的殖民统治者感到他们的统治面临着任何真正的威胁，不论这些事件在当时是多么棘手。对于 1930—1931 年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对法国统治的挑战(现在称为义静苏维埃)，我们不能作出同样的论断。在几乎一年的时间里，法国对越南北—中部的两个贫困省份的部分控制遭到了越南共产党信徒领导的农民的抵制，后者成功地在一段时间里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管理体制。直到法国外籍兵团被派到该地区，并且几乎可以采取任何方法去镇压对法国当局的挑战，包括处死大多数的囚犯之后，义静苏维埃才结束。在这个例子中，一些法国官员成了他们自己宣传的牺牲品。他们选择相信他们面临的挑战更多是反映了所谓“亚洲人”的“卑微”特性，而不是任何真正的民族主义精神或者建立一个更现代社会的期望，更不是农民为了反抗他们令人绝望的经济条件而进行的抗议。

150

虽然殖民官员不愿相信，但是对东南亚各个殖民地区的人口来说，早期独立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但是 20 世纪 30 年代似乎已经成为一段相当不安的时期，至少这些外来统治者心里没底。尽管荷属印度的总督德荣这样的人坚持认为荷兰仍然会继续统治他们的殖民臣民另一个 300 年，但是对未来的估计还是不容乐观。在英属马来亚，殖民当局对将来局势明显错误的估计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开始慢慢发生改变，伴随这种改变的是第一次关于在某个不确定日期实现独立的试探性思考。在缅甸，英国当局已经意识到附近印度的发展，并且直面来自全体缅甸民族主义者缓慢但日益增长的结束殖民政权的要求，所以他们也不能再假装坚持独立最终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英国没有考虑明确

的独立时间表。在法属印度支那的各个国家，根据位置的不同，对将来的态度也是非常不同的。在柬埔寨和老挝，法国没有看到任何迹象可以表明民族主义者将破坏他们的统治。越南则不同，但是法国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对他们统治的规模和力量，人们对此看法不同。也许下面这份简报提供了最好的总结：在越南，法国殖民当局一些部门——最出名的是安全机构，以及有相当一部分人怀疑下述官方立场：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有可能持续到无限期的将来。 151

只有在菲律宾，由于没有认真考虑日本武力向南扩张的可能性，所以 20 世纪 30 年代是一个东南亚政治家满怀信心地期待独立的将来以及为这个将来与殖民国家设立计划和讨价还价的时代。与东南亚的其他殖民当局不同，20 世纪 30 年代菲律宾的美国殖民官员是在一个已经接受独立必然性的机构内工作。

事情的另一面更难描述。因为一个局外人很难在推动东南亚民族主义者实现他们独立目标的信念，与殖民当局设置的巨大障碍对他们目标的影响之间保持平衡。20 世纪 30 年代，在流亡中煎熬的印度尼西亚政治犯是否感到他们正在接近独立和国家解放？在印度支那殖民地残酷的监狱里的越南人心里又在想什么？尽管这些囚犯中的一些人在他们释放之后出版了回忆录，但是，他们在尝试从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的可能性进行实际判断时的观点，仍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不过，不论存在怎样的怀疑或者困难，我们必须记录这些民族主义者对他们事业的正确性和成功的必然性的信念。他们也许对实现目标的速度没有把握，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怀疑他们最终将获得成功。

20 世纪 20 年代是不确定的年代，20 世纪 30 年代尤甚。那时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而且必须记住这种怀疑和彷徨的氛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和平岁月，人们开始反对仍然普遍流行的现实图景：殖民地风平浪静，欧洲人不受干扰地占据主导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不确定占上风，这种状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东南亚民族主义者能够满怀信心地期望将来，即使殖民国家似乎仍然拥有垄断力量。 152

东南亚没有逃脱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西方工业国家爆发的大萧条的影响。西方国家经济的急剧放缓对东南亚国家有同样巨大的影响,因为后者的出口工业非常依赖西方的需求。大萧条期间,华尔街经纪人和市场一同崩溃,工业城市中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形成巨大的失业救济大军。与此同时,锡、橡胶和稻米市场崩溃,因此东南亚的出口经济暂时陷入困境,数以十万计的东南亚人失去了就业机会。

政治不确定和经济困难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东南亚起作用的唯一让人深感不安的因素。东南亚某些地区的人口过剩问题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爪哇和越南的部分地区。随着人口过剩而来的是饥荒问题。目击者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一次饥荒中越南中北部地区的报道,今天读来仍然令人痛心。在义安和河静省,当1930年饥荒蹂躏该地区的时候,瘦骨嶙峋的人们为了得到一点土豆而相互打斗。

到了殖民统治时期,社会不平等已经加剧,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情况是引起不安和不确定的深层原因。东南亚民族主义者不仅了解他们外来统治者在经济事务上的主导地位,还意识到了这种日益增加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存在于少量从殖民统治存在中获益的同胞与没有获益的广大老百姓之间。而且已经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指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在东南亚部分地区的关于不满的一些公共信号,至少反映了部分人口的挫折感,他们相信有人阻止他们参与那个理应属于他们的经济发展之中。

15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变化往往不容易总结。这些变化也不总是被东南亚民众或者来自欧洲或者美国生活和统治该地区的局外人所认同。但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发生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在整个地区也许是不平衡的,但是,不管如何不平衡,随后的战争年代表明,在东南亚每一个被殖民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力量都已形成,而时钟不可能倒转,不可能回到战争开始之前一切尚未发生的时候。

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东南亚人已经更多地了解了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了殖民国家依靠他们的遥远殖民地获得繁荣的程度,更多地

了解了殖民状况下存在的不平等。这样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拥有下述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所有的东南亚人正在努力寻求独立，并且随时准备革命。很明显，这不是实情。但是相信变化一定会发生的人在数量上已经有了大幅增长，甚至那些对现代政治问题缺乏认识的人，比如农民，也开始意识到变化已经发生。教育的发展虽缓慢但很重要，现代经济部门扩展到每一个国家越来越广泛的地区，他们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发展有了一定的认识，不论是发生在中国的重大事件，还是印度的宪政发展，所有这些都是走向变化或者期望变化的因素。

当一天结束，殖民者品尝着“暮后小饮”(Sundowner，日落时喝的饮料)反思其地位时，他们对以上内容有多少认识，目前仍然未有定论。随着鲜明的变化每天发生，这些殖民者坐在俱乐部或者他们的平房外廊下，荷兰人品尝着荷式金酒(Genever)，英国人品尝着威士忌和苏打水，他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了吗？也许只有富有观察力的少数人曾经意识到了这些。对那些相信变化还很遥远的人来说，幻觉的延续使他们看不到在过去 20 年的时间里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 154

155

第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南亚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份里，殖民国家仍然可能相信他们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统治有一个无限的未来。菲律宾的独立不是太遥远，这是真的，而且泰国已经保持了其独立。但是对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来说(包括有关缅甸可能的自治政府的不确定的讨论)，将来，至少在殖民当局看来，应根据他们持续的外来统治来绘制。即使对最乐观和最具献身精神的东南亚民族主义者来说，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还没有殖民国家突然消失的期望。只有理解了这一总体情况，我们才能开始了解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东南亚及其民众，以及对该地区的殖民当局有如此令人震惊的影响。日本人对东南亚的入侵改变了该地区及其政治，而且 1941—1945 年之间必须被认为是东南亚现代历史最重要的时期。

那么，为什么直到最近关于这段时期的著作仍然相对较少？尽管太平洋和东南亚战争的军事史已经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细读任何书目都会发现，人们对战争年代本身而不是紧接着的战后阶段的事件关注过多。

156　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年份的东南亚的学者看来，这个问题的一个解释是该时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政治困境，所以大多数历史

157　学家倾向于避免过于接近地考察这段痛苦的插曲。以一种 21 世纪初



一个马来亚橡胶种植园内的战争

橡胶使马来亚成了日本的一个主要战略价值目标。橡胶种植园也成了进犯的日本与防卫的英国和盟军之间一些最痛苦战役的地点。在这张照片中，战争的浓烟升起在一个马来亚橡胶种植园上空，当日本人向南攻向新加坡的时候，以一种令英国指挥官震惊的速度推进。照片来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负面第 11485。

很难理解的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击德国和日本的国家的民众几乎没有保留地认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未引发类似于对朝鲜战争中的政策表示怀疑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越南战争引发大规模异议的事情。理解这些有助于明白，为什么历史学家会发现很难去面对复杂的而且有时候是不舒服的战争年代，也很难去接受一

些东南亚人对日本入侵者的欢迎;也很难接受日据时期为该地区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推动力这个事实。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的消失,刚刚指出的那些问题也减轻了。不过,其他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了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任何地方的详细历史,需要查询的资料的数量、其提出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其需要的语言能力都是可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要的日本研究还没有翻译,因此那些没有能力阅读日文的学者难以掌握那些资料。如此,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尽管存在少数对战争年代的杰出研究,但更多的还是研究空白或者只是肤浅的研究。本章必然也是肤浅的,但是它将在有限的空间内分配适当的重要性给1941—1945年间东南亚受到的影响。

日本的胜利

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南亚标志着一个不可逆转的节点。欧洲的政治家如温斯顿·丘吉尔和查尔斯·戴高乐也许不认为,战争年代的事件意味着欧洲殖民主导地位的旧模式不可能再一次重新建立。日本的入侵不仅仅是一个或者一系列重大的军事事件,它是一个重磅政治炸弹,击碎了过去一些最重要的假设。日本人进军到东南亚明显地强调了该地区民族主义者多年来一直提倡的一个观点:亚洲人能够击败殖民国家和他们在东南亚的代表。不仅击败他们,而且在他们被击败之后,人们能够将白皮肤的外来人从他们在社会中的特权位置上推翻,让他们变得比苦力好不了多少。这些苦力在和平年代为了维持殖民社会的结构而辛苦劳作。也许不可能去太多地强调东南亚社会内部关系激进转型的重要性。即使对没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那些人来说,欧洲人优越的神话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摧毁这个事实也是最重要的。东南亚世界不可能再与以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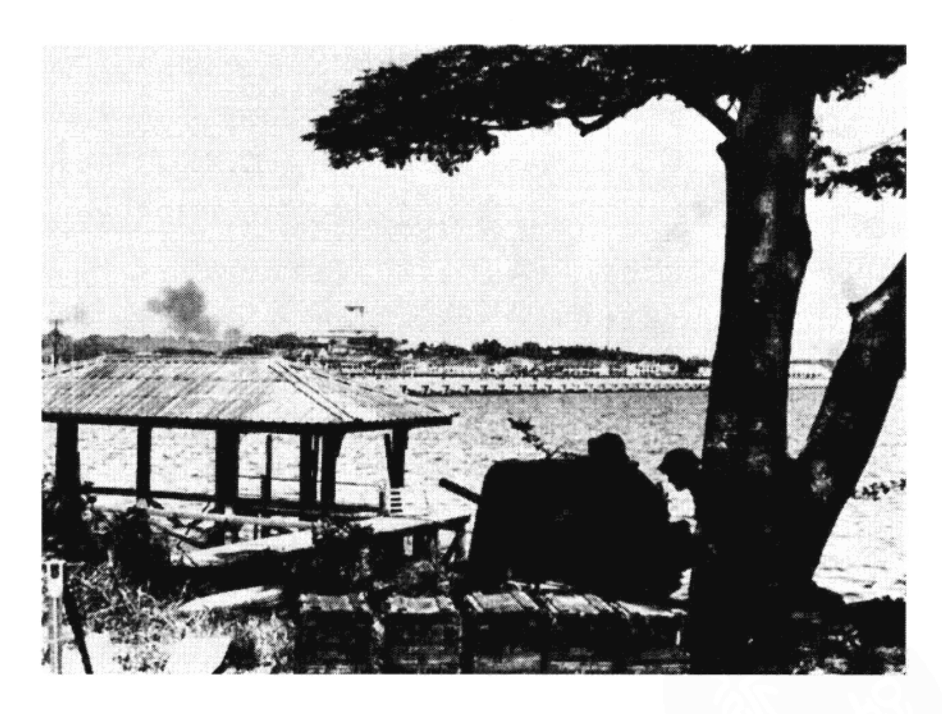
158

即使对日本侵略主要事件的最简要讲述也强调了殖民国家遭受到的一个接一个屈辱的程度。日本人进入法属印度支那之后,在法国当局与日本军队之间达成了一种谅解,这在东南亚地区是独一无二的。法国被允许保留对政府机构的控制,以换取其允许日本人使用法属印

度支那的领土作为中转、培训和提供供给的地区。这从来不是亲维希的法国总督德古上将所声称的“胜利”。相反，它给民族主义力量提供了保证，尤其是在越南。独立的希望寄托在比几年前曾经希望的更坚实的基础上。尽管法国的旗帜继续飘扬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政治上觉醒的成员很清楚地知道法国当局只是按照日本人的意愿来行使职责。

1942 年日本征服马来亚和新加坡是一个更大的屈辱。多年来对规划的忽视以及英国行政长官令人惊愕地拒绝直面日本军事力量的现实，导致了最惊人的溃败。20 世纪 30 年代曾经有人满怀信心地宣称，日本人不可能成为合格的飞行员，因为传说他们全部国民都是弱视。但是日本飞行员不仅给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以很大的打击，他们

159



澳大利亚军队正在防卫北方对新加坡的逼近

到日本人向马来亚南端——柔佛进发的时候，新加坡的命运就无可挽回了。英国的防务计划假定对新加坡的攻击将来自南边的公海。相反，日本人从北部推进，穿越柔佛海峡，撇开了联结柔佛和新加坡的中央大道，这里看到的是澳大利亚部队正在对迅速推进的敌人做最后的防卫。照片来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负面第 12449。

还在英属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战争中击沉了“威尔斯王子号”和“驱逐号”——两艘英国的主力舰。如果这些没有发生的话，这些战舰也许有助于没有受到良好训练以及领导无方的英国和英联邦军队对抗擅长丛林作战的日本兵。人们曾认为，日本人不可能征服马来亚半岛，因为英国军队能够控制主要的公路，而从丛林中穿过是不可能的。事件发生了 60 多年之后，人们仍然能够看到少得可怜的碉堡被安置在马来半岛东海岸的南北公路旁边，期望能够阻挡日本军队穿过丛林实行推进。但是，入侵者用技能和效率实现了这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一直到他们拥有了拥挤不堪的新加坡岛屿，人群中充满了难民，来自马来亚的主要供水被切断，一切任其摆布。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陷落。

160



发生在新加坡的死亡和破坏

在 1942 年 2 月日本人夺取新加坡之前，大部分的华人平民遭到轰炸，并造成了大量伤亡。在这幅照片中，两名华人妇女对轰炸造成的死亡和破坏作出了本能的反应。日本人进入新加坡之后，对当地的华人进行了野蛮的惩罚，他们相信华人是敌视他们的。照片来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负面第 11529/22。

英国在马来亚和新加坡战败之后，轮到荷兰去面对在印度尼西亚的战败了。1942 年 2 月底的爪哇海战役确保了在爪哇的荷兰及其盟

军的投降，到了 3 月底几乎印度尼西亚所有地方的荷兰军队都投降了。因此，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本在军事上控制了法属印度支那国家，英国在马来亚、新加坡和婆罗洲的殖民地，以及几乎所有的荷兰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并且正在占领葡属帝汶。泰国以保持独立为条件允许日本人在其领土内调遣军队。不过，与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不同，泰国政府不是根据日本人的喜好来掌权的，尽管他们多少需要考虑一下日本人的利益。在 1942 年 3 月末，只有缅甸和菲律宾还没有受到日本的全面军事控制。

最后，这两个国家没过多久也结束了对日本进攻的抵抗。美国和菲律宾军队的激烈抵抗将日本在菲律宾的胜利一直拖延到 1942 年 5 月的上半月。而在缅甸，英国、印度和中国军队且战且退，而不是稳住阵地迎击正在推进的日本军队，战斗在 7 月份结束。在不到六个月的战斗中，东南亚更多的地方落入日本人手中，这些事件发生的速度是殖民地国家从来没有预料到的，而且也使日本人自己感到震惊，他们曾经预计可能遭遇到更有效的抵制。随着旧的殖民主子离开以及他们的威信受损无法修复，东南亚的民众发现现在他们有了新殖民主人——亚洲人，后者以另一种方式占据了与他们刚刚打败的那些殖民者一样的位置。撇开独立的泰国以及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盛行的稀奇古怪的状况不说，东南亚其他地方见证了一个外来宗主国离开以给另一个宗主国的到来让路。

在该地区经历了殖民国家战败的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尝试与日本军队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这个国家是缅甸。缅甸独立军（BIA）的成员与推进中的日本军队结伴而行。当日本人在 1942 年 1 月开始入侵缅甸南部的时候，缅甸独立军的成员不到 1 000 人，随着日本人的稳步推进，缅甸独立军的数量也在增加。但是即使在缅甸战争结束的时候，缅甸独立军宣称有接近 3 万名成员，日本人仍没有要分配任何真正的权力给其领导的迹象。在缅甸，如同在其他地方，日本把它自己的利益视为最高，而且很快暴露其早期以“亚洲共荣圈”和“亚洲人的亚洲”为措辞的虚伪宣传。

162

日据时期

日本起到了一种在很多方面都类似于它已经取代了的那些殖民国家的作用。这个事实一定会让我们看到重要区别的存在。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尤其是在日据时期的早期,日本人的所做和所讲受到东南亚人欢迎的程度。日本人对马来亚和新加坡数以千计的华人实施了野蛮的报复,他们不仅把华人视为将来不可信任的对手,还把他们视为与在中国的日军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支持者。但是他们对待马来人却是非常不同,因为在初期,通过认真尊重马来苏丹和他们的朝廷以及通过把马来人安置在他们建立的用来取代英国殖民政权的管理部门中的突出(不是权力)位置,他们努力想获得这一部分马来亚人的支持。

印度尼西亚

在印度尼西亚,推翻荷兰殖民政权后,在殖民监狱中煎熬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被释放,他们中的一些已经在里面关了十年或者更久。这个事件,还有前殖民国家的战败,使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对日本人怀有好感。苏加诺和哈达等一些人通过与日本合作,追求他们使印度尼西亚真正独立的目标。这个决定意味着认为这种行动是准备独立的最有效方式的政治判断,还意味着乐意与打败荷兰的那些人合作。因此当战争结束的时候,这个决定将困扰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与荷兰政府的关系。荷兰人没有意识到,印度尼西亚人不可能同情荷兰人的战败,反而强烈主张将哈达和苏加诺这些人视为被人痛恨的日本敌人的“合作者”。

当这种战后冲突发生的时候,不可能有共同的看法。之所以如此,

163

部分是因为除了极少的例外,战败的荷兰人只是没有理解印度尼西亚人和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复杂的以及在很多方面很微妙的关系。日本人被许多印度尼西亚人称为解放者,不久便被视为另一个外来统治者——只是这一次是一个亚洲国家。尽管日本人很

快表明他们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印度尼西亚人在日本占领期间可以比在荷兰统治时期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组织。这是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民族主义领导人能够组织、建立指挥系统，而且在一些日本指挥官的同情默许之下，他们可以通过支持独立的广播来推动民族主义的目标。

日本的军人努力为他们国家发动的战争培养支持力量。但是对于参与了军事训练、伊斯兰组织或者青年组织的印度尼西亚人来说，被外国控制的事实不仅展示他们对印度尼西亚的认同来得重要，被荷兰禁止使用的印度尼西亚国旗能够飘扬，还可以唱独立歌曲。这些虽是象征性的变化，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也显现出同样的重要性。超越地方、宗教和阶级利益的印度尼西亚国家认同感的增强是发展一个行政管理框架，以及（秘密或公开地）建立一个军事组织等实际事务的伴随产物。

日本的占领为印度尼西亚人提供了另外一个重要的象征性指导，尤其是对年轻人。在印度尼西亚的很多地方，尤其是爪哇，传统的印度尼西亚文化价值非常强调顺从，并且认为理想的行为是感情不外露、缺少攻击性的。现在，获胜的日本人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可以仿效的模式：钦佩使用武力以及接受暴力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取的。没有什么比日本军事传统中体现的理想与传统爪哇生活有板有眼的平静理想之间的距离更远的了。不过，由于这种反差，年轻的印度尼西亚人开始质疑他们老一辈的价值观：如果在过去对荷兰的殖民统治积极地反应，而不是默许并接受其存在，那么结果是不是会更好？那些质疑老一代价值观的年轻印度尼西亚人并非全盘接受日本人与前者相反的价值观。不过，他们确实理解日本人行为中与他们自己的立场有关系的一些方面。而且因为理解这些，他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一代人，尤其是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默许荷兰统治的那些老一代的人和在日本占领下准备无条件与新统治者合作的那些人区分开来。印度尼西亚年轻一代的这些新态度将促使他们奋力反击战争结束后重新强加给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 164

马来亚和新加坡

乐意与日本人合作是东南亚其他地方战争年代的一个特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与日本合作的那些人的目标在每个国家或者在一个国家内的每一个群体中都是一样的。战争年代的复杂性在马来亚和新加坡体现得非常明显。在这些英国的领土内，华人被认为是敌人，并且被野蛮地对待，尤其是在日本人刚刚占领的时候，当时有数以万计的华人被处死。对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政策稍微缓和些，至少在最初，日本占领军对传统的马来领导人表示了一些尊重，并且在一些地区为年轻的马来人设立了特别教育项目。日本人也成功地征召了印度少数族群的成员加入"印度国民军"——为了把印度从殖民控制中解放出来而创立的军队。不过，尽管马来亚和新加坡人口中的一部人遭受的伤害确实比另外一些人要少，但是战争年代的标志是食物短缺以及遭到深深怨恨的日本人对劳工的需求。

缅甸和菲律宾

缅甸和菲律宾的战时历史尤其复杂，我们在这里仅仅提供大概的轮廓。与在东南亚其他地方所采取的政策相比，日本人鼓励这两个国家当地的政治家成为行政管理机构的一部分，至少在理论上，他们在其中有重要的作用。当日本人在 1942 年中期获得了对缅甸的控制时，他们发现军事敌对的终结并没有带来一个新的管理当局。英国控制时期没能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发挥作用的成千上万的缅甸年轻人现在要求这么做，并且采取行动来配合他们的诉求。凭借对民族主义思想的坚持，他们设法寻求控制国家的一些地方。早期，这些建立缅甸人管理机构杂乱无章的尝试的结果是非常不平衡的。在一些地区，当缅甸人驱赶印度定居者以及缅甸总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少数族群的时候，民族主义热情演变成冲突，然后是流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建立了一个文职的缅甸人行政管理机构，由一个著名的老民族主义者巴莫来领导。日本人希望通过他来争取以前与英国合作的缅甸公务

165

员的支持。

短期来看,这种安排似乎满足了双方不同的利益要求。日本人把巴莫领导的政府视为对之前战争时期许下的合作承诺的一种兑现。而从缅甸人的观点来看,一旦战争结束,日本人作为一个胜利者出现,这种安排就会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缅甸政府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些缅甸人假定日本人会有一定程度的克制,他们相信日本人将对缅甸人的利益给予应有的重视。在这方面,他们是错误的,而且从1942年后期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和缅甸之间的关系是不断增长的不信任和日益尖锐的利益分歧,以至于没有共同的东西把两个群体聚合在一起。

就缅甸与日本的关系而言,缅甸所发生的事情本质上与东南亚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一样。日本人的利益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尽管他们津津乐道于对缅甸独立的讨论——这实际上是1943年宣称的——权力仍然紧紧地掌握在入侵者的军队手里。而且在缅甸,日本人声称十分尊重佛教,并且准备充分重视缅甸在世俗事务上的利益,但是战争的需求不久导致他们开始嘲弄缅甸对宗教的虔诚和对政治的关注。日本人对佛教的兴趣很快就暴露出其真实动机,是企图利用佛教作为推动战争的工具。给予缅甸的所谓"独立"没有阻止日本当局苛刻要求缅甸人提供粮食和其他资源,而且更令人不安的,是为他们的战略铁路和公路建设项目提供苦力劳工。这种状况对国内的影响是明显的:怨恨日本人的缅甸人越来越多,一组缅甸人形成了一个秘密组织,一旦战争的局势开始对日本不利,他们就准备反抗日本人。年轻军官昂山是其中的著名成员。如果英国寻求恢复战前的状况,这个小组还准备努力去获得独立。 166

在太平洋战争和东南亚战争结果未定的情况下,另一个曾被给予"独立"的国家是菲律宾。由于长期被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经历了一个非常不同于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历史发展阶段,同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菲律宾的历史再一次例外。当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在1942年被日本人击败的时候,很多战前联邦时期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决定与正在实

施征服的日本人合作。因为在战争开始之前,菲律宾已经向独立迈了很大一步,集结到日本人那里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比缅甸更发达更有效的机构。事实证明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如同菲律宾历史的研究者多次指出的那样,凝聚在日本人周围的精英,不论是出于某种的"爱国主义"的眼光,还是因为露骨的自我利益,都没有与一般民众同仇敌忾。1943 年菲律宾宣布"独立"没有改变这种状况。与日本人合作的菲律宾政治家从来没有成功地摆脱傀儡的形象。同时,日本人残忍对待平民的事例以及征服者沉重的经济要求,只是增强了菲律宾普通民众的一种普遍的感觉:他们的利益更多地仰仗战前的美国统治者,而不是所谓的亚洲同胞"解放者"。简而言之,菲律宾的战时经历表明,菲律宾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人的利益是所有重要决定的指导原则,而且把日本人和被占领土地上的人群团结在一起的相互利益只不过是摆样子的宣传。

167

不过,在菲律宾人中存在着对日本人的深深怨恨以及选择与日本人合作的那些人的傀儡特质,菲律宾不仅有在战争中一直抗击日本人的重要的游击队抵抗运动,还有一大群与入侵者合作,而且一旦敌对结束就能够继续其职业的政治家和管理者。菲律宾是东南亚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菲律宾精英与日本人的合作或者勾结已经到了相当规模,以至于在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之后,人们忘记了哪个政治家在战争期间站在哪一边。同时,战争造成的深层次的分裂将会给菲律宾造成多年的麻烦。

法属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给了那些在各种殖民国家战败之后被日本人占领的东南亚国家。不过,在被法国殖民的国家(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中,法国殖民当局一直运作到日本人夺得权力的1945 年初期。战争期间继续在印度支那服务的那些法国人提出的观点有些道理:当时他们声称其行动保护了法国的殖民地位。在柬埔寨和老挝,至少短期来看,法国继续管理这些领土以及继续支持传统的统

168

治者的事实减少了民族主义感情的发展。但是该观点的说服力是有限的,因为在战争之前,民族主义还没有成为柬埔寨或者老挝的一个显著特点,只是随着战后世界迅速变化的政治平衡,它才发展起来。更能体现日本人"成功"的事件是发生在越南的——法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帝国中最重要的部分——一系列发展。

这个观点在前一章已经提出:20世纪30年代末期,越南民族主义者对法国的抵制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被越南共产主义者主导。当战争来到东南亚后,法国殖民当局与日本人达成了可疑交易的时候,越南共产主义者肯定没有能力去成功地夺取政权。他们的数量仍然很少,而且法国安全机构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去遏制并努力消除这支政治力量。他们正确地判断出,这支政治力量将成为法国继续统治的真正威胁。不过,随着战争的进展,机会的天平,尽管仍然不是权力的天平,慢慢地开始向有利于越南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者的一边倾斜。由于政治气氛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变化到来了。尽管总督德古和其下属主张法国在印度支那不变的作用,但是存在一种不断增长的意识:法国只是根据日本人的意愿继续管理其殖民领土。法国继续管理其殖民领土,但是最终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不是在他们手里。日本人对资源和人力的需求相对法国的政策有优先权,而且明确了殖民当局的空洞声明:日本的存在是双方协议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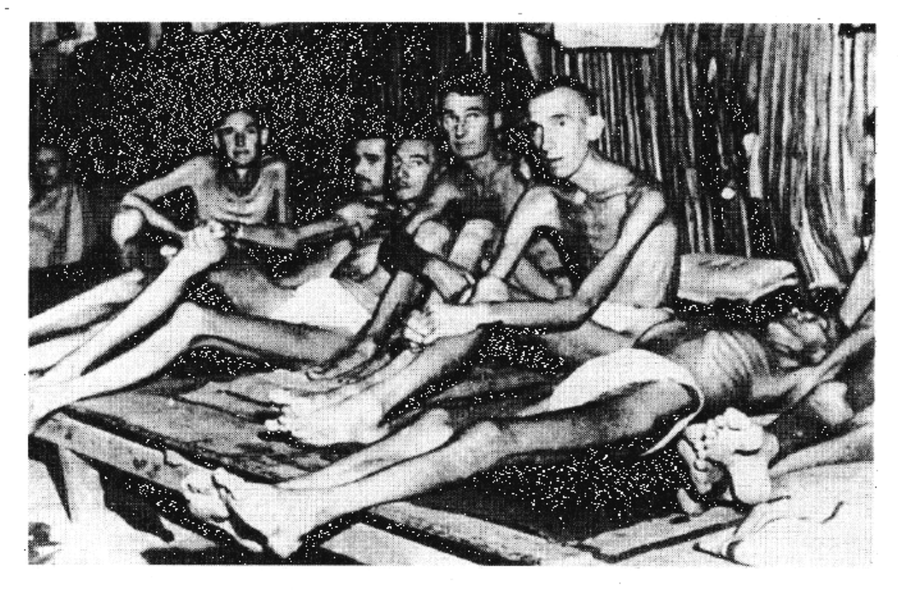
普遍意义上的变化还比较缓慢,但很明显是越南共产党的成就。挫败了中国国民党军队帮助越南内部不同政见团体的企图后,胡志明领导下的共产党在1941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政治阵线组织——越盟(越南独立和兄弟联盟)。这个组织由党的成员主导,但是征召了拥有共同目标——从法国获得独立——而团结在一起的广大越南人。这种缓慢但稳定的政治努力的重要性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不过,越南共产党本身爽快地承认,从军事力量或者从他们任何形式的行政控制领土来看,直到1945年突破性的发展之前,他们的地位都是很弱的。但是当1945年的事件发生的时候,越南共产党很明显是该国最重要的政治团体并且决心——如随后痛苦的流血所展示的那样——与外部和内部

169

的敌人战斗来保持他们的地位。

战争的形势发生转向

对所有东南亚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的事件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对已经经历了没有为政治参与提供任何机会的日本占领的那些国家来说是这样，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日本人 1942 年的胜利意味着建立了一个当地政治家可以发挥作用的新政府。日本人迅速进入东南亚粉碎了白人至高无上的神话，并且向东南亚人开辟了参与接近真正独立的一些事情的前景。此后不久，幻灭就来临了，因为日本人口号的空洞暴露出来，日本人利益的优先变得非常明显。于是，随着战争的命运缓慢但稳步地不利于日本人，东南亚的民众开始逐渐确定日本战败的可能性。除了指出广泛认同的事实——日据时期已经给该地区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变化，讲述这个时期



在樟宜的澳大利亚战俘

在东南亚的战争期间，那些成为日本人战俘的盟军士兵遭受了可怕的剥夺和令人震惊的残忍对待。这张照片展示的战争俘虏是在樟宜的澳大利亚幸存者，在新加坡的樟宜集中营里，营养不良使健康的人成了活骷髅。曾经自豪的殖民主子可以被日本人在征服东南亚期间羞辱。这个事实是使二战时期成为现代东南亚历史转折点的一个重要因素。照片来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负面第 19199。

东南亚各个国家民众面临的前景还必须更加重视差异，而不是他们经历的共同方面。因为如果战争的结束对整个东南亚是一个戏剧性的发展，那么它带来的问题和机会在每个国家都非常不同。

在泰国，当战争的进展有利于日本的时候，泰国与日本结盟而不是半心半意地站在日本人一边，因此日本人即将战败的含义是尤其令人不安的。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泰国的政策考虑了日本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以及站在日本一边带来的机会是重新获得对柬埔寨和老挝地区的控制，接着是控制缅甸——泰国的领土收复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声称有权拥有该地。这种政策阻止了泰国遭受东南亚其他许多地区所遭受的持续战争的物质破坏。随着环境的变化，泰国的领导人也开始转变其立场，明确示意逃离日本阵营，但是它没有用一种可能引发日本人重大反应的形式。尽管如此，当战争结束以及同盟国考虑对一个曾经反对他们的国家政策的时候，泰国所有精明的外交传统都显露出来。外交技巧以及东南亚其他地方更迫切的问题使泰国避免了任何严重的屈辱，而且泰国发现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自己比该地区其他任何地方更少受到影响。对泰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重要的，但他们不会因此对其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关系或者国内政治的本质进行根本性改变。几乎不可能对东南亚其他任何国家作出这样的评估。

170

171

在缅甸和菲律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被用来为相对迅速地从殖民地位转向独立做准备。在缅甸，由于英国和印度军队在1945年发动了一次成功地击败日本军队的战役，该地区的盟军总司令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同意与缅甸民族主义领导人合作，后者致力于使他们国家的完全独立。这个战时的决定后来增强了缅人的信心：与英国举行的战后政治讨论关注的是获得完全独立的技术细节，而不是关于独立是不是应该给予的问题。通向协议的道路并不总是容易的，而且第一任战后英国政府的政策起初似乎扭转了蒙巴顿的做法。不过最后，缅甸以最少的流血，得到了通向独立道路的保证。

对菲律宾的再次征服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当时日本人正在绝望地进行基本上不可能成功的尝试，去争取菲律宾人支持战败的一方，并

且去平息在整个战争期间选择与日本人合作的那些政治家和管理者日益紧张的情绪。再次征服的发生也得到了各种游击队团体的大量帮助,在这些游击队群体中,有一个胡克巴拉哈普(Hukbalahap,简称Huk,即"胡克":他加禄单词的缩写,意思是"抗日人民军")小组,这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在吕宋部分地区成功地打击了日本人。人们通常称呼这个运动的成员为"胡克",这一运动反映了菲律宾部分地区的一种重要的乡村传统,即质疑庇护关系的现存模式并且支持贫穷的乡下农民的利益。他们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出现在日本占领的后半期有长期的政治意义,因为他们综合了良好的反日资历以及一个社会变革的纲领,这个社会变革纲领非常不同于菲律宾政治生活中已经存在的、本质上保守的价值观。

172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有两个问题主导了菲律宾的政治生活。第一个是独立需要取得迅速进展,在这一点上,美国和菲律宾的政治家本质上是一致的。另一个问题是必须面对与近期的敌人大规模合作或者勾结的事实。所有人都有义务去获得独立,因而更容易去应付第二个问题。一些人提出,美国政治家和军事领导人,尤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最为著名,认为通过忽视第二个问题以及仰赖那些曾经同日本人有联系的人在和平年代去推行保守的、亲美国的政策,这样,保守派的利益将得到维护。对麦克阿瑟思想的评估是不是准确,还有待证实,但没有任何理由对下面的观点提出异议:不论菲律宾精英成员选择在战争期间发挥什么作用,他们在政治前景上的本质是保守的,精英数量也相对较少,并且由于微妙的政治和个人同盟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于确信将会被给予独立,精英成员通过期望和平的可能性,从而能够习惯战争令人不快的特点。因此,当胡克巴拉哈普开始公开地反抗政府的时候,精英成员中没有人想到和平的早期岁月将是多么困难。

通向独立的第一步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菲律宾和缅甸仍然令人惊讶地向独立进行着平稳过渡。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各种事件正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发

173

生。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所面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不可能跟缅甸和菲律宾所面对的一样。因为荷兰作为印度尼西亚的前统治者,法国作为印度支那的前统治者,两者都决心重申其宗主权。每一个国家的结果都是痛苦的革命和独立战争,一个持续了 3 年,另一个 9 年——一些人可能说 30 年。

在 1945 年 8 月最终向盟国投降之前,导致日本最终战败的发展过程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来说已经非常明显了。尽管强加给日本占领军各种压力,包括使用武力的一些尝试,但直到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导人才劝说占领者,由于荷兰有机会返回,在战争结束之前应该讨论并且宣布独立。最后的时刻终于在 1945 年 8 月 17 日到来,苏加诺(哈达在他旁边)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并且向他的同胞发布通知,准备去反击任何重新恢复荷兰殖民统治的企图。在他们的声明中,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宣布在“潘查希拉”五项原则内遵守一个世俗国家的概念:信仰真主、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社会正义和民主。

新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很快证明它作好了战斗准备,并且以惊人的效率反击任何企图回到战前殖民状况的尝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第一次为了实现战后独立的武装对抗是对英国发起的,而不是前殖民国的部队。苏加诺在雅加达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刚刚两个月,为新共和国而战的部队就试图阻止英国军队。英国作为盟军在东南亚地区的代表,进入主要的港口城市泗水。随后争夺泗水的战斗对双方来说都是长期的,代价高昂。它促使英国军队指挥官采取了一个非常谨慎的方法去进一步加强与印度尼西亚人的联系。这个指挥官被命令要维持控制一直到荷兰能够返回。但是最重要的是,泗水战役是一个信号,印度尼西亚人已经准备并且能够(即使将付出沉重的代价)为完全独立的目标而战斗。在战争事件的衬托下,任何事都可以接受了。

174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越南的状况可能比东南亚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复杂得多。在 1945 年 3 月,战争结束之前的 6 个月,整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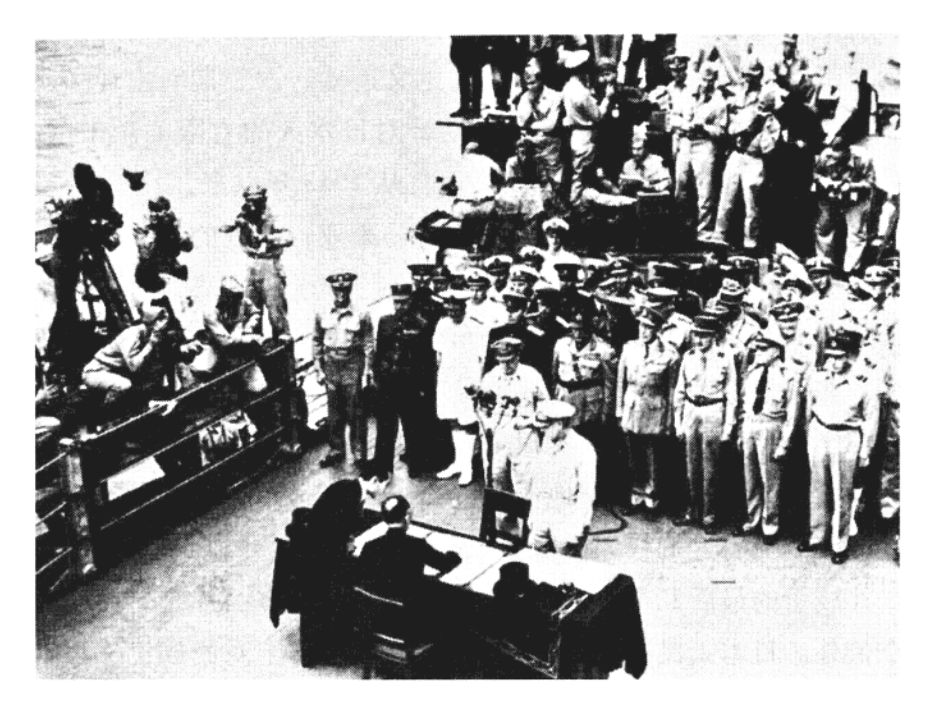
印度支那的日本军队推翻了战争早期阶段继续运作的法国当局，并且囚禁了法国政府和军事官员。日本人这么做是为了尝试去保持对经济和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印度支那地区的最大化控制，因为战败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日本人夺取权力之后不久，越南在一个无能的皇帝保大的领导下宣布“独立”。越南的“独立”实际上只是掩饰日本人统治事实的一个工具。而且几乎所有具有政治意识的越南人都认可这个事实。但是随着法国殖民者的离去，对共产党领导的越盟军队来说，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加速他们获取权力的尝试都变为可能。日本人仍然在军事上控制了主要的城市和乡镇。不过，在城市和乡村，越盟积极工作，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政治结构。一旦战争以日本的战败而结束，这种政治结构将能抵制法国的返回。

当他们为未来的政治权力奋斗的时候，越盟不是唯一思考战后发展机会的越南人。不过，似乎不可否认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用计谋争夺权力的各种越南政治团体中最有能力和最有效的一个。到20世纪30年代末，他们已经在民族主义政治中获得了突出地位，而且随着战争即将结束，他们无意失去他们的地位。当日本投降的时候，越盟准备宣布领导反对法国返回的运动。随后的一系列事件现在被称为八月革命。越盟领导人胡志明在1945年9月2日宣布建立一个独立的越南国家。在9月初的短暂时间内，越盟似乎成功了，尽管有来自越南南部政治和宗教团体的反对，而且越盟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分布得极其稀薄。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下述可能性似乎是存在的：胡志明的军队将成功地建立一个行政管理框架，使法国打消再次征服的考虑。可能性也许在那里，但是就如战争之后的几个月所展示的，法国的越南政策只会导致冲突，并最终引发战争。

175

组成印度支那的其他国家（柬埔寨和老挝）的事件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越南的最后阶段那么动人心魄。当柬埔寨的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宣布他的国家暂时独立，而且当数量有限但不容忽视的一些老挝人展示了他们决心抵制法国作为一个殖民国家返回时，重要的发展的确发生了。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传统的领导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把

176



麦克阿瑟接受日本投降

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结束了太平洋战争和其对东南亚国家的占领。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的“密苏里”号上，盟军太平洋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正式接受了日本的投降。日本的投降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控制了东南亚的殖民国家的胜利，但是那些国家在1942年遭受的战败确保了殖民时代不可能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重新恢复。照片来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负面第19128。

他们的命运与战争前的法国当局联系在一起，传统领导人的力量难以改变，这段短暂的没有殖民管理的经历还不能够为它们发展出越南的那种冲突做好准备。这段时期涌现的名人在柬埔寨和老挝的战后历史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不过目前，战争事件似乎没有传统统治阶级与法国殖民当局恢复以前的密切关系模式那么重要。

战争临近尾声时，马来亚历史也较为平淡。日本对马来亚的占领在某些程度上不同于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占领，他们没有尝试去推动任何形式的“独立”。马来亚和新加坡的作用是为日本的战事提供资源。但是，在一个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组成的社会里，不同的种族群体几乎没有共享的利益，日本人认为通过促进独立运动去努力推动

他们的目标没有意义。而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不同，马来亚没有重要的民族主义运动。占领期间出现了一个团体，它以“马来亚人民”的名义发动针对日本人的有限的游击战争。这是一支华人共产党的游击部队。而且从 1943 年以来，由于一小支英国军事小组(Force 136)的渗透，他们对马来亚日本人的武装抵抗与盟军的战事联系在一起。这些华人游击队战士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后来发动了针对马来亚战后政府的暴动的历史中，而不是他们对日本人的抗击。在其他方面，马来亚的战争经历对马来人来说相对轻松；对华人则是相当残酷且受尽剥夺；对印度人少数族群，尤其是那个社区不那么富有的成员，则是一个改善地位的机会，因为日本人把他们提升到了以前他们没有拥有过的权力位置。

177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马来亚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是殖民统治的一个例外。日本人没有推动一次独立运动，地方上对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兴趣。从日本手中重新获得马来亚没有战争发生，因为在英国人有计划的入侵发生之前，战争结束了。尽管这样那样的因素使马来亚的经历非常不同于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但是战争年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如一个马来亚观察家所说，在日本占领期间，世界已经颠倒，而且一旦战争结束，即使没有对英国人返回的抵制，也再不可能回到英国殖民主义的战前模式。重要的是，这种返回没有受到挂满国旗的建筑或者欢呼的人群那样的欢迎。

在东南亚其他地方，随着战争的结束，各种变化到来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管理之后，新加坡恢复成英国直辖殖民地，与把马六甲和槟城联系在一起的战前海峡殖民地区分开来。很清楚的是，这些领土今后将作为马来亚的一部分进行管理。在婆罗洲，沙捞越和沙巴一直存在着不寻常的安排。此前，前者由布鲁克家族统治，后者则由一个特许公司管理。现在，这种安排结束了，两者都成了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同时，英国重新建立了对文莱苏丹国的保护。在东帝汶，葡萄牙在 1946 年 4 月半心半意地恢复了他们的殖民统治，而且如以前一样，葡萄牙把这个遥远的殖民地当作一个很好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流放地。

本书先前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18 世纪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历史分水岭开始的时期，这个历史分水岭伸展跨越了整个 19 世纪并且进入到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被认为是这个巨大分水岭的结束。战争中的事件及其带来的东南亚人态度和视野的变化改变了该地区。178 战争暴露了殖民国家对被殖民臣民"忠诚"的很多声明的空洞，而且战争极大地和残酷地显示了白人统治在面对重大军事挑战时的弱点。不论选择什么词汇去描述战争带来的变化，必须掌握的重要一点是这些变化是根本性的。在政治上，战争年代确保了不可能再回到 1939 年那样看起来似乎永久不变的生活方式。不过，对东南亚许多地方来说，独立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前景，只有在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价之后才能最终获得。对于获得独立的最后一片领土——东帝汶，一直到 1999 年印度尼西亚撤出之后，这个宝贵的目标才得以实现。

第十章 革命和暴乱：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亚和菲律宾

179

在前一章开头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复杂性上。当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东南亚现代历史下一个重要阶段的时候，强调复杂性同样是合适的。东南亚现代历史的这个重要阶段，就是紧接着 1945 年 8 月战争结束的到来。在战后第一个十年，东南亚每一个国家的经历不仅本身是复杂的，而且各有特点，因此难以轻易地进行地区性概括。例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经过了痛苦的武装斗争之后才从前殖民国家手中获得独立。但是，每一个国家革命武装斗争的本质以及那些领导者政治的本质都是非常不同的。当人们指出下面这个事实的时候，情况就非常清楚了：与荷兰对抗的印度尼西亚军队曾经在一个阶段镇压了尝试控制独立运动的共产党同胞。50 多年以后，这个事件仍然被印度尼西亚军官清楚地认为是共产党完全不可靠的一个证明。这个重要的事件与越南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越南，从法国手中获取独立的斗争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把一个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年份的经历与另一个国家的经历区别出来的不同点数不胜数。如果对它们进行概括，一定要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考虑到下面的事实：每一个国家都面对着获得独立或者以其自己的方式处理独立的现实问题。即使是从来没

180

有经历殖民主义的泰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都不得不去处理一系列不同于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了解的那些问题。

由于每个国家个体经历的重要性，以下两章将集中在以国家为基础的历史发展方面，只用非常有限的篇幅进行对比讨论。本章的关注点将是分别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两次革命，以及两次——马来亚的共产党在被称为"紧急状态"时期不成功的起义和菲律宾胡克们同样不成功的起义。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革命已经多次吸引外国观察家的关注。不难找到引发这种兴趣的原因。印度尼西亚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最大的，在领土面积和人口两方面皆如此，这个事实促成了对该国独立斗争的广泛兴趣。但是，引发对印度尼西亚1945—1949年革命(当时荷兰最终放弃了再次强加殖民统治的尝试)兴趣和关注的不仅是上述事实。对印度尼西亚发展的外部兴趣一部分来自这样一个景象：一个经济上贫穷、军事上弱小的国家寻求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获得自由，因为尽管荷兰在人口数量上与印度尼西亚相形见绌，但他们能够使用更高级、更强大的武器和设备。另一部分则是由于，许多外部的观察家了解印度尼西亚人在反击荷兰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所追求的目标与盟军抗击德国和日本的目标一样——一个国家反对外来干涉，维护自身存在的权利。尽管对印度尼西亚事件的国际兴趣无法跟后来对越南战争的世界兴趣相比，但对许多人——不仅仅是对东南亚有兴趣的学者——来说，印度尼西亚革命以及反抗荷兰的战争激发了一种兴趣参与感，并一直持续到今天。 181

荷兰军队和管理人员在1945年后期开始返回印度尼西亚，到了1946年1月，他们已经控制了巴达维亚(雅加达)。他们发现民族主义者坚定地致力于获得独立，即使各种要求独立的团体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道路来获取独立上存在重大的观点差异。最重要的是，那些人之间存在分歧。其中许多人是曾经抗击英国军队在主要城市施行控制的

更年轻的一代,他们想立即全力争取独立。另外一些人则准备通过谈判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谈判的选择,起初对大多数民族主义领导人很有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避免流血的可能性。而且,返回后的荷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们接受印度尼西亚人对独立的诉求,只要足够重视荷兰的剩余利益就可以了。不过在 1946 年底之前,双方所持观点的分歧很快变得非常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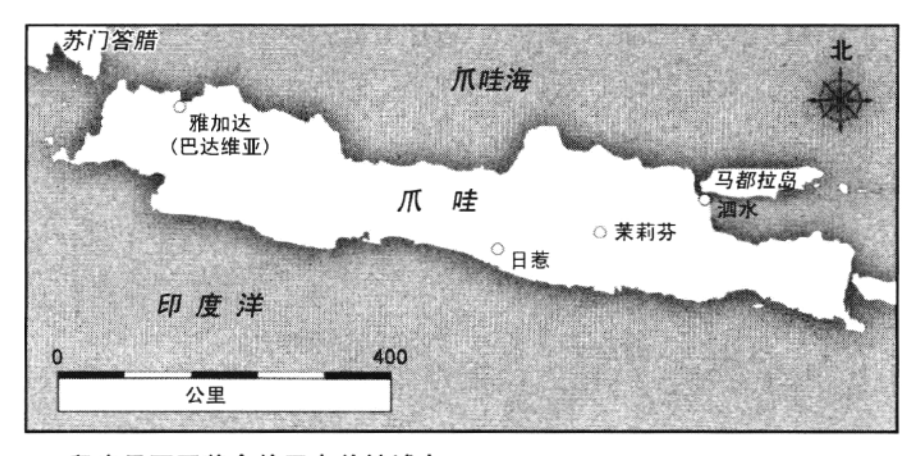
从印度尼西亚人的观点来看,谈判要关注的是独立的实施。这跟荷兰的立场形成直接的对比,荷兰的观点是谈判将要进行,因此也许应该作出安排允许印度尼西亚在以后不明确的时间获得全面独立。由于已经在 1945 年 8 月宣布独立,印度尼西亚人没有耐心用现实去匹配老生常谈的理想,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遭受了常年的囚禁和流亡。相反,荷兰不能摆脱殖民时期的态度。尽管他们政府所作出的承诺含糊,且对日本的敌对行动仍在进行之中,荷兰谈判者不能相信他们的前殖民地臣民为完全独立做好了准备,或者确实想要获得独立。他们在这方面的评估不仅受到其不乐意去面对荷兰的统治在印度尼西亚不再受到欢迎这个事实的影响,而且,对苏加诺这样的人所发挥的作用(为了实现他们民族主义的目标,苏加诺在战争年代乐意与日本合作)的怨恨也阻止了许多荷兰人以下面这种方式去观察战后的状况:考虑到现实,而不是沉浸于荷兰人对白人责任不切实实际的幻想和对印度尼西亚沉默大众所持希望的假设之中。

182

印度尼西亚人和荷兰人相互对立的观点意味着,谈判将不可避免地破裂。当无法在正在谈论事情的要领上达成共识的时候,这还不足够让双方着手去谈判。在争取独立斗争的过程中,印度尼西亚和荷兰达成的两个主要的协议——1946 年 11 月的《林牙椰蒂协定》和 1948 年 1 月的《伦维尔协定》(以举行谈判的舰艇的名字命名)——破裂了,这是由于荷兰根本上不打算让将来出现一个真正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尼西亚从来不清楚,荷兰是否乐意去接受民族主义者为平等的伙伴,让他们与前殖民国家一起成为计划中的“印度尼西亚合众国”的共同发起人。而且,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越来越确信,荷

兰支持一个由各种半自治的单位组成的联邦印度尼西亚国家只是维护他们地位的另一个尝试。为了追求这个政策，荷兰正在利用下述毋庸置疑的事实：在印度尼西亚其他地方的居民中过去存在且现在仍然存在对爪哇人优势的猜疑，有时甚至是深深的怨恨——比如在苏门答腊岛、巴厘岛、苏拉威西岛和其他东部外岛。不过，不管荷兰人多么强调这种猜疑的存在，并且当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从保守派那里也得找到一些回应。但是变得越来越明显的是，他们实施联邦方案的尝试，实际上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努力维持荷兰控制或者至少是荷兰的存在。

因此，荷兰的计划不仅遭受了来自印度尼西亚全境积极的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而且荷兰的政策对各个地区的民众来说最终也是不令人信服的。具备雏形的联邦国家在各个地区建立。许多因素有助于改变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对传播和牢固树立印度尼西亚人意识以及有各自特定文化的特定地区的居民意识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改变 183



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四个关键城市

雅加达(巴达维亚)：1945 年 8 月 17 日，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在这个城市宣布他们的国家独立。

泗水：1945 年 11 月，羽翼未丰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军队在这个城市进行了它的第一次重大战役。

茉莉芬：1948 年 9 月，以这个中爪哇城市为基地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员尝试夺取革命的领导权。未遂政变被印度尼西亚军队粉碎，印度尼西亚军队从来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这个事件。

日惹：当革命者反抗荷兰的时候，这个中爪哇的古代皇家城市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首都。1948 年 12 月，荷兰夺取日惹，但是这个行动只是增强了革命者继续战斗的决心。

和形成观点上同样重要的是，荷兰 1947 年中和 1948 年末实施的所谓“警察行动”。

随着谈判陷入僵局以及双方得出结论，他们的对手是恶意行事，荷兰在 1947 年 7 月发起了“警察行动”。从军事角度看，因为它是一个军事而不是警察运动，荷兰获得了一些成功。他们获得了对爪哇和苏门答腊重要地区的控制，而且这么做使他们能够切断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军队的食品供给。但是这种“成功”的代价是很高的，事实上要比荷兰设想的高得多。这只是东南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历史事例中的一个，而且实际上也同样是其他被殖民地区的例子之一，也是外来殖民国家没能超越当时的军事考虑看到更广泛的政治含义的例子之一。尽管荷兰的第一次警察行动获得了领土和供应，并在某些程度上控制了人口，但是它还成为聚集进一步支持民族主义事业的一个主要因素。民族主义领导人曾经指出荷兰事实上不准备给予印度尼西亚真正的独立，对于曾经怀疑民族主义领导人观点的那些人来说，荷兰军队的武装推进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明。简要地说，尽管荷兰在 1947 年 7—8 月之间夯实了统治的基础，但是他们也提高了对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程度。前殖民国家做得比这还要多，因为决定使用军事力量激起了国际社区主流力量的反对。从 1947 年末以来，国际上对印度尼西亚正在发展的冲突变得越来越关注，一直到最后，可以这么说，国际压力在使荷兰放弃对印度尼西亚独立的阻碍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84

通过新成立的联合国表达的国际观点结束了第一次“警察行动”，使双方回到谈判桌上。谈判再一次没有结果，从 1947 年底拖到 1948 年底。如以前一样，荷兰在第二次“警察行动”中选择了一个意图实施军事行动的方案。第二次“警察行动”从 1948 年 12 月中持续到 1949 年 1 月初，其间的事件模式与 1947 年的发展类似。荷兰人进行了军事推进，但是这么做增强了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地位，而且破坏了他们从西方同盟接受的支持。到了第二次“警察行动”的末期，在外岛的领导者中已经没有任何对荷兰有意义的支持了。结果仍然是进一步的谈判尝试。谈判最终促成了荷兰同意在 1949 年底移交主权。不

过，在此之前，必须考虑印度尼西亚革命期间内部政治的发展。

革命被记住通常是因为它们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其从头到尾复杂的历史发展。学者们也许被法国大革命历史中的政治细节所吸引，但是在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一个非专家之所以知道革命很重要，不是因为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之间的派系斗争，而是因为 1789 年之后在法国发生的根本性的政治变化。对于关注印度尼西亚革命的非专家来说，其关键点肯定是 1949 年获得的独立。但是学者们有理由去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派系之争，因为这些争议是关于革命完成时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印度尼西亚政治在革命期间也有一些情况与一直到今天仍然主导印度尼西亚政治家的问题相关联。在这方面有两个情况值得关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作用（按印度尼西亚语的名字通常被称为 PKI），以及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团体寻求建立一个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国家的尝试——这将被称为伊斯兰教国运动（来自阿拉伯语“上帝的居留地”的意思）。

185

我们已经指出，与越南的情况不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不是反对再次建立殖民统治的领导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只是许多政治政党和团体之一。这些政治政党和团体一起站在民族主义者一边，由于共同反对荷兰而团结在一起，与此同时，他们也寻求促进他们自己的政治纲领。这种对他们自己政治利益而不是民族主义者反荷兰运动的整体利益的关注，导致了共产党内一些成员尝试接管革命运动。未遂的政变以痛苦的失败而告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也就是 1948 年 9 月，茉莉芬中爪哇基地的共产党在经历了短暂的成功后，便几乎完全销声匿迹了。由上校纳苏蒂安领导的印度尼西亚革命军中最好的部队被派遣到茉莉芬。他们在那个镇战败共产党之后乘胜追击，采取后续行动，无情地扫荡了那些短暂地站在共产党一边并与之并肩作战的残余分子。

50 多年之后茉莉芬事件仍然能够搅动印度尼西亚政治。即使在尝试夺取权力之前，曾经有很多人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与其说是致力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事业，不如说是为了赢得他们特定的政治信

186 仰。这曾经是印度尼西亚军队中重要人物的观点,而且目前已经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在茉莉芬打败共产党的部队指挥官纳苏蒂安将继续成为独立后印度尼西亚政治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如同他的许多同行官员一样,他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曾经错误地相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把民族主义放在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和信仰之前。同时,就如许多人在早期分析该事件中所观察到的,印度尼西亚革命政府及其武装力量试图镇压共产党在茉莉芬的挑战这一事实,剥夺了荷兰从中捞取资本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全球性反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为他们在印度尼西亚保留一个位置是值得的。

其他对演变中的印度尼西亚政治领导的明显挑战——在过去没有给予这种挑战足够的重视——来自伊斯兰教国运动的支持者,他们的理想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国,这个概念已经被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所有领导人物坚决地拒绝。伊斯兰教国运动从印度尼西亚信奉伊斯兰教最强烈的那些地区得到了支持,如西爪哇、北苏门答腊和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加里曼丹)的部分地区。在第二次"警察行动"期间,那些致力于伊斯兰教国运动的人们极力尝试通过武装部队去获得对领土的控制。尽管这次尝试没有成功,但伊斯兰教国运动直到1962年仍在继续反对中央政府。如同茉莉芬事件一样,对伊斯兰教国行动的记忆仍然留在印度尼西亚民事或军事政治家脑海中,从那时候开始直到最近,把印度尼西亚转型成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的声音一次又一次被听到。不过,尽管人们普遍接受一个世俗(非宗教的)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所需要的,但是肯定的是,在以爪哇为核心的精英成员中,伊斯兰教毫无疑问在当代政治中发挥了比后革命初期更大的作用。

共产党和伊斯兰教国运动支持者的挑战及其失败都表明,正在反对荷兰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准备使用严格的措施来维持其在国内的地187 位。同样重要的是印度尼西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警察行动"中抵制荷兰军队的方式,欺骗了前殖民统治阶层,后者曾经认为一系列迅速的战役可以消除民族主义者的战斗能力。可以肯定的是,印度尼西亚军队没有办法抵制荷兰现代的武器和装备。但是,他们能够做的和已经做

的是从事不断的游击战来断绝荷兰对人口的控制，以及严重减少食品供应或者剥削印度尼西亚自然资源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印度尼西亚军队的作用对革命政府的持续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并且让军队在社会中拥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位置——社会认为军队是国家的保卫者，并且拥有发挥政治作用的特殊权利。

第二次“警察行动”之后的谈判是在非常不同于那些以前适用的条件下发生的。最重要的是，荷兰正面对来自美国的越来越多的压力，后者要求他们向印度尼西亚人作出妥协。在这些状况之下，印度尼西亚也将不得不作出妥协——接受大量的债务，包括荷兰在印度尼西亚采取军事行动的成本，以及推迟对西新几内亚（后来以伊里安查亚命名，即今天的巴布亚省）地位的决定。经过漫长的讨论，荷兰政府最终在 1949 年 12 月把它所控制的所有地区的主权都移交给了革命政府。在一年之内，荷兰在整个冲突和谈判的三年期间一直支持的半独立于爪哇的地方，也合并到统一的、世俗的印度尼西亚国家中。这一直以来就是大多数民族主义者的目标。

从荷兰获得独立后，民族主义者不得不面对印度尼西亚的许多问题。他们这么做时，成功的兴奋感开始消退，现实和各种问题变得更加明显。“多样性中的统一”这一印度尼西亚国家格言，是一个对现实和希望的令人钦佩的声明。它也反映了印度尼西亚内部丰富的多样性，这总是会对中央控制及其权威带来或大或小的挑战。而且由于革命斗争，地区和其他特殊利益的存在还远远没有消除。

188

1949 年时，这些还被看作是未来的问题，当时更重要的是已经获得独立这个事实。成功是许多因素和几百万人努力的结果，其中有一些重要人物，而更多的是卑微的小人物。在革命末期执政的领导人以他们以前反荷兰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在 1945—1946 年间的作用增强了他们的这种身份。特别是作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的苏加诺目前占据了一个有相当权力和影响力的位置。其他在革命期间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如哈达、纳苏蒂安以及日惹苏丹，也同时确信他们在革命后将拥有重要的地位。革命已经将权威授予其领导人，而且还确保

军队被认为是国家和革命价值观的保卫者。这些都是今后将持续许多年的政治收益。相反地,对共产党和伊斯兰教国运动理想的支持者来说,革命时期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看不到实现自身目标的希望。虽然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印度尼西亚革命中的事件以及当时各种个人和团体所发挥的作用在形成荷兰离开之后 10 年内印度尼西亚政治的本质中,发挥了有明显和直接的作用。

虽然印度尼西亚革命具有这些明显的表现,但学者们仍然继续争论其特点。他们问,1945—1949 年间发展的革命是什么? 不同学者的答案差别相当大。大多人都接受,除了从荷兰获得独立这个事实之外,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也发生了。但是,仍有不同的观点认为,真正革命的程度其实很小,在革命后期出现的既得利益者对实现印度尼西亚社会需要的重大社会变化没有真正的兴趣。在最后的分析中,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可能取决于一个观察家认为应该发生什么,而不是去尝试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很明显,大量印度尼西亚人相信他们对荷兰的 189 斗争已经超出获得独立这个基本事实,而且在革命发生 50 多年之后,对革命重要性的断言仍然普遍存在。

越南

在印度尼西亚,为了完成独立斗争而进行的差不多四年的谈判和战斗经历,使得所有(除了前荷兰东印度最偏远的部分[西新几内亚]之外)地方都到了民族主义者手里。而越南人反抗法国的历史是非常不同的,结果也非常不同。差异不仅在于越南共产党领导了对法国的抗击,在斗争持续的时间和军事冲突的强度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差异。而且,当法国从越南离开并且放弃维持一个殖民国家姿态的时候,越南只有一半的领土处于越南军队的控制之下,这支军队曾经在奠边府战役中令其法国对手吃了一场大败仗。

作为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持续到 1975 年的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序幕,1946—1954 年间越南抗击法国的战争仍然比较鲜为人知。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大量卷入时期的事件已经遮蔽了早期的发展。

但是除非理解越南在1946—1954年间的经历，否则不可能真正理解，在法国不再是敌人的年代里，为什么越南共产党后来战斗了这么长时间才获得其目标。

越南1945年8月的革命和随后宣布独立都不能阻止法国的返回。在越南南部，英国军队准备重新建立殖民当局。在该国北部，中国国民党部队以盟军代表的身份行事，一直到法国准备重申自己的地位。这些越南南部和北部的占领军阻止了共产党领导的越盟去追求其建立一个正常政府的目标。但是在整个国家，尤其是在北部共产党力量最强大的地方，越盟正吃力地增强其政治地位，同时与法国进行一系列长期谈判中的第一个谈判。 190

由于随后长时期的痛苦战斗，人们经常忘记在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与越南是在谈判。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发展中，至少这里有一个相似点：反殖民主义的军队准备与前殖民国家进行谈判。但是印度尼西亚人和越南人的期望与荷兰人和法国人的期望是如此不同，以至于不可能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真正可能性。也许比荷兰与印度尼西亚这个例子更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政府决心重申他们对前殖民领土——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控制。因为越盟决心去确保1945年已经宣布的独立得以维持，而法国仍然确信越南是“我们印度支那”(notre indochine)的一部分，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战争。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以一系列游击战开始，但是其在结束阶段变成了从主力部队作战到地方小规模战斗的所有军事层次上的作战。尤其是从越南人的观点来看，这是一场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战争。击败法国不仅仅是一个通过军事方式来获得的目标，而是通过动员所有能够使用的资源去挫败敌人的目标。越盟致力于破坏法国在越南每一层级上的地位，在法国殖民政府旁边成立了一个平行的政府，这样越盟的税务员不仅在处于越盟控制的那些区域内工作，还秘密地在被认为是法国保护的那些地区征税。不仅如此，越盟把战争视为更广泛政治斗争的一个方面，这促使它的领导人去追求那些第一眼看起来也许没有多大军事价值，但是长期来看却是对整体战略至关重要的目标。越盟尝

试促进识字率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能够读懂领导人对实行特定政策解释的民众有终极益处，因此尽管存在战争，这一计划仍应该继续。

191 我们可以相当容易地描述1946—1954年间越南战争的普遍模式，但是这样的概括会掩盖将在一个全面研究中出现的细节和限制(条件)。抗击法国的越南军队的实力在该国北部地区是最强大的，而且大部分的重大战役都发生在北部地区。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只涉及越南北部居民和法国。越南人在整个越南境内抗击法国，而且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法国人自己的军事地图都表明，越南南部的很多地方在越盟手里。不过，尽管起初越盟在北部的游击战发展成涉及几千人部队的重大战役，但是这不是南方的模式。在南方，来自双方的分散小分队在频繁的游击战和小部队行动中进行战斗，并且各自“控制”了经常存在争议的领土和人口。

法国发动重新对越南进行殖民控制的战争所面对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时机。尽管越盟准备承受长期战争的成本，并且这会给他们带来了更有效地追求政治目标的可能性，但是同样的观点不可能被法国接受。他们在印度支那的领导人，不论是军事领导人还是民事领导人，都认为无休止地延长战争将导致法国国内的幻灭。因此，他们努力想要迅速地结束战争。但是这正好是越盟的战略所不允许的。法国再次确立了他们在河内以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地位。他们使许多(尽管不是所有)的公路和铁路畅通无阻。他们确保越南少数几个大小各异的城市不会受到突然的袭击。尽管如此，法国无法使他们的越南敌人遭受沉重的失败。越南人由武元甲将军领导，与许多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一样，他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被殖民当局囚禁。在1947年初和1950年之间，武元甲的军队发动了一场经典的游击战，这个越盟的军事领导人展示了对其任务要点的明确把握。只有当越盟在数量或者战192 术上占据明显的优势时，才会发动对法国的攻击。越盟精心选择时机和地点小心翼翼地攻击法国，以避免法国迅速增强其军队的后援，或者使用空中力量，这种空中武器是越盟在整个战争持续期间都从来没有拥有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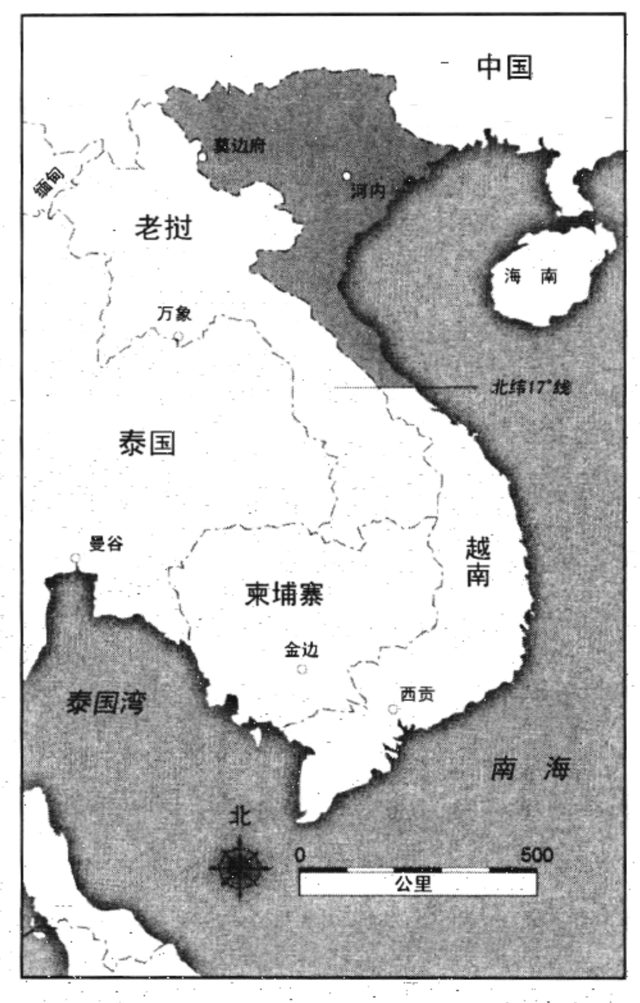
通过实行这样的政策，越盟不仅消耗了法国的宝贵时间，还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军事和政治能力。实际上，这是对武元甲将军军事重要性提升的部分解释。这个人曾经接受过律师培训，还曾经作为中学老师教授历史，但是由于命运无常，他没能成为一个被全世界军事院校研究其战役指挥的将军。相反，武元甲的军事经历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发展的：他能够以极高水平的军事才能应对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战略形势的要求。不过，尽管很有才能，但是武元甲仍然在1950—1951年间遭受了一些重大的挫折，因为当时越盟越来越多地寻求以大部队来攻击法国。这些挫折非常值得强调，因为它提请人们注意越南革命的错综复杂和代价。尽管共产党革命在最后是成功的，但是任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南历史的描述如果没有全面考虑到这一过程中的困难和为了获得结果而承受的高昂代价，都将是不合适的。

当提及对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果具有决定意义的1954年5月结束的奠边府战役的时候，人们应该记住，越盟此役的成功在1954年7月的日内瓦会议的谈判桌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这样，越南北部处于共产党统治之下，越南南部的地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只有当1975年整个越南都处在河内政府的控制之下后，这个问题才最终解决。战役的细节吸引了军事历史学家，尤其是法国所犯的根本性错误：选择在如此偏远的地点——远离法国在河内的总部——与越盟交战，以及由于当地恶劣的条件而无法破解围困。双方都意识到战役结果的重要性，而且在几乎无法忍受的条件下，双方都展示了相当的勇气和忍耐力。当越盟军队最终攻占了法国的位置，他们的成功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的伤亡人数远远超过法国人。这证明了毛泽东强调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193

法国在奠边府的战败宣告了法国努力维持其在越南地位尝试的结束。从1946年开始，这种努力就在军事和政治两个层面次上进行。军事战略失败了，但是法国所推行的政治政策的结果短期还是含混不清的。尽管法国没能成功地在越南南部培育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越盟的竞争对手，但是他们能够保持一个政府的架构。一旦第一次印度支那

战争结束,美国决定在越南南部扶植一个国家来遏制共产主义的全球战略,就可以借鉴这个政府的架构。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着持续的学术上的和政治上的争论。1954年,当战争在越南结束的时候,政治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只能说,如果尝试在越南南部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并且拒绝承认共产党的胜利(而他们相信胜利使他们有权控制整个越南),未来的前景就是进一步的战争。



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时的越南

1954年5月,法国在奠边府的战败注定了其在越南殖民地位的终结。1954年7月的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胡志明领导的越盟获得了对北纬17度线以北越南的控制,美国支持南越在南部建国。

越南革命在第一次反法阶段所付出的代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期东南亚前殖民地发生的所有政治变化中最高的代价。但是，尽管付出了这些代价，尽管越盟在和军事战役一起发动的政治努力，越南共产党起初还没有力量冒险与美国从 1954 年就开始支持的南部反共国家发生正面冲突。越南共产党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们的同盟中国人和俄国人已经在日内瓦会议上清楚地表示越南共产党的利益必须服从主要的共产党大国的利益。而且在 1954 年，这些大国没有准备为了确保越南共产党获得他们认为应该属于他们的最终成功，而冒险引发更大的冲突。

因此，与印度尼西亚相比，战后的第一个十年没有解决越南后殖民地位的问题，也没有使它统一在一个单一政府手里。相反，在越南领土内出现了两个国家，每一个都声称有权控制所有领土。对越南共产党来说，革命只成功了一半。毫无疑问，他们相信自己最终将获得全面胜利。但是，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不论是他们还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越南政治的其他观察家都没能猜到，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越南的最终代价将是多么高。

194

195

菲律宾和马来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期，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有一些暴乱和反叛，但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发生如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那样的独立武装革命斗争。因为其他东南亚国家都没有像荷兰和法国那样不乐意放弃控制的前殖民国家。尽管如此，还是有必要考虑对现有权威的其他两次重大挑战。这两次挑战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菲律宾的胡克巴拉哈普（胡克）起义以及“紧急状态”时期共产党对马来亚政府的挑战。

当对日战争结束时，菲律宾迅速获得了全面独立，并开始面对战争造成的巨大人身伤害和社会混乱。胡克运动的成员期望在战后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团体曾经在吕宋主岛的中部和南部发起了抗击日本人的一系列有限但成功的游击战。没有人否认胡克在

战争中的作用是让人钦佩的。但是就如法国共产党一样,他们在被占领的法国抵制德国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旦和平到来,他们的那些战时盟友却不信任他们。同样,在菲律宾,保守的政治精英警惕地看着胡克。当胡克在 1946 年的选举中成功地获得了菲律宾国会的 7 个席位的时候,这种警惕变得更加明显了。尽管这些选举成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其显示了这样一种前景的存在:一个直言不讳的团体在议会体制下工作,其目标完全违背了菲律宾精英的共同价值观。最重要的是,胡克是"耕者有其田"项目的支持者,这个项目将从根本上改变菲律宾初级生产行业,尤其是制糖业的现存经济结构。害怕变化以及对自己在议会中对付胡克的能力缺乏信心,菲律宾国会的其他政党拒绝让当选的胡克就座。这预示了保守和激进利益之间已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胡克的反抗开始了。

196

在挑战政府的早期阶段,胡克展示了一种持续从农民中获得支持的能力,就如他们在战争期间所做的那样。在曾经是他们战时据点的吕宋的中部和南部地区,胡克变成了一个有效的替代政府。他们享受到的成功使他们的领导人希望运动能够变成全国性的,在整个菲律宾进行激进革命。这个估计没能考虑到吕宋的成功之所以可能的地方因素。菲律宾的这个地区与该国其他大多数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激进团体第一次在 1937 年寻求获得权力的时候,传统社会的结构已经非常弱了。胡克在这个地区获得成功,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替代组织来反对他们。当这种替代以历史悠久和根深蒂固的地主利益的形式存在的时候,胡克发现它不可能获得支持。尽管胡克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样,但是,一个强大的把地主与佃农和农民连接在既定的关系里的社会结构确实存在,这个事实比作为社会体系一部分的不平等要重要得多。

因此,在 1950 年初,胡克达到了他们成功的顶峰,但是他们不能将这个成就迁移到别处。到了这一年的年底,菲律宾政府开始攻击胡克,并且在三年后结束了最严重的暴乱。这个显著变化的原因很容易讲述,即使在各种相关因素的重要性上有辩论的余地。1950 年 10 月,政府在马尼拉发动的一次突袭中成功地抓获了胡克政治局的几乎全部成

员(政治领导人),这一事件非常重要。根据一个告密者提供的信息,政府军队在这次打击中获得了人员名单和各种计划书,胡克再也没能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当时,菲律宾一个出色的领导人拉蒙·麦格赛赛刚开始在国防部长的位置上精力充沛地工作。对菲律宾及其与美国关系的批评者认为,当面对胡克的时候,麦格赛赛能够给他的军队注入大量的能量,这是美国建议和帮助的结果。这种建议和帮助肯定是重要的,但是似乎不应贬低麦格赛赛发挥的作用。日本占领期间,他是一个游击队领导人,并且来自非精英家庭,他的精力和个人的英勇几乎是不容置疑的,他从他的部队里面获得的忠诚似乎同样不容置疑。同样重要的是,他宣布的政策虽然在实施中只有部分是好的,但是它们提供了一些承诺:政府是真正关心乡村贫穷和不平等问题的。 197

麦格赛赛成功地降低了胡克的威胁,使得控制起义分子残余成了警察的责任。这个成功为他1953年当选菲律宾总统提供了重要砝码。当他倡议的很多乡村改进项目仍然在等待付诸实施的时候,他在1957年突然意外死亡。但是,不再有任何怀疑的是,胡克在他死亡之前就战败了。胡克军队的残余分子继续反对政府,直到今天,乡村不安全仍然是一个变化不定的问题。但是来自胡克的对菲律宾统一的威胁已经结束,不过,很多其他的问题仍然要去面对。

发生在马来亚(后来马来西亚联邦的西部马来西亚)1948—1960年间"紧急状态"期间的事件,对该国政府构成了比胡克更长期的威胁,尽管后者获得了地区性的成功。我们已经知道,紧急状态正式持续了12年的时间,所以应该适当考虑这个事实:这个共产党挑战与越盟引发的挑战是不同的,以及本章前面讨论的问题。事实上,菲律宾胡克的失败和马来亚共产党起义的失败已经被用来作为行动的指导。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进行的时候,也许还可能在越南被用作行动的指导。这种错误的观点忽略了几点,这几点对于理解东南亚最近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没能指出胡克起义、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和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反殖民战争每一个都是多么的特别。如果不能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很容易忽视主导了参与各种军事和政治活动的那些 198

人的思想的不同问题。而且人们有可能会陷入这样的思维：起义的发生及其被镇压都可以按照公式来进行。

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的几个特点把其与越南和菲律宾的发展截然区分开来。在后两个国家的例子中，反抗现存政府（无论是在越南的法国政府还是在菲律宾的菲律宾人政府）的人都是每一个国家里面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群，胡克是菲律宾人抗击菲律宾人，越盟是越南人抗击法国人或者法国人支持的越南人。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在"紧急状态"期间，起义者的种族构成大部分是华人。在这个国家，华人本身是少数族群，而且接受马来人的政治优势被所有人认为是毋庸置疑的，除了华人这个政治生活的小团体。

成功阶段的胡克以及抗击法国期间的越南人都可以凭借他们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的作用来获得支持。对马来亚的华人共产党起义者对，民族主义从来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口号。他们声称正在为"马来亚人民"战斗，并且声称正在领导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但是这些声称都是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得不作出的，不仅马来亚政治家——以东姑·阿卜杜勒·都拉赫曼为首，而且马来亚华人政治家都谴责他们的活动。而且，尽管他们声称正在为解放马来亚人而战斗，但是起义者几199 乎不能阻止那些民众意识到，在整个"紧急状态"期间，他们正稳步实现从英国独立出来的目标。

不过，尽管他们的宣传有弱点，马来亚的共产党起义者惊人地证明了一个有决心的游击队小组在有利的地理条件下的战斗能够造成多么沉重的打击，并且有可能获得无保护平民的被动支持。一旦马来亚共200 产党决定采取武装战略去追求其目标，它的军队就会逐渐进入覆盖了马来半岛大部分地方的密林中。他们能够从那里向脆弱目标发动袭击，比如孤立的警察哨所、区行政管理办公室、种植园主的平房以及锡矿经理。与越南战争标志性的牺牲宝贵的生命代价相比，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的伤亡数字似乎很小。但是伤亡数字本身并不能令人满意地反映起义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从他们对马来亚构成的威胁中感觉到其影响，因为它正逐渐从日本占领期间的混乱中恢复过来。起义所引



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

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是马来西亚的独立之父、该国第一任首相。他出生时是位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一名积极的政治家。在马来亚紧急状态期间，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展示了马来人政治家在准备独立的同时与英国一起打败共产党叛乱分子的承诺。照片采自《远东经济评论》。

发的不安全，也使独立的给予将被推迟。

英国殖民政府对"紧急状态"的反应显示了起义所带来的广泛威胁。尽管殖民政府起初对"紧急状态"问题的反应涉及某种程度的不确定，甚至混乱，这不久就被精心构筑的军事和政治努力所取代。这些努力的要点是把起义者跟其他平民分隔开来，以便那些平民免受起义者的攻击或者恐吓。同时，随着这些基本的军事目标的进行，需要为马来亚独立做工作了，这一点从来没有被忘记。1957 年，马来亚被给予独立，此时距"紧急状态"最严重时期不到 5 年的时间。

把起义者从其他人口中孤立开来在马来亚尤其重要，因为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存在大量的棚户居民,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政府的正常控制之外。这些棚户居民几乎全部是马来亚的华人居民,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或者日本占领期间迁移到棚户社区。"紧急状态"开始后,他们对于起义者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提供征召和供给的能力。在马来亚,反对殖民政府的游击队的全部人数从来没有超过9 000人,其中许多人是从棚户社区征召来的,那里的年轻人很轻易地就被劝说,相信革命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与人员征召一样重要的,是这些孤201 立的棚户社区把食物供给起义者的能力,因为后者的密林栖息地大部分不适合食物生产,得到其他的食物来源是至关重要的。

一旦意识到棚户社区的重要性以及理解了他们所带来的问题严重性,英国殖民政府进行了一项重新安置计划,这成为"紧急状态"时期的一个最鲜明特点。几乎50万棚户居民在两年的时间内被重新安置或者搬迁到"新村"。一旦重新安置,棚户居民有了警察的责任,由军队去追逐丛林中的游击队员。这是一个缓慢和繁琐的事务,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不是人的生命。尽管政府方面在人员上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时势并没有明确地不利于共产党游击队,直到1954年,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起义者将失败,马来亚将获得独立并且有能力结束"紧急状态"。作为少数族群中的少数,华人起义者从来没有成功地展示自己是民族主义旗帜的承担者。他们对很有限的一组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尤其是年轻华人,后者认为现存的马来亚社会中已经没有他们的空间了。但是对马来亚的其他华人社区以及压倒性数量的马来人社区,游击队员发起的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因为这些游击队员行事严苛。"紧急状态"不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一旦起初的震惊和混乱时期过去,不利于起义者的条件就会不断恶化。同时,马来亚起义以及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所带来的问题之间的巨大差异应该得到坚定的认同。由于把马来亚成功地战胜共产党游击队当作后来越南可能获得的结果,军事计划制定者正在犯把小鱼比作鲸鱼的古老错误。

本章讨论的四个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亚、菲律宾和越202 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发生了暴力。但是,就如本章反复强调的,

暴力的本质、人们为之奋斗和献身的问题、参与冲突的结果，这些在每个国家都非常不同。已经强调的差异有力地提醒我们注意东南亚国家的个别特征，无论它们具有怎样的普遍性。印度尼西亚抗击荷兰尝试重新强加某种形式的殖民控制的民族主义革命提醒我们，革命不一定只能由共产党发起。1954 年中期之前，越南共产党的部分成功建立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没有的条件的基础上。马来亚和菲律宾共产党起义的失败展示了，通过武装起义不能达到目的，武装叛乱不能（在不同例子中是因为不同的原因）吸引所有民众。革命和起义已经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特征，但是不同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原因。

203

第十一章 通向独立的其他途径

在前一章研究的四个国家中,有两个国家通过革命的方式获得了独立——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马来西亚一边准备独立,一边遏制并且最终战胜了从华人少数族群社区吸收成员的共产党起义者的重大挑战。菲律宾的例子又是不同的:一个独立的政府战胜了本地的起义者。这四个国家的不同经历再一次强调了东南亚的多样性,当评论该地区其他国家通向独立途径的时候,这种多样性的意识更将得到增强。

对于这个阶段,我们没有必要在泰国方面花太多工夫,因为已经指出很多次了,它是东南亚唯一没有经历殖民占领的国家。就如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章节中指出的那样,泰国在一段时期不得不去面对这种可能性:它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战败的日本的联系可能造成胜利的盟国军队对其强加经济或者政治的惩罚。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主要是因为泰国娴熟的外交,以及泰国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恢复了其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地位,甚至更自由,在某些程度上是因为它不再受到以前给予在泰的外国人特权的条约的拖累。

20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0年,我们只需考虑缅甸和组成法属印度支那的其他两个国家——柬埔寨和老挝。在这个时期,新加坡的未来地位仍然在讨论之中,事关其最终是否将与一个独立的马来亚

相联系。文莱仍然是英国的一个保护国。葡属帝汶,即后来的东帝汶,不论是在遥远的里斯本宗主政府还是战后初期的国际社会,都没有吸引任何注意力。

缅甸

在缅甸,从日本人战败之后直到1948年宣布独立,其间的历史充满了复杂性以及活跃在缅甸政治生活中各种团体之间痛苦的算计。这种算计发生的同时,缅甸和英国长期的激烈谈判也终于彻底讨论出了独立最后步骤的细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暴露出了缅甸政治深深的派系特征。一些派系由于内部成员对各自意识形态的忠诚而分裂,这些团体跨越了广泛的政治立场,从保守主义到支持马克思主义。清楚的是,英国正在离开缅甸,但是这个事实没能减少这些分裂。相反,既然独立似乎已成定局,各种团体认为更有必要去主张自己的立场。他们把这种状况视为英国的离去带来一种新的不可预测的情况之前去争取优势地位的良机。

其他分裂来自缅人和构成缅甸人口的其他群体之间的长期对抗,这些种族群体中最出名的有掸族、克伦族、钦族和克钦族。英国在其统治时期已经作出特别的安排,以一种与缅族多数族群分离开来的方式治理众多少数族群。现在,独立已经在望,代表各少数族群的政治家努力确保各自民众像英国统治的时候那样继续享受特别的权利。昂山将军领导下的缅族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阶段将缅人组织起来反抗日本人的领导人,准备向少数族群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尽管昂山和他的同事不准备允许建立以种族为基础划定边界的独立国家,但是他们准备认可种族认同感和过去的行政管理,后者的施行促使他们用与众不同的方法去对待缅甸北部和东部类似掸族地区这样的区域,使之看上去与缅族人聚居的伊洛瓦底江河谷一样。

205

历史只能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所以我们无法回答,"如果昂山在独立之后能够继续领导缅甸政府,缅甸会怎样"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曾经发生的是:当他们暗杀了昂山和他的6个最亲密的副手的时

候,政治对抗将缅甸政治宗派主义悲惨的现实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随着昂山在 1947 年 7 月去世,缅甸失去了其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但是迈向独立的进程并没有停下来。吴努接替了昂山的位置,他将成为独立缅甸的第一任总理,并将是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缅甸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物。尽管迈向独立的进程继续,但是它发生在一个越来越不团结和越来越暴力的氛围中。当 1948 年 1 月宣布独立的时候,这是一段极不稳定的时期,并最终成为大规模反抗中央政府的前奏。这些反抗是由不准备接受独立带来的政治结构的几个政治和少数族群团体发起的。缅甸在没有经过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所经历的那些代价高昂的斗争的情况下获得了独立。但是一旦殖民国家撤出,这个事实无法保证它不会迎来重大和高昂代价的混乱。

柬埔寨和老挝

在已经研究的所有东南亚国家中,没有国家像柬埔寨和老挝那样,人们对其现代历史只做了有限的考察。在柬埔寨的例子中,对该国宏伟和遥远过去的记录往往掩盖了对更现代时期的兴趣,除了 20 世纪 70 年代波尔布特政权的恐怖。在老挝的例子中,该国在人口上的小规模——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不超过 300 万,造成了其仅仅被当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在其邻国越南的重大事件的注脚。因为与柬埔寨和老挝相比,越南的历史事实上一直是要求更高并且显然更急迫更重要的研究主题。由于对这两个国家历史的关注相对缺乏,一个东南亚事务的非专业观察家要理解为什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会有这么重大的变化,确实存在真正的困难。非专业和专业的观察家可能都会问:看起来困乏的柬埔寨和老挝君主是如何在不到 40 年的时间里使自己的国家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同时柬埔寨还经历了现代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只有现在,柬埔寨和老挝获得独立之后 50 多年,我们才开始理解它们在获得独立之前的一些元素,这些元素暗示了独立之后的历史可能性。

越南历史与法属印度支那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柬埔寨和老挝

的历史之间的对比非常鲜明。至于现代政治发展，越南在反对法国殖民方面总是走在其邻国的前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越南，越南共产党变成了一支至关重要的力量，尽管几乎总是遭到迫害。与此同时，在柬埔寨和老挝实际上没有民族主义者煽动反对殖民当局，更别说共产党了。而且，就如前一章指出的那样，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只遭遇到最低程度的反对便回到柬埔寨和老挝。法国—越盟战争爆发之前，1946年越南的紧张时期与同一时期柬埔寨和老挝的对比同样是明显的。

尽管存在这种对比，以及在老挝和柬埔寨能看到的喜剧性的王室、神圣的大象、古老的寺庙和穿橘黄长袍的僧侣，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这两个国家造成了变化。在老挝，由于王子苏发努冯的激进游说，在战争期间出现一个反法团体，而他是这个团体最出名的成员之一。当战争在1945年结束的时候，苏发努冯和少量同伴拒绝接受其他战时同伴接纳的条件，没有同意法国的返回，也没有等待最后给予自治地位以及最终的独立。苏发努冯和同意他观点的那些人进入密林，并且把他们独立的目标与邻国越南刚刚开始的战斗联系在一起。对于老挝的共产党运动是否拥有一个独立于越南共产党的身份，各种观点争论不休。最短的答案是：它过去和现在都首先是一个老挝人的运动，但是由于老挝的地理位置及其人口的弱小，老挝共产党总是依靠他们在越南的意识形态同盟。而且，一些最出名的老挝共产党领导人娶了本身是共产党员的越南女人。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老挝的东北部地区对越南共产党的战略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老挝共产党军队(巴特寮，他们这么称呼自己)与后者密切配合，有时甚至接受越南人的直接指挥。

207

从1946年起，法国在老挝的政策目的在于减少政治困难，同时与越南和巴特寮军队在东北部带来的战略问题展开斗争。老挝精英(300万左右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的普遍倾向是在没有太多犹豫的情况下接受殖民统治的继续存在，这有助于法国人在湄公河沿岸老挝人口最多的地区寻求政治平稳。王室和半世袭的传统官员在大多数情况下乐意与一种最不费力便可获得个人回报的体制合作。苏发努冯王子、其

政治承诺以及他在法国获得的西方知识、乐意接受密林的严酷生活，所有这些似乎都是老挝精英一般规则的例外。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苏发努冯和巴特寮其他成员所代表的例外变得至关重要了。由于在奠边府遭受了军事失败，1954 年在日内瓦会议谈判从越南撤出的法国政府已经没有兴趣对弱小的老挝王国保持控制，1953 年后期，老挝理论上已经独立了。但是仍然存在一个问题，法国希望把权力转交给那些在 1946—1954 年间曾经与他们合作的保守老挝人——即传统精英的成员。不过，不论是法国还是传统精英都不能控制该国的北部地区，而共产党巴特寮在那里最为强大。不过，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现在完全独立的老挝将特别考虑巴特寮军队，并且最终把他们整合到国家军队里面。

跟许多纸面上决定的妥协一样，这个规定在现实中无法实行。老挝在 1953—1954 年所获得的独立从开始就有瑕疵。王国的保守团体没有兴趣允许左翼的巴特寮获得一个合法的立足点，而巴特寮的兴趣当然不是心甘情愿地作为他们政治敌人的下属来行事。就如老挝获得这个有瑕疵的独立是作为越南更重要发展的副产品一样，老挝政治史的下一个重要阶段也是由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不断上升的压力所决定的。

与老挝不同，柬埔寨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中没有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元素。1946—1953 年，明确界定的柬埔寨共产党运动也没有在柬埔寨正式宣布独立。相反，重要的国内政治争议与柬埔寨向独立迈进都与这些事情有关联：是由当时西哈努克国王领导下的王国的传统领导人控制一个独立的政府，还是将权力转交给不那么保守并且希望国王成为一个宪政君主的那些人手里？至于与法国的关系，一旦西哈努克能够展示他在国内事务中的优势，劝说法国给予独立的任务基本上是个时间问题。就如老挝获得独立结合了越南的发展一样，西哈努克领导的柬埔寨也能敦促法国给予独立，因为当时(1953 年)越南不断恶化的状况使得法国根本无心抵制柬埔寨的要求。



诺罗敦·西哈努克

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已经成为最出色东南亚领导人之一。他1941年加冕成为国王，并领导他的国家于1953年走向独立。1955年，他放弃王位，1970年被亲信推翻。作为波尔布特统治的红色高棉的一名囚犯，1993年，他再次被立为柬埔寨国王。照片由《远东经济评论》的戴维·詹金斯(David Jenkins)提供。

当西哈努克提出自己要求的时候，他已经在柬埔寨获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而且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他已经为超过10年的独立创造了条件，他是这个过程中的主要政治角色。在童年时代，摆脱了胆怯，未受到坏事物影响，他逐渐从谨慎地表现出兴趣发展到全面参与王国的政治事务。一旦他决定密切参与政治，以及从一些特别有能力的老年顾问那里得到好处——他们中间有著名的宾努和宋双，作为国王，他实际

209

210

上在公开政治领域内不会受到挑战。

至于1953年前、柬埔寨独立时期以及1954年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时的秘密政治,没有什么表明柬埔寨将发生左右两派全面冲突的战争。无论随后发生了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3年被给予独立期间,共产主义运动在柬埔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越南共产党的部队使用柬埔寨作为基地,而且毫无疑问,有柬埔寨人与这些部队有联系。但是回首1946—1953年,如果认为共产主义替代了西哈努克,将会犯下一个重大的历史错误。

在东南亚的各个国家,人的名字已经与获得独立密切联系在一起。关于越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胡志明的名字。昂山的名字将会继续主导对缅甸获得独立的讨论。当人们思考马来亚独立的时候,人们会想起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名字与国家和独立相匹配可能将继续,但有时候伴随着关于应该选取哪一个名字的尖锐争论。不过,肯定可以为这个命题举出一个例子:在东南亚所有国家中,只有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他对获得独立是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他就等同于获得独立。他起初对参与政治犹豫不决,而且开始参与后并不总是机敏老练,到了1953年,他开始控制场面。这是他的胜利,不过一些人可能主张,随后的年份将是他和他的国家的悲剧。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独立了。泰国从来没有经历正式的殖民主义。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已经从美国那里获得独立。而缅甸在1948年获得独立,即使在前进的道路上各种障碍经常造成困难,缅甸从英国通向独立的道路似乎总是让人放心。印度尼西亚的革命使得荷兰在1949年底撤出。法属印度支那国家在1954年见证了殖民当局的离开,留下竞争的越南,以及老挝和柬埔寨。

211

英国从马来亚的离开延迟到1957年,部分是因为共产党起义挥之不去,部分也是因为难以找到一个能够调和马来人社区期望的政治方案。马来人期望在包括一个非常大的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公民的少数族群的人口里,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确保马来人主导地位

方案的获得,华人也参与到公开的政治过程中,给予马来亚独立地位之后,在东南亚只留下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残余。新加坡、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现在的沙巴)的领土是英国在东南亚帝国的所有剩余部分,这些地方也很快结束了他们的被殖民生涯——1963 年,通过整合独立的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和沙巴,马来西亚联邦诞生。

随着马来西亚的建立,东南亚只有文莱和葡属帝汶(东帝汶)仍然是非独立的国家。1949 年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仍然在荷兰控制之下的最后一块领土——荷属新几内亚——1963 年在争议中被纳入印度尼西亚。文莱技术上是英国的一个保护国,而不是殖民地。虽然文莱拥有加入马来西亚的机会,但是由于其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所以它拒绝了。文莱苏丹担心整合到马来西亚将淹没文莱的身份,并且将失去该国很大比例的收入——它们使它成为东南亚最富的国家。直到 1984 年 1 月,文莱才最终获得独立地位。至于葡属帝汶,它仍然是葡萄牙遥远海外帝国的一个被忽视的残余。它的命运令人意想不到,1975 年印度尼西亚入侵,1976 年纳入印度尼西亚,然后经过一场痛苦的战争,最终在 1999 年得到了独立的承诺。

对大多数而且可能是所有以前被殖民的东南亚国家来说,实现独立伴随着一种解脱感,而且有时甚至是一种兴奋感。即使在越南饱受战争蹂躏的环境里,尽管共产党当局仅仅控制了它希望治理国家的一半,但是也有战斗结束的解脱以及一种期望——后来证明是错误的——控制延伸到南方不会拖延太久。日益增加的暴力和异议是缅甸获得独立前最后几个月的特点,尽管如此,这段时间仍然是重要的。在马来亚,“紧急状态”在继续,与社区政治相关联的困难大量存在,但是在 1957 年,独立似乎仍然是值得向往的。 212

对目前享受独立的那些人来说,解脱和兴奋是自然的、容易理解的情感。但是,随着那个目标实现,人们不得不在面对独立荣耀的同时,也直面其问题。尝试去评估这些问题以及东南亚国家对付它们的各种方式是接下来几章将要关注的内容。

213

第十二章　后殖民协议的终结及之后的发展(一)：印度尼西亚、越南、柬埔寨和老挝

那些从来不知道在殖民统治下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人，只能部分理解获得独立的重要性。对东南亚所有国家的民众来说(泰国例外)，实现独立涉及的不仅仅是政治控制和领导人的简单变化。这些事情从根本上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作为局外人仅仅关注独立过程所涉及的政治变化，我们将无法理解，为何当殖民统治者(无论愿意或者不愿意)离开的时候，许多东南亚人、领导人和他们的追随者都有与获得独立相关联的精神上的神奇特性，尽管并不完全。因为独立在东南亚人看来牵涉了许多种转型，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但是东南亚独立的历史经常涉及必须去调整对变化和发展的希望，因为当美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把政府的控制权转交给他们以前的殖民附属的时候，变化和发展似乎如此容易达到。甚至在东帝汶的例子中，1975年葡萄牙匆匆离开后的位置很快就被另一个殖民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到来所占据，那里有变化和发展的希望，但这些希望很快被可怕的现实所扑灭。

214

21世纪的东南亚不是唯一面临着重大问题的地区，许多问题没有明确的或者容易解决的可能性。实际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几十

年已经使得西方观察家所犯的错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清楚了。这些观察家胆敢把东南亚视为一个“问题”地区，没有适当考虑折磨所谓发达国家的许多复杂的困难。我们必须牢记这个事实：纵观东南亚国家超过四五十年的独立时期，东南亚地区一直面临而且仍将继续面对重大问题——泰国虽然没有被殖民的经历，但其发展模式与其他各国仍存在相似之处。这些问题的持续存在向解释东南亚独立后的现代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根本特征前进了一步：殖民时期结束时达成的政治协议随后被改变，在一些例子中被改变得相当明显。这是一个在每个国家都有巨大差异的过程，例如，缅甸的后殖民协议存在超过 10 年，而在越南，不到两年时间就结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独立时期，一些问题已经开始困扰东南亚的领导人。这些问题造成了后殖民协议的终结。这些问题类似于第三世界国家已经经历过的问题。在亚洲的其他部分、中东以及非洲，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走向独立，就如东南亚国家一样，这些国家被寄予厚望，但是经常却只拥有有限的资源。在人们考察的几乎任何领域，新独立的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这说明以前的殖民统治者没能解决重大的问题，因而要求新独立的领导人的即时关注。无论使用多么冠冕堂皇的词来将殖民统治合理化，殖民统治的引进和维持从来没有考虑过被殖民国家或者民众的利益——拉迪亚德·吉普林著名的，或者是臭名昭著的赞美背负“白人责任”美德的诗歌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基本的事实意味着殖民政权有与他们之后新独立政权不同的优先权。而且这个事实给新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215

有几个例子也许能使这个观点更清楚。尽管所有东南亚的殖民政权都多少关注为他们统治的至少部分人口提供教育的必要性，但是没有一个，即使最开明的也没有，认为有必要推动一个与该政权母国运作基础相同的小学阶段普及教育体制。不过，人们选择去判断殖民政权的教育政策——而且对不同的殖民政府以及不同的被殖民国家作出不同的判断——改进和扩展教育机会被东南亚所有新独立的国家看作是基本的步骤。

与教育不同，东南亚的殖民政府通常很少关注让该地区的人口在社区经济活动中发挥直接的作用。殖民地是因为它们的经济资源而具有价值，所以存在一个普遍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欧洲或者美国的公司控制了主要的国际商业，而内部商业则由殖民者和亚洲移民社区共享，通常是华人或者印度人。这个主题有变化，并且存在重要的例外。尽管如此，新独立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经常发现，他们和其同胞只是很有限地控制了自己的经济。刚才提及的移民社区是殖民统治下很多东南亚国家的一个特征，这又指向了另一个例子：独立到来之后，支配前独立时期的统治方式是如何急剧地发生变化的。对殖民政府来说，移民社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商业以及为种植园和公共工程提供劳力上。对东南亚独立政府来说，移民社区代表了非常不同的东西，最好的情况是产生同化问题，最坏的情况则是对国家安全和完整性的一个威胁。

独立的东南亚新领导人将继续面对的问题清单是冗长和令人生畏的。并不是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都很急迫地要求新独立的国家来解决。通常，在当前的条件下，无限制的人口增长不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但是它有这样的趋势，在一些例子中，这是迟早的事。更急迫的是，一旦殖民国家离开，独立的国家不得不去决定如何发展它们的经济。而且首先是如何获得和保持国家团结的问题。因为在观察后殖民协议是如何被众多事件所冲垮时，不论是逐步地还是戏剧性地，保持国家团结的目标是事件的核心。在整个东南亚地区，这个问题都是核心，每个国家的经历和时间跨度都非常不同。因此，有必要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经历来评论。

216

本章和紧接着下一章的目的是阐明，第一次重大的与后殖民协议的基本特征决裂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发生的方式。以后的章节将考察对那些最初协议的进一步偏离。尽管如下的考察将强调发生在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变化，但是我们应记住，社会和经济因素总是在形成政治事件的本质上发挥它们的作用。本章将关注在革命战争结束之后实现独立的两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和越南，以及另外两个国家：当殖民国

家从越南脱身的时候，它们作为法国协议的一部分，也获得了独立。

印度尼西亚

在与荷兰进行痛苦的武装斗争之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在1949年12月实现了他们独立的目标。一个新国家的成立已经成为现实，而不是曾经宣布的但仍然需要为之奋斗的理想。印度尼西亚人已经获胜，但是他们的胜利仍然有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荷兰已经放弃了主权，但是印度尼西亚国家将来的特征仍然不确定：它将是一个单一的国家，还是一个考虑了地区分离主义情感的国家？这些地区有亚齐、北苏门答腊和东部岛屿——加里曼丹岛(婆罗洲)的部分地区与苏拉威西岛，这些地区都存在着对爪哇政治家所发挥的主导和集中化作用的怨恨。而且关于伊斯兰教的作用将是什么也是不确定的，因为一些政治团体有一个持续的愿望，就是推翻1945年宪法中宣布印度尼西亚将是一个世俗国家的那部分内容。新独立的雅加达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实现对群岛的中央控制之后，在1950年8月17日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它的命令此时可以贯穿前荷兰殖民地，除了一个例外。当时，新几内亚的西半部——当时印度尼西亚称之为伊里安查亚——仍然处在荷兰统治之下。

217

在实现了单一的独立之后，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方向掌握在一个由作为总统的苏加诺领导的内阁手里。它的目的是选举产生一个制宪会议，从而考虑对当时引进的临时宪法进行可能的修改。但是这些选举都没有发生。相反，占据主导地位的爪哇权力掮客委派了人民代表会议的232名成员，当时人民代表会议被作为印度尼西亚议会来运作。

简而言之，接下来5年的历史明确地表明了，在获得独立之时，印度尼西亚社会的许多分裂还没有解决。在1950—1955年之间出现了不少于5个总理，这是由于一系列变化的政治联盟都努力考虑世俗主义者和支持给予伊斯兰教(印度尼西亚压倒性多数人口信奉的宗教)更大作用的那些人之间冲突的利益。同时，军队把自己视为革命成功的

保护者,努力保证其利益不会受到忽视。而且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也努力(获得了一些成功)克服茉莉芬事件带给他们政党的污点。所有这些努力都发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严重的经济困难,远离爪哇的地区持续的分离主义倾向,以及找到一种方式从前殖民国家手中夺取对荷兰新几内亚(伊里安查亚)控制的决心。

当选举终于在1955年举行的时候,不少于28个政党成为候选人。当结果提交的时候,没有一个单一的政党能够称为多数。获得票数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党,获得22%的票数。紧随其后的是两个伊斯兰教政党——马斯友美党21%,伊斯兰教师联合会18%。作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城市和乡村穷人有持续吸引力的一个信号,该党获得了16%的选票。这一结果对不稳定是一剂良方,而且出现得很及时。因为不仅选举的结果暴露了政党制度的弱点,它还强调了存在于与爪哇有联系的政治家和那些权力基础在其他岛屿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

这种状况最终是有利于总统苏加诺的。他早就明确表示他不信任议会政体,而且在1956年,当政党争斗继续在议会层面上演的时候,他表达了他的信念:印度尼西亚所需要的不是西方类型的"自由民主",而是"一个被领导的民主,一个有领导的民主"。各种评论者表示,他们还不清楚苏加诺在这个阶段首次提出这些想法的时候,是否已经对它们考虑清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雅加达持续的政治斗争以及苏门答腊一个分离主义反叛的爆发加速了其想法的实施。面对这些挑战,并且得到了纳苏蒂安将军领导的军队的支持,苏加诺在1957年3月宣布戒严法。

印度尼西亚军队镇压分离主义反叛的成功给苏加诺提供了推动其"有领导的民主"计划的机会。由于乖戾固执的制宪会议仍然存在,他呼吁为一个新的宪法投票,也就是1945年宪法。与1950年引进的临时宪法相比,这个宪法显然给予总统更多的权力。当会议没能达到要求的三分之二多数的票数通过新宪法的支持时,处于足够强大地位的苏加诺在1959年7月宣布新宪法——实际上是1945年宪法——生效。"有领导的民主"时期开始了,第一次重大的与后殖民协议的决裂

已经发生。

起初，苏加诺似乎无可非议。一个真正具有魅力的人物，一个引人入胜的演说家，他的个人声望得益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使他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知名人物。于是，在1962年，他可以要求人们把伊里安查亚的控制权转给印度尼西亚的决定(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归功于他。此刻，一个新的协议似乎已经实现，它使得苏加诺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上都获得了胜利。短短几年过去之后，这个判断就显得如此离谱。

对苏加诺成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至关重要的是军队的支持。不过，即使在通过成功的战役获得控制伊里安查亚之前(这个事件深深地牵涉武装部队)，苏加诺已经实行了造成他与军人不和的国内政策。在国际领域，他不顾军队中许多强有力人物的意愿，致力于反对一个新的马来西亚联邦的形成——把马来亚、新加坡和婆罗洲的英国领土合并在一起，这是下一章将讨论的问题。"对抗"政策对文职精英里的许多人没有什么意义，但却引发了军人的反对。与此同时，在国内，苏加诺证明自己越来越愿意寻求印度尼西亚政治中左派的支持，包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1965年很清楚地显示，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1965年9月一场未遂政变之后直到今天，这个事件的细节仍然是隐晦的，但是苏加诺的对手把它与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当时苏哈托将军领导的军队果断地采取行动，获得了对印度尼西亚国家的控制，使苏加诺成为一个挂名的总统。1966年3月，苏哈托对国家实行了有效的权力控制。在担任了一年代理总统之后，苏哈托在1968年成为印度尼西亚总统。被称为"新秩序"的时期开始了，而且苏哈托将在20年的时间里保持其对印度尼西亚的控制。

在1965年9月失败的政变之后，苏哈托正式上任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印度尼西亚被可怕的暴力所折磨。随着军队加强控制，成千上万的反共分子抓住机会对他们的政治敌人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军队或者袖手旁观或者在鼓励和参与。暴力在1965年后期开始，并且持续到下一年。反共暴徒进行了一场杀戮的狂欢，经常使用最残忍的方式来达到

220 他们的目的。还没有当时共产党和共产党同情者被杀的确切数字。可以确定的是,至少有一些屠杀涉及个人和政治动机。但是大多数外国观察家认为,1965—1966 年政治动乱期间应该至少有 25 万人被杀。一些估计更高一些。在"新秩序"的漫长时期,这是一个不可能被忘记的政治遗产。

在苏加诺下台以及随后的流血时期之后,印度尼西亚需要包扎自己的伤口,因此很少有人会预测,不久之后它会开始它自己的殖民冒险。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声称将统治所有曾经是荷兰殖民地的地方,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它从来没有对东帝汶的葡萄牙领土作出类似的声称。东帝汶是葡萄牙摇摇欲坠的海外帝国中长期被忽视的一部分,但是当葡萄牙当局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放弃该领土的时候,东帝汶被视为对印度尼西亚安全的一个潜在威胁,因为在该领土争夺权力的一些团体具有左倾的政治立场。这导致印度尼西亚在 1975 年入侵东帝汶,而且随后在 1976 年把该领土合并进印度尼西亚。伴随着这个事件之后的是长期的独立游击战,以及印度尼西亚令人不安的无能和残暴。

越南

印度尼西亚在 1949 年从荷兰那里实现了独立。5 年以后,越南的独立失败了。从半个世纪过去之后的观点来看,1954 年和紧随其后的事件似乎一点也不现实,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1954 年之后出现的两个越南在 1975 年注定将合并为一个。当时,这个问题不是那么明确。尽管事实是,为了结束敌对而在 1954 年 7 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的基础是越南是一个单一国家,不管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造成的政治和军事分裂是什么。我们在第十章已经讨论了越盟和法国之间的战争。

221 当日内瓦会议在 1954 年 7 月结束的时候,参与方同意的安排在性质上很明显是临时的。这在会议的最后声明中得到证实:它声明,"协议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解决军事问题来结束敌对,而且(根据协议)军事分界线是临时的,不应以任何方式解释为构成了一个政治或者领土的

边界”。总之，越南在17度线的分界不应该被认为是两个国家的边界。关于敌对结束之后如何解决突出的政治问题，会议进一步同意“普选应该在1956年举行”。因此，按照日内瓦协议，在共产党领导的越盟(目前控制了河内)和位于西贡的越南国家(正在得到美国不断增加的支持)应该在两年之内进行一场选举竞争。关于共产党领导人是否相信选举将会发生的问题，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可以确定的是，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河内的领导人相信通过选举他们能够获得胜利的土地——他们在战场上成功地抗击了法国人后未能得到的土地。

预计的选举从来没有举行。尽管起初不乐意支持一个单独的南部政府，现在由一个长期反共民族主义者吴庭艳领导，美国不久就致力于推行一项由冷战的考虑以及越南的既成事实促成的政策。最终，在美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下，吴清楚地表明他不愿意接受日内瓦协议规定的选举。由于表现出了相当大的个人勇气，吴抵挡住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包括来自曾经与法国作战的部分越南军队的挑战，以及拥有自己私人军队的政治—宗教派系的挑战和来自在法国与越盟战争期间经营西贡的赌博和卖淫敲诈的残酷黑帮的挑战。由于美国支持南部政权，到1955年中期，正好在规定的1956年选举之前，越南共和国(南越)打算忽视日内瓦协议的规定。

对南越来说，直接目标就是消除其境内北纬17度以南任何与越盟有联系的力量，因为后者对其控制构成了威胁。吴庭艳的武装力量和警察使用野蛮的手段来实现该目标，抓捕并处死了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的人。北越(越南民主共和国)由老革命胡志明领导，对河内政府构成挑战的直接问题可能比那些南越领导人面对的问题更可怕。一方面，河内不得不在其控制的领土设立一个施政机构，但是由于战争，它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害。另一方面，它不得不为一个它从来没有放弃过的长期目标作出计划，这个目标就是控制整个越南。随着河内政府着手实现其意志，它也表明了愿意通过残忍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通过一个“土地改革”项目来寻求强加其社会主义的远景，而这个项目的实现是以几千人的生命为代价的。面对大众对这个项目的抵制以及共产党

222

领导内部对这个政策的分歧，胡志明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和政府是有过失的。

不过，即使在胡志明当众宣布土地改革错误的时候，他和他的同事仍在计划获得对整个越南领土的控制。他早期对仍然留在南方的共产党游击队的指令是耐心地等待，但是到了 1959 年，他已经放弃了这个战略。重组在南方的现存力量并且从北方渗透新的力量使得共产党开始严重地折磨吴庭艳政权。随着一系列"打了就跑"的游击袭击，虽然参战人数不多，但是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也就是美国人在越南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伴随着战争的开始，1954 年的后殖民协议就永远一扫而光了。时间最长最野蛮并且折磨了东南亚一个单个国家的冲突揭开了序幕。

223

柬埔寨

当柬埔寨在 1953 年 11 月获得独立的时候，人们对谁将主导柬埔寨政治没有疑问。作为国王和该国最重要的领导人，在越南分裂大约一年之前，诺罗敦·西哈努克有权声称为柬埔寨的独立负责。而且，在日内瓦会议举行之后的第二年，西哈努克和他的保守顾问能够阻止给予数量有限的共产党任何特别地位，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这些共产党曾经作为越盟的盟友作战。这跟已经描述过的越南的情况形成了对比，越南共产党是议会的主要参与者，而且，以后将要看到的，这也与老挝的情况形成了对比。

独立的柬埔寨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高质量的宪政君主国，统治者的权力至少部分地被一个选举的议会所限制。事实上，由于其背后传统的重负以及对宪政安排的熟练操作，西哈努克已经促成了他能够绕过议会权力去推动他自己的政治议程他在寻求，独立期间就是如此。不过，他仍然面对着来自政治家的一定程度的反对。这些政治家反对这种制度，他们相信这种制度仍旧把太多的权力放在国王的手上。为了对此作出回应，西哈努克在 1955 年 2 月举行了一次全民投票，寻求柬埔寨民众对其为了独立而进行的努力的评价，他称这个时期为"皇家

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在西哈努克眼里,全民投票也是对他整个政治成绩的一个评价。结果,绝大多数人赞成他的行动,但是他对这个结果的满足不久就被一些证据削弱了:一些公众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是一手包办的。增加了他烦恼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仍然有政治家准备反对他,因为他为确保国王的政治意愿在任何时候都占上风而打算修改柬埔寨宪法。

就在这个时候——1955 年 3 月,西哈努克扔下了他的重磅炸弹,他后来称它为“原子弹”:没有任何提前通知,他宣布他将要放弃王位,由他的父亲接替其王位。他后来说,他现在可以以“公民西哈努克”的身份自由地参与政治了,不受到他作为国王的地位的限制。他的退位是一次精明的决策。这意味着在没有礼仪职责和自由限制(这是占据王位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要求)妨碍的情况下,他把给予柬埔寨君主的所有传统的尊重用来支持他成为政治领域新的积极分子。4 月,他的下一个重大决定也是同样大胆,在当时也是同样成功。厌倦了柬埔寨政治的派系本质,他接着宣布成立“人民社会主义社区”。这是一个政治运动,而不是一个政党,各种政治信念的民众都可以属于它,只要他们宣誓效忠王位和西哈努克的政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西哈努克已经重写了柬埔寨的政治规则,并且制定安排,为下一个十年的柬埔寨政治制定了界限。这些是国内政治根本性的安排,在 1970 年仍然是合适的,不过当时西哈努克的右翼对手推翻了他,并且在列车上安排悲惨事件,实现了波尔布特的胜利及其政权的可怕暴政。

224

老挝

有点出人意料的是,尽管曾经是组成法属印度支那国家中最小的一个,老挝独立后的历史比柬埔寨,甚至越南更加复杂。在越南的例子中,我们很清楚,日内瓦协议建议的选举没有举行,当时越南政治的中心问题是明确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会成功地将其控制扩展到整个越南,以及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会打败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南越)吗?在柬埔寨,西哈努克先发制人的退位的政治决

定，使其成为其国家政治中一个坚定的角色，确定了其国家10多年时间的政治方向。老挝刚刚独立后的发展却没有这么简单，在那里，政治
225 以一种扑朔迷离的方式交织在一起。老挝问题的复杂性可以以下列事实中窥见一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1953年之后的老挝政治和军事历史中，皇家同父异母王室兄弟持有相反的政治立场。梭发那·富马亲王是一个中立主义者，而苏发努冯亲王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就如前一章指出的，老挝1953年获得的独立从一开始就是有瑕疵的，因此后殖民协议的概念也许不能真正地适用于它的情况。跟柬埔寨的情况不同，日内瓦会议认可老挝共产党在独立的老挝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权利。这反映了这样的事实：由于得到了越盟军队的重要支持，老挝共产党的军队控制了老挝北部的两个关键省份，尽管他们的实际人数很少，也许总共有2 000人。显然，这是与越南接壤的两个省份。

日内瓦会议的协议，意图在万象的老挝皇家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达成一个临时协议，从而促成一个统一的包括整个老挝的政府。在政治层面上，随着老挝共产党的代表在1957年举行的一场选举中参与竞选，并在全国议会中获得了席位。这个协议暂时看起来可以实现。但是老挝也不能逃离冷战的压力以及南越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一方面，美国清楚地表明其意图，支持那些保守的老挝政治家，反对共产党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北越的支持，老挝共产党拒绝交出他们对北部省份的军事控制以及与老挝的其余部队整合。结果产生了这样一种状况：万象的历任政府只关注个人利益和政治运势，没有为老挝大部分人口的福祉做过什么事情。

1960年，这种模式在一个短时期内被打破。当时，一个年轻的老挝陆军上尉贡勒，发动了一场武力政变，目的是使老挝成为一个真正的中立国家。对所有对老挝有兴趣的外部各方来说，这是个关键的时刻，并且促成了另一次日内瓦会议，会议再次宣布了建立一个中立的老挝的目标。但是现实走向不会是这样。没有一方（除了少数几个人真正
226 致力于一个中立的方案）准备放弃打败他们对手的目标。保守的老挝

政治家大多数来自贵族官员家庭,他们的观点恪守非常传统的路线,而且认为他们的政治和物质利益与美国联系在一起。而老挝共产党得到了北越的支持,同样也不愿意妥协。随着万象的政治竞争稳步地向有利于共产党的方向倾斜,老挝的国内战争开始渐渐跟在越南发生的更大的战争联系在一起。

本章研究的四个国家中,后殖民协议的弱点在实现独立之后相对很短的时间内暴露。下一章将考察缅甸、马来亚、菲律宾和新加坡这四个国家,在没有敌对的情况下实现独立以及通过议会体制追求政治目标如何造成后殖民协议产生同样重要的变化。

227 # 第十三章 后殖民协议的终结及之后的发展(二)：缅甸、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以及与众不同的泰国

前一章讨论的四个国家后殖民协议的终结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发生的：以接近西方议会民主制形式为基础的政府制度或者从来没有建立(越南)，或者相当脆弱以至于可能被推翻，比如被苏加诺和西哈努克所推翻(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或者从来没有脱离大国政治而真正地运作(老挝)。缅甸、马来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情况却则不同。在每一个国家中，各种以议会制为特征的后殖民协议似乎都持续运作，即使有时候历任政府面对着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议会制度肯定不是在完美的状况下运作的。就如已经描述的那样，马来亚有“紧急状态”时期，菲律宾有胡克起义。不过，每一个国家都以非常不同的形式，结束了或者深刻地改变了后殖民协议。

缅甸

我们已经讨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期的事件。随着日本228 的战败，缅甸毫无疑问将走向独立。在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政府在满足缅甸民族主义者的独立要求方面一直犹豫不决，但是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之后，一种完全不同的气氛占据了上风。同样重要的是，伦敦新当选的工党政府致力于在印度推行非殖民化，而且将之推广到缅甸。在缅甸，缅族多数族群(少数族群的态度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有一种几乎普遍的独立承诺。不过，在存在这种承诺的缅族政治家之中，当他们计划独立的时候，政治政党之间仍存在着激烈的派系分裂。一些政治分裂来自缅族人与各种组成缅甸其他人口的种族群体的长期敌对，这些种族群体中有最出名的掸族、克伦族、钦族和克钦族。

之前说过，由于昂山和他的六个副手被暗杀，政治竞争清楚地显示了缅甸宗派主义现实的悲惨。随着昂山在 1947 年 7 月去世，缅甸失去了其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缅甸走向独立。昂山的位置由吴努替代，后者成为缅甸的第一任总理。

尽管仰光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分离主义挑战，但是政府平安度过了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反对政府的那些人的目标是分裂的。但是在中央政府中心也存在分裂，总理吴努倾向于出台考虑到缅甸种族多样性的政策。例如，他准备准许掸族人一定程度的自治。这些思路全然不顾缅甸军队的政策。军队领导致力于建设紧密集中化的国家，并且相信他们的观点应该被接受，因为他们曾经身先士卒地打击了分离主义的挑战。随着文职政治家持续的政治争吵以及少数族群自治要求带来的不断威胁，奈温将军领导的军队把事情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并且在 1962 年 3 月罢免了吴努和他的政府。

政变几乎没有流血——只有一个人被杀——但是议会制政府的死亡具有深刻的重要性，并且是一个具有长期意义的事件。随着吴努被流放，军人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将在接下来的 12 年用法令统治全国。1974 年出台的新宪法并不意味着军人统治的结束。从那时起，只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有过一个最简短的建议，准备放松对缅甸人生活的控制，除此之外，军人以不间断的方式保持着对政府的控制。由于其自然财富和其人口的高识字率，许多缅甸人对一个独立的缅甸寄予厚望，但是随着 1962 年军人的掌权，这种希望破灭了。军人掌权给 1948 年带来独立和议会制度的协议致命一击。

229

马来亚

马来亚在 1957 年 8 月获得独立,是在该国两个最重要的种族群体政治领导人的一系列谅解的基础上实现的。多数族群马来人和最大的少数族群华人在征得政治和经济上相对没那么重要的印度人族群的同意后达成了谅解。这些谅解的本质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马来人和华人领导人(分别是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和陈祯禄)之间友好的个人关系。写进宪法的内容是接受马来人的特权,因为他们是“国家的人民”。实际上,这意味着为马来人保留公务员职位,并且给予他们特别的机会接受教育奖学金。通过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家宗教,马来人的宗教也被认可,尽管公民信仰其他宗教的权利也得到认可。在州和联邦范围内,马来王国的传统统治者苏丹则在一个新的宪政安排下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这些苏丹中将轮流担任名义上的马来亚国王。

230 总而言之,这些安排的要点就是:马来人将在政治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而商业上强大的华人则继续在经济部门作为特权群体。总之,最重要的马来人和华人政治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和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主导了马来亚的议会,并且组成了“大联盟”。

第一次从 1957 年的宪政安排中脱离是 1963 年 9 月新马来西亚联邦的建立,这个联邦包括马来亚、英属婆罗洲的两片领土沙捞越和沙巴,以及新加坡。形成一个新联邦的想法来自马来亚的首相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这个想法得到了英国的热烈响应。英国当时仍然在婆罗洲领土和新加坡有帝国的责任,因此急于将它们抛掉。新加坡热情地加入了这个新联邦,它的领导当时似乎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参与新联邦会令以吉隆坡为核心的马来政治机构中的许多人非常不安。对这些马来人来说,新加坡被看作是一个潜在的中国第五纵队,有可能破坏马来西亚对马来人特权地位的认同以及伊斯兰教作为国家宗教的承诺。当新加坡领导人相信他们与马来领导人同样拥有权利获得联盟的最高职位,并且怀抱着这个信念积极地竞选

的时候，东姑・阿卜杜拉・拉赫曼和他的同事决定将新加坡从联邦中驱逐出去。他们在 1965 年 8 月这么做了，让新加坡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来追求自己的未来。

新加坡从马来西亚联邦分离出来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但是人们认为其真正与后殖民协议脱离要到四年后。1969 年，在马来人和华人圈对 1957 年宪法条款后面谅解条款的不满日益增加。从许多马来人的观点来看，用割让经济权利换取政治主导的安排已经不再是可以接受的协议了。一些马来人认为，马来执政党巫统既不能有效地满足其同族选民的利益，也不能以一种足够有力的方式来促进伊斯兰教的价值。这种观点促使一个马来政党——按其马来语的名字被称为 PAS——的重要性缓慢增长，它致力于使马来西亚成为伊斯兰教国家。与此同时，在更年轻的华人中间出现了对自己相比马来人处于二等地位的日益增长的怨恨。对一些华人来说，拥有财富但却被永远阻止拥有真正的权力，已不再令人满足。于是，对曾经支持 1957 年宪法的马来人和华人主要政党的支持开始衰退。当选举在 1969 年 5 月举行的时候，华人选民放弃了联盟，而去支持与新政党有关联的反对党候选人。这些新政党的绝大多数成员是华人。同时 PAS 也成功地获得了以前由巫统政治家占有的议会席位。因此，尽管联盟继续控制议会，但是它控制的席位数量锐减，而且华人主导的新政党的重要性突然上升。

231

在选举刚刚结束之时，导火线出现了。当时，新华人反对党的支持者为了庆祝他们成功获得议会席位，在首都吉隆坡举行了胜利游行。这导致马来执政党的支持者在 5 月 13 日举行了反游行。这之后是四天野蛮的社区暴乱，主要是年轻的马来人和华人相互攻击，最后造成超过 2 000 人死亡——非官方的死亡数字甚至更高。这些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宣布紧急状态以及解散议会，所有的基本权力都集中到国家行动理事会的手上。

发生在 5 月 13 日的社区暴乱更长期的影响重塑 1957 年宪法背后达成的谅解。由于马来人舆论对所发生的事件深感不安，并开始担心他们在马来西亚社会的特殊地位正在受到侵蚀，便采用了一系列方法

来修正宪法。例如,通过将马来人的特权变成一个强制命令——即使
232 在议会里也不容争辩,来进一步加强马来人的特权地位。通过规定配额来增加马来人进入大学的数量。最重要的也许是,“新经济政策”——通常根据首字母缩写称为 NEP——对马来西亚经济管理方式的改变。这个政策试图改变人们将该国华人视为商业成功的基本保证的状况。马来人对商业企业——包括那些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将受到鼓励和来自政府干预的帮助。

1969 年 5 月之后,这段马来西亚现代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出现了一个了不得的人物——马哈蒂尔·穆罕默德医生。他当时作为执政的马来政党的一名成员,将他在议会的席位拱手让给了来自伊斯兰教 PAS 政党的一名候选人。尽管他在当时还相对不是很出名,但是通过向总理阿卜杜勒·拉赫曼写信,指责他和他的同事没能捍卫马来人的权利,这个医生出身的政治家一跃成名。短期来看,这导致了他被马来执政党巫统开除;长期来看,这是他 1981 年成为马来西亚首相并担任该国领导人 22 年不平凡的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步。

新加坡

就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新加坡在 1965 年 8 月被驱逐出马来西亚。这个高潮事件可以被视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复杂政治辩论的最后一步。辩论的核心困难在于决定华人占大多数的新加坡应该在权力掌握在马来人多数族群手里的马来半岛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本书此前的内容已经描绘了新加坡出色地崛起为东南亚的主要商业转口贸易港,同时观察到,从现代早期开始,新加坡就在经济上与柔佛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柔佛是跨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海峡的一个马来州。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作为与马六甲和槟城联系在一起的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被管理,它与马来亚其他部分有密切的商业联系。而且,从殖民国
233 家英国的观点来看,海峡殖民地和构成马来亚的各王国本质上都是单一的政治单位,不论这个单位的组成部分被管理的方式有多么不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任何迫切的独立要求,无论是在海峡殖民

地还是在马来各王国,英国似乎没有理由去思考新加坡将来的地位或者反思下述事实:这个华人占大多数的实体位于一个马来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在人口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



李光耀

李光耀从 1959 年开始主导新加坡政治,尽管已经从总理的位置退下,但仍然起主导作用。作为一名出色的受英国训练的律师,他引导了新加坡非同寻常地从一个殖民转口贸易港到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的转变。照片由《远东经济评论》的 S.T. 坦(S.T.Tan)提供。

就如其他许多方面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状况。随着1945 年获得和平,伦敦新当选的工党政府决心开始推动一个非殖民地化项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阶段,计划把新加坡加入到马来亚的一个方案遭到了马来领导人的拒绝。因此,当马来亚稳步地迈向1957 年独立的时候,新加坡处于一个不确定的位置上:它是一个大多数人口是华人的英国殖民地,而且其新出现的政治领导人明显具有坚定的左翼性质。到了这个阶段,被称为海峡殖民地的实体也不存在了,因为马六甲和槟城已经被并入马来亚联合邦。

234

李光耀及其副手们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开始主持该岛屿的政治生活,随着他们大力支持新加坡的将来在于与马来西亚合并的观点,新加坡作为一个殖民地以及左翼特性为特点的形象将要改变。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新加坡政府正在逐步表明其乐意打击国内左翼对手(他们中的一些无疑是共产党),包括在未经审判的情况拘留他们。1962 年 9 月,李的政府在关于是否加入将来马来西亚联邦的一个全民投票中获胜。于是,新加坡宣布独立之后,在新的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之前 15 天,即 1963 年 8 月 31 日,新加坡和马来亚、英属婆罗洲一起成为新建立国家的一部分。对新加坡来说,这是其领导人最迫切期望的后殖民协议。给他们的信念锦上添花的是他们的胜利——人民行动党在 1963 年 9 月 21 日举行的国内选举中获得了大胜。这些发展代表了新加坡的后殖民协议。

这个协议的终结来得也很迅速,从建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日子算起还不到两年的时间,这反映了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联结中间存在着一系列误解和误判。如同已经讲述的那样,新联邦的马来领导人相信新加坡政治家将不会寻求在他们自己的领土之外发挥作用,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 1964 年 4 月马来西亚的选举之后。事实上,新加坡政府的成员曾经表态直到 1963 年结束他们都是如此。但是李光耀和他的同事改变了他们的想法,至少有两个主要的理由。第一,马来西亚联邦执政联盟中的华人组成部分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也许寻求在李光耀控制的新加坡取得政治进展。这一情况已经使后者不安了一段时间了。第二,更重要的是,PAP 领导人开始认为他们能够在马来西亚联邦层面上发挥重要作用,也许甚至是部长的位置。在印度尼西亚"对抗"政策造成的紧张以及李光耀尝试带头发起在联邦层面上联合反对执政联盟的背景下,东姑·阿卜杜勒·拉赫曼领导的马来西亚政府决定,新加坡不能再留在马来西亚了。在李光耀心存幻想地请求吉隆坡的东姑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没能成功之后,驱逐在 8 月 9 日发生了。

235

不论以什么样的标准来看,新加坡开始其新的独立生存的时候,都面对着巨大的困难。它是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国家,依靠从马来半岛

经过管道运送水过来。它的转口贸易是重要的，但是迫切需要将其经济基础多样化。40 年之后，这些缺陷已经得到克服。尽管一个 21 世纪的游客很难相信，20 世纪 60 年代新加坡的很多人口居住在只能被称为热带贫民窟的地方。游客今天看到的现代城市反映了两个政治世代极其有能力的领导人的才能和承诺。他们毫不犹豫地阐明他们的观点：普通大众的利益通常需要大量限制个人自由来得到保障。

菲律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菲律宾获得了其早已被承诺的独立，这个事实在有关胡克巴拉哈普运动给该国独立政府所带来的挑战中已经有所体现(第十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独立政府的成立几乎没有什么宪政上的困难。美国在 1935 年已经承诺给予独立，因此在 1946 年 7 月 4 日宣布的正式独立是美国殖民努力的一个必然结果。与美国的独立日相呼应，菲律宾的国庆日是 6 月 12 日，这涉及该国早期与西班牙的斗争，采纳的宪政安排也反映了美国的立法模式。独立的菲律宾由一个选举出来的总统统治，总统与一个包括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两院制议会共享权力。同美国一样，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人物。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菲律宾的参议院是在全国范围内选举产生的，这个事实造成了参议院变成了觊觎总统宝座的政治家的天然跳板。这种宪政安排也促成了政党政治相对稳定的基础，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找到，但是对菲律宾却是陌生的。政客们对政党的忠诚度是脆弱的，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他们会随时从一个党转换到另一个党。

236

我们已经指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菲律宾处理与日本人合作问题的方式。本质上看，太多精英曾经与日本人合作，政治阶层不得不进行旷日持久的审判和惩罚来消除这种记忆。支持这种方法的是菲律宾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直到今天这个事实仍然是最重要的：菲律宾政治在过去是，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今天仍然是，精英们的独有专

利,尽管少数从非精英背景进入政坛的个人也发挥了作用。精英大多是大地主家庭的成员,或者与他们有联系。这些大地主家庭的利益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而且在1945—1946年间,随着为总统和后来的立法选举而进行的各种尔虞我诈和操纵舞弊的发生,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没有一个精英政治家没有跟日本人合作过,也没有亲戚或者其他联系密切的人曾经这么做过。如同以前讲述过的一样,这跟胡克在战争期间发挥的作用形成了对比。后者抗击日本人,他们得到农民的支持对精英构成了一种政治和社会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当选为国会成员的胡克被他们的精英对手剥夺了他们在1946年选举中获得的席位。

237 独立后的菲律宾第一个选举出来的总统是曼努埃尔·罗哈斯。他是一个典型的精英成员,与该国强大的糖业利益有密切的联系。他在战前的共和国时期非常出名,并且与1943年日本给予菲律宾"独立"有联系。他与日本人联系的负面效应在得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支持后得以抵消。麦克阿瑟是美国在太平洋的总司令,在日本战败之后的几个月内,他在菲律宾发挥了类似总督的作用。

罗哈斯1946年当选为总统之后的几年里——他死于1948年——菲律宾的政治遵循了一条熟悉但令人沮丧的道路,让人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精英斗争,但是没有了美国殖民存在提供的政治缓冲区。确实,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在这个时期以及其后,美国对该国基本上由精英组成的政治结构的支持妨碍了改革。胡克对中央政府的权威仍然是一个危险的挑战,尤其是在吕宋,而且在后殖民协议中,贿赂和腐败被被认为是政治生活的一个正常部分。

对国会政治的挑战通常来自意想不到的地方:拉蒙·麦格赛赛,一个典型的非精英人物。与菲律宾政治中的很多人相比,麦格赛赛在战争期间曾经是一个积极的抗日游击队员。更突出的是,他是一个教师的儿子,后来为了谋生转行当了铁匠。他充分利用战时的履历进入政界,并且在1949年选举后的季里诺总统内阁中被提名为国防部长。在这个职位上,他重新发起了对胡克的战争,然后在1953年赢得了总

统选举。

当麦格赛赛提拔有才能的人进入政府的时候，精英对菲律宾政治的控制似乎可能被打破。事实并非如此。当麦格赛赛 1957 年在一场空难中去世，他曾经努力往政治中注入的很多变革精神随着他的去世而消失了。很重要的是，尽管他成功地消除了胡克的挑战，但是他承诺的大多数的土地改革还没有实行。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这些重要领域没有变化，对政治的控制仍然掌握在精英阶层手里。精英阶层从与大土地庄园的联系中获得财富和权力。尽管如此，从麦格赛赛总统任期开始，重要的变化在菲律宾经济的其他部门相继发生。随着多国公司抓住机会在菲律宾投资并与体制内的精英合作，城市地区的建设激增，尤其是在马尼拉。与此同时，随着相对的稳定代替了战时的混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高中毕业之后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238



费迪南·马科斯

作为 1965—1986 年菲律宾的总统，马科斯主导了该国家的政治生活，一直到 1986 年 2 月被推翻。照片采自《远东经济评论》。

在菲律宾，最终导致后殖民协议终结的事件发生在1963年。那一年，费迪南·马科斯通过选举获得参议院议长的职位。马科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律师，曾经谎称自己在战争期间是一个出名的游击队领导人。他利用参议院议长的位置来竞选总统，并在1965年获得了那个位置，进而宣布了振兴菲律宾的目标。在其第一个任期内，马科斯似乎可能实现他改变国民的目标。尽管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而且旧精英继续主导该国的经济，但是由于美国的主要基地都位于吕宋，菲律宾从越南战争中接受的财政副产品维持了表面的繁荣，虽然惠及穷人的好处非常有限。马科斯承诺更好的政府加上精明的选举回报足够确保他在1969年再次当选为总统，而且他也成为第一位连任两届的总统。他宣称的战时英雄主义仍然没有遭到挑战，而且他好大喜功的妻子伊梅尔达成功地树立了一个关心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形象，虽然她自己其实过着放纵奢华的生活。

239

在马科斯第二个总统任期的第三年，与后殖民协议的脱离到来了。尽管菲律宾的政治变幻无常，但直到那时，1946年引进的宪政安排在本质上仍然完好。于是，在1972年9月，马科斯脱离了这个既定的模式并且宣布戒严令。他说，这是为了维护民主以及迎接他所谓的一场危险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现实是非常不同的。离他第二个任总统任期的结束还有一年，而且宪法禁止他第三次参选。他深信他对菲律宾的将来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准备监禁几千名对手，并且没有让他们在法院挑战对他们的监禁。他知道精英中的许多人已经不断批评他的政策和其生活方式，他也知道精英的其他部分——尤其是与商业社区有联系的那些人以及军官团中保守倾向的成员——对他的观点抱有同情。中产阶级的舆论给了他的决定一些支持，而且那些为了城市和乡村穷人得到更好待遇而展开运动的人也从他明显乐意引进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的举动中看到希望。而且，随着理查德·尼克松入主白宫，马科斯宣称坚决反共产主义确保了他得到来自美国的支持。

240

实行戒严的积极方面很快被证明是脆弱和短暂的。随着马科斯的

总统职位更加牢固，他对改革的承诺越来越受到质疑。随着马科斯以一种后来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方式向他的亲信施与好处，土地改革的大胆想法同时也停滞不前。伊梅尔达·马科斯好大喜功的个人放纵以及不受约束地在过于盛大的宏伟建筑上花费国家资金，如打算增加政权声誉的旅店和文化中心，这些都典型地表现了马科斯时期的政治空洞。腐败放纵和裙带资本主义是首都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乡村的发展则正在威胁政府的权威。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复活的共产党正在获得新兵并且通过其武装组织——新人民军不断增加地区权力。与此同时，一直存在于天主教主导的马尼拉政府和该国南部岛屿，尤其是棉兰老岛的少数穆斯林社区之间的冲突正在变得越来越激烈。军队对这些挑战的反应通常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镇压，不区分国家的敌人和居住在正在作战地区的无辜农民。同时，经济发展也步履蹒跚，而且马科斯越来越受到慢性疾病的影响。他在 1981 年暂时取消戒严令，并且发起了一场腐败的总统选举，这场选举使他又再多得了四年的权力。

1981—1985 年间是现代菲律宾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随着经济突然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以及各省的安全越来越受到损害，马尼拉的政治生活变得更加离奇更加腐败。伊梅尔达·马科斯继续她的放纵生活，仍然声称自己是"小人物"的代言人；马科斯自己则长期缺席，因为他在接受治疗。军队中的重要成员继续支持马科斯，以换取这种支持带给他们的好处。这些成员由马科斯的左右手费维安·弗尔将军领导，他是马科斯的一个表兄弟，通过大力表现其忠诚，他已经从低级别上升到了上层等级。

一次残酷的暗杀之后，这个脆弱的"纸房子"开始四分五裂。1983 年，贝尼格诺·阿基诺，马科斯的一个公开承认的政敌，从美国的流放中返回，目的是为了挑战总统。当他在马尼拉机场下飞机的时候，一个有军队背景的枪手射死了他。这是结束马科斯统治的开始。阿基诺被杀激发了一个反对马科斯的广泛联盟，其中包括军队中心怀不满的成员、广泛的天主教社区中直言不讳的成员，以及许多(起初并不是全部)

241

强大的主教,这部分成员相当重要。这个联盟的领导是阿基诺的妻子科拉松・阿基诺。与她死去的丈夫一样,她强调了菲律宾政治的一些本质特点仍然没有变化。她是强大的许寰哥家族的一个成员,这是一个西班牙混血家族,在马尼拉北部的邦扳牙省拥有大量的土地。

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候选人领导了一场政治革命,阿基诺夫人被提名为反对派的候选人,在1986年2月举行的选举中与马科斯竞争。毫无疑问,通过公平计票,她在选举中获胜,但是越来越糟糕的是,马科斯及其支持者拒绝承认这是事实。结果是爆发了大众对马科斯及其政权的巨大怨恨,马科斯从前的盟友、数十万计的马尼拉人口,最重要的是,大量的宗教人士,包括神父和修女,都涌上街头抗议选举结果,并且要求马科斯离开。在起初的犹豫不决之后,马尼拉天主教派的海梅・辛大主教也对这些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与此同时,大多数军人拒绝对抗示威者。到了2月底,马科斯逃离了该国。阿基诺夫人正式就任总统。在某种意义上,后殖民协议已经得以恢复,但是马科斯统治下的戒严时期已经表明,1972年之前,菲律宾政治已经变得非常脆弱。这种脆弱性在1986年2月"人民力量"革命胜利之后还远远没有消失。

泰国

就如反复强调的那样,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没有经历殖民统治的国家。因此,去寻找"殖民协议"以及对什么时候脱离了它作出判断,就如我们在本章和前一章对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讨论一样,不是我们将要做的事。但是我们有可能描绘出从1932年政变之后影响泰国宪政历史发展的梗概。1932年的政变终结了一直存在于当地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非常复杂时期的要点:这一时期彼此竞争的政治集团在本质上几乎都是精英,都曾竭力塑造泰国的性格特征。尽管描述的事件具有鲜明的泰国特点,但是他们还具有东南亚其他国家所具有的一些普遍的相似性,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个人和集团都努力去为变化的时代找到新的政治答案。

242

尽管在1932年政变中发挥作用的一些人的目标非常激进——由

一个专业律师比里·帕依荣领导的一部分人甚至考虑建立一个共和国的可能性——20世纪30年代在泰国掌握权力的人仍旧非常保守。君主的权力已经受到限制，但是对该制度传统的尊重没有消失。一种包含有选举成分的政府制度得以建立，但是最终的权力却在军人和他们的文官合作者手上。尽管他们是保守的，但他们确实促进了一些进步的变化，包括施行普及的小学义务教育以及在乡村层次上削减税赋。

1938年，一个著名的军人披汶·颂堪获得权力，泰国又摇摆到了甚至更保守的政治局面，不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里都是很明显的。在披汶的领导下，泰国的价值观被提升到优于西方国家价值观的高度，并且存在对日本侵略性民族主义的钦佩(这也正是“泰国”这个名字被引进以代替“暹罗”成为该国名字的时候)。随着法国在欧洲战败，披汶抓住法国势力减弱提供的机会攻击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并且获得了对柬埔寨和老挝边界地区的控制。这提高了泰国的自豪感，但这也是日本调解的结果。到了1941年，日本在法属印度支那具有支配权力。1941年11月，日本使用泰国的领土对英属马来亚发动攻击，披汶的政府只能默许他们的行动，随后在日本的敦促下向盟国宣战。鉴于日本不可阻挡地向东南亚其他地方进发，泰国似乎坚定地站在日本阵营里，但它不打算加入日本一方参加战斗。它以前与西方打交道的经历表明，当作出妥协有利于维护其独立，而且没有其他行动方针的时候，泰国再次准备“随风而倒”。

243

三年后，战争接近尾声，而且日本的战败似乎不可避免，泰国的政策再次发生变化。通过精明的外交以及获胜盟国的精力被其他地方牵制，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泰国为其与日本的暧昧关系仅仅付出了很小的代价。它不得不归还在柬埔寨和老挝获得的领土，但是它成功地忘掉过去，这可以从该国1946年加入联合国反映出来。当这些发生的时候，泰国政治的“旋转门”属性使披汶再次成为总理，仅在1946年6月年轻国王阿南达神秘死亡之后失去了权力。1948年，随着军人继续在泰国政治中占据重要位置，此时已经是大元帅级别的披汶再次成为总理。在一个精英阶层很不稳定的模式中，1948—1951年之间，发生了

不少于4次由军人领导的未遂政变。披汶和他的政府在这些未遂政变中幸存,并继续统治到1957年,在新议会的换届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之后,他在一次由其长期的对手沙立·他那叻将军领导的政变中被罢免。

沙立对1957年选举出来的议会没有一点耐心,便在1958年解散了它。他的独裁倾向以及对泰国共产党的坚决攻击,由于他乐意在公务员系统内提升有能力的人以及加强泰国国王的作用而得到谅解。与此同时,沙立主持发展了与美国日益密切的关系。他的政策关注前法属印度支那国家发展的安全,但是作为一个主要的附加收益,这却促成了美国在泰国投资的增加。1963年沙立去世,接替他的是他侬·吉滴卡宗,军人主导的统治得以继续,与美国的关系也变得更密切。20世纪60年代末短暂的议会统治在1971年结束,他侬在军人保守成员支持下再次掌权。这样一来,泰国社会中那些不再乐意接受军人及其盟友拥有固有权利来主导泰国政治的人的愤怒即将爆发。

对这些安排的怨恨在1973年10月沸腾了,反对他侬及其副手的暴力示威造成了他的流放以及新议会的选举。这次事件证明了在泰国政治平衡中出现了新的元素:受教育的城市年轻人、增长中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以及期望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人。其中许多是大学生,他们热情地(即使有些不够现实),寻求为以前没有被代表的群体,如城市工人和乡村穷人等,拓宽民主参与的途径。在这个社会躁动以及共产党在整个印度支那获胜的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一个蓬勃的泰国议会制度暂时得到了巩固。但是在1976年10月,与警察和军队部门有联系的仍然强大的右翼和保守成员发动了反击。他们残忍地攻击曼谷法政大学的学生,声称学生推动了极端激进的政治。在这个混乱的时期,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学生逃亡到边远的农村地区。军人再次掌权,并任命了文官他宁·该拉威廉为总理。但是一年不到,军人再次行动,废弃了他宁,确立了他们自己的江萨将军为总理。

尽管当时还不是十分清楚,但是对江萨的任命的确标志着泰国政治一个真正转折点,相当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与后殖民协议的根本性脱

离。江萨在20世纪80年被另一个军人炳·廷素拉暖将军取代。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不曾想到一种议会民主会在泰国出现,但这最终确实发生了,江萨,尤其是炳,成功领导国家渡过了政治和经济难关。通过提供大赦,农村的不同政见者被鼓励返回主流政治,严酷的军事行动则是行不通的。曼谷政府逐渐表明自己乐意考虑农民的利益,尤其是居住在国家东北部贫穷省份的农民。但是1992年选举之后,曼谷发生了大规模暴力游行,因为当时军人似乎再次计划夺取权力。这证明了世俗民主化的趋势似乎已经确立,但是国王决定性的干涉确保了议会统治的继续。

考虑到这个背景,只有最乐观的人才会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泰国所有的问题。同时,它在这些年也确实坚定地走在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蓬勃发展的国家的道路上。21世纪开始的时候,它就成了这样的国家。尽管如此,目前存在的议会制度如果不经历进一步的根本改变,能否在将来继续存活则是一个未知数。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时候,东南亚已经有了8个独立国家。由于越南的侵犯,柬埔寨的独立受到严重的损害。越南的侵犯在1979年把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赶下了台,这是下一章研究的内容。但是在其他地方,或好或坏,独立的政府凭借广泛多样的宪政措施进行统治。文莱,技术上从来都不是殖民地,在1984年结束了其作为英国保护国的历史。东帝汶成了唯一一个独立要求被占领国(印度尼西亚)拒绝的国家。当柬埔寨再次获得真正的独立,已经十多年过去了。而对东帝汶而言,直到二十多年之后,独立的宝贵目标才最终实现。

246

第十四章　东南亚的独立挑战

前两章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东南亚各种后殖民协议终结的方式在每一个国家都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两个典型事例。置日内瓦条约背后的假设于不顾造成了越南战争的痛苦岁月以及可怕的生命损失。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短暂的后殖民联系，以及随后前者被联邦驱逐却没有造成两个国家的敌对，即使1965年以来他们之间的一些言语交流是多么激烈。因此，尽管我们有可能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以一般的方式来讨论独立带来的挑战，但是认识到每一个国家非常特殊的不同经历，及其领导人一直努力去应付一系列问题时的不懈努力，也同样相当重要。

我们已经提及人口迅速增长及其给东南亚政府带来的困难等相关问题。更多的人口意味着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服务和维持安全——在一些国家，对服务的要求已经超出他们的能力。无论什么时候讨论人口增长问题，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尤其是爪哇岛，都是焦点。因为印度尼西亚不仅拥有东南亚最多的人口，而且该国几乎一半的人口都集中在（247）爪哇岛，据估计，目前印度尼西亚人口已超过2.2亿，到2025年将增加到2.75亿，而最悲观的估计是，到21世纪末，其人口达到4亿时，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增长才会稳定。不过，印度尼西亚的人口增长率在过去的20年已经变慢了。

不仅印度尼西亚必须应付人口规模增加带来的后果，泰国发现自己开放边界已经不再合理，因为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对农业用地的需求也继续增长。人口压力在菲律宾已经成了一个重大问题。菲律宾天主教会的独特作用以及其反对避孕措施，都意味着该国的人口在接下来的30年里将翻倍。迅速的人口增长也发生在更小的东南亚国家。尽管柬埔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遭遇了可怕的经历（我们将在本章后面部分谈论这个问题），它的人口在1979年波尔布特被推翻的时候大约有800万人，到了大约2025年，其人口将可能在目前将近1 000万的规模上增加一倍。

扩展教育，遏制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威胁，提供充分的医疗保健——所有这些都是东南亚独立国家曾经宣布的社会目标。但是这些目标花费高昂，对国家预算需求极大，而国家预算经常会明显受到世界经济局势中变化的模式以及把一个殖民地经济转型为国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的和不利影响。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从石油和铜到橡胶和锡，应有尽有。找到一种方法来开发这些资源，并且发展一种能够在管理成本和大约2.2亿遍布从苏门答腊到巴布亚（以前的伊里安查亚）广阔土地的人口之间实现平衡的经济方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同样可以适用于该地区的其他地方，即使它们规模较小，因此政府必须建立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优先事项，找到有能力的人去管理已经决定了的项目，以及找到资金把计划变成现实。在追求他们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外来的援助对整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 248 是重要的，不过对其重要性也不应高估。在最后的分析中，东南亚经济发展问题的应对是成功还是失败，将由该地区的政府和民众，而不是由外来者来判定。

无论经济成本是什么，决心作出自己的决定，这一直是缅甸独立的大部分时间里该国政府出台政策背后的哲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强调自给自足和限制外国经济活动的政策才开始放松下来。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本是相当大的，而且该地区没有一个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学习缅甸的做法。

在这个背景下，除了严苛的经济问题和花费高昂的基本医疗和教育领域的社会项目之外，东南亚的独立国家还面临一系列同样非常严重的问题，它们与获得和保持国家统一有关。我们没有夸大：没有一定意义上的国家统一，独立国家的所有其他目标都处于危险之中，即使某些目标已经实现。对该地区的所有国家来说，努力去实现国家统一已经成了获得独立以来的主要任务。

对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而言，获得和保持国家统一的问题曾经存在于两个层面上。一方面是形成一致的全国政府形式——涉及社区内的哪个集团或者哪几个集团应该掌握权力，以及应采用什么样的限制条件等诸类事务。另一方面是与地区和少数族群利益有关的问题——即中央政府的利益是否应该超越国内一个集团或者地区的利益，这个问题已经成为无休止辩论的核心，有时候甚至会引起武装斗争。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后一类问题——多数群体与少数族群，或者中央权力
249
与地区之间的冲突——也许更容易理解。在西欧，以及更明显的苏联和南斯拉夫，一定程度的地区和少数族群利益还没有消失，这些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即使在 30 年前，西欧的发达国家还存在一种藐视地区和少数族群利益重要性的倾向，但是在 21 世纪开始的时候，没有政治研究者会采取这样的立场。英国作为所有西欧民主国家中相对最稳定的国家之一，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已经表明在一个政府上统一的国家内，他们地区的特殊利益不能仅仅通过伦敦的中央议会来满足。佛朗哥的专制结束之后，地区利益的重要性在西班牙得到了更明显的展示。在这方面可以考虑一下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期望和要求。巴尔干地区再次成为战争的舞台对我们是个有益的提醒：与种族和宗教身份相联系的冲突不是不发达地区的专利。

因此，当我们发现地区主义和与中央政府的目标不一致的少数族群的利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一部分当代东南亚国家的主要问题时，不应该对此感到过于惊讶。例如，缅甸中央政府面对的问题不是真正的新问题，尽管有新元素涉及其中。缅甸有大量少数族群，他们希望独立地生活，或者至少是半自主地生活，而不是被仰光的中央政

府控制，这其实是一个漫长历史事实的延续。缅甸几个世纪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缅族人将他们的统治强加给非缅族成员的努力，以及对这些努力的抵制，这已经成了缅甸的主要特点之一。在过去，缅族人成功地建立了对构成缅甸多样人口的掸族、克钦族、克伦族和其他少数族群的脆弱控制。随着英国统治的离去，国内占主导地位的缅族人与其他族群旧的紧张关系再次出现，并且在独立60年之后仍旧成为一个相当显著的问题。

地区问题是菲律宾当代历史的一个持续特点。这个事实提供了另外一个例子：一个独立的东南亚国家如何不得不去面对一种从明确的历史先例中发展起来且在后殖民时期已经呈现出新的更具挑战性特点的挑战。在西班牙和美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菲律宾的南部岛屿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在菲律宾北部，天主教的西班牙统治者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使菲律宾成为东南亚唯一一个基督教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不过在南部，存在一个不同的世界，而且事实上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因为在菲律宾南部岛屿，当西班牙人到来的时候，伊斯兰教已经确立。伊斯兰教的信仰——大约5%的当代人口的宗教——支撑了菲律宾南部大部分的人口，使他们感觉自己与他们的北部天主教同胞是割裂的。这种认同感的割裂造成了一些问题，但是只要马尼拉政府(不论执政的是西班牙人、美国人还是最近的菲律宾人)不试图强加严格的规则，就能够找到方法来平衡中央政府和南部伊斯兰教信徒之间的利益。菲律宾的独立政府一直致力于将自己的权威强加到南部伊斯兰教地区。而且，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信奉天主教的菲律宾人开始在南部地区定居，而这个地区过去的人口大多数是穆斯林。结果，马尼拉政府和分离主义穆斯林集团之间的争斗至今仍然没有解决。简单来说，这是在国家的中心地带相信国家的完整需要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那些人与在外围地区不与掌权群体共享利益和宗教，即不认同前者的那些人之间的冲突。菲律宾南部抵制中央政府的那些人不认为他们是乐意被马尼拉领导的那些人所处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和共同义务的一部分。

250

这种认同感的缺乏能够在东南亚其他地方找到。泰国南部的伊斯兰教少数族群提供了同样的例子。这些伊斯兰教的马来信徒居住在一个缓冲地区已经很多年了。泰国的统治者声称对这个地区拥有权威，251 但是很少实施它。伴随着英国殖民推进到马来亚，领土被调整，大量的马来人、伊斯兰教的信徒，发现自己处在泰国的统治之下。这个王国正日益渴望在国内形成一个行政统一体。泰国伊斯兰教少数族群的人口比例——总人口的大约4%——比菲律宾的要小些，但是他们带来问题的本质是非常相似的。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曼谷的泰国政府——泰人，佛教徒，而且目标是中央集权——不能被轻易地认同为是他们的政府。从曼谷统治者的观点来看，王国领土内的伊斯兰教信奉者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没有任何特权。紧张和冲突的潜在威胁是很明显的。

泰国政府在处理其北部部落少数族群问题的时候，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即使没有那么严重。直到最近，居住在泰国北部的苗族、克伦族、阿卡族和其他山地民族仅仅与泰国的行政机构保持着最有限的联系。山地民族居住在偏远的很少被泰人访问的地区，遵照他们自己的习俗，种植他们自己的专门作物(包括鸦片)，并且与低地地区进行贸易。在一段时期内，当曼谷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对边境地区进行日常控制，而且缺少人口压力使得低地的泰人没有兴趣将他们的农业定居点扩张到山地地区的时候，这样的安排是可能的。不过，时间的推移给泰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样也给山地民族和曼谷政府的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过去40年，泰国逐渐开始建立对其北部边境地区的明确控制。因此，政府在该地区的存在一直在增加，而且，山地民族与警察、海关当局以及国家的许多其他机构第一次增加了持续联系。与此同时，泰国人口的迅速增长造成了泰人到该地区的定居，而该地区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山地民族的专有地盘。

尽管面临各种少数族群带来的问题，泰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252 的经历还是无法跟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威胁相比。本书早先已经指出了，东南亚大陆国家与海上地区之间的巨大

差异之一是，东南亚大陆国家非常普遍地拥有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人口群体和不同数量的少数族群，而海上地区，尤其是印度尼西亚，是由一系列种族群体构成，因此没有一个单一群体如泰国的泰人那样明显地占据主导地位。当人们观察20世纪50年代后期印度尼西亚地区利益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的时候，这个对比必须牢记。在海上地区，发生的不是对主导种族群体的一次未遂反叛——就像缅甸的掸族人和克伦族人那样，当时他们对抗的是缅族人。相反，是在远离爪哇的岛上拥有地区利益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试图挑战雅加达中央政府的权力，而这个中央政府得到了各种种族背景的印度尼西亚人的支持。叛乱分子通过采取行动，宣布他们认为的地区利益——尤其是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人的利益——比来自雅加达的强大中央控制的国家利益更为重要。尽管有来自外部力量的秘密支持，叛乱分子还是失败了，印度尼西亚的统一特性得以维护。尽管如此，反叛表明了地区利益是印度尼西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并且展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分裂和不团结的风险。

这个判断已经被20世纪90年代苏门答腊北部重新出现的"自由亚齐"运动进一步证明，这将会继续挑战以雅加达为核心的政府统治。亚齐长期以来的特征就是其特殊的身份感，其标志就是承诺比爪哇很多地方更严格地遵守伊斯兰教规。这种对伊斯兰教的忠诚已经使亚齐被称为"麦加的走廊"。在抵制荷兰殖民挺进的所有印度尼西亚地区中，没有一个地区的抵制比亚齐更强烈，在那里，民众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顽强抵制。该地区大大有助于印度尼西亚的石油财富，而且亚齐人口中的许多成员认为他们没有从来自他们地区应得比例的国家预算中受益。而且亚齐不是唯一质疑雅加达政府代表他们作出决定权利的印度尼西亚地区。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屿的西半部分——是另一个地区，而东帝汶的发展已经表明，弱小但有决心的民众也有可能从印度尼西亚国家那里要求并获得独立。 253

寻求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已经产生了许多政治公式。东南亚的各种国家在努力寻找一种政府制度来满足每一个独立国家个别需求的过

程中，对这些政治公式进行了尝试，遵循或者背弃了它们。考虑到东南亚国家与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历史以及该地区政府面对的不同压力，完全遵守西方的模式基本是不可能的。西方议会制度已经发展了数百年，仅仅 20 世纪的历史就已经表明，许多欧洲国家的民主议会制度可能是多么脆弱。而且在西方，普选是一个 20 世纪的现象，除了个别例外。

当我们观察东南亚国家在关于他们应该如何被治理上作出不同选择的时候，下述事实需要铭记在心。现代东南亚的三个非共产主义国家——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军队长时期与政府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宣布的戒严法依靠军队的密切支持来保证其有效性。在每一个例子中，军队在社会中的角色非常不同于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分配给军队的传统角色。在这些东南亚国家中，军队已经扮演了并且正在扮演着重要的政治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只有武装力量可以信任，因为它们把国家利益放在局部利益之上。

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苏哈托政权的终结已经显示了该观点的局限，但印度尼西亚军队还是继续把自己视为从荷兰获得独立的革命的保卫者，并且通过参与政治来寻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苏加诺统治期间，军队对政党的派系斗争越来越失望，并且更关注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的增加。如前面叙述的那样，这导致了苏加诺的下台以及他们的自己人——苏哈托将军就任印度尼西亚总统。军队在 1965 年获得权力之后的可怕事件说明了现代东南亚的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激发激情和暴力。尽管印度尼西亚军队确保自己取得对行政当局的严格控制，但民众内部数以万计的反共分子抓住机会发起了对他们政治敌人毁灭性的打击。

254

印度尼西亚的这些事件强调了，权力应该在哪里及其应该如何被实施的政治发展和决定通常与西方的议会模式没有什么关系。被西方国家接受的“规则”似乎并不适合东南亚人的情况。也许确实使用了投票箱，而且也遵循了议会形式，但是通常制度却允许掌权的政党或者团

体去确保它保留这一权力。例如在泰国,军队仍然是当代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与越来越多利益集团相关联的政党制度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从独立以来一直主导马来西亚政治的马来政治家无意改变允许国内华人少数族群成员参与政治的制度——事实上是获得高位,但是不允许他们发挥平等伙伴的作用。在文莱,1984 年完全独立之后,与王室有联系的统治者实行了专制统治,没有显示出任何引进一种参与的政府形式的意愿。

只要东南亚现存政府面对的挑战包括议会外行动,如叛乱以及反对一个法律的性质,那么一个外部观察家就会期望这些政府在寻找实现他们目标的方法的时候,会奉行最适合他们判断的而不是与西方任何模式一致的方法。外部对东南亚人没能坚持行为的最高标准的批评,比如人权和不受约束的议会民主,也许会导致政治过程的一些修正,但是不可能成为整个决策过程中的一个决定因素。 25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东南亚各个国家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来自政治左派,来自以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作为行动指导的共产主义。考虑到一直困扰东南亚地区很多地方的不稳定以及已经存在过而且仍然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的巨大问题,人们认为应该存在一个激进的左翼来挑战本质上经常保守的政府,这是不足为奇的。不过,尽管越南战争具有巨大的重要性,但是不能就此认为共产主义已经在整个东南亚成为一种同样强大的力量。因此,尽管共产党在现代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政治中发挥了作用,但只有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有共产党政府上台。

在介绍东南亚一般历史的书中,一章的内容不可能完全包含关于越南共产主义的所有问题。相反,相对于柬埔寨和老挝,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尤其是柬埔寨,我们仍然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过去 40 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对于 1953 年独立前和独立后的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知识的缺陷正在慢慢被填补,但是对于为什么一个令人震惊的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最终能够在 1975 年获取权力的解释还是不完整的。我们对印度支那每一个国家的了解是,它们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以来的

经历非常不同于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总之,共产主义政府在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掌权的事实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该地区其他地方左翼政治的本质,无论是其过去还是对其未来的预估。

越南共产主义者最终成功地在整个越南建立一个政府的事实反映256了斗争和有效组织的一个长期历史。在法国殖民统治期间,寻求在反对殖民统治中发挥政治作用的所有团体中,只有共产主义者不仅能够在法国严酷的镇压下生存,而且能够表明他们有一个关于越南殖民状况事实的连贯计划。虽然这与是否认同越南共产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无关,但是,就如本书以前所论述的那样,历史讨论的是已经发生了什么而不是也许会发生什么。在越南,共产主义者凭借杰出的领导才能,有时候包括无情地镇压他们越南对手的政治技巧,以及遵守一个对法国殖民主义带来的问题提供了清晰答案的政治纲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变成了在越南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团体。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只是进一步巩固了它的地位。1954 年之后美国在越南南部扶植与之竞争的越南政府时,没能考虑这样的事实:不论一个外部国家能够提供多少物质援助和军事援助,在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越南,没有其他的运动能够在政治领域挑战共产主义者。

当然,越南共产主义者确实通过军事手段获得了最后的战争胜利,但是如果没有越南北部的政治凝聚力,那些军事手段不可能成功。而在战争持续很多年的南部地区,可以看到随着战争的继续,共产主义者如何成功地建立对人口的政治控制。不过,对于下面的事实没有争论的空间:在 1954—1975 年西贡的许多任政府中,没有一任政府能够展示一种把人民大众与其追求的目标联系起来的能力。与共产主义者追求的国家目标相比,非共产主义者在南部越南的政治特征是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吵,以及无法形成如共产主义者那样以国家目的为己任的追求目标。

这种目标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但是统一的越南的内部和257平很快地暴露出,这么长时间一直致力于打仗的越南共产主义领导层缺少应对新状况所需要的经济管理技巧。南方与越南北方长期和痛苦

的分离的代价引发了特殊的问题，表现得最醒目最悲惨的就是难民潮，他们主要来自南方，试图从一个他们认为自己无立足之地的社会中逃出。越南共产主义领导人反复强调他们把独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且他们也确实在 1975 年获得独立。在随后的年份里，河内的领导人有时候似乎除了独立之外不能给其民众提供其他东西，因为他们实行的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紧缩。只有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河内政府才开始从事一个经济自由化项目，并时断时续地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是仍然没有任何与之相匹配的政治控制的放松。

在 30 年的战争和 40 多年的政治运动之后，共产主义者在越南的最后成功才到来。在现代东南亚历史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的经历，诚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老挝的事件有某些相似点，因为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巴特寮军队参与了一场政治和军事斗争，这场政治和军事斗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开始的，并且持续到越南共产主义的胜利，它确保了老挝也将有一场共产主义者的胜利。得出这个看法不是要贬低老挝元素在老挝发生的事件中的重要性。但是，忽视老挝军事运作与越南发展密切关联的程度将是愚蠢的。因为这里确实有一个关于历史连续性的重要例子。老挝传统上一直扮演着越南和泰国两个强大国家之间的缓冲国的角色。为了确保老挝共产主义力量的胜利，越南也在追求长期以来的历史政策：确保没有其他敌对国家能够在老挝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尤其是在与越南接壤的那些地区。

不过，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在老挝获得权力在某些程度上可以视为越南发展的脚注的观点也不能完全适用于柬埔寨。那么，如何解释柬埔寨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一个君主制国家到 70 年代中期确立一个激进的革命政府的重大变化？一开始就承认我们对于柬埔寨在 60 年代所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是明智的。在 60 年代，诺罗敦·西哈努克似乎主导了政治生活，但是现在很清楚的是，有一个正在缓慢发展的团体正在准备为一场共产主义革命而斗争，只等使这场斗争变得可能的条件成熟。我们对于西哈努克亲王在 1970 年被一场右翼政变推翻之后的发展的了解也是不完整的。不过，我们知道足够勾画出主要发展的

258

粗略纲要。

对于关注西哈努克亲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统治情况的许多外部观察家来说，他似乎已经相当成功地找到了确保控制国内政治和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一种政府形式。现在看起来，这个成功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错觉。在内部，西哈努克没有在他的国家为那些不同意其政策的人提供空间。对于曾经信奉左翼政治的那些人，这逐渐意味着仅仅有两个选择：人们或者保持沉默或者消失到农村，加入到数量虽小却不断增多的一群人中，他们正在等待时机，希望变化的情况也许使其有可能夺取政权。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右翼的政治家最终在1970年把西哈努克赶下了台，而且这件事为东南亚近现代历史中左翼团体为获得权力而进行的最痛苦的斗争之一做好了准备。

右翼政变之后，柬埔寨卷入越南的战争中，因为美国试图为撤军而拖延时间。1970年美国对柬埔寨的入侵引来了越南的反应，因此金边的新政府发现它不得不去面对越南共产主义力量和左翼柬埔寨人的挑战。左翼柬埔寨人此时已经公开为他们控制国家的目标而斗争。1972年底之前，越南共产主义者在抗击金边右翼政府中的作用局限在为红色高棉(柬埔寨)供应和培训援助。柬埔寨国内战争陷入一种流血模式，在美国的大力协助下，包括以无与伦比的强度进行轰炸，金边政府直面数量小得多但具有献身精神的左翼敌人。如果拥有人数优势和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就能够赢得战争，那么金边政权应该获胜。它的军队人数远超左派，左派也许从来没有超过6万部队为他们的事业战斗。但是战争的结果同样取决于其他东西。柬埔寨左翼力量在面对极端不利的条件的时候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努力——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还不清楚。相反(有一些明显的例外)，金边领导的右翼力量缺乏有效的领导以及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一种普遍信念。

259

随着战争的持续，很清楚的是，冲突的双方的广泛暴行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例外。也许左翼力量把使用严厉的暴力手段来对付平民和士兵视为人数上处于弱势一方的必要武器，但也有可能，他们使用暴力不仅是为了抗衡金边力量的暴力，也是为了回应美国飞机的残酷轰炸。

不论是什么理由，随着战争继续下去，双方对战士和平民的政治暴力和暴行加速升级了。似乎清楚的是，这些绝望时刻的经历增强了左翼领导人的信念：一旦战争结束，就不可能有妥协。柬埔寨将被完全改变，而且不惜以人的生命和痛苦为代价。

的确，1975 年 4 月夺取政权力之后，金边新的激进政府致力于社会的全面转型。在波尔布特的领导下，民主柬埔寨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政策，目的是消除外国和资本主义社会腐化影响以及实现柬埔寨农业的自给自足。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只能慢慢为外部世界所了解，因为红色高棉胜利之后的柬埔寨基本上与外国游客隔绝了。不过，逐渐变

260



挖掘出的头盖骨(柬埔寨)

整个柬埔寨的大众墓穴是波尔布特对柬埔寨暴政时期可怕的遗产。1978 年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后，许多这样的墓穴被挖掘，而且波尔布特统治时期受害者的头盖骨已经按照坟墓分组，将 1975—1979 年被处死的数十万计的人作为一种提醒。这幅照片中的头盖骨和骨头发现于金边附近的一个墓穴，1981 年末被挖掘出来。

得清楚的是，波尔布特和他的合作者们准备使用令人震惊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民众在极端残酷和痛苦的条件下被迫撤离金边只是政府发起行动的一种开始，这些行动的特点是残忍和无视人的生命。大批柬埔寨人被驱赶到巨大的农业合作社里，被迫在不人道的条件下工作，随时会有遭到惩罚的风险，包括因极轻微地触犯了当时实行的严酷规则而被处决。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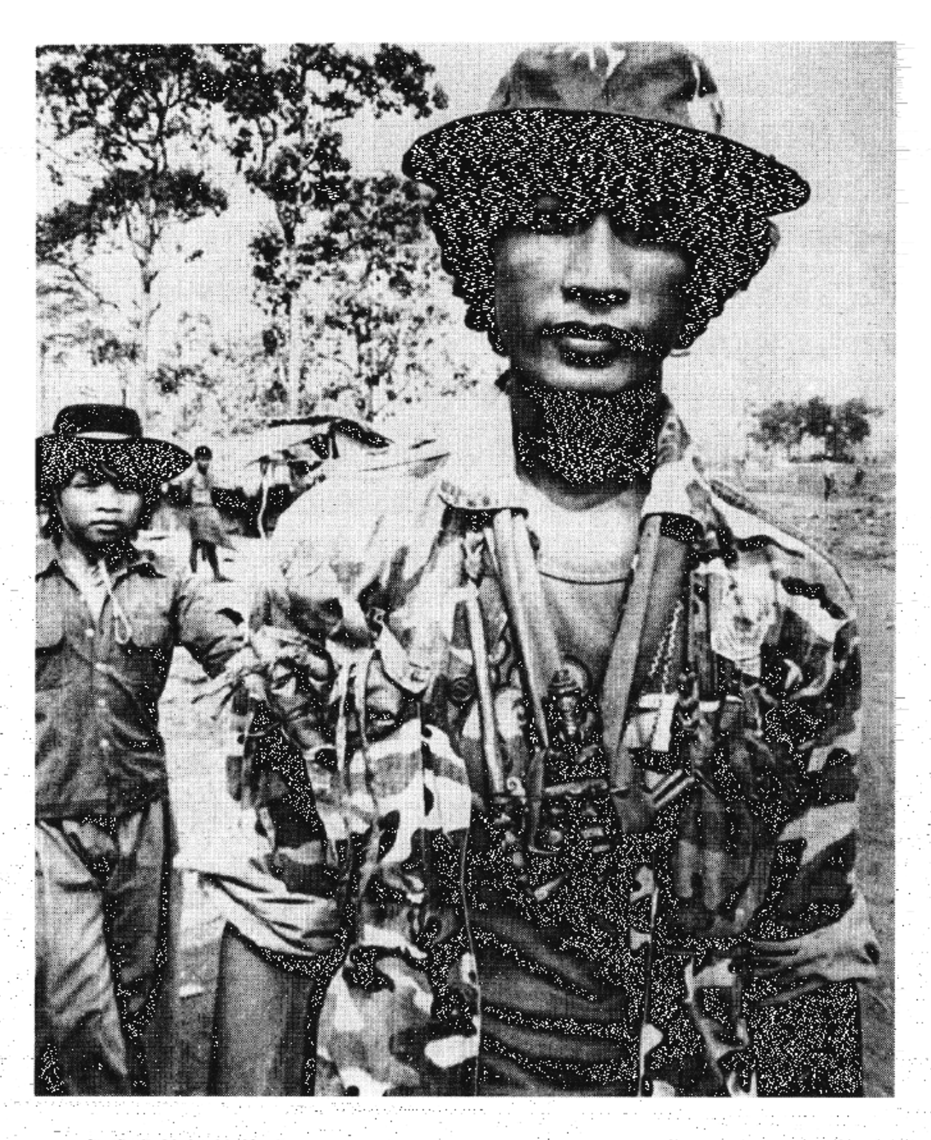
柬埔寨难民在泰柬边境等待分发食物

1978年年底，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波尔布特政权，随后难民逃亡到泰柬边境。超过20万难民集中在边界附近，他们的生存取决于国际援助。这幅照片中的难民正在1980年的农陈营地等待分发大米。

我们仍然需要对波尔布特政权统治柬埔寨的时期做更多的研究。在柬埔寨国内，不同的行政管理地区在残忍程度上似乎存在一些差异。而且也许永远都不可能让人完全确定：在一个把对国家的忠诚置于所有其他道德标准之上的社会中，所发生的处决里有多少是政府指令的结果或者个人决定的结果。不管实情可能是什么，生命的代价是惊人的。永远不会清楚到底有多少柬埔寨人在波尔布特统治期间被处决，也不可能绝对确定由于柬埔寨民众可怕的生活条件，1975—1979年间发生了多少生命损失。知情的观察家目前认为，由于民主柬埔寨政府实行的政策，有超过两百万柬埔寨人死亡，其中50万—100万人也许是被处决的。

波尔布特和他的合作者可能继续他们对柬埔寨的血腥统治多久是本书已经提出的实际发生了什么的许多替代性可能中的另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是波尔布特政府的统治也许会继续其可怕的道路很长一段时间。现实的情况是，波尔布特及其同事决定去挑战越南对南部地区的控制，这引发了越南最终在1978年底决定入侵柬埔寨，并且让其门徒领导金边政府。越南的入侵对柬埔寨来说是一个悲惨的解脱。

262



柬埔寨的抵抗战士

1978 年年底，越南开始入侵柬埔寨，之后许多柬埔寨抵抗团体在泰柬边境建立。这些抵抗团体中最大的是波尔布特军队的残余，其余的则忠诚于西哈努克亲王和其他非共产主义领导者。这幅图片中的抵抗战士是高棉人民民主解放阵线的成员。他的脖子戴着护身符和印度教神甘奈沙作为驱除死亡的咒符。

尽管已经绘出了柬埔寨历史最近的发展过程，但是问题仍然存在。263 一个暮气沉沉的王国，即使包含了超乎想象的社会不平等，又是如何变成如此痛苦的斗争舞台？如果当时的美国政府没有采取行动确保柬埔

寨全面参与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那么事态的发展过程会有不同吗？是斗争年代的痛苦造成了新柬埔寨领导人坚定地不计任何代价地去实行其激进的计划？我们必须提出这些问题，但目前不可能绝对肯定地回答它们，这个事实清楚地证明了在现代东南亚历史中存在我们仍然无法掌握的知识领域。如果没有别的，我们所了解的柬埔寨的最近历史把它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分离开来。共产主义来到柬埔寨的方式几乎没有告诉我们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拥护者可能成功还是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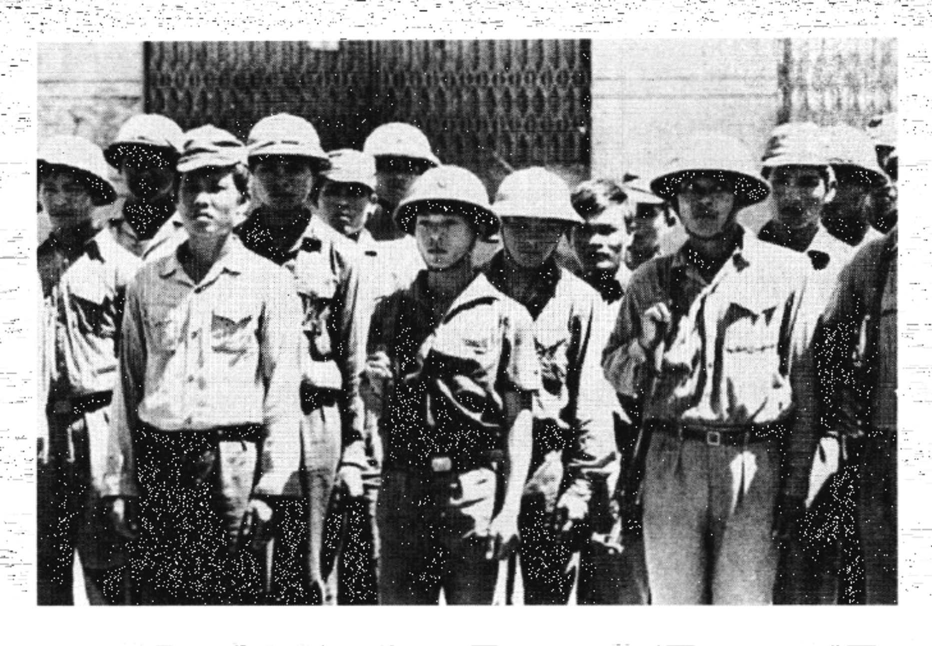
共产主义在三个印度支那国家胜利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共同利益的增强，以及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与共产主义国家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之间事实上的分裂。东盟在 1967 年就成立了，其根本目的就是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但是一直到 1976 年，东盟才举行其第一次领导人峰会，东盟的领导人希望建立一个更协调的政治回应来应付东南亚不断变化的战略形势。在这个时候，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的胜利给了他们新的动力。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开始于 1978 年底，进一步巩固了东盟在处理共同问题(出现了一个越南主导的印度支那)时，将其作为共同利益进行协调的政治方法。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缅甸是东南亚唯一一个不是东盟成员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由于没能取得会员资格，缅甸遵循其既定政策，避免与该地区的任何大国集团结盟。与其相反，文莱在 1984 年实现独立后加入了东盟。

264

不过，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东南亚，作为事态迅速发展的标志，缅甸、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 20 世纪末都已经成了该组织的成员。这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和苏联对抗的结束，因为后者的崩溃迫使该地区的共产主义国家调整他们的对外政策，不仅是与他们东南亚邻国的关系，还有与中国的关系。以缅甸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它的领导人决定加入东盟是希望该组织的成员身份可以尽量减少要求该政府采取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更尊重人权的压力。

265

越接近今天，东南亚的历史就越复杂，或者总而言之似乎变得更复杂。研究中拥有太多事实的困难似乎与研究中掌握太少信息的困难相



越南在磅清扬的新兵训练

越南入侵柬埔寨终结了波尔布特的专制统治，但是柬埔寨成了一个被占领国。战胜了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之后，越南共产党在他们入侵之后的柬埔寨面对着一个新的敌人，因为柬埔寨抵抗力量包括共产主义者和非共产主义者，他们沿着泰柬边境建立了基地。许多在柬埔寨的越南军队来自南方，照片展示了1981年末新兵在磅清扬训练的场景。

当。可以肯定的是，对东南亚各国独立情况的研究表明，不论人们在整个地区找到多么广泛的相似点，比如确保国家统一的问题，该地区单个国家的发展细节经常是非常不同的。一个研究者越关注更近的时期，就越是难以进行笼统概括，因为有特定的问题和发展需要注意。尽管如此，认识到现代东南亚历史的一般特征仍然是必要的。在这个地区，各个国家共享了过去历史的许多共同特征，因此也有必要明白，它们最近经历的广泛模式通常是非常相似的，不论哪种经历的细节是多么不同。

对东南亚所有国家来说，现代时期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是努力在当前的要求和过去的价值观之间取得平衡的一个时期。持怀疑态度的观察家也许认为，世界上的其他（实际上所有的）地区也是如此。不过，有一点不同，因为对东南亚的各个国家来说，走到今天这一步并

不总是以东南亚人的速度来进行,泰国是个相对的例外,在19世纪的许多时候和20世纪的上半叶,东南亚许多地区的发展速度大多受到外来力量的影响,而且有时候几乎完全受到外来力量的控制。这个观点并不意味着东南亚人不是他们自己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恰恰相反,这只是承认一个事实:欧洲和美国殖民主义的影响在生活的一些领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随着殖民控制时代的结束,东南亚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作出自己的决定,而且能够决定应该如何依靠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如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种状况的结果并不总是东南亚人自己所期望的,更不用说外部观察家了。

266 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们将考察东南亚历史最近的发展,并且努力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东南亚现代历史的要素有哪些?

第十五章　东南亚现代史：对当代和近现代历史的概述

267

本书中对东南亚历史的变化与连续性相对重要性的强调，有时候一个方面似乎比另一个方面更重要，而且有时候两者似乎都对事件的展开发挥作用。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观点。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受益于这种方式：他给人的印象是其行为和政府风格反映了爪哇统治者的传统品质。而且关于同一个时期柬埔寨领导人诺罗敦·西哈努克，我们也可以作出类似的评论。不过，一个特定领导人反映传统价值观的能力还没有成为该领导人站在重大变革最前沿的一个障碍。越南的胡志明可能也被认为拥有儒家的简朴和文学能力等传统领导品质，但是他也领导了一场给越南带来激进变化的共产主义运动。

当我们研究东南亚地区最近历史的时候，必须铭记下述观点。因为就如同后殖民地协议的终结代表了与过去的重大脱离，最近几十年的事件也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变化是东南亚现代历史一个至关重要的持续特征。由于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变化速度，最近的一些重大发展在前几章已经描述，一些重大发展（尽管不是全部将）在本章再次被提及。本章不仅提供了对近期发展情况的概述，还提供了对东南亚现代历史的广泛主题的一些反思。

268

重大政治变化

就东南亚最近的历史而论,没有什么发展比 1998 年苏哈托政权崩溃之后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变化更重要的了。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苏哈托政府制造的繁荣下显然隐藏着重大的问题。作风日益独裁的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标志是国家暴行,这受到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的怨恨,尤其是大量的学生,他们发现他们所受的教育不能保证未来的就业。随着暴露出来的腐败在 1997 年开始发展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散布,苏哈托的一些关键同伙与总统拉开了距离。于是,面对着反对其统治的大量示威以及军队撤回支持,苏哈托被迫辞职。

随着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制度引进更民主的新法律,在苏哈托辞职之后,三任总统已经迅速地依次就任——第一位是苏哈托的前副总统哈比比,然后是瓦希德・阿卜杜勒・拉赫曼,最后是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翠,她是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的女儿。分离主义抵抗运动在亚齐和巴布亚继续存在,以及 2002 年 10 月巴厘岛恐怖分子实施的爆炸,这些都已经清楚地表明,印度尼西亚民众的生活和过去很多时间一样动荡。

早在巴厘岛爆炸案发生之前,东帝汶的戏剧性事件已经给整个印度尼西亚带来了冲击。随着不断增加的国际压力要求其改变对东帝汶的政策,而且在那片领土上存在着持续的抵抗游击战争,哈比比总统在 1999 年宣布允许东帝汶人在独立问题上投票。尽管经常受到印度尼西亚的恐吓,东帝汶人还是以压倒多数投票支持独立。这个结果导致印度尼西亚军队和他们在东帝汶的支持者进一步实施暴力。尽管如此,亲独立的投票使一个临时的联合国权力机构得以设立,其任务是为东帝汶独立做准备,这个目标最终在 2002 年 5 月实现。

269

在缅甸,某种变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变得明显了。对其军事领导人来说,这个东南亚最孤独的政权确实不准备接受一个民主政府。尽管如此,变化还是发生了:在仰光掌权的那些人试图扩展他们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尤其是与中国和泰国,这是几十年来的

第一次。

20 世纪 90 年代，在苏联解体之后，柬埔寨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从而迎来了一个摇摇欲坠的和平。苏联在此前支撑着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几乎没有人在 1990 年之前预测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出之后，联合国会在那个国家发起选举，而红色高棉作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地位在缓慢但稳步地下降；更不可能预测到，越南将成为东盟的一个正式成员，不过这是在 1995 年(缅甸和老挝在 1997 年加入了该组织，柬埔寨在 1999 年成为其成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泰国的城市骚乱和示威游行成为头条新闻，但是在整个 80 年代，大部分泰国民众缓慢但稳步地拥抱了民主的理想，这些在塑造该国的政治未来上比军人恢复其在该国政府中优势地位的不成功努力要重要得多。在马来西亚西部，由于 1984 年和 1993 年的宪政改革，在牺牲传统的统治者苏丹利益基础上，权力在马来西亚议会得到巩固，尤其是行政权。这个重要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被马来西亚之外的世界忽视了。

经济危机

所有对最近历史的概述都不能忽视 1997 年笼罩亚洲地区的经济危机，它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尤其具有破坏性。印度尼西亚在 1965 年是一个经济崩溃的国家，大约 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在经济上似乎是安全的，其公民贫困的比例减少至不到 20%。但是，不久之后的情况便很清楚地显示，国家的很多繁荣都不可靠，而且当东南亚的经济命运开始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些繁荣的泡沫就迅速地破裂了。 270

印度尼西亚是这场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受害者。这场经济危机现在被认为是开始于泰国。在泰国，该国的国家银行和其商业伙伴被发现一直背负着大量的不良贷款，且储备严重枯竭。不过，其实整个东南亚都具有类似的特征。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的现象到处都是：政府的政治家与商业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政治家在给予商业合同和许可

证上照顾他们的支持者，通常不考虑正在促进的商业的经济活力。这些做法加上例行腐败以及投资大笔金钱到非生产性企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高尔夫球场)，都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一旦资本流动受到限制，一个接一个的商业活动失败了。

然而，起源于亚洲经济危机的所有严重影响证明，该地区具有相当大的弹性：经济危机开始之后 5 年多的时间，许多影响已经消失。认识到这一点是有益的。尽管已经发生的大部分复苏在本质上是脆弱的，但认为东南亚将在煎熬中萧条许多年的预测被证明是过于悲观了。

人口统计

在 21 世纪开始的时候，东南亚仍然是一个拥有巨大多样性的地区，人口统计强调了这一点。柬埔寨和老挝的平均寿命是 51 岁；而它们的邻国泰国，平均寿命是 69 岁，两者差异明显。毫不奇怪的是，由于非常特殊的城市性质以及较高的生活水准，新加坡的平均寿命是 74 岁。作为一般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长期稳定的一个指数，苏哈托统治在其他方面不受欢迎，印度尼西亚的平均寿命目前是 63 岁。

271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东南亚变化特征的强调。统计数字表明，城市化已经使东南亚不再是一个乡村占压倒多数并且以农民为基础的地区了。尽管大约 80%的柬埔寨人口生活在城市和乡镇之外，老挝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数字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况。在马来西亚，45%的人口是城市居民；菲律宾的数字是 44%。在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大约 3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心。

个体身份，当地价值：多大变化？

然而，对东南亚最近历史时期发生的所有变化来说，重要的是认识到一个很容易被研究该地区的新手所忽视的基本事实。不能仅仅因为如此多的变化已经发生，并且在东南亚新兴的首都具有如此多的现代性证据，就认为组成该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个体身份，

并且屈服于西方或者全球的规范。着迷于——尤其是在城市年轻人中间——西方流行音乐和国际快餐连锁，加上精英成员运用英语的能力，但这些都不应该使局外人忽视传统的持续力量。东南亚的研究者也不应该轻视历史在形成该地区民众对他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国家的政治应该如何安排的观点中所发挥的作用。

有时候，遥远历史的分量已经被最近的事件加强。越南就是如此。在其他时候，某个国家最近的历史可以对当代的态度施加强大的影响。272 印度尼西亚就是如此。印度尼西亚军队在争取从荷兰独立中的重要作用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因素，它形成了军人有权力在国家中发挥政治作用的的信念，尤其是在军队继续与亚齐和巴布亚的动乱与暴乱作斗争的时候。

本书所讨论的地区和民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些典型的例子，因此，我们提及的是爪哇人和爪哇，而不是松巴人（生活在松巴岛——东印度尼西亚的“外”岛之一——上的人们）；曾经引起了我们很大一部分注意的是低地越南人和泰人，而不是南越的山地中居住的拉德人或者北部泰国楠省的傜族人。在这些更知名的东南亚民族和他们居住的更知名的地区，变化的程度是最大的。毕竟，这些民族和地区一直与他们自己的世界和非东南亚人世界的变化产生的思想和力量有最长的接触。例如，与马来西亚北部吉兰丹州一些遥远的河流上游偏远地区的乡村水稻种植者相比，在城市居住的吉隆坡旅行社的职员显然更有可能接纳一种严重背离了传统马来人生活模式的生活方式。

但是东南亚城市生活与乡村更偏远地区生活之间的明显对比也可能是误导。重新回到我们虚构的职员，不论他或她身处吉隆坡、曼谷、马尼拉或者许多其他迅速发展的城市，由于接纳一种明显现代的生活方式，这个人的生活已经真正改变了多少？尽管喜好现代服饰和音乐，答案也许大大小于第一印象。在熙熙攘攘的东南亚城市（西方的影响在此似乎非常强大）的现代性和巨大变化的表面背后，有很少被休闲游客看到的生活的另一面。当你突然听到一个巴厘加美兰乐队正在雅加达的一个后街敲打出断断续续的节奏的时候，这些演奏者很明显是从 273

巴厘来到首都寻找工作。如果你此时闭上自己的眼睛，就会瞬间从印度尼西亚首都尘土飞扬、拥挤不堪的郊区穿越到巴厘一个庙宇庭院里，在那里身穿华丽服装的拉惹乐队成员正演奏他们的锣鼓和木琴，为巴厘人改编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戏剧片段伴奏。

在曼谷，一个不同的经历可以提供同样的洞见。远离迎合富裕的外国人和泰国人的豪华酒店，有的是为没那么富裕的人们提供的更实惠的娱乐场所。进入其中一个酒店，你会发现除了通常发出震耳欲聋声音的麦克风和扬声器等现代电子产品之外，娱乐场所仍然提供该国带有传统世界色彩的东西。来自王国东北部贫穷农业地区的大量移民在这里聚会，喝着他们冰镇的啤酒，体验着火辣辣的咖喱，歌唱或跳传统圆舞，就好像他们在一个田园式的省级中心或者在他们村子里的庆祝会之中。除了曼谷交通车水马龙的背景声音，一个游客所见到的风景与表面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世界没有什么关系。

一个游客的旅行离开城市中心越远，现代世界的影响就变得越表面。摩托车、电力、固定电话以及越来越多移动电话，无所不在的晶体管收音机和越来越多的电视机，所有这些都是变化的标志。但是明显的连续性仍然存在于乡村节日和娱乐的力量中。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在次国家层次的权力和影响力上体现了连续性。这里有一个连续性的例子，它掩盖了与着装风格和音乐喜好等表面事情有关的许多变化。尽管每个地区都非常不同，而且尽管该地区尚存的两个共产主义国家老挝和越南以及柬埔寨的情况明显不同，但是传统领导人在区和村级的权力和影响力仍然是相当强大的。不过，当人们研究国家层次上的情况的时候，图景就没有这么清楚，

274

领导和管理

为了评估国家层次上的发展，最有用的方法可能是研究从 18 世纪开始的东南亚政府本质的转型。在 18 世纪，该地区的主要国家都是由国王统治的，而小一点的国家则是由各种各样有头衔的人来统治。这些统治者和他们的朝廷体现了传统。这种情况与 21 世纪开始时存在

的情况形成对比。只有在柬埔寨、泰国和文莱，世袭的君主仍然是国家元首。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是国王，但是他是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选举职位。更重要的是，传统统治者的消失伴随着把行政管理与统治者的朝廷联系在一起的政府制度的终结。与之相反，19—20 世纪见证了主要以西方模式为基础的行政管理制度的缓慢建立，这不仅代表了与过去的急剧脱离，而且带来了国家对民众日常事务的逐渐卷入。

因此在这方面，讨论东南亚已经形成的管理形式与讨论西哈努克亲王是否应该被认为是“神王”，或者苏加诺总统是否是传统爪哇领导人的一个典范所获得的价值是一样多的。问题不是讨论与西哈努克和苏加诺以及他们领导风格相关联的传统因素得不到有价值的洞见。相反，值得关注的是：无论东南亚某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多么现代或者多么传统，他作为一个行政管理制度的一部分来发挥作用在形式上非常不同于传统时代的政府制度。

当然，一个苏加诺或者一个西哈努克差一点就使一个管理机构发挥其预设作用的能力瘫痪。而且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东南亚的一些官僚机构也许没有什么效率，但是该地区的政府通过过去 100 年或者 150 年经过重大创新的行政管理制度来运转。而且在这里，不仅仅变化是重要的，变化的本质也是重要的。这些管理制度的存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领导权似乎逐渐掌握在符合一种普遍西化模子的政治家手里，或者是以符合这种模子的男女作为亲密顾问的政治家手里。这是一个概括，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扩充和限定。第一个应该作出限定的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应该被从一般性的评论中排除出去。越南的领导人曾经接触到西方比较特别的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必须被视为西方的产物，至少部分如此。在其缓慢地改变方向以允许形成一个更开放的经济体系之前，越南的社会主义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因此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西方思潮。几乎不需要强调的是，同样必须重点考虑越南传统的影响和对中国模式的借鉴。

另一个更重要的限定是：对领导人状况的概括在每个国家的不同

275

时期都是非常不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东南亚国家实现独立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领导人的风格和特征都非常不同。但是正在讨论的是一个大趋势。尽管其风格可能返回到过去，领导人在东南亚多年来仍然是重要的。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里，经济和政治生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似乎有可能证实一个世纪以来形成的模式。

也许还有其他地方需要进一步的限定。如果严重危机在一个或者另一个东南亚国家出现，那么已经被确定为一个总趋势的模式似乎最不可能继续。我们仍然很难确定 1975 年之后柬埔寨内部的许多发展，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该国在 1970—1975 年可怕的国内战争期间经历的大规模危机为我们理解波尔布特执政期间拒绝西方影响的管理模式提供了一条基本的线索。不过，不论变数和限定是什么，在其他地方是西方(包括苏联)提供了管理模式。即使在非常特殊的缅甸，近 30 年来也一直坚定地努力寻找一个缅甸的社会主义路线，领导人和官僚机构并没有完全摒弃对西方基本模式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构建。

276

总之，20 世纪已经见证了技术官僚在东南亚和非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的兴起和影响。有时候这些“新人”主导了政治体系，而在其他一些时候，他们惶惶不安地与传统领导人共事。但是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被忽视。而且这些“新”人们不仅仅在培训上是新的。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东南亚，在战后时期掌握权力的那些人经常是传统领导阶层的成员。但是这并非完全如此，而且缓慢地但稳步地，来自非精英背景的人们已经开始在甚至是最传统趋向的政府里面发挥突出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一种形式的精英(传统的)已经被另一种形式的精英(绩效精英)所取代。我们可能作出这样的观察，但是这不应该削弱变化的极端重要性。

变化的政治条件和改进的教育机会不能保证人才在东南亚的成功，但是其障碍明显低于以前。在新加坡尤其是如此。长期服务的总理李光耀使智力能力成为国家行政管理中晋升的一个关键资格。应该强调的是，管理的变化以及“新”人们在东南亚国家治理中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一旦实现独立，整个地区都会接纳西方类型的民

主。远非如此，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所发生的事情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或者考虑一下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在其独立后大部分时间内的统治方式。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苏哈托掌握政权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大力采纳了与市场趋向有密切联系的美国大学教员顾问们设计的经济政策，而且这些顾问通常不是传统精英的一部分。的确，他们已经断然地与过去脱离，不仅是苏加诺统治时期实行的政策，而且更明显的是与传统印度尼西亚治国有关的价值观。不过，追求现代的经济政策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苏哈托政权准备接纳西方的民主概念。只有随着 1998 年政权的突然垮台，印度尼西亚才在政治上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化，并且见证了第一位由民主选举而掌握权力的总统。

277

稳固的边界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东南亚所发生的主要管理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学习过西方知识或者受到过吸收西方思想的人的忠告的那些人开始掌握权力，所有这些都不应该使我们忽略其他同样重要的变化。但是由于今天的需求兴趣，这些同样重要的变化可能被轻易地忽视。尽管本书多次指出了这些，但是很容易忘记的是，几个东南亚现代国家在最近才获得他们目前的领土范围。概括一下：在 19 世纪末法国强加殖民控制的时候，老挝是一组诸侯国，甚至更小的小国。马来西亚联邦是由一个世纪前没有共享统一的苏丹国以及婆罗洲的领土组成的。婆罗洲则忠于至少两个苏丹国以及位于海上穆斯林苏丹世界控制之外的地区。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是从荷兰东印度殖民帝国锻造出来的，荷兰东印度本身在 20 世纪初期才实现了对其声称有治理权的岛屿的全面控制。尽管菲律宾被当时的殖民国家西班牙认为是一个单一实体，但是在美国统治之前，还不能说它已经成为一个中央政府之下的管理统一体，而且甚至在美国统治期间也许仍不是。

总之，现代东南亚历史的一个特色是，在过去的 100 年里，旧的松散边界和管理安排已经变得更紧密，证实了旧国家的存在并且划定了新国家的领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老挝很显然是现代作品，哪怕

278

可以找出悠久的历史传统来表明这些现代的国家有重要的前身。殖民时期和其他时期的东南亚现代历史已经确认了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边界,并且强调了菲律宾作为一个政府实体的存在。作为一个鲜明特例的新加坡不仅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个新产物,同时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特存在,除非人们在新加坡看到了古老王国室利佛逝的某个直系后裔。

阶级、经济和权力:什么将驱动未来?

在过去100年或者200年带来的变化之后,东南亚新兴国家的出现或者旧国家的"巩固",尤其是在大陆地区,为当代每个国家非常不同的政治过程做好了准备。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西方,也许能作出这样的概括:现代政治的本质是关于阶级和经济的持续争论。阶级可以通过不同西方国家的不同因素来定义:通过财富、遗产继承、功绩或者职位赋予的地位,或者这些因素的一些或者全部的综合。但是大体上来说,西方国内政治的核心问题涉及国家财富应该如何分配以及将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来确保未来创造更多有利于国家和个人的财富。

不过,人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争论对东南亚许多政治家来说并不总是核心问题,而且也不是联结该地区所有国家政治的一个共同的核心线索。它们最根本的考虑是,希望获得或者保持权力。尽管经济问题不可能被该地区的任何国家忽视,但显然有许多例子,其中经济方面的考虑与其他关注的问题相比,至多是第二位的。缅甸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寻找一个"缅甸社会主义路线"被宣称为国家的首要关注点,但是旧的对种族纷争的关注也是当代缅甸政治生活同样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更重要。对经济发展的切实关注毫无疑问是马来西亚政治生活的特点,但是需要关注马来西亚作为多种族社会的事实意味着该国的政治和政治讨论具有非常特殊的种族趋向特征。关于泰国和菲律宾国内缺少对中央政府认同感的少数族群相关的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因此,种族或者社区政治向现代东南亚的特点注入了非常特殊的元素。对该地区的一部分地方来说,在过去100年或者200年已经成为东南

279

亚历史特点之一的重大变化，还没能成为一道命令推动政治发展乃至产生一组关于国家利益的假设，也还没有使得所有人都有权利去参与那些利益的讨论和决定。

这种状况有可能改变吗？一些评论者认为，变化的出现取决于经济考虑和更狭义的政治因素。采取这种立场的原因之一是这样的事实：东南亚仍然如此依靠外来资本，所以只有当东南亚政府控制了他们自己的经济命运后，它才有可能实现更大的经济平等和更平等的政治过程。这种观点把论点过于简单化了，但即使是更复杂的版本也还是远远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在东南亚，外来资本的作用在本书考察的时期里一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18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转型在很多方面都归因于外来的输入。外来资本在经济领域一直具有明确的功能，并且已经成为东南亚历史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在过去的200年间，而是从非常早的时候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东南亚的本质特征已经使其成为思想、外部政府和资本的接收者。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印度尼西亚巨大的财富在不需要外来资本的情况下也许能被印度尼西亚人开发利用。但是在一个没有那么理想的世界，这一前景已经没有取得成功的可能了。19世纪末期成为该地区历史的一个特点的西方资本流入到东南亚，的确使得该地区严重依赖外部力量。对于该地区没有共产主义政府的那些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依靠外部资本似乎是肯定的。而且甚至在越南和老挝，尽管这种依靠也许被它们存在的共产主义领导所减轻，但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如果西方不再对东南亚实施殖民控制的话，西方力量（在今天是越来越多的日本资本）仍然是该地区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280

经济发展，或者缺少经济发展；与种族或者社区政治相关联的困难；管理体制的转型和出现一个新型的领导人或者管理者——所有这些都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东南亚历史道路的特征。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或者一系列不能忽视的特征，这就是汹涌澎湃的暴动和叛乱，有时候甚至是革命，这些展示了各阶层的各种群体的怨恨和不满，从少数族群到反映国家利益的各种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反殖民革命就是

如此。

东南亚曾经有长时期的暴乱、反叛和革命，这个事实让我们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殖民时期之前、期间和之后该地区的政府为其边界内的所有民众提供可以接受的或者有意义的领导的困难程度。对于外部的观察家来说，很容易理解人们拿起武器反抗殖民政府的至少一部分动机。尽管有点困难，但是人们可以理解种族或者地区少数族群的情感挫折，有时候，他们缺乏对中央权威的认同，因而使得他们别无选择地成为武装的不同政见者。

不过，大多数局外人很难理解何以会形成农民的长期抗议和起义，尤其是形势通常似乎非常不利于这种运动的成功。在这一章简述里没有空间来分析农民政治这些表现形式背后的复杂因素。相反，一个应该吸取的观点是，农民的不满常常具有深刻和绝望的性质，以至于人们认为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反抗。而且这个事实提醒我们注意把东南亚的“富人”和“穷人”区分开来的持续的巨大鸿沟。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从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该地区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很可能是乡村社区的逐步贫困化。东南亚没有其他地方的农业贫困问题可以跟中爪哇和东爪哇相比的了，但是不那么明显的贫困是其他许多地区的特点之一，而且只要那些条件不利地区的人口增长超过资源的承受力，贫困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281

在 21 世纪开始的时候，一个仍然很难令人满意的新情况是，在东南亚出现了与奥萨马·本·拉登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恐怖组织的影子，并且以伊斯兰教的激进设想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这些组织的存在已经确定与 2002 年 10 月巴厘岛爆炸案以及该地区其他地方成功或者未遂的攻击都有关联。目前，除了指出存在这些组织以及他们宣称的伊斯兰教派被绝大多数东南亚穆斯林拒绝之外，我们很难做更多的事情。

对该地区的许多居民来说，现代东南亚历史一直记录的是痛苦的失望而不是希望。19—20 世纪该地区发生的事件涉及一种重要形式的变革和转型，常常截然不同于西方世界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变革，但它也同样重要。与此同时，在这本书中已经勾勒出的变革和转型使得东



1800—2000 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人口增长

20 世纪，东南亚的人口增长是引人注目的。即使印度尼西亚政府努力控制人口增长，但是该国的人口 2000 年还是达到了估计的 2.1 亿。

南亚国家仍然面对着在本质特征上与发达世界国家的顺序不同的问题。让我们再次回到人口迅速增长的问题,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如菲律宾那样不得不去与人口增长作斗争。到 21 世纪中叶,菲律宾将增加近一倍的居民人口。

283

物质资源或者缺少物质资源,同样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东南亚广大农村地区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例如,毁林已经在东南亚大陆和海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可靠的估计,东南亚仅仅在 90 年代就已经失去了至少 2 300 万公顷的森林。这十年失去的森林面积近似于英国的领土面积。没有哪个地方的毁林比菲律宾更触目惊心的了。在那里,1946 年存在的 3 000 万公顷的硬木森林到 1990 年已经减少到不足 100 万公顷了。在越南,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付出的环境代价是毁坏了 220 万公顷的森林和农田。从 1975 年战争结束以来,更多的森林遭受破坏:在战后重建过程中,越南每年使用大约 20 万公顷的森林。柬埔寨遭受了作为其后殖民遗产一部分的波尔布特暴政的无与伦比的恐怖统治,90 年代非法伐木造成的后果是毁灭性的,以至于亚洲发展银行在 1998 年警告说,如果不结束非法伐木,柬埔寨的热带硬木资源将在短短的 5 年内枯竭。因为这样的警告,砍伐速度有所放慢,但是非法伐木这种行为还远远没有消失。

由于东南亚历史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所遵循的道路,该地区将继续受到很多压力,每个国家的首要关注点是保持国家的统一。对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来说,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认同感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因此分离主义者的异议不可能从将来东南亚的舞台上消失。不过,当把该地区的所有问题编成目录,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在所有讨论中注入相当程度的乐观。本章前面指出的预期寿命的改善反映了整个地区大部分地方在生活水平上的显著改进。政府服务延伸到几十年前还未知的地区,而且更多的东南亚人正在获得小学以上的教育。的确,这是当代东南亚最有希望的方面之一。在不下 5 个国家——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三分之二的学龄儿童进入了中学,这大大超过了印度(50%)。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贫穷仍然是一

284

个持续的问题，但是这个事实必须与中产阶级的稳步增长相对照。当东南亚人展望他们未来的时候，他们有理由去希望和相信。认识不到这一点将是非常错误的。

未来的东南亚将会非常不同于100年前，更不用说建造伟大的吴哥、蒲甘和婆罗浮屠纪念碑的“古典”世界了。同样重要的是，未来的东南亚将会继续保留其本身的独特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组成整个地区的单个国家的特点。因为，如果有一个东南亚历史的特点可以达成普遍一致的话，那就是还没有把东南亚国家变成世界上任何其他部分苍白的复制品的变革和转型。东南亚国家保留了它们的个体身份——一个丰富和复杂的历史产物。它的历史只是最近才开始被深入考察，因此在学者、学生和专家前面，仍然有获得新见解和更好理解的前景。无论未来的东南亚是什么样子，对其过去的研究是一个在充满趣味和魅力的世界穿越的知识旅行。这是一个值得去更好地了解的世界。

285

附录：通过艺术和文学发现东南亚

在理解东南亚的过去时，认识该地区丰富的艺术遗产有助于给历史分析的骨骼增加文化的血肉。东南亚和西方作者的小说写作样本同样能够提供一种传统历史有时会缺少的时空感。考虑到这些因素，这篇附录将非常粗略地评论东南亚艺术史的某些重要方面，还提供了对东南亚小说写作有选择的全面考察，这可能有助于读者获得对该地区历史人性方面的一些了解，尽管采用的方式多数是关于非土著局外人对该地区的观察。

东南亚艺术

今天看来似乎很奇怪，第一批接触到东南亚最宏伟的"古典"建筑遗迹的许多欧洲人由于其不同于欧洲的美学而忽视它们或者贬低它们。例如，在18世纪，荷兰商人定期从巴达维亚(雅加达)旅行到位于日惹和苏腊卡尔塔(梭罗)的中爪哇朝廷。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近地经过巨大的婆罗浮屠和普兰巴南纪念碑。不过，在他们的记录中没有提及这些引人注目的庙宇。贸易是商人们关注的事情，而异国情调的爪哇艺术审美没有对他们的商业关注造成影响。这些中爪哇的遗迹便留待斯坦福·莱佛士来发现了。他在1811—1816年担任爪哇副总督的时候，启动了对婆罗浮屠的第一次现代考察。就如较早的一章



发现一座吴哥时期的寺庙

在起初对柬埔寨的寺庙艺术重要性持一些保留意见之后，法国官员和考古学家在向世界展示这些建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幅版画中，法国官员1873年在磅同省的磅柴桢监督清理圣剑寺周围的丛林，该寺建造于吴哥时期。照片采自路易斯·德拉波特(Louis Delaporte)的《柬埔寨之旅》(*Voyage au Cambodge*)，1880年。

287 指出的那样，布意孚神父作为 19 世纪第一批游览吴哥的欧洲人之一，很乐意承认他所看到的庙宇的宏伟壮观，尤其是吴哥窟。但是这种赞许没有给予他在寺庙中看到的雕像。出于 19 世纪中期身为一名男性和牧师的优越感，他宣称吴哥艺术家表现人类形式的努力是“荒唐”的。

不过，尽管直到 19 世纪后半叶仍然几乎无人知晓或者留意，东南亚艺术的许多形式现在已经得到了认可，这是由于其具有审美价值，并能帮助历史学家勾勒出早期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技术特点的证据。随着多年来发展出来的兴趣和鉴赏力，各种艺术越来越受到学者和收藏家的重视。尽管早期的研究，尤其是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一些著名的学者型管理者的研究，集中在遗迹和雕塑上，但在今天，更广泛的对象受到了关注，尤其是过去 30 年，对陶瓷和纺织品的兴趣大大增加。

遗迹艺术

由于规模巨大，柬埔寨的吴哥、缅甸的蒲甘和中爪哇的婆罗浮屠等伟大的寺庙建筑群在整个 20 世纪以及 21 世纪初，已经成为学术和旅游兴趣的一个热点。尽管它们令人印象深刻并且在文化上非常重要，这些遗迹仅仅是在整个东南亚居住地区在欧洲人的影响到来之前建造的众多寺庙和建筑中最出名的几个而已。例如，东爪哇的玛琅和勿里达附近，有很多重要的寺庙仍然存在。过去几十年来，外国人无法进入瓦普庙，但人们现在再一次可以去游览这个位于老挝南部可以追溯到

288 吴哥时期的重要庙宇。它俯瞰着湄公河，距离柬埔寨暹粒附近的吴哥建筑群几百公里之遥。在现代越南中部海岸边的占人的寺庙，使人想起一个在其鼎盛时期可以挑战吴哥高棉国王权力的但已经消失了的王国。在泰国，那里有可以追溯到吴哥时期的重要寺庙遗迹，但是在大城、素可泰和思塔查城，还有重要的泰国城市和寺庙建筑区，以及没有那么出名的建筑群，比如清盛北部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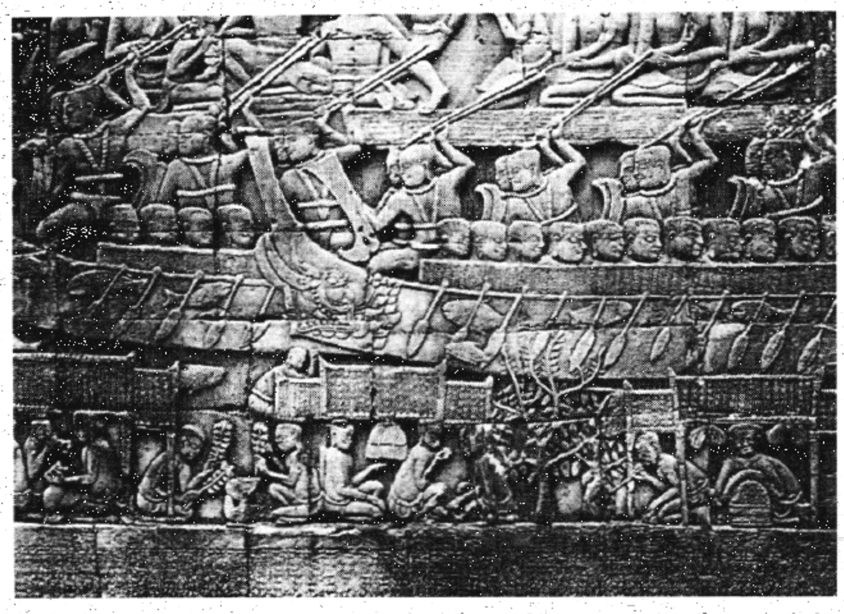
这些遗迹由于种种原因激发了人们的兴趣，甚至包括那些对东南亚历史或者遗迹体现的象征意义没有一点知识的人。吴哥（9—15 世纪）和蒲甘（9—13 世纪）的寺庙建筑群的实物存在和范围令人肃然起

敬。在吴哥，数十座寺庙分散在大约 500 平方公里(200 平方英里)的区域内。它们的中间是吴哥窟，世界上最大的宗教遗迹。尽管其规模巨大，却是在 35 年这么惊人的短时间里建造而成的。蒲甘寺庙的数量几乎让人无法想象。用砖块建造的大约 2 000 座寺庙点缀着广阔的缅甸中部平原。中爪哇城市日惹附近的婆罗浮屠提供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印象。这个巨大的佛像高高耸立在今日的游览者面前，但人们走近它时的心情就如大约公元 800 年其完成建造之后前去朝圣的佛教徒一样。朝圣者围绕着佛像环行，“读着”雕刻在平台浅浮雕上的佛教诞生故事，缓慢地登上遗迹的顶部。在那里，它被四周部分隐藏的佛像所环绕，这些佛像眺望着远处的圣山。在现代重复这种经历至少让一个游览者能够体会到这座遗迹在一千年前赐予其虔诚信徒的力量。

不论大小，散布在整个东南亚的前现代时期的遗迹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同时每个遗迹也有他们建造时期的时空标志。通常在那些印度文化影响到来之前就存在的宗教场所，留存至今的遗迹有时候只受到印度教或者佛教的单独影响，有时候受到两者融合的启发。不过即使受到印度宗教的启发，以及利用了来自印度的建筑和艺术风格，东南亚的历史遗迹从来不会单纯复制次大陆的寺庙和神殿。不论寺庙的位置或者建筑布局的基本形式在方式上与印度教和佛教天地万物的象征性表达有多少类似点，即使一个不熟练的观察家也能立即辨认出吴哥和中爪哇普兰巴南的寺庙不同于那些如奥里萨邦等印度地区发现的庙宇。同样明确的是，在东南亚，一个国家的寺庙风格与另一个国家的寺庙风格是不同的。 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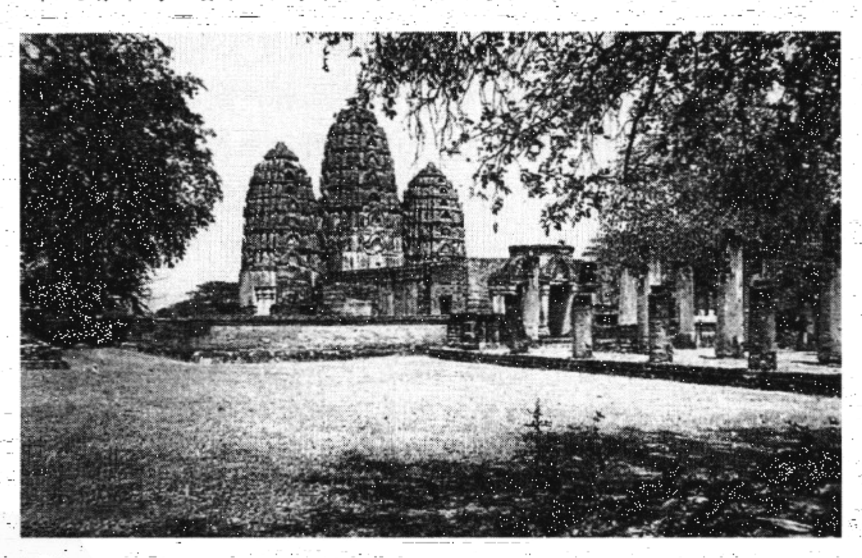
当然，文化历史学家的兴趣与更关注政治问题的学者的兴趣存在着交叉。例如，泰国的历史不仅仅被记录在纪年里。同样重要的是，泰国建筑风格的发展反映了其从柬埔寨帝国的一个边缘地区转型为一个独立王国的过程。其建筑风格仿效了柬埔寨早期的模式，但本质仍是泰国本身的特点。 290

前现代时期东南亚历史遗迹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其丰富的装饰。许多装饰已经遭受了时间、战争和肆意破坏的蹂躏。对于使用灰



巴戎寺的吴哥时期的浅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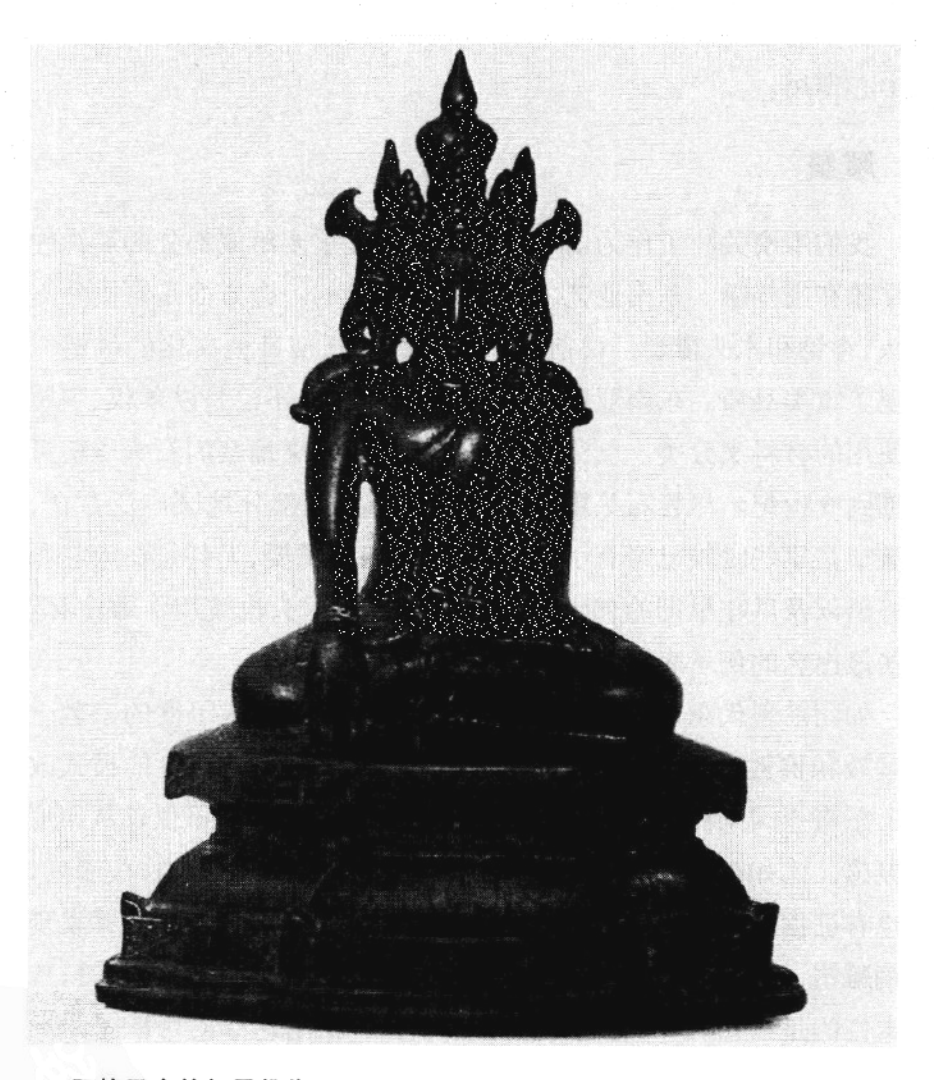
由于结合了对最近事件的叙述性描述以及日常生活的场景，13世纪后期吴哥巴戎寺的浅浮雕是非常杰出的。在这个图案中，浮雕中间部分展现了占人的战舰正在去攻击吴哥的路上，而下面则是柬埔寨人在观看斗鸡比赛、玩骰子和吹长笛的场景。



素可泰的西撒瓦寺

西撒瓦寺位于泰人素可泰城市建筑群内，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它清楚地表明了泰塔从吴哥发现的早期柬埔寨风格(参见第22页的吴哥窟图案)发展而来的轨迹。泰人建筑风格的发展是伴随着从柬埔寨政治统治中实现独立的。

泥装饰的一些泰国素可泰寺庙和外部用灰泥、内部用油漆做装饰的蒲甘寺庙来说尤其是如此。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吴哥的寺庙，浅浮雕和高浮雕仍然装饰着寺庙的墙壁、柱子和楣梁，其清晰度没有受到过去几百年风雨的影响。浮雕图案中的物体种类以及装饰者的创造力是惊人的。在吴哥，浅浮雕描绘的场景包括：印度史诗，历史事件如柬埔寨和占人军队之间的冲突，以及日常生活的“瞬间”。仅仅在吴哥窟，沿着这



阿拉干人的加冕佛像

阿拉干(西部缅甸)的一尊加冕佛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佛像铜身，但有鎏金的痕迹。“呼吁土地见证”的姿势可以追溯到17世纪晚期，这种形象表明了中国元素在其装饰上的影响。(高28厘米)

个巨大遗迹外廊墙壁上的浅浮雕——史上最大的遗迹——覆盖了520米的直线距离(568码)。建造吴哥这种作品或者爪哇婆罗浮屠墙壁所必需的精力和组织显示了宗教在前现代东南亚社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这些伟大的寺庙来说,建造、装饰和维护都需要资源的集中,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建造和维护中世纪欧洲伟大的修道院基座所需要的努力。尽管这种类比并不完全让人满意,但东南亚的寺庙形象在他们的社会中的重要性确实类似于欧洲伟大的教堂和寺院在他们建造时代的中心作用。

292

雕塑

我们刚刚关注了作为前现代东南亚遗迹重要组成部分的装饰性的浅浮雕和高浮雕。东南亚艺术遗产同样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自由站立的石头、青铜和木头雕塑。目前它们被认为与任何其他文化的雕塑一样体现了审美品质。东南亚雕塑的范围是广泛的,不论是以年代、主题还是使用的材料来分类。已经发现的前吴哥时期柬埔寨的石头雕塑可以追溯到6世纪。尽管石头雕塑继续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广泛存在,青铜雕塑在早些时候已经有了先例,并且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大陆和苏门答腊以及爪哇早期的伟大王国衰落之后。木头也被用作雕塑材料,一些最出名的例子来自缅甸。

如同前现代东南亚的寺庙建筑群一样,雕塑也从印度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中吸收了灵感和肖像图解,然后把这些印度的模式改造成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艺术表达。东南亚的雕刻者不仅仅从印度吸收灵感。比如在越南,中国对其艺术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在缅甸,同样也有证据表明中国模式影响了雕塑者。尽管在整个东南亚都发现了青铜雕塑,但是根据雕塑的数量,许多观察家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传统最丰富的是缅甸、泰国和老挝的佛像雕塑。作出这样的判断不是贬低柬埔寨吴哥重要的青铜雕塑或者爪哇很小但很漂亮的小雕塑。不过在缅甸、泰国和老挝,在严苛的肖像标准内工作的不知名艺术家能够在几个世纪里面生产出在审美质量上非常杰出的一系列雕塑。它们给人印

293

象最深刻的一点是把权威感和平静感融合在了一起。素可泰时期的雕塑(13—15世纪)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但是其他中心的雕塑也值得关注。来自缅甸西部阿拉干的佛像雕塑以它们最好的形式非常成功地成为佛教肖像要求的标杆以及具有普遍吸引力的艺术品。的确，这些雕塑普遍存在的高度艺术性已经使它在最近成为让人感兴趣的对象。即使对佛教没有基本的理解，一个非东南亚的观察家也可以对几个世纪前雕刻这些雕塑的无名工匠的艺术成就有所反应。

佛教和印度教并不是曾经在东南亚占优势地位的仅有宗教。在菲律宾，天主教在这个群岛国家的北部和中部岛屿变得根深蒂固。由于西班牙把天主教带到了菲律宾，西班牙形式的崇拜和西班牙的宗教艺术主导了教堂在岛屿的扩张。伊比利亚艺术的分支在菲律宾扎根的一个明显例子是雕刻在木头和象牙上的圣人形象装饰在教堂的圣坛、宗教基座和教徒的私人神龛上。这些形式绝佳并且拥有流畅线条的圣人雕塑可以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最好宗教艺术相媲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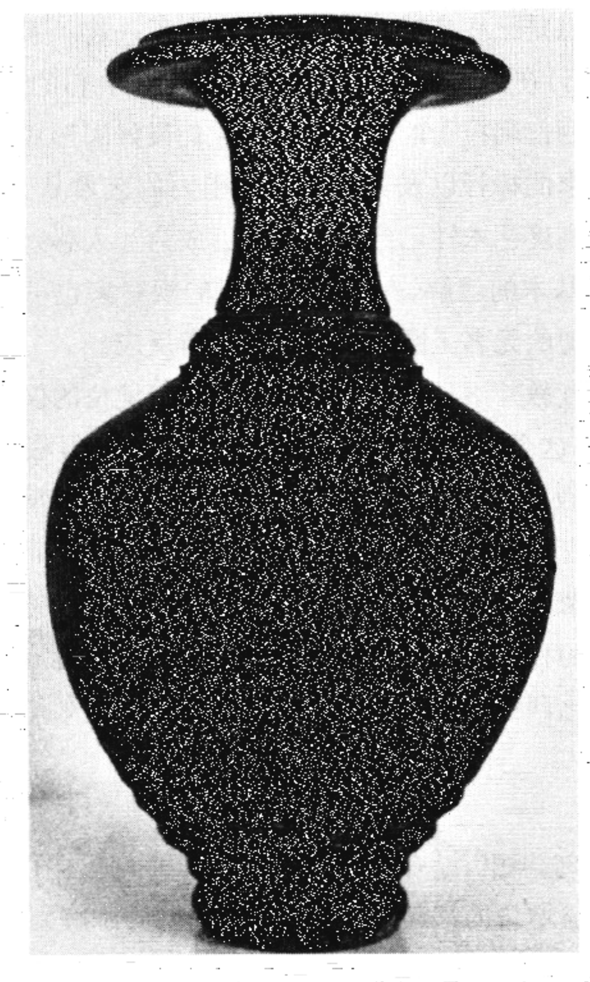
陶瓷

在过去的30年里，没有其他东南亚艺术种类吸引了如同对地区陶瓷研究这样日益增长的兴趣。许多年来，专家们了解到东南亚存在一系列陶瓷，但是上佳的中国陶瓷，仍然是瓷器学者和收藏家的主要兴趣所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尤其是70年代以来，曾经有一个态度上的转变，这是因为意识到来自东南亚一系列地区的陶瓷不仅值得赞许，并且在追踪该地区的历史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94

许多因素促成了不断增长的兴趣。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泰国东北部的班清发现的一个重大考古地点非常重要，在这里发现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600年的陶瓷和青铜器表明存在一个比原先已知存在还早的东南亚当地文化。在学者们开始评估在班清发现的器物的意义时，其他人则了解到更晚时期的大量陶瓷突然在东南亚变得可以购买得到，而且不是来自中国。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地出土的陶瓷是在柬埔寨、越南、缅甸和泰国生产的不同种类的陶瓷物品。它们在

295



柬埔寨陶瓷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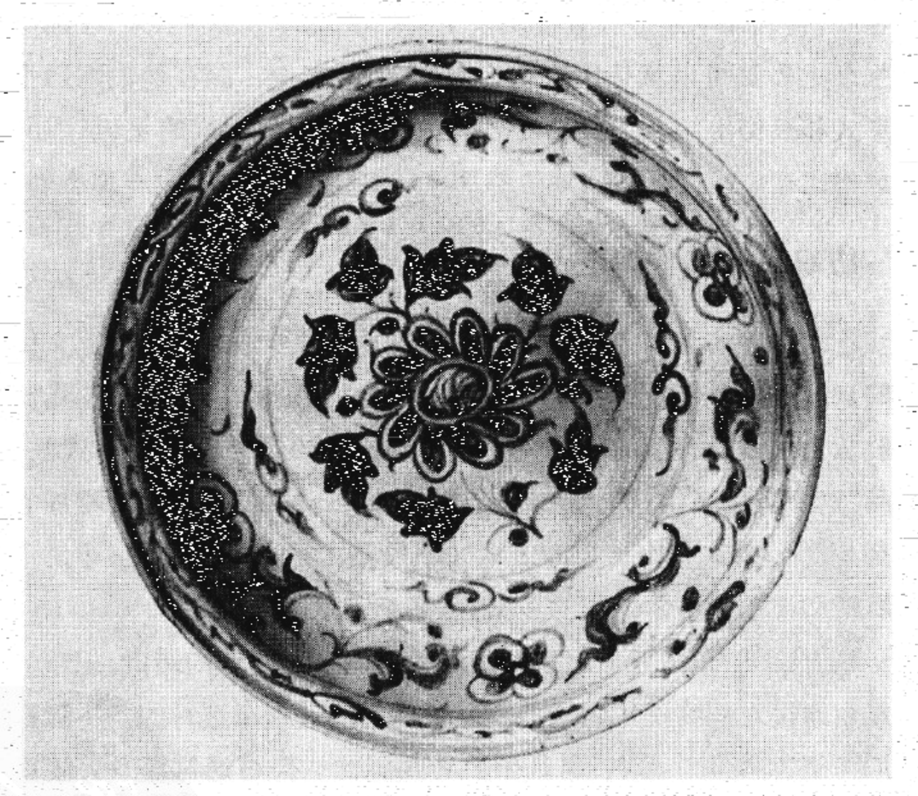
这个生产于12世纪后期至13世纪早期的柬埔寨瓶子是该时期典型粗瓷器型。它的表面涂了一种深褐色的釉。(高29厘米)

市场上出现起到了刺激研究的作用,这不仅使我们对东南亚生产的一系列陶瓷有了更丰富的理解,而且为了解这个特定地区的历史发展道路提供了更多知识。例如,对在泰国中部发现的窑的分析已经提出了这种可能性:泰王国的出现也许比以前认为的更早。总之,过去30年的发现和研究已经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在前现代时期的东南亚大部分地区,除了广泛流通的来自中国的陶瓷之外,同一时期的东南亚大陆还存在当地陶瓷的重要生产中心。现在很清楚的是,这些中心的产品也

在整个地区广泛地流通。

追溯到前现代时期的东南亚陶瓷物品的类型是极其多样的。从尺寸上看，物品既有越南、柬埔寨和泰国生产的小的瓶罐，也有缅甸生产的高达一米多的大石器罐，后者的通用名称是马达班罐。陶瓷产品的形式同样多种多样，罐、碗、花瓶和盘子是最常见的类型。但是还有其他独特物品：在柬埔寨的陶瓷中，动物形象（包括动物和鸟类形状的罐和饮水器皿）相对常见；泰国中部宋加洛周围的窑出土的陶瓷许愿塑像是为了保佑妇女生育，而陶瓷大象则让人想起了这些动物在佛教中所发挥的作用。

东南亚陶瓷的生产工序有一种超越尝试理解产生特定结果所需要专业技术程度的重要性。学者们正在寻求确定这种专业技术的源头： 296



越南陶瓷盘子

该盘生产于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由蓝、黑釉装饰，中间是牡丹图案。（直径26厘米）

是当地发展起来的还是从其他地方引进的。尽管中国的陶工似乎有可能在古典时期建立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东南亚生产中心时发挥了作用,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当地的陶工很快就能够运用任何引进的技术。当地技术和引进技术之间的互动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例如在泰国,一些学者认为也许是越南陶工首先把技术带到了后来成为独特青瓷生产基地的地区。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些越南人也从中国学习了一些技术。

297 甚至对特定形式的设计和陶瓷工艺的起源地没有疑问的地方,东南亚工匠生产独特的民族物品的能力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越南与中国的长期联系确保了中国对越南陶瓷发展的强烈影响。尤其是中国在明朝时期对越南的重新占领(1407—1421 年),促成了蓝色和白色陶器的生产,它们的早期形式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物品。后来,在越南窑的生产上仍然可以辨认出中国的影响,但是当地工匠在他们陶器作品的形式和装饰上注入了他们自己的地方个性。最明显的是,越南的装饰风格比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那些风格要更自由,也没有那么刻板。

纺织品和其他工艺品

不断增加的对陶瓷的学术关注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对东南亚文化扩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已经把对“艺术”的定义扩展到包括以前被降低到一般认为是较低等级的“工艺品”类中的物品。目前几乎没有人在“工艺品”这个类别来讨论陶瓷。与此类似,对东南亚纺织品不断增加的兴趣至少已经把这些物品视为该地区一般艺术遗产的一部分,即使不是以雕塑和遗迹为主要内容的东南亚“高雅艺术”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东南亚最出名的纺织品是印度尼西亚的蜡染,织布的装饰是由通过对织物使用腊来控制反复漂染的过程来进行的。尽管在印度尼西亚之外非常出名,但是旅游者购买的蜡染布通常都是大规模生产的那种,用手工实施设计的辛苦工作已经被放弃,开始使用滑车或者机器来印染。尽管仍然有蜡染制作者以传统的方式来工作,但以这种方式生产的蜡染需要的是缓慢和精确的工作,这意味着它们的产量将

越来越低。

总体来看，以传统方式生产的蜡染与以现代方法印染的蜡染之间没有可比性。传统的方法能够将无限多的不同设计运用在布料上，印度尼西亚爪哇居民的许多设计充满了象征主义。大量的蜡染布总是在爪哇生产。某些设计和喜欢的颜色组合与地理联系在一起。中爪哇的日惹和苏腊卡尔塔（梭罗）以黑颜色和严谨设计的蜡染出名，这个特点反映了与他们传统朝廷相关的公共行为规范。相比之下，来自爪哇北海岸井里汶和北加浪岸的蜡染则更加丰富多彩，几乎肯定地反映了已经在该地区长期存在的来自中国的强烈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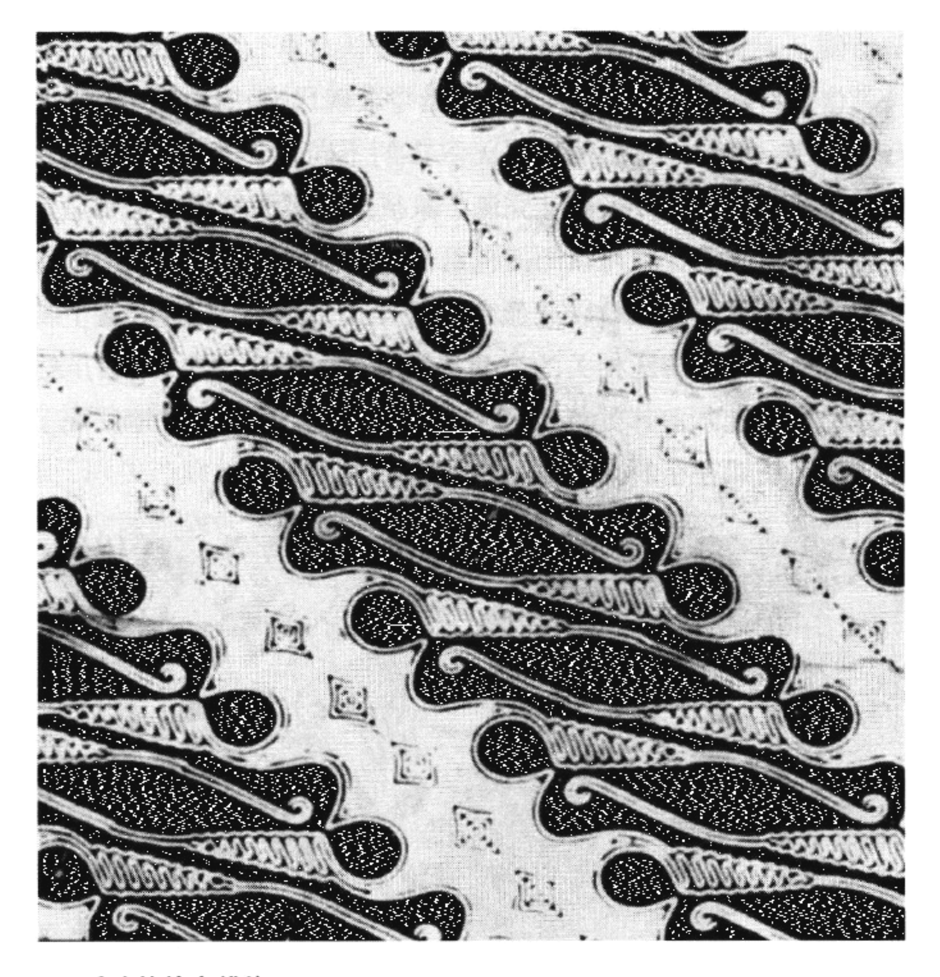
298



爪哇的丝绸蜡染

这件丝绸披肩（Slendang，印度尼西亚语）上的图案是一只深蓝色的凤凰，金箔装饰使其加以突出。这种蜡染是北部爪哇生产的，且在巴厘岛很流行。图中的布是60年前生产的。

299



爪哇的棉布蜡染

这件爪哇蜡染的是以传统的“短剑”图案来装饰的。蜡染的颜色是深蓝色映衬着灰色背景而不是传统的中爪哇棕色背景，这表明它的来源地可能是北部爪哇。图中的布是二战后不久生产的。

印度尼西亚也生产细织纺织品，而且其工艺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也占主导地位。这些梭织布料的种类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巨大的，从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的丝绸，到婆罗洲迪亚克人和菲律宾北部吕宋山地民族的纤维布，无所不包。在它们范围广泛的种类中，纺织品提醒我们注意东南亚物质文化的一般特征。尽管不同学科的学者认为在整个区域有广泛的潜在相似之处，国家和地区的特点已经并且仍然是东南亚艺术遗产的一个特征。这种观察是对的，即使人们讨论的是与武器相关的木雕或者金属制品。在后者的种类中，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拥有的

300

形式多样的波刃短剑就明显不同于大陆王国的直刃剑。

就如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一样，变化是当代东南亚的一个特点，因此已经成为东南亚历史一部分的丰富艺术遗产和工艺品传统在许多情况下已经被慢慢侵蚀。历史遗迹建造的时期在几个世纪以前已经结束，尽管它在巴厘岛的寺庙里留下了回响：在巴厘岛，一个极为丰富的艺术和文化传统以该地区其他地方都无与伦比的活力存活下来。传统的纺织品继续作为当代生活的一个主要特色，尽管大规模生产的替代品已经侵入。陶瓷生产重放异彩，尤其是在泰国。银器匠的工艺品从来没有从泰国北部消失，而且已经在现代马来西亚的东海岸各州复兴。但是不管已经发生和将要到来的变化是什么，东南亚的艺术遗产是丰富多样的，这是对过去伟大和持续的文化活力的一个证明。

小说中的东南亚：个人选择

关于东南亚的小说作品在数量上是巨大的，尤其是在本书研究的现代历史时期。例如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一个法国作者估计，在此之前的 80 年，他的同胞已经出版了大约 1 000 本以印度支那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即使仅仅考虑 19 世纪中期以来与东南亚有关的(长篇)小说和更短的小说作品，一个研究者也将面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寻求去评论那些只是以英语呈现的作品。而且很多努力将是错误的，因为大量的以东南亚为背景来写作的小说由于既没有文学趣味也无法引发历史兴趣，理所当然地被遗忘了。 301

不过，如果评论全部小说作品的艰巨任务能够情有可原地放置在一边的话，可以有选择地考察一些最容易得到、最有影响和最令人回味的以东南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推荐一些东南亚研究者可以阅读的书籍和故事是本书最后部分所尝试的内容，选择比较个性化和多样化，是一个大杂烩；而且，考察的大多数(长篇)小说是欧洲人写的，并且内容是关于在东南亚的欧洲人。东南亚作者的英语(长篇)小说数量相当有限。

小说作为政治声明

用小说来作关于东南亚的政治声明不局限于最近的时期，当时许多以越南战争为主题的小说作品以支持或者反对冲突的明确立场发表出来。毫无疑问，最出名的是以印度尼西亚为背景的荷兰小说《马格斯·哈弗拉尔》(*Max Havelaar*)，该小说的写作有一个深思熟虑的改变荷兰印度殖民地管理方式的目标。

小说于1859年第一次出版，作者是爱德华·陶威斯·德克尔(笔名是穆尔塔图里[Multatuli])，一个在印度尼西亚服务了18年的荷兰人。在此期间，他逐渐对殖民统治的性质不再抱有幻想，他把殖民统治视为荷兰的腐化和对印度尼西亚人利益的无视。这本书主要是自传性质的，但仍然对殖民制度提出了强烈控诉。尽管对于这部小说在其出版后几十年的影响程度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大多数评论家认为，德克尔已经触动了许多官员的良心，这些官员在19世纪后半期来到印度尼西亚并且相信殖民国家应该实行更"自由"的政策。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态度反映了认为殖民当局有责任改进其管理的那些人的生活的真正转向。对其他人来说，变革的必要性被视为是不能改变《马格斯·哈弗拉尔》所描述弊病的风险的一种必要和真实的反映。不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官员正在对德克尔提出的殖民反叛的幽灵作出反应。德克尔质问道："扭曲的弹簧最终不会反弹？长期压抑的不满——压制到政府可以否认其存在——最终不会转向愤怒、绝望和疯狂？"

302

关于殖民地印度尼西亚更复杂的小说是路易斯·库佩勒斯的《隐藏的力量》(*The Hidden Force*)，1900年第一次出版。如同《马格斯·哈弗拉尔》中描写的那样，库佩勒斯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殖民官员。但是与德克尔的主角不同的是，库佩勒斯的主角万·乌迪杰克(Van Oudijek)虽然也是一个殖民制度的质问者，但他更多的是一个固有的不平等以及荷兰统治者与他们的印度尼西亚臣民之间鸿沟的一个受害者。虽然不是战争檄文，但《隐藏的力量》传达了一个强烈的政治信息，而且和《马格斯·哈弗拉尔》一起读也许更加有益。

在这个简短的对怀有并成功实现政治目的作品评论中，另外两个小说值得提及。菲律宾反对西班牙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是扶西·黎刹(José Rizal，何塞·黎萨尔)。作为一个具有极其广泛才能的人，黎刹是两部论战小说的作者，这两部小说帮助形成了19世纪末期失败的菲律宾反抗西班牙的革命道路。《不许犯我》(*Noli me tangere*，1886年第一次出版，并且在1912年以 *The Social Cancer* 为书名出版了英文版)和《起义者》(*El filibusterismo*，1891年第一次出版，并且在1912年以 *The Reign of Greed* 为书名出版了英文版)对菲律宾的殖民制度进行了辛辣的批评，尤其是对天主教修士作为西班牙政策的工具所发挥作用的批评。尽管缺少《马格斯·哈弗拉尔》和《隐藏的力量》所具有的可读性，黎刹的作品应该以其体现的激情和在当时的影响而立足于世。

东南亚的异国情调和浪漫

由于其异国情调及其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物质和文化特征，东南亚激起了许多西方作者的想象。这种异国情调或者"浪漫"是以东南亚为背景的小说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特征，而且反映在四部小说上——一部短篇故事集和一部这里简要提及的"素描"合集里面。

几乎没有小说家曾经尝试写作早期历史时期的东南亚，即便有也很少有人成功。这些少数人中的一个是莫里斯·科利思，在其小说《她是女王》(*She Was a Queen*)中，他描写了13世纪的缅甸。小说松散地以一个朝廷的纪年为基础，告诉了我们女王索(Saw)的故事，她是一个生活在缅甸历史最动荡时期之一的具有很强性格的女人。科利思肯定不是英语小说写作中的名家，尽管他著名的流行历史值得再次关注，但是他在本书中提供了一个近亲繁殖的东方朝廷面对着与其地位不相称的挑战之时令人信服的愚蠢和堕落。由于描述了缅人和华人这两种文化之间的阴谋、背叛和冲突，这部小说对欧洲闯入者接触之前几个世纪里的东南亚世界提供了少有的洞见。

303

另一个试图描述前殖民时期东南亚世界的作者是休·克利福德

爵士,他是在英国扩张到马来亚初期在马来亚工作的学者管理者中最出名的一位。克利福德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写作只是他的业余活动。他的作品水准参差不齐,但是在他的短篇小说集《沉默的另一边》(*The Further Side of Silence*)中,他对19世纪末期传统马来社会的特征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洞见——不论他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多少偏见。克利福德声称,他这部小说集中的故事是以个人经历为基础的,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些。他对前殖民地时期马来亚的描述对他们来说是事实的试金石,尽管这些事实被记录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非文学的目标。因为克利福德毫不隐讳地承认这个事实:他写作的目的是庆祝在英国殖民主义之下,马来人"从他们过去的阴影中走出,进入个人自由的喜悦中,这在白人看来是世俗世界中最重要的事情"。

把克利福德的故事与他同时代的弗兰克·斯韦特纳姆(弗兰克·瑞天威)的作品相比较是很有趣的。跟克利福德一样,斯韦特纳姆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学者型管理者,尽管所有事情表明他是一个不那么有吸引力的人。如他在该书前言中所解释的,他的《马来速写》(*Malay Sketches*)是"一系列对马来风景和马来特征的素描,它们来自已经在这些风景和民众之中度过了他生命中最美好部分的一个人的经历"。不过,这样的声明使斯韦特纳姆的作品在今天可能被视为"纪实小说",但是它有一种浓厚的异国氛围。

304

克利福德曾经与伟大的英籍荷兰作家约瑟夫·康拉德通信讨论他的作品,而这就是我们将要讨论的康拉德最出名的作品之一。如果科利思的小说是有趣的,克利福德的短篇故事包含了各种历史和文化趣味,那么康拉德的《吉姆老爷》(*Lord Jim*)是20世纪杰出的小说之一。在这部关注一个成为假想的马来或印度尼西亚苏丹国权势人物的商业海事官员性格缺陷的作品中,康拉德的主角以沙捞越的詹姆士·布鲁克(James Brooke)为蓝本。相似是表面的,而且这个叫吉姆的人最后不幸死去,没有什么出息,而不是建立了一个王朝。不过,在他的写作中,康拉德捕捉到的是一个人在一个仍然向冒险者开放的世界里能够

做什么。与此同时，利用19世纪晚期在东南亚的经历，康拉德在《吉姆老爷》和其他小说中把背景设置在东部海洋，为在该地区贸易港口和定居地的人们提供了精彩的文学肖像。考虑到康拉德的文学技巧，他毫不奇怪地吸引了很多细致的评论，包括诺曼·谢理的《康拉德的东方世界》(*Conrad's Eastern World*,伦敦,1966)以及更近期的，罗伯特·汉普森(Robert Hampson)的《约瑟夫·康拉德的马来小说中的跨文化冲撞》(*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in Joseph Conrad's Malay Fiction*, Basingstoke,2000)。后一本书不仅认真对待康拉德的文学成就，还从他关于印度尼西亚—马来社会的本质以及19世纪后期西方人是如何感知的作品中得出了有趣的结论。

异国情调更是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王家大道》(*The Royal Way*,首版是1930年以*La Voie royale*为书名出版的法文版)的一个强有力的特点。根据马尔罗自己在1920年代尝试从吴哥的女王宫中盗取雕像的经历，《王家大道》把对法属印度支那压制性的政治制度的批评与一个有力的冒险故事结合在一起。为了在印度支那不为人知的内部寻找文物，主角克洛德(Claude)和更年老一点的同伴佩尔肯(Perken)稳步深入到小说虚构的地区——真正的吴哥遗迹北部的某个地方。在这个偏远的地方，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冒险者与山地民族反抗低地居民的一场起义纠缠在一起。这本书以佩尔肯的死亡和克洛德的下落不明而结束。紧凑、令人回味以及透露了其作者和他写作的时代，《王家大道》是一部小经典。

305

最后，在这个简短的以作者对东南亚“浪漫”的兴趣为标志的书目列表中，应该提及维基·鲍姆的《巴厘岛故事》(*A Tale From Bali*, 1937年出版)。鲍姆在一次游览巴厘岛之后写作了她的故事。当时，如同其他旅游者一样，她迷恋上了该岛屿及其民众丰富的文化生活。她讲述的故事是关于荷兰控制该岛和1906年巴厘岛人和荷兰入侵者之间出现不平等争夺的悲剧之前的巴厘岛朝廷和乡村生活。人类学家也许会挑剔鲍姆描述的巴厘岛人生活的准确性，但是她已经给非专业的读者提供了一个以历史事实为坚实基础的生动故事。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殖民社会

欧洲殖民生活构成了最大量的关于东南亚的西方小说作品的基础。很多作品对所描绘的个体和他们移居的世界进行坦率的评论。在用讽刺性的笔法来写作的那些作者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毛姆。尽管毛姆在20世纪20年代在该地区只渡过了一段有限的时光，但他的写作不仅是以他自己的经历为基础，而且对过去和现在的丑闻保持警觉。毛姆最出名的以东南亚为背景的短篇故事也许是《信》(*The Letter*)和《胆怯》(*The Yellow Streak*)。第一篇的创作来源于一个真实的和臭名昭著的马来亚婚姻丑闻和谋杀。第二篇利用了毛姆自己在沙捞越一次划船事件中的经历。在这两个故事和其他的故事中，毛姆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气息，以至于在他出版了他的故事之后，他被新加坡和马来亚看作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访问者。

乔治·奥威尔(原名Eric Blair)同样也是一个对东南亚殖民生活进行批判的观察者。拥有在该地区生活的更长经历，他根据自己在缅甸担任英国殖民官员的工作经历写作了一部杰出的短篇小说。就捕捉殖民生活的枯燥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言，这部20世纪英语小说《缅甸岁月》(*Burmese Days*)，以及直接利用他在缅甸的职责而写的两篇随笔《射象》(*Shooting an Elephant*)和《绞刑》(*The Hanging*)也许无人能与之匹敌。

306

一部稍微晚一点的小说《新加坡控制》(*The Singapore Grip*)则以类似对新加坡陷落之前和期间的殖民生活的讽刺性考察而出名。这部小说是由一个具有很高成就的小说家雅各·法瑞尔写成，因此这是一本有趣和复杂的书，而且它的特点是作者小心翼翼地关注历史的准确性。

一个鼓舞人心的发展是这样的：许多殖民控制期间写作的小说以及以前只能是东南亚语言的小说正被越来越多地翻译成英文。最近一个越南的例子是武重凤的《红运》(*Dumb Luck*)。它最初发表于1936年，是一个对20世纪30年代殖民生活的尖锐讽刺，展示了对越南搞独

立似乎还很遥远的那段时期里的殖民者的批判。尽管他不幸短命——去世的时候年仅 27 岁，但是他对越南人来说是众所周知。武重凤提供了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的对殖民地越南的洞见。

爪哇作家普拉姆迪亚的四部小说受到文学评论家的高度赞扬，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浓厚兴趣，反映了荷兰殖民主义在印度尼西亚的最后岁月的作品，其总题目为“布鲁四部曲”(The Buru Quartet)，这个题目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当他是布鲁岛上的政治犯的时候，作者已经构思了这些故事。这些作品在其母国长期被禁止出版，因为作者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文化部门有联系。许多人，包括笔者，尽管认为这些小说不容易阅读，但是都认可这些小说的重要性。

种植园生活

以东南亚橡胶种植园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在关于殖民地时期生活的众多书籍中形成了一个次类别。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小说和一部跨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小说对苏门答腊和马来亚开发的大橡胶种植园封闭和单调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明确但让人沮丧的洞见。马德龙·塞伊凯·鲁洛夫和她的丈夫拉斯洛·塞伊凯都写了关注种植园不公平制度的有分量的小说。在种植园里，白人经理可以虐待他们的印度尼西亚工人而不受惩罚。两个人都根据他们在苏门答腊的个人经历而写作，而且拉斯洛·塞伊凯的《热带病》(*Tropic Fever*)和塞伊凯·鲁洛夫的《橡胶》(*Rubber*)在唤起荷兰公共舆论反对他们描述的虐待中发挥了作用。人们对这两本书感兴趣不仅仅在于它们描述了欧洲殖民者对他们的土著工人的傲慢甚至有时候是残忍的行为。在《橡胶》和《热带病》这两本书中种植园生活的枯燥和辛苦都得到了生动鲜明的描写。

307

皮埃尔·布尔以稍后时期为写作主题，创作了关于以他的东南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桂河大桥》(*The Bridge Over the River Kwai*)，他在《马来亚渎圣》(*Sacrilege in Malaya*)中也详细描述了种植园生活的枯燥。布尔也以个人经历为基础写作。他曾经在马来亚一个法国人拥有的种植园工作了 10 年。拥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他嘲弄高

级经理们使自己受制于一套僵硬的规则，这套规则规范着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雇佣工人生活中的每一个元素。布尔作为殖民地生活的敏锐观察者，在描述战前马来亚的分裂的世界上尤其成功。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中，一个人的种族身份经常决定其职业，那里有欧洲人经理、泰米尔割胶工人、华人商人和零售店店主，以及马来贵族或者小股东。

并非所有的小说对与橡胶工业有关的那些人都无情或者公开地进行嘲弄。另一部很出名的关于种植园生活的自传体小说就不是这样。亨利·福柯尼那的《马来亚之魂》(*The Soul of Malaya*)是以作者20世纪20年代的经历为基础的。福柯尼那不是不评论他观察到的殖民生活，他提供的更乐观的画面需要与《橡胶》和《热带病》几乎得不到缓解的昏暗形成了对比。

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许有点奇怪的是，东南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产生一批比较出名的小说作品。可能的原因在于战争促成出版了许多优秀的对该事件的非小说叙述。例如，斯宾塞·查普曼的《森林是中立的》(*The Jungle is Neutral*)，讲述了英国领导的游击队小组(Force 136)的英勇行为，就如任何小说描述战争一样激动人心。

308

如同迄今引用的绝大多数小说一样，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文学讲述的是欧洲人在该地区的故事，而不是对战争的描述，就如同东南亚当地民众看到的那样。战争年代出现的最有分量的小说是詹姆斯·克拉维尔的《鼠王》(*King Rat*)。以克拉维尔自己在新加坡樟宜监狱当战俘的生活经历为基础，《鼠王》提供了一幅人们努力挣扎着让步于残忍监禁的让人不寒而栗的图景。尽管克拉维尔后来的历史史诗更出名，但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值得一再阅读，因为其成功地描绘了在压力下的人们，他们的弱点和他们的勇气。

由缅甸战役引发的两部小说值得一提。缅甸战役经常被描述为“被遗忘的战争”，其标志是一场痛苦的英军撤退，然后在斯利姆(Slim)将军的带领下地顽强的返回，最终打败了日本人。缅甸战役的一些危

险被下述小说有效地捕捉到，一部是知名作家写的，另一部的作者则名不见经传。著名作家贝茨讲述了三个英国人在他们驾驶的飞机坠落之后努力挣扎着在缅甸干旱区生存的故事。几乎跟贝茨的所有作品一样，《紫色平原》(*The Purple Plains*)是一本专业写作的书籍，细节很有说服力。一种类似的细节准确性出现在西德尼·布特沃斯的《三河荣光》(*Three Rivers to Glory*)里。这部小说对发生在缅甸西部的战斗进行虚构的描述，在那里西非边防军不仅与日本人作战还要与印度国民军成员作战，后来是因希望从英国人那里获得独立而站在日本人一边作战的印度军队。

不过，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早些时候作出的评论，但是这两部关于缅甸战役的小说也许被恰当地认为没有同时期的两部非小说那么令人印象深刻。这两部非小说都是由成功的小说家写的。第一部约翰·马斯特斯的《经过曼德勒的路》(*The Road Past Mandalay*)是关于东南亚战争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没有那么出名的是乔治·麦克唐纳·弗莱泽对他在缅甸战时经历的叙述，他是系列小说“弗拉什曼”(Flashman)的创作者。在马斯特斯担任英国高级官员的地方，弗莱泽是达勒姆轻步兵团的一名士兵。他的《缅甸战役回忆录》(*Quartered Safe Out Here: A Recollection of the War in Burma*)是从一个步兵的角度来对缅甸丛林中的战争进行感人的叙述。

309

另一部小说由于其较高的文学品质，应该在此有所提及。保罗·斯洛特以印度为背景的小说受到广泛称赞，他还以战争末期的马来亚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中国爱楼》(*The Chinese Love Pavilion*)是他不太出名的作品，但是仍拥有与他的其他小说同样高的文学品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

虽然关于东南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高质量小说相对缺乏，但是战后的年份出现了大量作品，不仅具有可读性而且提供了一种时空感。列出并且讨论哪怕只是一小部分以战后为背景的小说都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以下只能有选择地介绍一些关于1945年之后较有趣的书籍。

就如本书前几章指出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年份的标志是骚乱。这种状况在该时期一些最好的小说里得到了反映,格富厄姆·格林的《文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一定是最优秀的。以1952年前后的越南为背景,《文静的美国人》部分是一个政治声明——法国人注定要输掉他们的印度支那战争,而且任何寻求形成亚洲历史道路的其他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它准确地捕捉到了越南的外籍人士社区的生活基调。一个读者能够感觉到西贡日常生活的紧张,在那里,到一个酒吧或者咖啡馆去都意味着遭受到手榴弹袭击的风险。在格林的叙述中,该书有两个具有强烈效果的片段:发艳(Phat Diem)的罗马天主教的主教遭到围攻,以及小说的讲述者福勒访问西宁(Tay Ninh)的高台庙。简洁,嘲讽,传神,《文静的美国人》值得多次阅读。

310 有一本书具有非常不同的文学品质,从法国士兵的角度有效地捕捉到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氛围,这就是让·拉特吉的《百夫长》(*The Centurions*)。这本小说记录了法国军官团在为"肮脏的战争"(他们自己判断将被其在法国的政治领导人背叛)而战斗时的痛苦失望。由于以小说的形式叙述了一些因素(它们在引发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士兵反叛中发挥了作用,这也是拉特吉稍后的小说《执政官》[*The Praetorians*]的主题),任何关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小说评论都应该提及《百夫长》。

另一部以战后冲突为其中心主题的小说是韩素音的《餐风沐雨》(*... and the Rain my Drink*)。以马来亚的"紧急状态"时期为背景,这部小说没有假装对那场斗争中的问题进行平衡的叙述。不过,尽管作者是以一个华人观点的支持者来写作,包括那些进入丛林成为抗击殖民政府游击队的马来华人,但是她对马来亚其他种族的描绘同样不缺乏同情。韩素音对华人弱者困境的愤怒使她的读者深刻理解了为什么"紧急状态"会发生,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以及为什么它在形成独立马来西亚的舆论上有如此深远的影响。安东尼·伯吉斯的三部以二战后马来亚为背景的小说并且在后来以单卷本发表的《马来亚三部曲》(*The Malayan Trilogy*)都是对已经过去的殖民场景强烈的讽刺性评

论。没有人否认伯吉斯讽刺的才智和能力，但是很多人会发现他巧妙的作品在痛责马来亚的英国人的时候，近似于老套的种族主义。

不同种类的骚乱为印度尼西亚作家莫赫塔尔·卢比斯和澳大利亚作家克里斯托弗·科契的小说提供了背景。作为被翻译成英语的一个东南亚作者的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卢比斯在他的《雅加达黄昏》(*Twilight in Djakarta*)提供了一种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的悲观看法。以20世纪50年代为背景，卢比斯提了一种对苏加诺时代持批判态度的看法。腐败被描绘成特有的。绝望和贫困是民众的命运。在小说中出现的大多数人在性格上是有缺陷的——很少有人能得到读者的同情。不过，尽管卢比斯的大多数作品有些说教，但由于优美的翻译，《雅加达的黄昏》是对一个处于政治和社会衰退中的城市极有说服力的叙述。苏加诺时代的结束构成了科契的小说《危险年代》(*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的中心主题。从一个局外人的立场来写作，科契的小说比卢比斯更加生动地唤起了真实世界的一个虚构对应物。以苏加诺对印度尼西亚统治最后阶段为背景的另一部小说是布朗驰·达普杰的《黑暗中的猴子》(*Monkeys in the Dark*)。跟科契一样，达普杰关注的是展示一个外籍人士在面对印度尼西亚政治高潮的个人困境。非东南亚人在异国被个人问题困扰这个主题在达普杰后面的作品中多次出现。可能更有成就的是主要以马来西亚为背景的《龟滩》(*Turtle Beach*)，有人对这部小说假定的种族主义的推论进行批评，他们似乎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小说中描绘的那些人中没有人缺少这样或那样的偏见。

311

另一位东南亚作家的主题是现实社会的不平等，他就是菲律宾小说家弗朗西斯·何塞。在他的小说《弥撒》(*Mass*)中，他展示了对一个年轻人与共产主义运动暧昧关系的令人信服的描绘。在努力去接受政治选择的要求的时候，小说的主人公反思了菲律宾社会的本质，它产生的腐败以及在不诉诸暴力的情况下明显不可能实现的变革。一个局外人对同一个社会的观察可以在罗伯特·朱的《丛林酒吧中的哭泣》(*A Cry in the Jungle Bar*)里面找到。朱以反语的手法来写作，有时甚至

近似于讽刺。他对一个澳大利亚援助专家在菲律宾经历的描绘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尤其是关于哪怕是最好心的外国人在进入另一个社会时所面对的困难。

新加坡被许多外籍作家当作写作背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见证了一群活跃地创造了关于历史和当代主题小说作品的本地作者的发展。这些作者中最出名的是林宝音，她的小说和短篇故事关注妇女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作用，尤其是那个社会中弱势群体的作用。她早期的作品以《小小的讽刺：新加坡故事集》(*Little Ironies: Stories of Singaproe*)为代表，在当地受到很多关注，但是最近的《女佣》(*The Bondmaid*)已经给她带来国际关注。在更年轻的作者中，律师和小说家菲立·惹耶勒南是较突出的一个，他的作品关注当地文化价值和当地政治。他最出名的作品也许是《亚伯拉罕的承诺》(*Abraham's Promise*)，这部作品被大多数评论家认为是对新加坡独立前后政治的一种怀疑性评论。

—312

在评论东南亚小说作品的过程中，笔者一直强调这些选择的个人性质。对列举的每一部作品，另一个评论家可能会选择提供一部予以代替，或者对选择出的作品作出不同的判断。而且越接近今天，人们在应该包括哪些书以及不应该包括哪些书上的分歧将更大。越来越多的正在出版的关于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的小说使得选择变得更加困难。

冒着被批评为从越来越多的以“美国时期”的印度支那为基础的小说作品中作出了非常有限的选择的风险，我在最后列举的是四部与众不同的优秀小说：鲍宁的《青春的悲怆》(*The Sorrow of War*)，蒂姆·奥布莱恩的《追寻卡西艾托》(*Going After Cacciato*)，约翰·德尔维吉奥的《第十三谷》(*The 13th Valley*)以及科契的《通往战争的公路》(*Highways to a War*)。鲍宁的痛苦小说提供了来自“胜利”方对战争的看法。这种充满了痛苦的看法导致一些人把它与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相比较。德尔维吉奥的小说是残酷的现实主义，从步兵的经历来看待战争，并且是

以1970年发生在一直延伸到越南南部中央高地的山谷里的激烈战斗为基础的。相比之下，奥布拉恩的书则混合了现实和幻想。这是一部复杂的小说，它开头的第一句“这是一个糟糕的时代”就赢得了读者的注意。科契的小说主要以柬埔寨为背景，逼真地描绘了一个战地摄影师的生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在战争时期的景象和气息。

小说只是理解东南亚的一条途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条途径受到大部分作为非东南亚人的局外人的作者视角的局限。不过，由于研究领域的多样性，以及许多地区和学科仍在等待对东南亚的深入考察，因此忽视通向知识和理解的任何途径都将是一个错误。不论它们的局限是什么，这里评论的书籍和故事能够为每个人对东南亚历史迥然相异的研究中增多一点内容。

313

注释

这一章对东南亚小说作品的简要评价仅仅涉及一些最出名的以该地区作为地理背景的书籍和故事。对以不同国别和地区为基础的大部分小说的更详细考察现在可以在罗宾·温克和詹姆斯·拉什编辑的专题论文集《西方小说中的亚洲》(*Asia in Western Fiction*)中得到。这本论文集1990年在曼彻斯特和火奴鲁鲁出版。一个最近的关于东南亚作品的选集(包括东南亚人的作品)已经作为“旅行者的文学伴侣”系列出版：艾里斯德·丁瓦尔编辑的《东南亚》(*South-East Asia*)(伦敦1994年和芝加哥1995年)。最近一个特别有价值的对马来亚小说的概括论述是弗吉尼亚·霍克的《书写一个新社会：马来亚小说中的社会变迁》(*Writing a New Society: Social Change Through the Malay Novel*)，2000年在悉尼出版。

下面是对本章所列举作品的一个汇编。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第一版的出版时间。

小说

Bates, H. E. , *The Purple Plain*, 1948.

Bao Ninh, *The Sorrow of War*, 1994.

Baum, V., *A Tale From Bali*, 1937.

Boulle, P., *The Bridge Over the River Kwai*, 1954;
Sacrilege in Malaya, 1959.

Burgess, *The Malaya Trilogy*, 1972.

Butterworth, S., *Three Rivers to Glory*, 1957.

Clavell, J., *King Rat*, 1963.

Clifford, H., *The Further Side of Silence*, 1916.

Collis, M., *She Was a Queen*, 1937.

Conrad, J., *Lord Jim*, 1900.

Couperus, L., *The Hidden Force*, 第一版 1900 年在荷兰出版。

D'Alpuget, B., *Monkeys in the Dark*, 1980;
Turtle Beach, 1981.

Del Vecchio, J. M., *The 13th Valley*, 1982.

Drewe, R., *A Cry in the Jungle Bar*, 1979.

Farrell, J. G., *The Singapore Grip*, 1978.

Fauconnier, H., *The Soul of Malaya*, 1931.

Greene, G., *The Quiet American*, 1955.

Han Suyin, ... *and the Rain my Drink*, 1956.

José, F., *Mass*, 1979.

Jeyaretnam, P., *Abraham's Promise*, Singapore, 1995.

Koch, C. J., *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 1978;
Highways to a War, 1995.

Lartéguy, J., *The Centurions*, 1961;
The Praetorians, 1963.

Lim, C., *Little Ironies: Stories of Singapore*, Singapore, 1978;
The Bondmaid, London, 1995.

Lubis, M., *Twilight in Djakart*, 1964.

Malraux, A., *The Royal Way*, 1935.

Multatuli(笔名 E. D. Dekker), *Max Havelaar*, 第一次在荷兰1859年出版。

Maugham, S.,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1977—1984.

O'Brien, T., *Going After Cacciato*, 1978.

Orwell, G. (笔名 E. Blair), *Burmese Days*, 1934.;

Shooting an Elephant and other essays, 1950.

Promoedya Ananta Toer, "The Buru Quartet", *This Earth of Mankind*, *Child of all Nations*, *Footsteps*, *House of Glass*, New York, 1990—1992.

Rizal, J., *Noli me tangere*, 1886;

El filibusterismo, 1891.

Scott, P., *The Chinese Love Pavilion*, 1960.

Székely, L., *Tropic Fever*, 1937.

Székely-Lulofs, M., *Rubber*, 1931.

Vu Trong Phung, *Dumb Luck*, Ann Arbor, Mich., 2003.

非小说

Fraser, George MacDonald, *Quartered Safe Out Here: A Recollection of the War in Burma*, London, 1992.

Masters, J., *The Road Past Mandalay*, 1961.

Spenser Chapman, F., *The Jungle is Neutral*, 1949.

Swettenham, F. A., *Malay Sketches*, 1895.

315

建议阅读书目

尽管这个建议阅读的清单中有相当多的书目，但是就如本书的其他部分一样，列举的书目应该仅仅被认为是对越来越多关于东南亚历史文献的简单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出现的与东南亚历史有关的很多重要的作品已经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而且想深入了解该主题的任何人都需要查阅广泛的期刊和许多能够得到的书籍。下面的清单不包括以英语之外的欧洲语言出版的资料，尽管读者应该了解，有很大一部分资料是荷兰文（尤其是对印度尼西亚来说）和法文的（对以前组成法属印度支那的国家）。而且，越来越多的关于东南亚历史作品是以该地区的语言完成的。

对于希望在更深层次上满足自己对东南亚兴趣的读者来说，现在有广泛的书目助手可以使用。对于本书涵盖的时期，最好的书目指导是扩展的"书目"提供的，即 D. J. 斯坝伯格（D. J. Steinberg）编辑的《寻找东南亚：一种现代史》（*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 A Modern History*）（1971 年纽约，1985 年火奴鲁鲁重印）。这本书的一个修订版在 1987 年出版，包括对 1985 年前出版的资料的书目指导。一个进一步修订版将在 2004 年出版。详细的和最新的单个东南亚国家的书目已经在"世界书目系列"（牛津；圣巴巴拉，加州；丹佛，科罗拉多州）中出版。

316

对于引用程序的注释：一旦一个题目在"建议阅读"中引用，全部的出版细节（出版的日期和地点）在后面的引用中将不再提供。

参考书目和指南

Anderson, D. L., *The Columbia Guide to the Vietnam War*, New York, 2002.

Hay, S. N. and M. H. Chase,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 Bibliogruphic Guide*, New York, 1962(现在过期了，但仍然有用).

Herbert, P. and A. C. Milner, eds,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A Select Guide*, Whiting Bay, Arran, 1989.

Leifer, M., *Dictionary of the Modern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new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1996.

Stearn, D., *Chronology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1400 - 1996*, Sydney, 1997.

Steinberg, D. J., ed., *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 A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1971, reprinted, Honolulu, *1985*, revised edn, New York, 1987.

综合类

历史和历史学

Anderson, B. R. O'G.,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1983;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1998.

Bellwood, P., *Man's Conquest of the Pacific: The Pre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and Oceania*, New York, 1979.

Brown, D., *The State and Ethnic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Christie, C. J., *A Modern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Decolonisation: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London and New York, 1996; *Ideology and Revolution in Southeast Asia, 1900 -*

1980: Political Ideas in the Anti-Colonial Era, Richmod, Surrey, 2001.

317 Embree, A. T. et al, *Encyclopedia of Asian History*, 4 vols, New York, 1988.

Hall, D. G. E.,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4th edn, London, 1981(这种大规模的研究仍然是对该地区最重要的单一历史研究,提供了直到 1981 年其修订时候的百科全书式的材料); ed., *Historians of South-East Asia*, Lonldon, 1962(一系列文章提供了对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发展状况”的评论).

Jeffrey, R., ed., *Asia: The Winning of Independence*, London, 1981.

Lieberman, V., *Strange Parallels: South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 – 1830*, Vol. 1, Integration on the Mainland, Cambridge, 2003.

Mohamed Halib and T. Huxley, eds, *An Introduction to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6.

Murphey, R., *A History of Asia*, 2nd edn, New York, 1996.

Reid, A. and D. Marr., eds., *Perceptions of the Past in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 1979(对东南亚历史写作的评论,尤其是印度尼西亚).

Scott, J. C.,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h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onn., 1976.

Soedjatmoko, et al, eds, *An Introduction to Indonesian Historiography*, Ithaca、NY, 1965.

Steinberg, D. J., cd., *In Search of Southeaast Asia: Modernl History*(已经以其出色的书目而出名,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诠释).

Stuart-Fox, M., *A Short History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Trade, Trade and Influence*, Sydney, 2003.

Tarling, 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2

vols, Cambridge, 1992; *Southeast Asia: A Modern History*, South Melbourne, 2001. Wolters, O. W., *History, Culture and Religio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Singapore, 1982, revised edn, 1999.

地理学

Dobby, E. G. H. *Southeast Asia*, 11th edn, London, 1973.

Fisher, C. A., *South-East Asia: A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Geography*, 2nd edn, London, 1966(即使目前已经过期,但是仍然是对整个地区的主要描述文本).

Hill, R. D., *Rice in Malaya: A Study in Historical Geography*, Kuala Lumpur, 1977; ed., *A Systematic Geography of South-East Asia*, Kuala Lumpur, 1978; *Southeast Asia: People, Land and Economy*, Sydney, 2002.

Logan, W. S., *Hanoi: Biography of a City*, Sydney, 2000.

McGee, T. G., *The Southeast Asian City: A Social Geography of the Primate Cities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1967.

Pluvier, J., *A Historical Atlas of Southeast Asia*, Leiden, 1995.

Ulack, R. and G. Pauer, *Atlas of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1988.

民族学

Barnes, R. H., Gray, A. and B. Kingsbury, *Indigenous Peoples of Asia*, Tucson, Arizona, 1995.

Kunstadter, P., ed., *Southeast Asian Tribes, Minorities and Nations*, 2 vols, Princeton, NJ, 1967.

Lebar, F., G. Hickey and J. Musgrave, *Ethnic Group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Conn., 1964.

Lebar, F., *Ethnic Groups of Insular Southeast Asia*, 2 vols, New Haven, Conn., 1972 and 1975.

318

社会和经济

Booth, A., *The Indonesi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A History of Missed Opportunities*, London, 1993.

Booth, A., W. J. O'Malley and A. Weidemann, eds, *Essays in Indonesian Economic Economic History*, New Haven, Conn., 1990.

Brown, I., *Economic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c. 1830 – 1980*, Oxford, 1997.

Burling, R., *Hill Farms and Paddy Fields*, Englewood Cliffs, NJ, 1965.

Cushman, J., and Wang Guangwu, eds., *Changing Identities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since World War* Ⅱ, Hong Kong, 1988.

DuBois, C., *Social Forces in Southcast Asia*, Cambridge, Mass., 1959.

Elson, R. E., *The End of the Peasantry in Svutheast Asia: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Peasant Livelihood*, 1800 – 1990s, New York, 1997.

319 Evans, G., ed., *Asia's Cultural Mosaic: An Anthropological Introduction*, Singapore, 1993.

Hickey, G. C., *Sons of the Mountains: Ethnohistory of the Vietnamese Central Highlands to 1954*, New Haven, Conn., 1982; *Free in the Forest: Ethnohistory of the Vietnamese Central Highlands 1954 – 1976*, New Haven, Conn., 1982.

Higham, C., *Early Culture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Chicago, 2002.

Hooker, M. B., ed., *Islam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Leiden, 1983.

Keyes, C. F., *The Golden Peninsula: Culture and Adaptation*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1977.

Lee Kam Hing and Tan Chee-Beng, eds,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Shah Alam, Selangor, 2000.

Owen, N. G., ed., *Death and Disease in Southeast Asia: Explorations in Social, Medical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Singapore, 1987.

Pan, L., *Sons of the Yellow Emperor*, New York, 1990; ed., *Encyclopedia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London, 1999.

Purcell, V.,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revised edn, London, 1965.

Reid, A. J. S., ed., *Slavery, Bondage and Dependency*, St Lucia, Brisbane, 1983; ed.,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ωries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ydney, 1996.

Sandhu, K. S., *Indians in Malaya: Im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1786 – 1857*, Cambridge, 1969.

Snooks, G. D., A. J. S. Reid and J. J. Pincus, *Exploring Southeast Asia's Economic Past*, Singapore, 1991.

Swearer, D. K., *The Buddhist World of SoutiJeast Asia*, Albany, NY, 1995.

Wang Gungwu,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ydney, 1981.

艺术

Achjadi, Jo, *Seni Kriya: The Crafts of Indonesia*, Singapore, 1988.

Brown, R., *The Ceramics of South-East Asia: Their Dating and Identification*, Kuala Lumpur, 1977, 2nd edn, Singapore, 1988.

Dagens, B., *Angkor: Heart of an Asian Empire*, London and New York, 1995.

320 Fahr-Becker, G. , ed. , *The Art of East Asia* , 2 vols, Cologne, 1999.

Groslier, B. P. , *The Art of Indochina: Including Thailand* , *Vietnam* , *Laos*, *and Cambodia* , New York, 1962.

Gutman, P. , *Burma's Lost Kingdoms: Splendours of Arakan* , Bangkok and Sydney, 2001.

Guy, J. S. , *Oriental Trade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 , *Ni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 Singapore, 1986.

Jacques, C. , *Angkor*, Cologne, 1999.

Kahlenburg, M. H. et al, *Textile Traditions of Indonesia* , Los Angeles, 1977.

Mannikka, E. , *Angkor Wat: Time*, *Space and Kingship* , Sydney, 1997.

Maxwell, R. , *Textiles of Southeast Asia: Tradition*, *Trade and Transformation* , Melbourne and New York, 1990.

Miksic, J. , *Borobudur: Golden Tales of the Buddha* , Singapore, 1995.

Pisit Charoenwongsa and M. C. Subhadradis Diskul, *Thailand* , Geneva, 1978.

Ramseyer, U. , *The Art and Culture of Bali* , Oxford, 1977.

Rawson, P. , *The Art of Southeast Asia: Cambodia* , *Vietnam* , *Thailand*, *Laos*, *Burma*, *Java*, *Bali*, London, 1967.

Richards, D. , *South-East Asian Ceramics: Thai*, *Vietnamese and Khmer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Art Callery of South Australia* , Kuala Lumpur, 1995.

Shaw, J. C. , *Introducing Thai Ceramics*, *also Burmese and Kinner* , Chiangmai, 1987.

Sheppard, M. , *Living Crafts of Malaysia* , Singapore, 1978.

Wagner, EA. , *The Art of Indonesia* , New York, 1959.

Zéphir, T., *Angkor: A Tour of the Monuments*, Singapore, 2004.

期刊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nn Arbor, Mich.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Modern Asian Studies, Cambridge

Pacific Affairs, Vancouver

除了以上学术期刊，一个当代东南亚观察家能在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周刊中找到重大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报道。

早期东南亚历史

Chou Ta-kuan (Zhou Daguan), *The Customs of Cambodia*, Bangkok, 2nd edn, 1992.

Coedès, G.,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Berkeley, Cal., 1966; *Angkor, An Introduction*, London, 1967;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1968(这三部翻译的都是研究早期东南亚的所有法国历史学家中最杰出的著作).

Hall, K. R., *Maritime Trade and State Development in Early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1984.

Higham, C., *The Archaeology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1989; *The Civilisation of Angkor*, London, 2001.

Mabbet, I. and D. P. Chandler, *The Khmers*, Oxford, 1995.

Marr, D. G. and A. C. Milner,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9th to 14th Centuries*, Singapore and Canberra, 1986.

Mieksic, J., ed., *Indonesian Heritage: Ancient History*, Singapore 1996.

Smith, R. B. and W. Watson, eds, *Early Southeast Asia: Essays in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London, 1979.

Taylor, K. W., *The Birth of Vietnam*, Berkeley, Cal., 1983.

Vickery, M.,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Pre-Angkor Cambodia*, Tokyo, 1998.

Wheatley, P., *The Golden Kherso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Malay Pen insula Before A. D. 1500*, Kuala Lumpur, 1966.

Wolters, O. W., *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Srivijaya*, Ithaca, NY, 1967; *The Fall of Srivijaya in Malay History*, London, 1970.

传统世界

Andaya, B. W., *Perak: The Abode of Grace: A Study of an Eighteenth Century Malay State*, Kuala Lumpur, 1979.

Andaya, L. Y., *The Kingdom of Johor, 1641 – 1728*, Kuala Lumpur, 1975; *The World of Maluku: Eastern Indone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Honolulu, 1993.

322

Aung-Thwin, M., *The Origins of the Classical Burmese State: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Pagan*, Honolulu, 1985.

Gullick, J. M., *Indigenous Political Systems of Western Malaya*, London, 1958.

Heine-Geldern, R. von, *Conceptions of State and Kingship in Southeast Asia*, Ithaca, NY, 1956.

Lieberman, V. B., *Burmese Administrative Cycles: Anarchy and Conquest, 1580 – 1760*, Princeton, New Jersey, 1984.

Milner, A. C., *Kerajaan: 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Rule*, Tucson, Arizona, 1982.

Reid, A.,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 – 1680: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New Haven, Conn., 1988;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Vol. 2: Expansion and Crisis*, New Haven, Conn., 1993; ed., *Indonesian Heritage: Early Modern*

History, Singapore, 1996.

Ricklefs, M. C. , *The Seen and Unseen World in Java, 1726 - 1749: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slam in the Court of Pakubuwana* Ⅱ, Sydney, 1998.

Shrieke, B. J. O. , *Indonesian Sociological Studies, Part Two*, The Hague, 1957.

Taylor, R. H. , *The State in Burma*, Honolulu, 1988.

Woodside, A. B. ,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Cambridge, Mass. , 1971.

Wyatt, D. K. ,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New Haven, Conn. , 1984.

殖民发展

Boxer, C. R. , *The Dutch Seahorne Empire 1600 - 1800*, New York, 1965;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London, 1969.

Bruce, G. , *The Burma Wars, 1824 -1886*, London, 1973.

Cady, J. F, *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 Ithaca, NY, 1954.

Chandran, J. F. , *The Contest for Siam, 1889 -1902: A Study in Diplomatic Rivalry*, Kuala Lumpur, 1977.

Cowan, C. D. , *Nineteenth-Century Malaya: The Origins of British Political Control*, London, 1965.

King, V. T. , *Explorers of South-East Asia: Six Liues*, Kuala Lumpur, 1995.

323

Osborne, M. E. , *The French Presence in Cochinchina and Cambodia: Rule and Response (1859 - 1905)*, Ithaca, NY, 1969; *River Road to China: The Search for the Source of the Mekong, 1866 -1873*, Singapore and Sydney, 1996, New York, 1997.

Parry, J. H. , *The Spanish Seaborne Empire*, London, 1966.

Phelan, J. L. , *The Hispa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Spanish*

Aims and Filipino Responses, 1565 - 1700, Madison, 1959.

Reid, A. J. S., *The Contest for North Sumatra: Atjeh, the Netherlands and Britain, 1858 - 1898*, Kuala Cumpur, 1969.

Ricklefs, M. C., *Jogjakarta under Sultan Mangkubumi, 1749 - 1792: A Hisotry of Division of Java*, London, 1974.

Roberts, S. H., *The History of French Colonial Policy, 1870 - 1925*, reprinted edn, London, 1966.

Stewart, A. T. Q., *The Pagoda Wars: Lord Dufferin and Fall of the Kingdom of Ava, 1885 - 86*, London, 1972.

Walker, J. H., *Power and Prowess: The Origins of Brooke Kingship in Sarawak*, Sydney and Honolulu, 2002.

Woodman, D., *The Making of Burma*, London, 1962.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东南亚历史

文莱

Saunders, G., *A History of Brunei*, Kuala Lumpur, 1994.

Turnbull, C. M., *A Short History of Malaya, Singapore and Brunei*, Melbourne, 1980.

缅甸

Adas, M., *The Burma Delt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on an Asian Rice Frontier, 1852 - 1941*, Madison, 1974.

Cady, J. F.,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Ithaca, NY, 1958.

Hall, D. G. E., *Burma*, London, 1960.

Maung Htin Aung, *History of Burma*, New York, 1968.

Sarkisyanz, E., *Buddhist Backgrounds of the Burmese Revolution*, The Hague, 1965.

324

Taylor, R. H., *The State in Burma*, Honolulu, 1988.

柬埔寨

一直到最近都没有令人满意的柬埔寨通史,戴维·钱德勒(David Chandler)的作品改变了这种状况。

Chandler, D. P. , *A History of Cambodia* , Boulder, Colorado, 1983, 2nd edn, 1993.

Osborne, M. E. , *The French Presence in Cochinchina and Cambodia: Rule and Response(1859 -1905)*.

Reddi, Y. M. , *A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1863 -1955*, Tirupati, 1970.

Tully, J, *France on the Mekong: A History of the Protectorate in Cambodia, 1863 - 1953*, Lanham, Maryland, New York and London, 2002.

东帝汶

Hiorth, F. , *Timor Past and Present* , Townsville, Queensland, 1985.

印度尼西亚

Abeyasekere, S. , *Jakarta: A History*, Melbourne, 1987.

Brown, C. , *A Short History of Indonesia: The Unikly Nation* , Sydney, 2003.

Day, C. , *The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Dutch in Java* , reprinted edn, Kuala Lumpur, 1966.

Elson, R. E. , *Village Java under the Cultivation System, 1830 -1870* , Sydney, 1994.

Friend, T. , *Indonesian Destinies* , Cambridge, Mass. , 2003.

Furnivall, J. S. , *Netherlands India: A Study of Plural Economy* , reprinted edn, Cambridge, 1967.

Geertz, C. ,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 Berkeley, Cal. , 1963.

Ingleson, J. , *The Road to Exile: The Indone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 1927 -1934* , Singapore, 1979.

Legge, J. D. , *Indonesia*, 2nd edn, Sydney, 1977.

Pringle, R. , *A Short History of Bali: Indonesia's Hindu Realm* , Sydney, 2004.

Ricklefs, *M. C. r. A History of Modern Indonesia*, London, 1981, 2nd edn, 1993; *The Seen and Unseen Worlds in Java, 1726–1749: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slam in the Court of Pakubuwana* Ⅱ, Sydney and Honolulu, 1998.

325

Rush, J., *Opium to Java: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s in Colonial Indonesia*, Ithaca, NY, 1990.

Taylor, J. G., *The Social World of Batavia: European and Eurasian in Dutch Asia*, Madison, Wisconsin, 1984.

Wertheim, W. F., *Indonesian Society in Transition*, revised edn, The Hague, 1959.

老挝

Evans, G., *A Short History of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Sydney, 2002.

Stuart-Fox, M., *Buddhist Kingdom, Marxist State: The Making of Modern Laos*, Bangkok, 1996; *A History of Laos*, Cambridge, 1997.

Stuart-Fox, M. and M. Kooyma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Laos*, Metuchen, NJ, 1992.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Chiang Mai, 1994.

马来西亚

Allen, C., ed., *Tales from the South China Seas*, London, 1983.

Andaya, B. W. and L. Y. Andaya, *History of Malaysia*, London, 1982.

Butcher, J. G., *The British in Malaya, 1880–1914: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European Community in Colonial South-East Asia*, Kuala Lumpur, 1979.

Drabble, J. H.,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alaysia, c. 1800–*

1990: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 Houndmills, Hampshire, 2000.

Emerson, R., *Malaysia: A Study in Direct and Indirect Rule*, reprinted edn, Kuala Lumpur, 1964.

Gullick, J. M., *Malaysia*, New York, 1969; *Malay Society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1989; *Rulers and Residents: Influence and Power in the Malay States, 1870 – 1920*, Singapore, 1992.

Hooker, V. M., *A Short History of Malaysia: Linking East and West*, Sydney, 2003.

326

Milner, A. C., *The Invention of Politics in Colonial Malaya: Contesting Nationalism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1994.

Pringle, R. M., *Rajahs and Rebels: The Ibans of Sarawak under Brooke Rule, 1841 – 1941*, Ithaca, NY, 1970.

Roff, W. R.,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New Haven, Conn., 1967.

Stenson, M., *Class, Race and Colonialism in West Malaysia: The Indian Case*, Vancouver, 1980.

Turnbull, C. M.,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 – 67: Indian Presidency to Crown Colony*, London, 1972; *A Short History of Malaya, Singapore and Brunei*.

Winstedt, R. O., *A History of Malaya*, revised edition, Singapore, 1962.

菲律宾

Corpuz, O. D., *The Philippines*, Englewood Cliffs, NJ, 1965.

Cushner, N. P., *Spain in the Philippines: From Conquest to Revolution*, Quezon City, 1970.

Friend, T., *Between Two Empires: The Ordeal of the*

Philippines, 1929 -1940, New Haven, Conn., 1965.

Ileto, R. C., *Pasyon and Revolution: Popular Movements in the Philippines, 1840 -1910*, Quezon City, 1979.

Karnow, S., *In Our Image: America's Empire in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1989.

McCoy, A. and E. de Jesus, eds, *Philippine Social History: Global Tade and Local Transformations*, Sydney, 1981.

Majul, C. A., *Muslims in the Philippines*, Quezon City, 1973.

Zaide, G. F., *Philippin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2 vols, revised edn, Manila, 1957.

新加坡

Lee, E., *The British as Rulers: Governing Multiracial Singapore 1867 -1914*, Singapore, 1991.

Lee, E. and C. T. Chew, *A Histor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1991.

Lee Poh Ping,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Kuala Lumpur, 1978.

Turnbull, C. M.,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 -1975*, Kuala Lumpur, 1977.

Yong, G. F., *Chinese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Colonial Singapore*, Singapore, 1991.

泰国

Bunnag, T.,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of Siam, 1892 - 1915*, Kuala Lumpur, 1977.

Prince Chula Chakrabongse, *Lords of Life: The Paternal Monarchy of Bangkok, 1782 -1932*, New York, 1960.

Stowe, L. A., *Siam Becomes Thailand*, London, 1991.

Thongchai Winichakul, *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

327

body of a Nation.

Vella, W., *The Impact of the West on Government in Thailand*, Berkeley, Cal., 1955.

Wyatt, D. K.,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越南

Buttinger, J., *A Dragon Embattled: A History of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Vietnam*, 2 vols, New York, 1967.

Duiker, W. J.,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Vietnam, 1900 - 1941*, Ithaca, NY, 1976; *Ho Chi Minh*, New York and Sydney, 2000.

Huynh Kim Khanh, *Vietnamese Communism, 1925 - 1945*, Ithaca, NY, 1976.

Karnow, S., *Vietnam: A History*, New York, 1983.

Marr, D., *Vietnamese Anticolonialism, 1885 - 1925*, Berkeley, Cal., 1971; *Vietnamese Tradition on Trial, 1929 - 1945*, Berkeley, Cal., 1981.

Ngo Vinh Long, *Before the Revolution: The Vietnamese Peasants under the French*, Cambridge, Mass., 1973.

Osborne, M. E., *The French Presence in Cochinchina and Cambodia: Rule and Response (1859 - 1905)*.

Smith, R. B., *Vietnam and the West*, London, 1968.

Truong Buu Lam, *Patterns of Vietnamese Response to Foreign Intervention 1858 - 1900*, New Haven, Conn., 1967.

Woodside, A. B., *Vietnam and the Chinese Model; Community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Vietnam*, Boston, 1976.

328

Zinoman, P., *The Colonial Bastille: A History of Imprisonment in Vietnam, 1862 - 194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2001.

第二次世界大战

综合

Collier, B., *The War in the Far East 1941 -1945: A Military History*, New York, 1969.

Daws, G., *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 POWs of World War Ⅱ in the Pacific-the Powerful Untold Story*, London, 1994.

Elsbree, W. H., *Japan's Role in Southeast Asian Nationalist Movements*, Cambridge, Mass., 1953.

Friend, T., *The Blue-Eyed Enemy: Japan Against the West in Java and Luzon, 1942 -1945*, Princeton, 1988.

Hicks, G., *The Comfort Women: Sex Slaves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Forces*, Sydney, 1995.

Iriye, A.,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 1987.

Jones, F. C., *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 1937 -1945*, London, 1974.

Lebra, J. C., *Japan's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in World War Ⅱ: Selected Readings and Documents*, New York, 1974; *Japanese-trained Armies in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1977.

McCoy, A. W., ed., *South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Conn., 1980.

Tarling, N., *A Sudden Rampage: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Southeast Asia, 1941 -1945*, London, 2001.

缅甸

Ba Maw, *Breakthrough in Burma: Memoirs of a Revolution*, New Haven, Conn., 1968.

Naw, A., *Aung San and the Struggle for Burmese Independence*, Chiang Mai, 2001.

Trager, F. N., *Burma: From Kingdom to Republic*, New

York, 1966.

柬埔寨

Chandler, D. P, *A History of Cambodia*, 2nd edn.

Osborne, M., *Sihanouk: Prince of Light, Prince of Darkness*, Sydney and Honolulu, 1994.

Tully, J., *France on the Mekong: A History of the Protectorate in Cambodia, 1863 – 1953*.

印度尼西亚

Anderson, B. R. O'G., *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44 – 1946*, Ithaca, NY, 1972.

Benda, H. J., *The Crescent and the Rising Sun: Indonesia Islam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Hague, 1955.

Kahin, G. McT.,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Ithaca, NY, 1952 and subsequent eds.

Sato Shigeru, *Nationalism and Peasants: Java Under the Japanese Ocupation, 1942 – 1945*, Sydney, 1994.

老挝

Evans, *A Short History of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Kemp, *Alms for Oblivion*, London, 1961.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Caffrey, K., *Out in the Midday Sun: Singapore 1941 – 1945*, London, 1974.

Chea Boon Kheng, *Red Star Over Malaya: Resistance and Social Conflict During and Af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Singapore, 1983.

Chin Kee Onn, *Malaya Upside Down*, Singapore, 1946.

Kratoska, P. H.,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ydney, 1998.

Spenser Chapman, F., *The Jungle is Neutral*, London, 1949.

菲律宾

Agoncillo, T. A., *The Fateful Years: Japan's Adventure in the Philippines, 1941–1945*, 2 vols., Manila, 1965.

Friend, T., *Between Two Empires: The Ordeal of the Philippines, 1929–1946*.

Steinberg, D. J., *Philippines Collaboration in World War Ⅱ*, Ann Arbor, Mich., 1967.

330

泰国

很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泰国的有趣报道包含在期刊论文里面。再次指出的是,现有的最佳参考是戴维·怀亚特(David Wyatt)的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越南

Hammer, E. J., *The Struggle for Indochina*, Stanford, Cal., 1955.

McAlister, J. T., *Vietnam: The Origins of Revolution*, New York, 1968.

Marr, D. G., *Vietnam 1945: The Quest for Power*, Berkeley, Cal., 1995.

Ngo Vinh Long, *Before the Revolution: Vietnamese Peasants Under the French*.

Nguyen Khac Vien,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Vietnam*, Berkeley, Cal., 1974.

战后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期伴随着成功地获得独立,起义和革命,成功和失败,因此促动了大量作品和出版物的出现。任何尝试为这个动荡和激动人心的时期提供一个建议阅读的全面清单的努力都将远远超出本书的目的。下面的建议阅读书目是为了提供一个对该地区总体上以及东南亚单个国家战后历史的简单介绍。选择反映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一本富有启发性和争议的书与一本被认为不会引起争议的

可靠的书同样有价值。

综合

Acharya, A., *A New Region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London, 1993.

Bloodworth, D., *An Eye for the Dragon: Southeast Asia Obserued, 1954 –1970*, London, 1970.

Broi nowski, A., *ASEAN into the 1990s*, London, 1990.

Case, W., *Polilies in Southeast Asia: Democracy or Less*, Richmond, Surrey, 2002.

Edwards, L. and M. Races, *Women in Asia: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Globalisation*, Sydney, 2000.

331

Evans, G. et al, eds, *Where China Meets Southeast Asia: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the Border Regions*, Bangkok and Singapore, 2000.

Frey, M., Pruessen, R. W. and Tan Tai Yo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Decolonization*, Singapore, 2004.

Funston, J.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2001.

Garran, R., *Tigers Tamed: The End of the Asian Miracle*, Sydney, 1998.

Kershaw, R., *Monarchy in South-East Asia: The Faces of Tradition in Transition*, London, 2001.

Lancaster, D., *The Emancipation of French Indochina*, London, 1961.

Leifer, M., *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1989; *Dictionary of the Modern Politics of Southeast Asia*.

Osborne, M., *Region of Revolt: Focus on Southeast Asia*, Harmondsworth, 1971.

Robison, R. and D. S. G. Goodman, *The New Rich in Asia: Mobile Phones, McDonald's and Middle Class Revolution*, London, 1996.

Shaplen, R., *Time Out of Hand: Revolution and Reaction in Southeast Asia, 1969*; *A Turning Wheel*, New York, 1979.

Vatikiotis, M. R. J.,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Trimming the Banyan Tree*, London, 1996.

Walker, A., *The Legend of the Golden Boat: Regulation, Trade and Traders in the Borderlands of Laos, Thailand, China and Burma*, London, 1999.

文莱

Ranjit Singh, G. S., *Brunei 1834 - 1983: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Survival*, Singapore, 1984.

Saunders, G., *A History of Brunei*, Kuala Lumpur, 1994.

Turnbull, C. M., *A Short History of Malaya, Singapore and Brunei*.

332 **缅甸**

Khoo Thwe, P., *From the Land of Green Ghosts: A Burmese Odyssey*, London, 2002.

Lintner, B., *Outrage: Burm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Hong Kong, 1989.

Maung Maung, U., *Burma and General Ne Win*, New York, 1968; *Burmese Nationalist Movements, 1940 - 48*, Honolulu, 1990.

Naw, A., *Aung San and the Struggle for Burmese Independence*.

Silverstein, J., *Burma: Military Rule and the Politics of Stagnation*, Ithaca, NY, 1978.

Smith, M., *Burma: Insurgency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 London, 1991.

Taylor, R., *The State in Burma*, Honolulu, 1988.

柬埔寨

Becker, E., *When the War was Ouer*, New York, 1986.

Chanda, N., *Brother Enemy: The War after the War*, New York, 1986.

Chandler, D. P.,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olitics, War and Revolution Since 1945*, New Haven, Conn., 1991;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Sydney, 1993; *Voices from S-21: Terror and History in Pol Pot's Secret Prison*, Sydney, 2000.

Corfield, J., *Khmers Stand Up: A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Government 1970-1975*, Clayton, Vic., 1994.

Deac, W. P., *The Road to the Killing Fields: The Cambodian War of 1970-75*, College Station, Texas, 1997.

Gottesman, E., *Cambodia After the Khmer Rouge: Inside the Politics of Nation Building*, New Haven, Conn., 2002.

Jackson, K., ed., *Cambodia 1975-1978: Rendezuous with Death*, Princeton, 1989.

Kamm, H., *Cambodia: Report From a Stricken Land*, New York, 1998.

Kiernan, B., *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 London, 1985; *The Pol Pot Regime: Race, Power, and Genocide in Cambodia 1975-79*, New Haven, Conn., 1996.

Leifer, M., *Cambodia: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1967.

Martin, M. A., *Cambodia: A Shattered Society*, Berkeley, Cal., 1994.

Norodom Sihanouk, *My War with the CIA*, New York, 1973.

Osborne, M., *Before Kampuchea: Preludes to Tragedy*, Sydney, 1979; *Sihanouk: Prince of Light, Prince of Darkness*.

333

Vickery, M., *Cambodia: 1975 – 1982*, Hemel Hempstead and Sydney, 1984; *Kampuchea: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Sydney, 1986.

东帝汶

Dunn, J., *Timor: A People Betrayed*, 2nd edn, 1996.

Joliffe, J., *East Timor: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Brisbane, 1978.

Greenlees, D. and R. Garran, *Deliverance: The Inside Story of East Timor's Fight for Freedom*, Sydney, 2002.

Krieger, H., ed., *East Tim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asic Documents*, Cambridge, 1997.

Martinkus, J., *A Dirty Little War*, Sydney, 2001.

O'Rourke, K., *Reformasi: The Struggle for Powerr in Post-Soeharto Indonesia*, Sydney, 2002.

Schwarz, A., *A Nation in Waiting: Indonesia's Search for Stability*, 2nd edn, 1999.

Taylor, J. G., *East Timor: The Price of Freedom*, London, 1999.

印度尼西亚

Brown, C., A *Short History of Indonesia: The Unlikely Nation*.

Crouch, H., *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Ithaca, NY, 1978.

Elliott, D. V. M., *The Sacred Willow: Four Generations in the Life of a Vietnamese Family*, New York and Oxford, 1999.

Elson, R. E., *Suharto*, Combridge, 1991.

Friend, T., *Indonesian Destinies*.

Greenlees, D. and R. Garran, *Deliverance: The Inside Story of East Timor's Fight for Freedom*.

Hill, H. , ed. , *Indonesia's New Order*, Sydney, 1994.

Hooker, Y. M. , ed. , *Culture and Society in Newi Order Indonesia*, Oxford, 1995.

Hughes, J. , *Indonesian Upheaval*, New York, 1967.

Kahin, A. R. , ed. , *Regional Dynamics of the Indonesian Revolution: Unity from Diversity*, Honolulu, 1985.

Kahin, G. McT. ,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Leifer, M. , *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 London, 1983.

Legge, J. D. , *Sukarno: A Political Biography*, 3rd edn, Singapore, 2003.

Liddle, R. W. , *Leadership and Culture in Indonesian Politics*, Sydney, 1996.

O'Rourke, K. , *Reformasi: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Post-Soeharto Indonesia*.

Reeves, D. , *Golkar of Indonesia: An Alternative to the Party System*, Singapore, 1985.

Reid, A. J. S. , *The Indonesian Nationul Revolution, 1945 - 1950*, Camberwell, Vie. , 1974.

Robison, R. , *Indonesia: The Rise of Capital*, Sydney, 1986.

Schwarz, A. , *A Nation in Waiting: Indonesia's Search for Stability*.

Sundhaussen, U. , *The Road to Power: Indonesian Military Politics*, Kuala Lumpur, 1982.

Vatakiotis, M. , *Indonesian Politics under Suharto*, London, 1993.

334

老挝

Brown, MacA. and J. J. Zasloff, *Apprentice Revolutionaries: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Laos, 1930 - 1985*, Stanford, Cal. , 1986.

Dommen, A., *Conflict in Laos: The Politics of Neutralisation*, New York, 1971.

Evans, G., *Lao Peasants under Socialism*, New Haven, Conn., 1990; *The Politics of Ritual and Remembrance: Laos Since 1975*, Chiang Mai, 1998; *A Short History of Laos: The Land in Between*.

Halpern, J., *Government, Politics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Laos*, New Haven, Conn., 1964.

Kremmer, C., *Bamboo Palace: Discovering the Lost Dynasty of Laos*, Sydney, 2003.

Stuart-Fox, M., *Lao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London, 1986; Buddhist Kingdom, *Marxist State: The Making of Modern Laos*, Bangkok, 1996; *A History of Laos*; ed., *Contemporary Laos*, St Lucia, Brisbane, 1997.

Toye, H., *Laos: Buffer State or Battleground?*, London, 1968.

335 **马来西亚**

Bedlington, S. S., *Malaysia and Singapore: The Building of New States*, Ithaca, NY, 1978.

Clutterbuck, R. L., *The Long, Long War*, New York, 1966.

Crouch, 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Malaysia*, Ithaca, NY and Sydney, 1996.

Hussein, M., *Islam and Etlmicity in Malay Politics*, Singapore, 1989.

Means, G. P., *Malaysian Politics*, New York, 1970; *Malaysian Politics: The Second Generation*, Singapore, 1991.

Milne, R. S.,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Malaysia*, Boston, 1967.

Milne, R. S. and D. K. Mauzy, *Malaysia: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Islam, Boulder, Col., 1986.

Ongkili, J. P, *Nation-building in Malaysia, 1946 – 1974*, Singapore, 1985.

Ratnam, K. J., *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sia*, London, 1965.

Short, A.,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 – 1960*, London, 1975.

Stewart, I., *The Mahathir Legacy: A Nation Divided, a Region at Risk*, Sydney, 2003.

Vasil, R. K., *Politics in a Plural Society: A Study of Non-Communal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 Malaysia*, 1971.

菲律宾

Corpus, O. D., *The Philippines*.

Grossholtz, J., *Politics in the Philippines*, Boston, 1964.

Kirkvliet, B. J., *The Huk Rebellion: A Study of Peasant Revolt in the Philippines*, Berkeley, Cal., 1977.

Kessler, R. J., *Repress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Philippines*, New Haven, Conn., 1989.

May, R. and F. Nemenzo, *The Philippines after Marcos*, New York, 1985.

Reid, R. H. and Eileen Guerrero, *Corazon Aquino and the Brushfire Revolution*, Baton Rouge, 1995.

Rosenberg, D. A., ed., *Marcos and Martial Law in the Philippines*, Ithaca, NY, 1979.

Steinberg, D. J., *The Philippines: A Singular and Plural Place*, Boulder, Col., 1982.

新加坡

Chan Heng Chee, *The Dynamics of One Party Dominance: The PAP at the Grass Roots*, Singapore, 1976; *A Sensation of*

336

Independenc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vid Marshall, Singapore, 1974.

George, T. J. S. , *Lee Kuan Yew's Singapore*, London, 1973.

Hill, M. and Lian Kwen Fee, *The Politics of Nation Building and Citizenship in Singapore*, London, 1995.

Lam Peng Er and K. Y. L. Tan, eds, *Lee's Lieutenants: Singapore's Old Guard*, Sydney, 1999.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irs of Lee Kuan Yew*, Singapore, 1998;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 The Singapore Story: 1965 –2000*, New York, 2000.

Milne, R. S. and D. K. Mauzy, *Singapore: The Legacy of Lee Kuan Yew*, Boulder, Col. , 1990.

Minchin, J. , *No Man is an Island*, Sydney, 1986.

Turnbull, C. M. ,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 –1975*.

Vasil, R. , *Governing Singapore*, Singapore, 1992.

泰国

Anderson, B. R. O'G. and Richard Mendiones, *In the Mirror: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Siam in the American Era*, Bangkok, 1985.

Girling, J. L. Z. , *Thailand: Society and Politics*, Ithaca, NY, 1981.

Hewison, K. , *Bankers and Bureaucrats: Capital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hailand*, New Haven, Conn. , 1989.

Hunsaker, B. et al. , *Loggers, Monks, Students and Entrepeneurs: Four Essays on Thailand*, Dekalb, Illinois, 1996.

Kobkua, Suwannathat-Pian, *Thailand's Durable Premier Phibun through Three Decades, 1932 –1957*, Kuala Lumpur, 1995.

Morell, D. and Chai-anan Samudananija,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ailand*, Cambridge, Mass. , 1981.

Wyatt, D. K.,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越南

Blair, A., *Lodge in Vietnam: A Patriot Abroad*, New Haven, Conn., 1995.

Bui Tin, *Following Ho Chi Minh: Memoirs of a North Vietnamese Colonel*, London, 1995.

Colvin, J., *Volcano Under Snow: Vo Nguyen Giap*, London, 1996.

Currey, C. B., *Victory at Any Cost: The Genius of Vietnam's Gen. Vo Nguyen Giap*, London, 1997.

Duiker, W. J., *Ho Chi Minh*.

Duncanson, D., *Government and Revolution in Vietnam*, London, 1968.

Fall, B., *Street Without Joy: Insurgency in Indochina 1946 – 1963*, Harrisburg, Penn., rev. edn, 1963; *Hell in a Very Small Place: The Siege of Dien Bien Phu*, Philadelphia, 1967.

Hue-Tam Ho Tai, *Radic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Vietnames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92.

Jamieson, N. L., *Understanding Vietnam*, Berkeley, Cal., 1993.

Kahin, G. McT., *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 New York, 1986.

Kamm, H., *Dragon Ascending: Vietnam and the Vietnamese*, New York, 1996.

Karnow, S., *Vietnam: A History*.

Langluth, A. J., *Our Vietnam: The War 1954 – 1975*, New York, 2000.

Lewy, G.,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1978.

Lockhart, G., *A Nation in Arms: The Origins of the People's*

337

Army of Vietnam, Sydney, *1989*.

McAlister and P. Mus, *The Vietnam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New York, 1970.

Maclear, M., *The Ten Thousand Day War*, London, 1981.

Marr, D. G., *Vietnam 1945: The Quest for Power*.

Race, J., *War Comes to Long An: Revolutionary Conflict in a Vietnamese Province*, Berkeley, Cal., 1972.

Shaplen, R., *Bitter Victory*, New York, 1986.

Smith, R. B., *An T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 *Vols* Ⅰ-Ⅲ, London, 1981-1991.

Thayer, C. A., *War by Other Means: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Revolution in Vietnam, 1954-1960*, Sydney, 1989.

Turley, W.,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 Boulder, Col., 1986.

Warner, D., *The Last Confucian*, New York, 1963.

Vo Nguyen Giap, *People's War, People's Army*, New York, 1963.

Woodside, A. B., *Community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Vietnam*, Boston, 1976.

大事年表

文莱

1800—1840 年　曾经对大部分的婆罗洲海岸和苏禄群岛行使权力,文莱在 19 世纪初期是一个日渐衰落的国家

1841 年　沙捞越的控制权丧失给了詹姆士·布鲁克

1877 年　文莱把沙巴割让给了北婆罗洲公司

1888 年　文莱变成了英国的一个保护国

1906 年　英国任命一个常驻居民管理文莱

1963 年　文莱决定不加入马来西亚

1984 年　文莱获得独立

缅甸

1800 年以前　从 1752 年缅甸由雍籍牙王朝统治

1824—1826 年　第一次缅甸战争

1852—1853 年　第二次缅甸战争

1885 年　第三次缅甸战争

1910—1940 年　缅甸成为英国的一个殖民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8 年　缅甸获得独立

柬埔寨

1800 年以前　在 18 世纪末期的时候,柬埔寨是一个弱小的国家

并且向泰国和越南朝贡

1864 年　柬埔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处于法国的殖民控制之下

1910—1940 年　柬埔寨作为法国"保护国"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953 年　柬埔寨获得独立

东帝汶

1800 年　以前到了 18 世纪末期,东帝汶已经成为葡萄牙殖民帝国的一部分超过了 200 年

1975 年　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

1999 年　东帝汶投票决定独立

2001 年　东帝汶获得独立

印度尼西亚

1800 年以前　18 世纪末,荷兰的控制扩展到爪哇和群岛大部的主要港口中心

1890—1910 年　19 世纪,荷兰的控制慢慢在群岛扩张,推进发生在 1890—1910 年

1910—1940 年　印度尼西亚(荷属印度)作为荷兰的一个殖民地,一直被统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9 年　通过 1946—1949 年与荷兰的战争,印度尼西亚在 1949 年获得独立

老挝

1800 年以前　在 18 世纪末,没有一个老挝王国存在,一系列领地和小国作为更强大的邻国的附庸而存在。

1893 年　法国确立了对几乎所有现代老挝领土的控制

1910—1940 年　老挝作为法国的一个"保护国",被一直统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1953 年　老挝获得独立

马来西亚

1800 年以前　在 18 世纪末,只有现代马来西亚的部分地区处于

外国控制之下：槟城和马六甲

1824 年　对马六甲的控制权从荷兰转移到了英国人手里

1870—1900 年　从 1870 年以来，英国获得了对马来各王国的殖民控制

1910—1840 年　现代半岛马来西亚处于英国的殖民控制之下

1957 年　马来西亚以马来西亚联邦的形式获得独立

菲律宾

1800 年　至 18 世纪末，菲律宾已经经历了两个世纪的西班牙统治的缓慢扩张

1898 年　反抗西班牙统治的革命失败

1899 年　1899 年西班牙—美国战争的爆发促成了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控制

1935 年　实行内部自治

1946 年　1946 年菲律宾获得独立

新加坡

1800 年以前　在 18 世纪末，新加坡几乎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

1819 年　莱佛士建立了现代新加坡

1880—1940 年　新加坡作为英国的一个殖民地被统治，并且与槟城和马六甲一起成为海峡殖民地的一部分

1963 年　新加坡获得独立

泰国

1880 年以前　在 18 世纪，泰国在新的却克里王朝的统治下正变得日益强大

1851 年　蒙固王登上王位

1868 年　朱拉隆功国王登上王位

1932 年　革命结束了泰国王作为绝对统治者的地位

越南

1802 年　越南统一在阮氏王朝之下

1859—1867 年　法国获得南部越南，建立了交趾支那殖民地

1885—1886 年　法国获得中部和北部越南(安南和东京)

1910—1940 年　越南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

1954 年　越南获得独立

一些参照时间点

1815 年　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

1832 年　改革法案在英国颁布

1848 年　欧洲的“革命年”

1861—1865 年　美国国内战争

1867 年　苏伊士运河开通

1870—1871 年　普法战争

1880—1890 年　欧洲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

1899—1902 年　布尔战争

1911 年　中国辛亥革命

1914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 年　十月革命

1929—1930 年　大萧条开始

1939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7 年　印度获得独立

1991 年　苏联解体

索　引

（条目后数字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C

D

E

I

J

M

Q

R

T

U

V



书名=东南亚史=SOUTHEAST ASIA：AN INTRODUCTORY HISTORY
作者=（澳）米尔顿·奥斯本著；郭继光译
页码=312
ISBN=
SS号=13225383
dxNumber=000011729174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定价：

全文地址=27a7121c8c60fb77ab6d43810a4a6c42/img17/7C1DB9890A26094C3B0BFE2FDDA333F9889587E377F1A2FAC0A33B148CDA95D8A14EE9D426919251CFDB9D21042A32609F15C7F00960DD4002818272E997E59E03D7DB66F311638F5456EB134AB9F93AC3F1811624A3CA7A6EEE49B37A410B2BC4141FE16ADDF9813E2D35FC85BA50E0515A/b13/qw/